

巴林文史丛书



1-8册 (全套) 定价: 280.00元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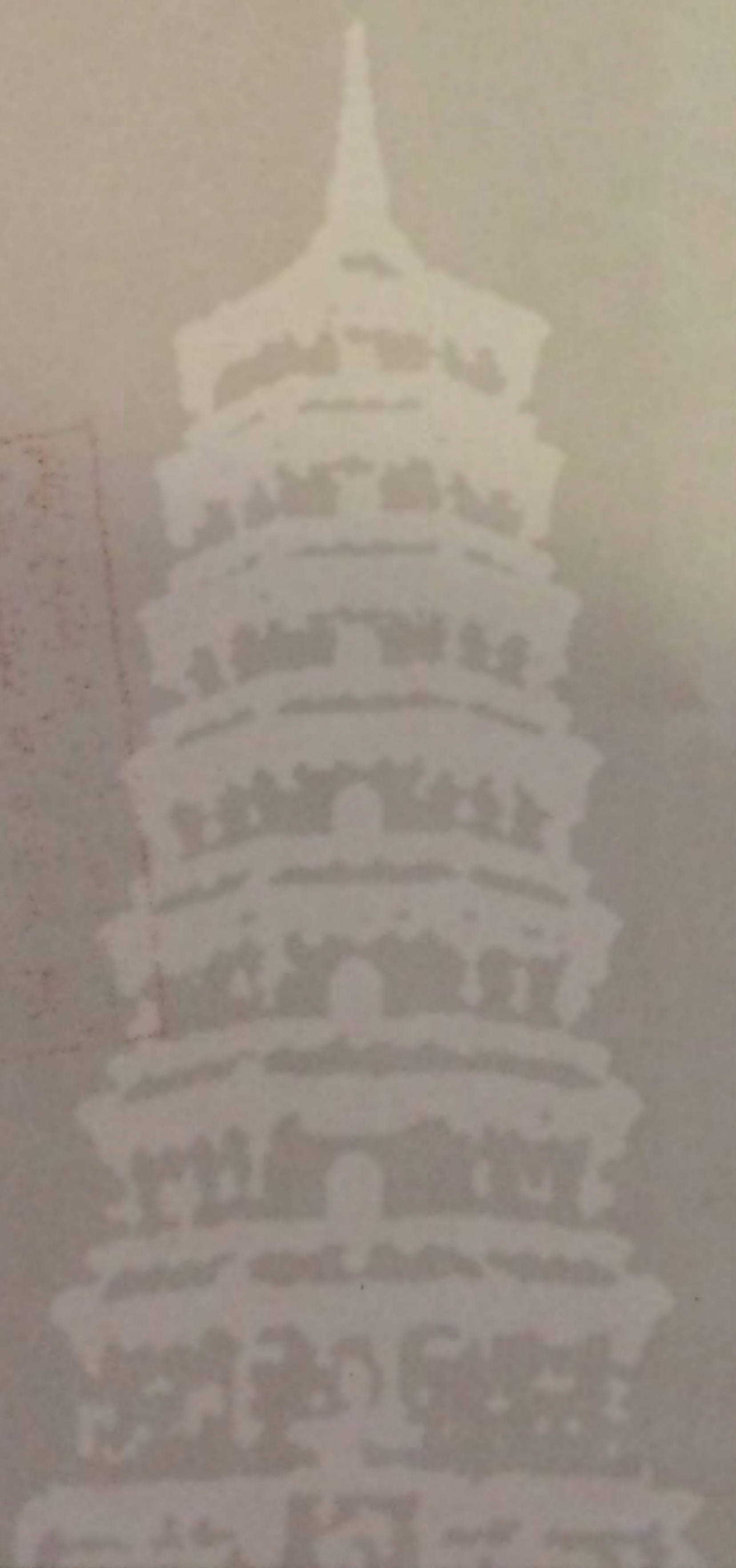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大蒙古学研究中心藏书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Mongolian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Collection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总 编:特·武力更

副总编:叶 喜

主 编:穆 松

说 明

说 明

自 1985 年政协巴林右旗第二届委员会出版发行《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以来,经过旗政协各届领导的一贯坚持和几代文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蒙汉两种版本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共 16 辑(蒙文版和汉文版各 8 辑),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旗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誉,得到了旗党政领导的肯定、关怀和支持。

今年 9 月,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文联《花的原野》杂志社联合主办《首届中国·巴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因此,根据会议需要和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旗政协决定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进行集中印制。《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次校印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保留第一版原貌特征”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以及内容上的明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由于编者能力有限、

时间紧迫等原因,虽付出努力,仍不免会有瑕疵,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同时,在印制过程中由于受一些客观因素限制,对史料第四辑中的人物照片未能刊出。

在此,向始终关心支持巴林右旗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对文史工作倾注心血与汗水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9年9月

写在卷首

奉献给敬爱的读者面前的是巴林人民雪白的“哈达”,是政协文史工作者共同培育的又一朵绚丽的鲜花——《巴林右旗文史资料》汉文版第二辑。

敬爱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该书的第一辑是在乙丑年九月(一九八五年)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情景。

在巴林右旗出版发行《文史资料》,充分说明了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政协文史工作在巴林右旗有了新的进展。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们根据撰稿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篇幅、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贬损的原则和在定稿过程中,贯彻了广征博采、多谈并存的原则编辑出版了这辑史料。

本辑所选用的四十余篇史料,仍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为主,但也有的采用调查研究搜求整理、参校此勘的第二、三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对读者提供

一个颇为完整的认识。

撰写文史稿件,讲究实事求是,返以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代久年湮,往事纷繁,经历者的实践又不无局限,因而导致内容记载抵牾,材料窜乱不确,文字衍夺错讹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在编审过程中,尽我们的力量做了一些修改,校正、补充……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各界人士搜篋忆昔、查阅资料,撰纂、整理稿件,积极支持我们;本会主席和秘书长亲自审稿;旗委、政府和有关单位热情关怀;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苏赫同志为本辑题写书名。所有这些,都是为这辑“史料”的出版起了决定性的因素。对此,我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相对而言,在基层政协编辑出版文史书籍,难度是比较大的。受人力、时间和资料的拘限,特别是编者的学识薄浅,在书中难免有纰漏,望读者不吝赐教,则幸甚!

编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沿 革 篇

巴林部的地理方位…………… 乔吉(1)

巴林部姓氏浅谈 ……………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穆松(10)

林丹汗碑…………… 占·达木林斯荣(23)

奈曼苏木…………… 撰文:恩和巴图
译文:鲍银虎
达伦布和
审文:那顺(26)

记 实 篇

巴林王府被烧前前后后…………… 撰文:恩和巴图
译文:巴特尔
审文:穆松(50)

伪巴林右翼旗公署参事官多田正美覆亡记 ……………
…………… 口述:张明乐
整理:王兴贵(65)

李化亭一家在巴林右旗胡日哈村…………… 口述:喇嘛扎布
整理:暴云峰 穆松(70)

巴林右旗政治处建立前后记实 穆松(77)

索博日嘎一带的初垦 撰文:曹达那木 乌兰巴特尔
译文:穆松(82)

昭乌达盟实业学校 叶贺吉茹木(85)

索博日嘎努图克发生人间鼠疫记实 ... 王久惠 叶喜(87)

解放战争时期征粮工作片断
——访明根巴雅尔记实 穆松(89)

巴林右旗畜牧兽医工作发展概况
..... 那·色灯 商润峰(96)

一九四八年土匪进入大板记实 陈文增(102)

文物古迹

巴林境内的古长城——边堡·界壕 穆松(105)

出土金银葬具实录及其他 韩仁信(109)

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苗润华(115)

清百寿图玉碗 乌兰其其格(126)

荣宪公主之章 布和朝克图(128)

珍奇的古袍 郭振有(130)

人物篇

拉西彭楚克及其《水晶念珠》 乔吉(133)

乌勒慧充阿 撰文: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色杰
审文:穆松(137)

暴乐梅林 清格乐巴图 穆松(148)

蒙古族才女桃崇阿 穆松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 整理:那·宝音贺希格
译文:白占柱(164)

察隆阿 阿其图(176)

郭俊卿参军记 王兴贵(181)

陶格陶 王兴贵(185)

东鲁布 文辑(189)

教 育 篇

艾里学校和必车赤学斋 达木林巴斯尔(192)

清卓力克图在巴林教育事业的贡献
..... 撰文: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穆松(201)

叶纯浦私塾 陈文增(212)

回 忆 录

见日本侵略军初进大板 莫胡尔(217)

解放初期妇女运动的一段回顾 武云格日勒(219)

忆乌日塔叛变初我的一段经历 口述:抗喜
整理:乌力吉木仁(223)

在奥伦陶勒盖的交锋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关布扎布(226)

忆昔日巴林青年的追求
——记内蒙古自治学院的一段回忆
.....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曹都(232)

回忆扎噶尔王片断..... 口述:德力格尔
整理:叶喜(242)

我的活佛生涯..... 口述:元旦扎木苏
整理:叶喜(246)

经济篇

清末民初巴林右翼旗畜牧业的经营和商品生产交易略述
..... 韩士龙(250)

巴林右旗境内森林资源及其历代的被破坏略述
..... 莫胡尔(259)

生产部..... 陈国卿(267)

福和斋..... 陈国卿(269)

大众合作社..... 陈文增(272)

民俗篇

帕尔吉..... 特·武力更
译文:孟和(274)

巴林蒙古族传统生活用具..... 叶贺吉茹木(276)

巴林蒙古族的马具..... 叶贺吉茹木(282)

种漫撒籽地的大犁杖..... 叶贺吉茹木(290)

宗 教 篇

镇敌金刚祭辞进善速成经——汗山祭辞经文
..... 搜集: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布和朝鲁(293)

日伪时期巴林右旗喇嘛教片断..... 阿其图(296)

风 味 食 品

赛罕汗山上的蘑菇..... 哈斯巴根(301)

巴林火锅..... 郭振有(303)

巴林人的传统食品——呼日森巴达..... 布和朝克图(307)

于寿山烧鸡..... 陈文增(308)

巴 林 传 奇

康熙下马石..... 郭振有(310)

巴林部的地理方位

乔吉

(一)

关于巴林部,《蒙古秘史》、《元史》和十四世纪的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史集》等著名史书都记载了该部的源流和该部一些著名人物,如纳牙合和阿剌黑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后裔白颜等人而外,还记载了成吉思汗时巴林部右翼千户长豁儿赤、那颜等。《史集》虽以记载蒙古诸部详尽而著名,但却没有提出成吉思汗时和成吉思汗以前巴林部的地理方位。本文就据有关文献中的零散记载,将成吉思汗时代及以后一段时间的巴林部所属地理方位作以简要概述。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建立了蒙古国家在建国大典上成吉思汗论功行赏时,对巴阿邻部的豁儿赤说:“在豁儿赤[所辖]巴阿邻部三千户之外,[再]与塔孩、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凑成万户,[曰]豁儿赤管辖,做万户,在沿着额儿的思[河]林木中百姓之地,自由扎营居住,镇抚林木中的百姓……未得豁儿赤的同意,林木中的百姓不得做任何行动。”^②这一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就把额儿的思河流域的一部分林木中百姓赤那思、帖良古惕、脱额列思等部封给豁儿赤,并

指定豁儿赤所辖的三千户巴阿邻同这些部落沿着额儿的思河流域游牧。《秘史》所记及一条,对我们了解成吉思汗时和成吉思汗以前的巴林部地理方位都提供了极可靠的史料。

那么,我们想知道八邻部当时的地理方位,还必须了解额儿的思河流域当时那些部落,如帖良古惕、脱额列思和赤那思等部的居地以及豁儿赤封地的方位及大体情况等。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西部是乃蛮部。乃蛮部当初居住在乞儿吉思地方。③大概是黠戛斯人南下的时候,乘回鹘汗国的崩溃,占领了从额儿的思河到和林的广大土地。这是乃蛮部故地的地理方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地区时,乃蛮部已分裂成为两部,即一部分住在多山之地,另一部分住在平原上。据《秘史》记载:就不难看出分裂为两部的乃蛮情况。《秘史》说:“其后(即1202年)成吉思汗与王汗两人去征乃蛮古出古惕(氏族)的不亦鲁黑汗,当(他)在兀鲁黑·塔克④的豁黑、兀孙⑤的时候[杀]到。不亦鲁黑汗不能对抗,就越过阿勒台(山)退却了。从锁豁黑,兀孙追赶不亦鲁黑汗,越过阿勒台山,顺着忽木升吉儿。⑥。[地方]兀泷古河⑦追袭……顺着兀泷古河追去,在乞湿泖·巴失湖⑧赶上不亦鲁黑汗,就在那里使(他)陷于绝境。”⑨我们根据上述记载,不仅知道了不亦鲁黑汗败逃的道路,而且也明确了解到不亦鲁黑汗实住在阿勒台山区。这就是《史集》所谓住在多山之地的那一部分乃蛮。至于乃蛮部的另一部分《秘史》也给我们提供了其地理方位。据《秘史》一二〇四年乃蛮部塔阳汗在斡儿浑河东纳忽山的战役中被擒

获,其子古鲁克沿着塔米尔河逃走。⑩、一二〇五年春,乃蛮古出鲁克汗和篾儿乞惕部的脱黑脱阿两个人合流一起,在额儿的思河的不黑都儿麻。⑪、源头,一起整顿军马。成吉思汗远征前来攻打时,乃蛮部古出鲁克不能与篾儿乞惕部共同作战而逃亡,途中在横渡额儿的思河的时候,多半沉没,死在水里。古出鲁克汗渡河后,经过畏兀儿和台儿鲁兀惕地方,前去回回地方,与在垂河流域的西辽古儿汗相会。⑫据上述古出鲁克败逃的情况和路线来看,这一部分乃蛮人住在额儿的思河上游的平原上。这就是《史集》所谓住在平原上的那一部分乃蛮。

再考察一下,《秘史》所记帖良古惕和脱额列思(见207节)居地当时在什么地方。据《史集》这两个部都被称为森林部落,因为他们住在乞儿吉思人和谦谦洲人地区的森林里。在费舍尔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一七七四年)一书所附古西伯利亚地图上,帖良古惕人被标在鄂比河上游及其右岸支流托母河沿岸居住。⑬、前文引《秘史》,这两个部受八邻部豁儿赤管辖。我们可从《元史》中说:“八怜(应为邻)脱列思所隶户六万五千余锭”⑭。此脱列思即《秘史》所谓脱额列思,元时仍属八邻部,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部应在乞儿吉思谦谦洲以西,额儿的思河以东地区居住。

我们又从《史集》和《元史》中的一些记载,便可知豁儿赤分地中的八邻部时居地。《史集》(波伊勒英译本)说:“脱黑·帖木儿、昔里吉、撒里满出征,进至也儿的石(即额儿的思河)八邻部地,他们各自忙于进行作战准备”⑮、《元史》中说:“床兀儿……大德元年(1297年)袭父职,领征北诸军

师,师逾金山(即阿尔泰山)攻八邻部之地,八邻部南有答鲁忽河,其将帖良台阻水向军……”,又说:“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援八邻部之将李白军遇”④等等。这里所说的“八邻之地”即豁儿赤的分地。八邻部豁儿赤万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他自己所在的三千户。因而元代称豁儿赤所在的分地为“八邻之地”。《秘史》所记赤那思就在这个“八邻之地”之内,也是豁儿赤的属民。

根据上述地理方位,我们可以概述豁儿赤分地即当时八邻部居地为今叶尼塞河西北,额尔齐斯河(即《秘史》作额儿的思河)和鄂比河(指今新西伯利亚,克失的迷城往下部分),上游一带广阔地带。到了十三世纪末时大概从这个地方迁居到喀尔喀河以东地带。

注:①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译本,一九八三年第306页(下简称史集)。

②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湾,一九七九年,第207节(下简称《秘史》)。

③《元史》68卷,《地理志》,《史集》第一卷第一册223—224页。

④兀鲁黑、塔克,突厥语意为大山,指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河支流索果克河与额儿的思河右岸支流布克多尔玛河的分水岭。

⑤淄豁黑、兀孙:孙河,指今科布多河支流索果克河。

⑥、忽木升吉儿:《元史·定宗本纪》说:“三月戊中”(1248)年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当即此地。据札奇斯钦先

生指断,当在乌陇古河上游之地,见《秘史》第158节注④。

⑦、兀流古河:今乌陇古河,有东西两源,皆出于阿尔泰山。

⑧、今乌陇古湖,旧图作布伦托海。

⑨、《秘史》第158节。

⑩、《秘史》第196节。

⑪、Buheurma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奎屯峰。

⑫《秘史》第198页。

⑬、《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02页。注②,又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11—12页。

⑭、《元史》第20卷,中华书局校勘本,一九八三年,第431页。

⑮、《史集》第二卷,第313页注⑦。

⑯、《元史》,第128卷,中华书局校勘本,一九八三年,第3135页。

(二)

我们知道,现在的巴林右旗居地是清天聪八年(1634年)“定蒙古牧地疆界”时所划定的居住牧地。那么在中国史上所谓“明代蒙古”时期巴林部是否也在此地驻牧?当然不是。要明确当时的巴林部居地首先要了解史称“喀尔喀五部”的来历,因为我们所讨论的巴林部是“喀尔喀五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喀尔喀五部”,这是蒙文历史文献上出现的名词,其原

文为 ᠠᠨᠢᠯᠢᠨ ᠶᠤᠨᠠᠨᠢᠯᠢᠨ 意为“五鄂托克喀尔喀”，俗称“喀尔喀五部”。学界很早注意到“喀尔喀五部”的组成部分，精通蒙文的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曾根据蒙文“额尔德尼·脱卜赤”（汉译“蒙古源流”），试图揭示“喀尔喀五部”的组成部分，其后日本学者和田清博士也有这样打算，但都未能指出“喀尔喀五部”的组成部分。继这两位名家之后，对这个问题有所进展的学者就是美国塞瑞斯教授。他利用十八世纪蒙古史家巴林部拉西彭斯克所著《水晶念珠》(dolorEriKe)一书，正确指出了“喀尔喀五部”的名称，这在蒙古学研究上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进展。因为塞瑞斯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蒙古学家正确指出“喀尔喀五部”的名称。当然，亨利·塞瑞斯教授利用蒙文文献指出了“喀尔喀五部”的名称，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相比较，可以说是冲击性的胜利。但我觉得塞瑞斯教授的研究，在史料来源问题上尚有欠缺。

在蒙古人写的史籍中《水晶念珠》并非第一次指出：“喀尔喀五部”的名称。据今我们所知道的蒙文文献中，喀尔喀五部的成员之一扎鲁特部高僧答哩麻固什撰写的《金轮千辐》一书第一次全面指出了“喀尔喀五部”的名称。而《水晶念珠》则是据《金轮千辐》摘录了“喀尔喀五部”的名称而已。

据《金轮千辐》记载：喀尔喀五部为巴林、扎鲁特、巴约惕、弘吉刺惕和乌齐叶特。据此，我们知道，我们要讨论的巴林部是喀尔喀五部的一个成员。那么，喀尔喀五部是怎么划分的，它的由来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了解喀尔喀五部的成员之一巴林部情况。

明代，蒙汉文献所出现的“喀尔喀”系指蒙古中兴英主

达延汗(1479—1517在位)时期蒙古六万户之一，为达延汗子阿勒楚博罗特和格日森扎所领有。据蒙文文献记载，元亡以后喀尔喀就有“十二喀尔喀”即“内喀尔喀五部”和“外喀尔喀七部”之说。正因为如此，传说当时情况的《蒙古源流》中，有“十二鄂托克喀尔喀”的记载。那么这个“十二鄂托克喀尔喀”究竟什么时候形成，后来又如何划分成“五部”和“七部”呢？至今蒙古史学界仍无明确公论，只是各抒己见而已。但是我们从蒙文文献上可以知道其大约时间。《金轮千辐》告诉我们，达延汗五子阿勒楚博罗特从阿刺黑十二库列延喀尔喀中分出来，成立扎鲁特，巴林、弘吉刺惕、巴约惕(bayuruu)和乌齐尔等“喀尔喀五部”的统治者。《水晶念珠》以及后来的蒙文文献均持这一说法。看来，达延汗时代即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所谓“右翼三万户”之一的喀尔喀已经有“十二库列延”，也可以说“十二部”，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到后来，这“十二库列延”发生了变化。达延汗子阿勒楚博罗特之子虎刺哈赤时，有子五人，各为一库列延(明代汉籍为“营”)，因而成了五部落，即“内喀尔喀五部”。其余“七库列延”归达延汗季子格埒森扎的七个儿子。据喀尔喀台吉善巴所著《阿萨拉克齐史》(1667年)格埒森扎布生于癸酉年(1513年)，卒于戊申年(1584年)，看见“喀尔喀七部”和“五部”大概这时候形成。所说虎刺哈赤五个儿子是：长子兀把赛(扎鲁特部祖)，次子速把亥(巴林部祖)，三子兀班·贝穆·多克申(弘吉刺惕部祖)，四子索宁·岱青(巴约惕部祖)，五子舒哈克·卓力克图(明代汉籍为抄花，乌齐叶特部祖)。

正如前文所述，“喀尔喀”以部落名称出现，是在达延汗时代。但“喀尔喀”这个名称，早自《蒙古秘史》以来就出现了。《秘史》所谓“喀尔喀河”，指的就是流入贝加尔湖的那条河。据此日本和田清博士对“十二鄂托克喀尔喀”的驻牧地有个推测。他认为，所谓“十二鄂托克喀尔喀”之中，外蒙古七部落是在这条河西边克鲁伦河注入处发展起来的，而内蒙古五部落而是在这条河以东，跨越兴安岭的地方繁荣起来的，因而自然可以推测，这个部落的名称可能来自同名的河流。何况据《蒙古游牧记》载，竟把喀尔喀内外札萨克列入阿噜(北)蒙古里。所谓阿噜蒙古，是占据兴安岭山阴，今呼伦贝尔地方的部落，由此可以设想喀尔喀部落的原住地。(详见《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和田清博士将“十二鄂托克喀尔喀”的原居地推测到喀尔喀河流域)当然其所谓“原住地”，指的是明一代的事。

正如和田清博士所推测的那样，喀尔喀诸部曾一度在喀尔喀河流域驻牧过，那么巴林部也在其中是毫无疑问了。元代，巴林为八邻部，也不在喀尔喀之中，曾有过“八邻万户”之称。成吉思汗时至元一代八邻部(即巴林)的居地，基本上在额尔的思河上游，东不越阿尔泰山，西不过额尔的思河之乞儿吉思诸部范围之内。

那么，何时史称“八邻部”的人们越过阿尔泰山来到了喀尔喀河流域，而后来变成“内喀尔喀五部”之一呢？我们从蒙文文献上看不到有明确的记载，但探讨这一问题时，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乞儿吉思诸部东迁”一事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

乞儿吉思诸部东迁问题，已由何秋涛、李文田、洪钧、韩儒林和日本箭内互等人曾研究过。据韩儒林的研究，约十三世纪末有不少乞儿吉思部人迁到东方来。例如，斡赤斤玄孙乃颜的叛乱被镇压后，依忽必烈可汗的命令，在乃颜故地(即今兴安岭以东至松花江上游一带)只从乞儿吉思一带搬迁了不少部落(详见《穹庐集》)。这些搬迁部落大部分是“林木中百姓”。但这些部落中没有明确记载有否巴林部，然而就乞儿吉思部东来的地理方位与明代巴林部所活动的地理方位来看，似乎有联系。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八邻部”很可能也是辽宁北镇县，镇远(今黑山)，镇武，西兴等堡(均在今台安以西)和海州卫(今辽宁海城)东昌、东胜(均在今海城西北)等堡的边外一带辽阔的辽河套地区，其驻牧地离明朝边兴约四百余里。(详见《辽夷略》)，巴林部速巴亥次子巴图大概驻牧于旧辽阳以北，适两河之中，蒙古人称这里为哈孩额力素。(详见《万历武功录》)。巴林部驻牧于此地大概直至后金天聪年间划分牧界为止。

巴林部姓氏浅谈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穆 松

驻守在蒙古高原的阿尔泰山关口的喀尔喀哨所的古老蒙古部落巴林部落,同世界各部落氏族一样有自己的姓氏和部族之分。而且把部落姓氏的名称、更替、含意传授给子孙后代的习俗,同时还能解释清楚自己姓氏有关的传闻等。大多数巴林人还能用几种文字记述自己的姓氏。

巴林部作为古老的蒙古部族之一,他们的姓氏和部族无疑是在氏族社会中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

古老的诸狄(ᠵᠠᠷᠠᠨᠳᠠᠭ)中的一支高车(ᠬᠠᠭᠴᠢᠨ)部落从部族到姓氏的仅这一例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世界各国的蒙古学者们的研究和有关的著名历史典籍,如:《蒙古秘史》、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历史大作《史集》、俄罗斯学者符拉其米尔左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多桑《蒙古史》等都对蒙古族姓氏的血缘关系做了比较准确的结论。

巴林部人同蒙古其它各部落一样历来随父姓。巴林部是博尔特赤诺阿,古阿玛喇勒的十三代孙孛端察尔的长子巴邻歹开始的《元朝秘史》等有关史书明确记述了巴邻歹是孛端察尔的长子,孛端察尔是许多蒙古贵族部落的始祖,八

邻部(巴林)即产生于此。

巴林部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从原来的巴阿邻,尼楚坤巴阿邻(ᠨᠢᠴᠦᠬᠤᠨᠪᠠᠭᠠᠯᠢᠨ),莫年巴阿邻(ᠮᠣᠨᠠᠪᠠᠭᠠᠯᠢᠨ)等众多的姓氏。巴林部在成吉思汗时期很有名气。在一一八一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被封为蒙古大汗至一一八九年归附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的二十八个部落中巴林部的豁尔赤,兀孙额布干是其中的一个部落。一二〇二年成吉思汗向泰亦赤兀惕进军时,巴林的失儿古额秃额布干率两个儿子阿刺黑、纳雅阿放回了塔尔吉泰然后投靠了成吉思汗,受到了可汗的器重。后成吉思汗封纳雅阿为蒙古国中央万户首领,把阿刺黑封为千户首领。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大帝国时封巴阿邻部的兀孙额布干(兀孙老人)为“别乞”。根据《蒙古秘史》等记载,做“别乞”的人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之上,同诸王一样自由,他骑的马可以同成吉思汗的马拴在一起。扎奇斯钦的《蒙古秘史译释》中有这样的记载: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建立了蒙古国家,在建国大典上成吉思汗论功行赏时对巴阿邻部的豁尔赤说“豁尔赤所辖的巴阿邻三千户之外,再与塔孩、脱斡劣思,帖良古惕等部凑成万户……”。

从巴林部的性质来看他同整个蒙古部落的部族性质是一样的。他起源于蒙古高原原始人群中的蒙古语群体是血缘关系的纽带组成的部族,巴林人有他的共同的牧地,有自己的独特习俗,心理素质,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祖先和氏族。这些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逐步进化成现在这

个程度。

从巴林人的部族姓氏和他们的根源、分支以及名称来看,现有六万多人的巴林蒙古姓氏中属蒙古语姓氏的大约有百余种,其它来源的姓氏有六十余种。

现将巴林蒙古族姓氏的来历、含意做一简单的分类,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来源于贵族姓氏

成吉思汗的后裔博尔只斤氏(ᠪᠣᠷᠵᠢᠵᠢᠨ),在巴林蒙古族中比较多。该姓氏的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在巴林称博尔只斤家族为贵族和台吉。巴林姓博尔只斤的台吉分为四门弟、外几门台吉、二十户台吉等三种。

四门台吉的来源是:成吉思汗的二十一世孙巴林第一代札萨克郡王色布腾与固伦淑慧公主所生的四个儿子所命名的;色布腾的长子郡王瓦其尔为主门台吉世袭罔替。主门台吉的后裔们居住在王府附近的大板,沙巴尔台,王陵附近的白音尔灯,其其尔图音格根一带。还派部分到翁吉刺惕迁往的八佐领担负守防任务。色布腾的次子公爷格日勒图为第二门台吉,世袭罔替。他们的后裔居住在巴彦汉山脚下的查干沐沦河流域地区。色布腾的三子公爷那木札为第三门台吉,世袭罔替。三门台吉的住牧地为西拉沐沦河北岸,古日古勒台河流域。色布腾的四子协理阿拉布坦为第四门台吉,世袭罔替。四门台吉的游牧地为召胡都格、哈嘎一带。据传色布腾王的原配夫人查干达日哈生了一子叫却金扎布,把他安置在巴林南的臭水湖附近沙漠地带(臭水

湖的现名为查干诺尔,该湖自然碱性比较浓,牲畜不易饮,湖边不易长草,所以当时在此地人称该湖为臭水湖)。当时的王府掌权的官吏们和掌权的满洲人为了控制其却金扎布之系不仅把他们安排在永不长草的臭水湖附近住牧还诅咒他们是:“却金扎布之家的人不超二十户,畜不过一千头”。所以后来叫称二十户台吉。

外八达的台吉(达为清朝官职名),是早在一六六〇年归附巴林的翁吉刺惕部台吉和从外地归附的其他姓博尔只斤氏的台吉分成八个苏木并从四门台吉中派一名达(即:官职)来统辖他们。

把原来的翁吉刺惕的后裔编成乃门苏木(即:八佐领,巴林旧志等称八之箭)安置在巴林右翼旗的东南部。后来人们根据他们的住地方位称<准奈曼苏木 ᠠᠨᠢᠨᠠᠮᠤᠰᠤᠮᠤ >,从习惯上分称奈曼苏木台吉,古日本苏木台吉(即:三个苏木台吉),塔本台吉等。此外也分东翼台吉和西翼台吉。(即:东翼台吉是归附巴林右翼旗的翁吉刺惕台吉和其他台吉,西翼台吉是巴林王公贵族和官吏们为了监视和控制外来归附巴林的这些部落专门从四门台吉中选派去统辖的达诺彦们的支系)这就是准奈曼苏木西翼台吉的来历。

古日本浩特台吉(也称塔本浩特台吉)住牧地区为乌力吉沐仁河流域。古日本浩特台吉(古日本为三个之意)后来分三支,据传弟兄三人分家的时候各分到一个祖传下来的宝物佛像而得名。这家有三个佛像,一个是满苏习利,另一个是召、还有一个佛为甘珠尔。这家的三个儿子分家时各分到一个,分到满苏习利的支系逐渐成了姓满苏习利,分到

召的支系逐渐成了姓召(该姓氏的近年来用汉字的赵字来记自己的姓氏),分到甘珠尔佛的那个支系逐渐成了甘珠尔姓氏的人了。这些姓氏一直传到如今。三个浩特台吉们现在住在我旗的东南部西拉沐沦、益和诺尔、胡日哈、宝日勿苏、白音查干、洪格尔等地。

巴林右翼旗封王、公、协理、幕根达、达诺颜等爵位的时候首先从四门台吉中调选,这是顺治年间归附清朝以来一直到全国解放成了不可抗拒的传统观念。

巴林的博尔只斤氏和台吉们都有规定的臣仆(奴隶)。如果台吉违背了祖规的台吉也有被撤销台吉爵位变成庶民的例子。如:翁吉刺惕部台吉兀拉岱、兀斯岱在清康熙年间由于被诬陷身亡的同时被割去了台吉爵位,所以他的后裔们就自然成了庶人。

在巴林右翼旗庶民改成台吉的例子几乎没有。但是,在翁牛特左翼旗北的西拉沐沦河畔驻牧的部分陶高楚克氏族的人,当地人称他们为陶高楚克台吉。有人了解陶高楚克氏族的这部分人成台吉的来历。那是早在十六世纪巴林部同其他四个部落从蒙古高原的阿拉坦杭盖往南迁时归附巴林部的一个小游牧部落陶高楚克,随巴林南下时途经乌珠穆沁昆兑(大川)到达查干沐沦河和西拉沐沦河汇合处定居,其中的一部分在呼克苏勒地带渡过西拉沐沦河归附了翁牛特部,在翁牛特这部分陶高楚克氏的人被称为陶高楚克台吉。

在巴林右旗也有小部分贵族的后裔博尔只斤氏的人没有台吉爵位,他们更没有臣仆和附属百姓,其中有的富户也

有仆人的。

巴林台吉对氏族,门第等十分清楚,特别是用汉字记载时姓氏的头一个字的字母来记“宝”或者“鲍”。

巴林的台吉博尔只斤氏不仅本旗内部的同姓氏不能通婚,而且同一个姓氏的扎鲁特、乌珠穆沁、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旗人不能通婚的习俗。

二、普通臣民的姓氏

在巴林普通臣民的姓氏较多,这些姓氏来自部落、山水地名、头人的职责或职业、特殊的标记和纪念、爵位崇拜(图腾)物、财宝、风景等百余种。

巴林臣民姓氏中,人口较多者有陶高楚克、尼楚古惕、布和楚惕、客烈亦惕、宰桑、扎力赤惕等。

陶高楚克(ᠲᠤᠭᠤᠪᠴᠢᠭᠦᠬᠡ):据传巴林部从蒙古高原南迁到此地定居时,随同巴林的有三百户陶高楚克。姓陶高楚克的家族人自己解释说:陶高楚克来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名人乌由图斯钦的后裔们居住在陶高楚克山麓,由此得名陶高楚克部,以后逐渐变成姓氏。也有的人把陶高楚克解释为;陶高其(厨师)或者陶尔其格(帽顶),是历史的误解。把陶高楚克分为陶日根陶高楚克和哈日陶高楚克之分(实际是内外之分)。此姓氏的人分布在巴林中部的伊逊毛都、召胡都格、翁根毛都、查干诺尔、查干勿苏等地。据传陶高楚克部的老长者们每隔三年的春节初三在指定的地点聚会撰填陶氏家谱。陶氏家谱直到一九四七年在本旗住在伊逊毛都的色音高力布扎兰家保存过,后在土改运动中被丢失。

尼楚古惕(*ᠨᠢᠴᠢᠭᠤᠲᠢ*)：此姓氏的人分布在嘎拉达苏台，归勒斯台、博林古日班坤兑，阿都钦浩雅尔毛都等较多，古时尼楚古惕氏有德高望重的失儿古额兔额布干(额布干为老人之意)，他本是泰亦赤兀惕部人的家臣，当泰亦赤兀惕部大部分人向成吉思汗归顺时失儿古额兔额布干看出了成吉思汗统一天下的卓越才能，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纳雅阿、阿刺黑归附了成吉思汗，对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蒙古大帝国做出了汗马之功，所以失儿古额兔老人死后追封淮安王。尼楚古惕部落人在成吉思汗时期常光膀子走路，所以叫作尼楚古惕意为光着膀子的人们，后来尼楚古惕一词逐渐成了该部落的姓氏。尼楚古惕部人同整个巴林部人一起从蒙古高原搬迁到现在的巴林住地后又出现了几个分支。如：召恩格日(即：百户)、召恩额日(即：一百条汉子)、召恩图日乐(即：百世)、吉仁萨达嘎(即：六十个箭袋)、查干艾马克(即：白部)、额木格德(对老妇之尊称)，宝楞(地名)等。

关于召恩额日和召恩格日有这样的传闻：原来洪格尔他拉住着一户尼楚古惕氏一家，他的妇人到了高龄后身有孕，主人担心难产所以把老妇用勒勒车送往巴林左旗境内的“福善寺”即：格力布尔召拜佛烧香。他们到了召庙叩头烧香完毕往回赶路的时候突然阵痛并且越来越厉害，到了赛音章图山脚下时这位老妇人实在坚持不住了，妇人临产时指挥他的老夫赶快到山脚下种田的盘营去弄来种地的犁铧子助产。老夫按老妇人的指意果然安全生产了。妇人见到自己生的是个男孩格外高兴，于是祝愿说：“要繁衍成召

恩格日(即百户)召恩额日(百夫)，召恩图日乐(即：繁衍百世)。”从此出现了召恩格日、召恩额日、召恩图日乐的名称。这个妇人分娩的山脚为额本格德(即：妇人)，这些名称后来是这家族的姓氏了。

关于吉仁萨达嘎和阿日班萨达嘎的来历是：曾在嘎拉达苏台河畔的尼楚古惕氏人每年的六月聚会在一起撰写填补家谱的习俗，有一年的六月河水发涨无法渡河，所以这一年没有聚会在一起祭山祭水召开牧民那达慕盛会更没有撰写家谱，从此失去了嘎拉达苏台河西岸尼楚古惕氏人的共同联系，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吉仁萨达成(即：六十个箭袋)和阿日本萨达嘎(即：十个箭袋)两个姓氏了。

据知情人仁钦嘎瓦等回忆，尼楚古惕氏的家谱曾在巴林末代管旗章京乌勒慧崇阿家保存着，乌勒慧崇阿死后这一宝贵的家谱失传。

尼楚古惕氏的各个支系把自己的姓氏记汉字的“乌”、“白”来记载至今。

布和楚惕(*ᠪᠤᠬᠤᠴᠢᠲᠢ*)：古老的蒙古时尼楚坤巴林中有着出色的摔跤手，后来成了姓氏。布和楚惕(即：摔跤手们)在《蒙古秘史》中记载为“布和努惕”、“布和楚惕”。“努惕”“楚惕”二字在蒙古语中尾复数形式。现在布和楚惕用汉文的“博”字或者“布”字来记载自己的姓氏。现在布和楚惕人分布在巴林右旗的各地，特别是沙巴尔台、巴彦尔灯一带较多。

客烈亦惕氏(*ᠬᠡᠯᠢᠮᠣᠳᠤ*)：它的来源于蒙古古代的强大部落的名称。《蒙古秘史》作“客烈亦惕”，《元史》作“克烈

惕”客烈亦惕氏分布在我旗的幸福之路、巴彦他拉、宝日勿苏、胡日哈等地。据传客烈亦惕部不吃敖勒盖(即:牛羊的灌肠),不烧椴木等独特的习俗。客烈亦惕氏的家谱曾在巴林左翼旗章京客烈惕氏人笃古尔扎布家保存过,后在兵乱中被丢失。

木苏臣氏(ᠮᠤᠰᠤᠴᠢᠨ):木苏臣氏的来源成吉思汗时期的专门制做箭杆而且在该部落中箭法高的人而得名。据《蒙古秘史》等著名蒙古典籍记载了阿兰古阿哈屯(贵妇人)用五个木苏(即:箭杆)教子的历史故事。现在木苏臣氏的人分布在我旗的幸福之路、巴彦他拉、巴彦尔灯、宝日勿苏、巴彦汉等地。木苏臣氏的人用汉字的“木”或“牧”、“穆”来记述自己的姓氏。

宰桑氏(ᠵᠠᠰᠢᠨ):宰桑来源于官职的名称。成吉思汗时期每一鄂托克(即:部)之长为宰桑。此姓分布于我旗沙巴尔台、巴彦尔灯、查干沐沦等地,宰桑氏的人用汉文的“解”和“翟”字记自己的姓氏。

扎力赤惕氏(ᠵᠠᠯᠢᠴᠢᠲᠢ):《元史》记载扎力赤惕氏来源于送信传指的职业名称。但另有一种传说称扎力赤惕来源于扎力尔部的后裔,也有的人说是来源于“扎达”(即:古代兵器中的矛)、说扎力赤惕氏人用长矛刺杀老虎而得名。扎力赤惕氏的人用汉文的“吉”或者“扎”来记载自己的姓氏。

通事(ᠲᠣᠩᠰᠢ):通事来源于能说会道的雄辩能力的经通事情而得名。通事本身就是汉语。通事氏中有苏木通事(即:箭)和诺木通事(即:弓)萨达嘎通事(即:箭袋)之分。此姓的人分布在都希苏木,巴彦他拉苏木、查干沐沦苏木等

地。通事氏的人用汉文的“通”或者“佟”字来记载自己的姓氏。

此外,普通臣民的姓氏中来源于部族名称的姓氏有:内喀尔喀五部的扎鲁特(ᠵᠠᠷᠤᠲᠦ)、巴阿邻(ᠪᠠᠭᠠᠯᠢᠨ)、翁吉刺惕(ᠤᠩᠵᠢᠰᠢᠷᠢᠲᠢ)、巴牙兀惕(ᠪᠠᠶᠠᠭᠤᠮᠤᠲᠢ)、兀者惕(ᠤᠯᠠᠵᠢᠲᠢ)、察哈尔(ᠴᠢᠬᠠᠯ)、克什克腾(ᠬᠢᠰᠢᠬᠢᠲᠦᠭᠦᠨ)、益和利思(ᠶᠢᠬᠡᠯᠢᠰᠢ)、巴尔虎(ᠪᠠᠷᠬᠦ)、陶日古惕(ᠲᠠᠷᠢᠭᠦᠲᠢ)、珠尔赤惕(ᠵᠢᠷᠴᠢᠲᠢ)也称“珠申”,来源于肃慎姓氏)、泰亦赤兀惕(ᠲᠠᠢᠶᠢᠴᠢᠲᠢ)、唐兀惕(ᠲᠠᠭᠤᠮᠤᠲᠢ)、塔塔尔(ᠲᠠᠲᠠᠷ)也称鞑鞑)、兀良哈(ᠤᠯᠠᠭᠠᠬᠠ)也称兀良海、属古老的选儿列斤部落)、帖良古惕(ᠲᠢᠯᠠᠭᠦᠲᠢ,林中三部之一)、敖勒虎努惕(ᠠᠣᠯᠡᠬᠦᠨᠠᠭᠤᠲᠢ,是博儿只斤同一源,后归附翁吉刺惕部而得名敖勒虎努惕)、敖尔赤兀惕(ᠠᠣᠶᠢᠴᠢᠲᠢ)等。

来源于工种职业的姓氏有:豁尔赤惕(ᠬᠥᠷᠴᠢᠲᠢ)、豁尼臣(ᠬᠥᠨᠢᠴᠢᠨ)、兀合尔沁(ᠤᠯᠬᠡᠷᠴᠢᠨ)、阿都沁(ᠠᠳᠤᠴᠢᠨ)、塔日阿沁(ᠲᠠᠷᠢᠶᠠᠬᠢᠴᠢᠨ)、合日本沁(ᠬᠡᠮᠤᠪᠢᠴᠢᠨ)、哈布哈沁(ᠬᠠᠪᠬᠠᠴᠢᠨ)、宝乐哈沁(ᠪᠠᠯᠠᠬᠠᠴᠢᠨ)、哈日玛沁(ᠬᠠᠷᠢᠮᠠᠴᠢᠨ)、色热沁(ᠰᠡᠷᠡᠴᠢᠨ,其中:有乌兰色热沁、查干色热沁之分)、阿拉塔沁(ᠠᠯᠠᠲᠠᠴᠢᠨ)、阿拉西沁(ᠠᠯᠠᠰᠢᠴᠢᠨ)。

来源于地貌地名的姓氏有。奥矣毛都(ᠠᠣᠶᠢᠮᠠᠳᠤ 即:森林、该氏为古老的“林中百姓”演变而来)、海拉苏(ᠬᠡᠯᠠᠰᠤ 即:榆树林)、宝楞(ᠪᠠᠯᠠᠭ 即:山弯)、敖日楚克(ᠠᠣᠷᠢᠴᠢᠬᠡ 即:山称)、呼卜苏勒(ᠬᠤᠪᠤᠰᠤᠯᠡ 即:沼泽地)、岗嘎(ᠭᠠᠩᠭᠠ 即:山岗)、道老惕(ᠲᠠᠯᠠᠷᠢᠲᠢ 即:丘岭)。

来源于珍品宝物的姓氏有;布斯沁(ᠪᠤᠰᠤᠴᠢᠨ 这是成吉

恩汗统一天下后奖赏一个臣民一个腰带,这个臣民的后代为了纪念可汗的恩慈用名布斯沁,以后逐渐布斯沁家族行成了,这就是布斯沁姓氏的来历)。

来源于头人的名称的姓氏有:查哈岱(ᠴᠢᠬᠠᠳᠠᠢ)、赤努兀惕(ᠴᠢᠨᠤᠮᠤᠲᠢ)、齐木惕(ᠴᠢᠮᠤᠲᠢ)、囊亚惕(ᠨᠠᠶᠠᠲᠢ)、兀格惕(ᠤᠭᠦᠭᠡᠲᠢ)、达来明安(ᠳᠠᠯᠠᠮᠢᠨᠠᠨ)。

来源于图腾的姓氏有:双哈尔(ᠰᠤᠬᠠᠷ)、昆(ᠬᠤᠨ)、芒古惕(ᠮᠠᠭᠤᠭᠡᠲᠢ)。

在普通臣民的姓氏中也有,哪力叶惕(ᠨᠠᠯᠢᠶᠡᠲᠢ),也有的人称之为宝很乎珠 ᠪᠠᠶᠢᠬᠡᠨᠠᠭᠢᠰᠢᠵᠤ ,此姓氏的人分布在我旗的洪格尔苏木一带)、宝给(ᠪᠠᠶᠢᠭᠢ)、阿日根木扎(ᠠᠷᠢᠭᠢᠨᠮᠤᠵᠠ)、代尔图(ᠳᠠᠢᠷᠲᠤ)等蒙古部分传说用其名称和其它来源的姓氏。

普通臣民中也有:哈日楚惕(ᠬᠠᠷᠢᠴᠢᠲᠢ)、哈日牙惕(ᠬᠠᠷᠢᠶᠠᠲᠢ)、赛楚兀惕(ᠰᠠᠢᠴᠢᠮᠤᠲᠢ)、扎苏楚兀惕(ᠵᠠᠰᠤᠴᠢᠮᠤᠲᠢ)、巴达戈(ᠪᠠᠳᠠᠭ᠎ᠠ)等来历不明的姓氏。

三、来源于外地的巴林姓氏

在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活习俗,联姻等原因在巴林日益增多来源于外地的姓氏。

一六四八年清顺治年间清朝皇女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第一代札萨克色布腾时陪房三百户。一六九一年清廷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第四代郡王札萨克乌尔衮时陪房二百四十户,后到了一七五〇年清朝乾隆皇帝又下嫁三女儿和硕和碗公主给巴林旗札萨克多罗郡王琳沁长子德勒克时陪

嫁四户。这些人原为满族或其他民族,但来到巴林后代代居住此地与当地的蒙古族通婚,融合为蒙古族。清朝时这些陪房人被编为两个佐领。现在这部分人分布在我旗各地,特别是大板、沙巴尔台、阿日本格日、格根少荣、古日古勒台等地较多。据了解,在我旗现有陪房人的姓氏有六十余个。

如:赵、孙、李、郑、汪、王、苗、唐、刘、佟、郭、田、罗、张、杨、景、董、马、于(魏)、韩、邵、肖、黄(皇)、金、胡、范、潘、包、陆、许(徐)、毅、石、吴(武)、海、关、姚、穆、梁、何(贺)、尹、霍、博、贾、夏、齐、钱、陈、耿、常、邵、池、林、顿、戴、宋、白、恒、蔡、卜、谢、伊……。

在巴林蒙古族中有蒙古姓氏和陪房人的姓氏以外还有从战场上俘获的、生活所迫迁入巴林和同巴林人通婚、入赘、收养等原因演变了原来姓氏的也不在少数。如:哈达图河流域,孟根希热图一带的魏桑氏是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这部分人把自己的姓氏写成“周”。据传清朝时期巴林军队征讨吴三桂叛乱时翁吉刺惕的首领兀苏台、兀拉代弟兄二人从战场上俘获姓周的两个小男童。这两个人是为吴三桂占地俘获的所以巴林人都叫他们“魏桑”氏人(魏桑是吴三桂的转音),后来逐渐成了魏桑氏,现在魏桑氏的人有的用汉字的“魏”来记自己的姓氏,也有的仍然用“周”字来记述自己的姓氏,也有的用“于”字来写姓氏。

巴林人的姓氏从产生至发展的历史,是各部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对此万万不能忽视。

我在耳闻好线索的基础上,参阅了《蒙古秘史》、《成吉

思汗传》、《中国历史上部族简解》、巴林拉西朋楚克写的《水晶念珠》、《巴林乌兰硕古木》、《中国姓氏汇编》等书籍。也调查和采访了几十名知情人撰写此文。

林丹汗碑

占·达木林斯荣

巴林右旗插汉城,始建辽代,金、元沿用。

1388年2月,明军攻破插汉城,后来的情形如何,便无人知晓。插汉城内曾立有一块石碑。参加树碑者约有二十人,他们的名字前人没有抄录,因此不得而知。立碑时间,以碑文内容推测,约在1626—1634年之间。该碑为林丹汗(1592—1634)而立,故称作林丹汗碑。碑文记载了林丹汗扶持和信仰黄教的事迹。这些记载补充了史志的不足,为研究鲜为人知的北元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土蛮汗者,系林丹汗的曾祖父,所部号察哈尔。明人撰《土蛮列传》载“土蛮。打来孙长男也。所部皆朵颜蟒惠、伯户、鹅毛秃、壮兔等,挖弦之士六万,最精壮。嘉靖(1522—1566)中,移徙潢河(西拉沐沦河)北,常引速把亥(巴林部长兼北元执政理事)入海、盖、开元。”这是明人关于打来孙汗及其继承者的汗廷所在的最明确的记载。《林丹汗碑》载:“这里(插汉城)自古以来有一座敬经塔(白塔子),专一地信奉胜利者诸教的互尊法王显示曼殊师利的技艺,他(林丹汗)也想按照古时印度和西藏的菩萨圣王的神圣榜样,扶植

佛教。他对于北方诸国芸芸众生的利益和幸福的源泉——佛教互为诚敬并视若瑰宝,因此将已遭破坏的旧日的一切加以复兴和整顿。特别是为了纪念高贵的教主们的功德,并把曾祖图们札萨克图汗的遗体举行火化,建成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了实现他母后的愿望,建造了天降塔。他按照典藏中所载的经义,用奇珍异宝建起了这两座蔚为壮观的崇拜对象以及其他许多法身崇拜对象以后,就使这个国家充满了光辉,把天下照耀得辉煌壮丽。岱松皇帝(林丹汗)御妹索拉斯瓦遵照汗的吩咐,监督一切事宜,如美丽的构造,宏伟的建筑形式,并在这一切的周围布满了祥云等。最后在我佛升天以后的三千七百五十九年的丙寅年沙拉拜月(1626年7月)初三完成了这一事业。“林丹汗建造的两座舍利塔,在《蒙古游牧记》里有记载,但已倒塌。即然林丹汗在插汉城内建造了其先世陵寝——舍利塔,说明他的汗廷就在巴林一带。现在,文献记载与碑文互力印证,为我们确定林丹汗的汗廷所在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自嘉靖年间至天启七年(1627),北元汗廷在西拉沐沦河北面。插汉城,则是北元的陵寝。其实,林丹汗有一座城。《满洲实录》称该城为林丹汗的“拜兴(房屋)所居之城”,而其蒙古名则查干浩特城,据《蒙文史料》记载,林丹汗城的北山叫阿巴嘎山。蒙古地区叫作查干浩特的蒙城很多。因此,阿巴嘎山是考证林丹汗城的重要依据。距插汉城正东二百里,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有一座古城,叫查干浩特城。一般认为该城始建于辽代,金、元沿用。古城北有一座大山,名叫阿巴嘎山。据此,笔者认为:该城就是林丹

汗的查干浩特城,是北元的汗廷所在地。

按照蒙古惯例,大汗分封民土,诸王各有分地,受封诸王当依例向大汗献纳贡赋。一般认为,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土蛮汗时期。土蛮汗死后布颜汗继位,布颜汗死后林丹汗继位,林丹汗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明朝县部尚书王之臣曾作过如下分析:“虎罕(林丹汗)自祖父以来为诸部长,诸部皆纳贡。其祖父死,虎年幼,沉溺酒色,诸部各自称雄,贡献逐绝。虎心衔之久矣。薊门、辽东各有虎款赏,其宣府张家口乃虎贸易之地。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噶家(喀喇沁)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乌梁海)截杀亦如之。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也就是说,林丹汗时期,蒙古诸部向大汗献纳贡赋一事,曾一度中断。收纳贡赋是汗权的重要标志之一,不纳贡赋就是不承认林丹大汗的地位。这与林丹汗的“北边止我一人”的政治理想是直接违背的,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林丹汗便决定“先处里”,即实现蒙古的政治统一,“后处外”,即对付后金和明朝。《林丹汗碑》的一段内容,说明林丹汗的奋斗目标的实现程度:“在这个北元的国家里也同样如此,赖有长生天的神助,蒙古成吉思汗德高威重,英名远扬。到他们的第三十六代(应为第二十二代)诞生了大转佛法宝轮菩萨的转世,即岱明车臣成吉思汗(林丹汗)。他统治着许多异族国家,首先是汉族和唐古特族的国家。他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这与1619年林丹汗致清太祖的信中的话完全一致。从戊午年

(1618)到己未年,我听到尼堪国(明朝)被你困扰。在己未年夏季,我曾亲自去招谕广宁城(辽宁省北镇县)降服并纳贡。现今你出兵广宁城时,我将阻止你。”林丹汗的力量强盛到使蒙古以外的民族向其献纳贡赋,说明林丹汗的大汗地位已经恢复,察哈尔部又一次进入一个强盛时期。

《金轮千辐》载,1617年林丹汗已成壮年,阿巴嘎山地方,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内容是整顿察哈尔部,将察哈尔部划分为六万户,并分左右两翼。任命后里胡那克杜棱为左手万户,绰罗斯塔布囊为右手万户。新任命的朝官中,可考者有索诺木,他是林丹汗的护卫长。护卫,蒙古语谓克什克腾,索诺木降清受封为克什克腾札萨克。从《清实录》所载北元官员的阵容来看,《金轮千辐》的记载是可信的。阿巴嘎山会议是林丹汗时期的察哈尔部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

东蒙古地区,察哈尔部以外,还居住着科尔沁、阿鲁、喀尔喀等蒙古族部落。阿鲁部是成吉思汗四兄弟 ᠠᠷᠤᠯᠤᠰᠤ 属部的统称。为首者楚虎尔达尔汗诺颜 $\text{ᠪᠤᠰᠢᠬᠦᠯᠢᠳᠠᠷᠬᠠᠨᠨᠣᠶ᠋ᠠᠨ}$,系阿鲁科尔沁札萨克的先世。阿巴嘎山会议后,科尔沁及阿鲁二部,分别向林丹汗献纳贡赋。喀尔喀部包括巴林、扎鲁特、巴约特、弘吉刺、乌齐叶特五部。为首者炒花(《清实录》称喀尔喀卓礼克图洪巴图鲁),系速把亥的幼弟。1626年4月,清军击败喀尔喀,炒花、色特尔、速把亥子卜言顾之子阿玉什等从养息木河地方北渡西拉沐沦河,依附林丹汗。察哈尔、喀尔喀二部的合并,进一步加强了察哈尔部的实力。随着察哈尔部实力的增长,林丹汗曾多次产生了制服

截杀自己使臣的喀喇沁部的想法。1627年夏之际,林丹汗携传国玉玺统率六万户察哈尔及喀尔喀部的一半,并由金塔宰桑策楞护送主之白室(成吉思汗陵),拔营而西。北元铁骑的锋芒直逼喀喇沁部的上都城。根本动摇北元政权的蒙古大内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清军乘虚而入,察哈尔遂告覆灭。

黄教,俗称喇嘛教,由宗喀巴(1357—1419)创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滥觞于呼和浩特城的北元宗室俺答 ᠠᠨᠳᠤ (1507—1581)。1573年,俺答用兵青藏,开始接触黄教。从此他“始念六字心咒”。1576年北元土蛮汗前往黄教僧侣噶尔玛喇嘛处,开始皈依黄教。1578年俺答将宗喀巴的大弟子的转世,迎至青海的仰华寺,二人在那里互赠封号,俺答赠给宗喀巴的大弟子达赖喇嘛的封号,这是达赖喇嘛名号的起源,该喇嘛系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赠给俺答彻辰汗的封号。1587年,以察哈尔部长脑毛大黄台吉为首的北元使团,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第二年,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前往北元汗廷的途中。1589年,达赖喇嘛转世于俺答家族中,这就是四世达赖喇嘛。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前去青藏地方,在班禅大师法座前出家当喇嘛。1604年林丹汗即位。这一年,黄教上层派遣迈达里胡图克图喇嘛,到蒙古地方主持黄教。林丹汗在迈达里胡图克图喇嘛处受精深密乘之灌顶,开始皈依黄教。1617年,夏尔巴喇嘛从青藏地方护送金佛到达林丹汗处。于是,林丹汗在查干浩特地方,为佛修筑寺庙。这就是黄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开始。把这一传入经过“与地域概念联系起来的,则是《林丹汗碑》,

碑文载：“由于早就定下的天意，他（林丹汗）以自己的信仰和虔诚为这个国家请来了天之瑰宝——受到古代君主，法主尊崇的喇嘛、在知识、慈悲和力量方面具有一千道毫光的曼殊师利的转世，即普遍被称为阿难陀师利波陀罗的教主夏尔巴。他们以喇嘛和施主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基础，把不信教的愚昧一扫而光，使它成为一种陈迹……（此处脱字）创造了身体、语吾和精神的崇拜对象，重新发展了僧团，把宗教的花坛培育得欣欣向荣。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都记载在“三界众生全胜宫”的一块碑上，一览便知。身体的崇拜对象指寺庙和佛，语言崇拜对象指林丹汗朝所译成的《甘珠尔经》，精神的崇拜对象指宝塔。由此可知，黄教在东、西蒙古地区几乎同时传入。传入赤峰地区的时间，根据文献记载，可确定为1576年。北元时期，不仅在呼和浩特城出现喇嘛寺庙，而且赤峰地区的插汉城、查干浩特城也出现了喇嘛寺庙。这些寺庙不仅佛像初具规模，同时已有了藏文经典。

奈曼苏木

撰文：恩和巴图

译文：鲍银虎

达伦布和

审文：那 顺

近年来，蒙古史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活力，蒙古史方面的文献、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屡屡问世。尤其《巴林右旗文史资料》今又出版，令我欣喜。有言道：“天乐喧鸣，众生起舞。”为了给蒙古史学研究打打边鼓，我在此不遑顾及孤陋之嫌，以手头的家谱及父老传闻为据，粗浅勾勒了作为巴林右旗不可分割的三十部之一部分弘吉刺惕——奈曼苏木（即八佐领）的始末，供有关专家、学者作参考。

漠南五部喀尔喀（即扎鲁特、巴林弘吉刺惕、巴岳惕、兀济叶惕）之一的三十部弘吉刺惕之后裔如今已隔化在东西巴林和翁牛特旗。

弘吉刺惕德鄂托克（旧时蒙古族地区由万户分解为互相联合的阿寅勒，即被称作鄂托克）的首领兀班·博依姆诺颜有二子：即小达尔罕诺颜和昭日格图诺颜；

小达尔罕诺颜有五子（有的书上说有七子）：巴特尔诺颜、芒哈勒代岱青诺颜、秉图诺颜、白恒达楚呼尔诺颜、拉布

泰(阿布泰)洪台吉;

拉布泰洪台吉时期(清顺治时期,即公元1644—1661年间),弘吉刺惕部归属在巴林部。

拉布泰洪台吉有二子:即萨邦台吉和扎木苏台吉;

萨邦台吉有六子:那顺扎布、罗格金巴、白斯古楞、白有、道而、杜拉玛;

杜拉玛为三等台吉,有三子:达萨协理、达尔扎台吉、博迪台吉;

小达尔罕诺颜的原配夫人早逝,留下遗孤巴特尔;

巴特尔诺颜有二子;兀拉代、兀苏台,兀拉代诺颜有四子查干阿尔斯兰、查干毕力格、苏门查干、敖特根;

敖特根有二子:赛音宝音、呼乌宝音;

呼乌宝音只有一子:阿由尔扎纳。

本文将涉及到上面这些人,故将其系谱列于文首,以便阅读。

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弘吉刺惕部早先的游牧地在今辽宁省铁岭一带,不知何时何故迁徙到呼伦贝尔。而迁到巴林的原因是部族内部的混乱、争斗。这次内讧发生在小达尔罕诺颜去世之后,是在由谁承袭札萨克爵位问题上,满蒙官吏之间发生激烈争论而引起的。鄂托克里的蒙古贵族坚持“长子当朝政季子守家业”的惯例,推举芒哈勒代,满洲陪官们却怀疑芒哈勒代对清王朝怀有异心,力荐所谓“智勇双全”的季子。

最后由清皇帝定夺,令芒哈勒代承袭爵位。芒哈勒代尽管承蒙众人推举和皇帝的恩眷,承袭了札萨克爵位,但同

满洲陪官们的龃龉、磨擦难以消弥。巴特尔诺颜不忍看这种局面,给其弟芒哈勒代暗递短笺:“将灶主困于户,率三兄弟及三十部弘吉刺惕,尽除龟蛇之族。”(其意为我们把在位的小弟关在家中,然后兄弟几人率领弘吉刺惕部的全部人马去征讨水滨的满洲人)。这种可能招致灭族之灾的大胆的想法,使芒哈勒代岱青诺颜惊恐万状。于是,借口“兄长年高体衰”免去了其兄巴特尔诺颜的军职,让巴特尔诺颜的两个儿子兀拉代、兀苏台来继位。

当时,漠南、漠北的蒙古及各地此起彼伏地举事反清,使满清朝廷吓得如同惊弓之鸟。巴特尔诺彦尽管已解甲赋闲,满洲陪官们却对他仍不放心,最后送毒酒致死才算罢休。为了掩饰这桩罪恶勾当,他们对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二人摆出一副“格外眷宠”的面孔,夸赞“兀拉代的膂力猎过伯勒古岱,乌斯台的箭法赛过哈布图、哈斯尔。”与此同时,策划挑起鄂托克的内部分裂,兄弟阋墙。他们鼓动拉布泰、兀拉代、兀苏台等人说:“你们应南下到老哈河一带去住牧。那样,皇室定会看重你们,赐予札萨克王爵位,甚至有可能把你们两位英雄招进京城当近卫将军。”

有一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在呼和哈达博格多敖包庆典上,拉布泰洪台吉同芒哈勒代岱青诺颜争吵,致兵戈相见,互相残杀,死伤很多人。芒哈勒代岱青诺颜一方最后惨败逃亡。拉布泰洪台吉当即收拾所有的财产、畜群,率所属十佐领之众南下。

弘吉刺惕尽管惯于迁徙跋涉的游牧部落,但在盛夏酷暑中满蒙官兵的催促下、昼夜兼程,急速行进,使他们疲惫

不堪。可是，一过小兴安岭，满洲陪官们带着军士突然悄悄地离开了他们。这样，迁徙的人们不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住哪里，只好漫无目的地向南奔。没有了满族陪官，人们倒轻松了许多，行进速度也放慢了，有不少人悄悄溜回老家，也有很多人从老家匆匆追上，寻找妻室儿女团聚。

从后面赶将的人们说“芒哈勒代岱青诺颜已驰书京城，把洪台吉告到朝廷了。”拉布泰听了大为震惊，知道自己上了别人的当，但悔恨莫及了。他们只好加紧赶路进入巴林右旗境内，投奔下嫁巴林郡王色布腾的固伦（满语，即国家）淑慧公主寻求庇护。拉布泰拜见公主，一五一十地禀告事情原委并求他救命。公主答应了他的请求，说：“我可以奏请圣上，免你一死，但你须精诚极效圣朝。”

皇族接到芒哈勒代岱青诺颜的奏本正要发怒时，固伦淑慧公主的奏章也到。公主奏：“拉布泰已投奔到我们巴林了，圣上宽容为怀，免其一死，赏赐给我为盼。”皇帝看了公主的奏章后，说：“拉布泰既然投奔公主，就把他交给公主好了。”

固伦公主对弘吉刺惕流亡部众施以洪仁博义，亲自在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山南麓设大行帐，带去很多布帛、米面、药物，隆重迎接了他们。给拉布泰及其所属十佐领的台吉诺颜每人赏赐绸缎一匹，给庶民部众分发米面、酒肉，给老弱病患施以药物，如此大宴三日。其时正值秋高气爽，哀鸿南征。历尽种种患难的人们此时悲喜交加，触景生情，怀念家乡及骨肉同胞，借酒兴唱起了哀惋的歌，闻者无一不落泪。公主及随从也深为动情，将呼和少荣以南至昆都楞芒

哈，西拉沐沦以东至乌力吉沐沦河的广阔而丰美的草场慷慨地赐予了他们，弘吉刺惕部喜出望外，连连拜谢公主的恩典，并且为了永久纪念公主及巴林王公、台吉们的友善仁慈的美德，将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山（蒙古语，即性情反复无常的尖峰）改称为“赛汉章图乌拉”（蒙古语，意为性情美好之山）。今在洪格尔苏木境内的赛汉章图山就是当年的阿布吉干图呼和少荣。

弘吉刺惕部的主、偏佐预定居于幄布尔山（伊塔古图）、哈达图河一带，第三、四、五、六佐领定于特根罕山、乌力吉沐沦河一带；第七、八佐领定居于古鲁淖尔一带；第九、十佐领定于昆都楞芒哈（即沙漠）、西拉沐沦一带过上了平安的日子。为了报答公主的恩典，他们年年月月为公主进贡。公主也非常看重拉布泰，奏请朝廷把他擢拔为协理。

弘吉刺惕部归附巴林郡以后，他们的摔跤手、神箭手和快马多次在巴林那达慕上夺魁。巴林部主台吉诺颜等大为不悦，心生妒嫉，说：“英雄苏巴海的子孙难道甘心落后于弘吉刺惕？”他们从所部各佐领抽调壮汉、骏马，加紧训练。这本是兄弟之间的争风吃醋。但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满洲陪官眼中，巴林、弘吉刺惕二部的合并则意味着对他们的潜在威胁。于是，他们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地告到了朝廷。接到奏本，皇帝及大臣们大为惊骇，口念“云聚则成雨”的祖训，施展了离间弘吉刺惕、巴林二部关系的阴谋诡计。

这一年春天，王府里养的一条最好的猎犬得了狂犬病，咬了府里的好几个人。满洲陪官趁此机会收买阴阳先生算卦，散布了“这是心腹之人为害的征兆……”的谣言。巴林

郡王听后,心生疑窦。暗自嘀咕:“这个心腹之人到底是谁?”从此,给郡王心上投下一道阴影。

这一年阴历10月25日,巴林王公们赴大板西庙听完宗喀巴圆寂纪念日诵经,深夜返回王府途中,听到东南方一声春雷般的巨响,随即一颗巨星自东南朝西北方向陨落,郡王见巨星陨落,心中纳闷,寻声望去,半夜里的东方泛出黎明似的鱼肚白。“那边为什么有白光?”王爷忙问左右。“咳!王爷您今天才发现?东南边泛这种光已不止一次了,据阴阳先生说……”满洲陪官趁机递上了半截话,几天后,“王爷身体欠安,与弘吉刺惕有关。满洲阴阳先生和西藏传经大师所占卜象一模一样,那因此,不把弘吉刺惕的祖传宝玺……”等风言风语盛传于王府。

谗言惊皇城,毒箭直戳心。然而,不仅自古善良的巴林部还是住在巴林境内的弘吉刺惕,对这一切丝毫没有察觉。这时,东有科尔沁西有康古特(即西夏)举事反清,制造叛乱,所以,满清统治者恐惧蒙古各部尤甚,千方百计分散他们的力量。平定科尔沁,满清朝廷不敢派遣巴林的蒙古旗军,怕他们伙同对方倒戈反清。尤其让弘吉刺惕、巴林二部偕行,如同放虎归山,危险很大。出于这种猜疑,满清皇帝令巴林的蒙古旗军去平息西夏叛乱。因色布腾郡王本人病体未愈,奏请朝廷让儿子替他出征。巴林旗军出发不久,曾任明朝辽东总督,后降清立过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在南方称帝,举兵反清。满清朝廷命令各地蒙古旗军去平定吴三桂之乱。巴林郡王接到圣旨后,勒令弘吉刺惕部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数从戎远征。

拉布泰洪台吉接到郡王的钧旨,自个认为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招募弘吉刺惕部所有能拿动刀枪的男丁,交给兀拉代、兀苏台两个诺颜带领出征。因为,朝廷催促紧,兀拉代诺颜只把十三岁的季子留在妻子身边,带着未满二十岁的三个儿子登上了征程。

临走时,兀拉代诺颜领着所属十佐领的头目及三个儿子拜见公主。公主用玉樽斟酒亲手赐予兀拉代诺颜祝福道:“孩子,祝你远征凯旋,让弘吉刺惕部名扬天下!”

兀拉代诺颜出征一年多,杳无音讯。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深感不安。这时,拉布泰洪台吉接到巴林郡王的一封私函,内容是:“今年五月五日,愿与贤卿在哲热图打黄羊围。协理带领人马自东、南二方向行围;敝人带马从西、北二方向行围。双方人马会合于赛汉章图山南麓。此次晤面,敝人想顶礼求福于足下珍藏的祖传宝玺。务请携行,切莫忘怀!”拉布泰洪台吉读毕王爷的信,一面派人把行猎时间、地点通知所部十佐领,一面准备携玺而行。聪慧的协理夫人劝阻道:“巴林王爷说顶礼求福于咱们的宝玺,恐有诈。如果诚心敬仰宝玺,为什么非要带到猎场?宝玺也不是刀枪棍棒之属。”萨邦台吉也接过母亲的话茬劝道“巴林王爷真要想顶礼求福咱们的宝玺何不屈尊光顾敝舍?王爷诚然是圣主成吉思汗的金枝,可我们也不是庶民百姓的后裔,说到底还不是同根生发的簇叶?”任凭妻儿苦苦相劝,老协理执意不肯更改初衷。行猎日期到了,老协理从佛龛取出珍藏的宝玺,包在蓝缎子绣囊,挂在脖颈上出发了。

弘吉刺惕部向来有不分男女老少,携带弓箭猎犬,手持

掷棍投棒行猎的习惯。因此,这一天,他们黎明前就出发,摆开队列围住黄羊群,朝猎场中心地带追赶。行围圈收拢会合了,善良的弘吉刺惕人还在催马唆犬,张弓搭箭,掷棍投棒,打得酣,使黄羊群纷纷倒地。但是弘吉刺惕方毕竟老少居多壮丁少,到底也没打下人手猎物。巴林的猎手们却个个年轻力壮,老远可以看到他们驮在马鞍上的猎物多得几乎要拖地。围场收拢会合之后,巴林的猎手们慷慨卸下猎物,热情分送给弘吉刺惕部里那些因年老体衰或年幼力单而尚空着手的人们。

猎场行帐纷纷支起来了,处于正当中的饰以云纹的大蓝帐格外醒目。色布腾郡王本人满脸堆笑走出行帐,亲自迎接老协理,殷勤地请进帐篷里,摆下酒桌款待。酒过三巡之后郡王起身用清水洗手,焚香净身,小心翼翼地接过弘吉刺惕的祖传宝玺,动手打开包裹。宝玺包裹得非常严实,最外边一层天蓝色缎子,里边一层五彩绸,拉开纯银铸成的印匣小抽屉里边还裹着一层黄绸哈达。王爷不慌不忙地打开包裹,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经文,将宝玺顶到脑门求福之后,传给手下人。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学着王爷的样子顶礼求福,越传越远。行帐外人声鼎沸。争先恐后地嚷嚷:“给我!给我……”王爷在这边不动声色地陪着老协理,不时亲手斟酒,谈笑风声,频频劝酒。外面人声悄然静下来了,老协理以为人们已经顶礼求福够了,便对郡王说:“现在该把宝玺装匣了。”郡王传令道,“送还宝玺!”门外静悄悄,无人应承。过了许久进来一个侍卫跪禀道:“宝玺不见了!”王爷佯装暴怒,厉声喝斥道:“下贱的奴才!快给我找回来!”

老协理喝酒喝得本来有些晕晕乎乎,一听“宝玺不见了!”立刻两眼发黑,踉踉跄跄地跑出行帐,用嘶哑的嗓音一迭连声喊:“还我宝玺!还我宝玺!”逗得人们围上来看热闹。扎木苏台吉拨开众人到父亲跟前,问道:“宝玺是否失落了?”几乎急昏了的老协理,软瘫瘫跌落在儿子怀里,萨邦台吉等弘吉刺惕的台吉诺颜们也闻声相继赶来,一面劝慰老协理,一面求告王爷:“郡王开恩,一定要把宝玺找回来!”

巴林郡王当即召集所部各佐领头目颁令道:“今天打猎的人一个也不准放回去!一伙一伙的一个人一个人地搜一遍!一定要把宝玺找出来!”遵照王爷的钧旨封锁了猎场,不分上下挨个搜,直到黄昏也没找到。第二天人们把所住那片地上每一根草木都扒开寻找,如此过了二天,当他们刚要吃晚饭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霎时间平地积水尺余深。行帐已挡不住水,人们个个成了落汤鸡,又冷又饿,实在难捱。夜间,大部分弘吉刺惕人悄悄回了家。他们本来就为了解闷开心才打猎的,有的家里没有人,有的留下年幼的孩子看家,遇上这么大的雨,自然放不下心,第三天早晨云开雨霁了,但平川汪洋一片。王爷和协理只好放走众人,约好雨水退去之后再来找。

雨水终于退去了,双方如约前来,翻着泥浆找了七天也未见宝玺的影子。老协理经这次灾变,身心交瘁,口吐鲜血,昏厥过去,被四个人抬着回家了。今在巴林右旗洪格尔苏木东北部的塔玛干召(意为丢失宝玺的坨子地)就是当年弘吉刺惕丢失宝玺的坨子地。

且说,弘吉刺惕遣送的旗军经几年转辗征讨,终于平定

了吴三桂之乱。在连年的战争中，弘吉刺惕人表现非常出色，英勇无畏，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可他们尽管报效国家，奏凯而归，但也死伤惨重，为不少弘吉刺惕父老双亲、少妇幼童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兀拉代、兀苏台二将军骁勇善战，带兵有方，深得满洲主帅的赏识。班师回朝后，满洲主帅把他们兄弟二人单独延留在京城，准备引见给皇帝，受封领赏。这时，巴林郡王恰恰也在京城。他听说论功行赏的名册中有兀拉代、兀苏台二人，禁不住妒火中烧。郡王当即用重金贿赂那位主帅，要求暂缓引见兀拉代、兀苏台的日期。同时，又用金银珠宝贿赂京城六部及理藩院文武众臣，将镇压吴三桂的军功记在自己二个弟弟名下。

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二人在战场出生入死地奋战七个春秋，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谁也没料到，巴林札萨克王不仅不禀报皇上为他们请功授奖，而且也不让率他们打仗的主帅见兀拉代、兀苏台，把他们幽禁在一个小院里达半年之久。对他们来说，被困在这种小院子，比那在战场上拼死拼活还难熬。终于有一天早晨，主帅派人告诉兀拉代、兀苏台：“时下我不能领你们二位诺颜晋见皇帝，有事日后再说。”不久，朝廷便派几个兵丁送他们回乡。

一同参战的有功人员都得到了朝廷赐予的优厚奖赏，唯独没有兀拉代、兀苏台二人的份。而且，当他们二人凭借骏马的长劲越过高山峻岭，长途跋涉回到家时，仁慈的母亲和叔父拉布泰已经仙逝了。

原来，在半年前弘吉刺惕部的勇士们从战场上回到家

乡时，兀拉代、兀苏台的母亲没见到自己两个儿子的身影，就以为两个儿子和孙子都阵亡了，当即哭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而他们的叔父拉布泰诺颜却被王爷欺辱而含恨弃世。他两听了这一切，悲痛难忍，仇恨满腔，竟把手中的酒杯握碎了。兀拉代、兀苏台二人回来后，经常去巴林王府，责问巴林王：“你们为了讨好朝廷，派我们弘吉刺惕的子孙上战场后，为什么不但不照顾留在家里的父老孤寡，反而压迫欺负？”并且每次去都要讨还那枚弘吉刺惕部祖传宝玺。巴林王被他们逼得无奈，只好假惺惺答应找回他们的祖传宝釜。他装模作样令其下属各佐领各抽五十兵丁，在所谓丢失宝玺的地方架起蒙古包挖一口井住下来，让兵丁们“寻找”弘吉刺惕部的那枚宝玺，以搪塞兀拉代、兀苏台之口。今洪格尔苏木东部塔玛干胡都格就是当年寻找宝玺时打井的地方。

巴林王一面装腔作势，集中众人打井又架帐篷，制造寻找宝玺的假象，另一方面向清政府告状：“兀拉代、兀苏台二人自还乡以来，一直怀恨朝廷，整日演练兵马以试图和天子作对。此间也多次劫掠旗札萨克王府及敝人的私宅，使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上看了奏状，将信将疑，心想：穷乡僻壤的一个小小部族，竟敢兴风作浪？皇帝只好派了两名使臣前去巴林以探虚实。

心怀鬼胎的巴林王早有准备，当朝廷的两位使臣来到王府检查此案时，郡王、诺颜和台吉们说的和上书的状子一致，而且把案情说得更加真实、具体，把两位使臣的耳目搪塞得天衣无缝。但是，二位使臣却提出了要到弘吉刺惕部

居住的地方察看。这可急坏了巴林郡王,为了不暴露天机,他选派谨慎老练的哈日敖海梅林陪同两位使臣前往,并再三吩咐千万不要暴露。哈日敖海梅林心领神会,陪同使臣去八佐领。路过查干诺尔地方时,有意领到几户台吉家歇息、作客。让台吉们向两位使臣进谗言,使他们更加怀疑东八佐领。接着领两位使臣上“乌珠尔”山顶,让他们看了弘吉刺惕部在远处围猎场景。两位使臣看到那尘土飞扬,喊声震天充满沙场气氛的景观,误认为是在进行军事演习,将地形地貌、人马约数、行动规模等记下来之后,没敢向东八佐领境内涉足一步,就返回来,回城去了。由于哈日敖海梅林陪同两位使臣观察八佐领弄假成真,立了大功,更加受到王爷的宠爱。巴林郡王为了永远纪念哈日敖海梅林的这一切功绩,将“乌珠尔”山命名为“乌珠尔梅林哈日”。今查干诺尔苏木东北边的梅林哈日山即是。

皇上听了两位使臣的禀报后,气得怒发冲冠,马上唤一名大将军下旨:“汝等率所部,附蒙古旗兵若干,进军弘吉刺惕部,将兀拉代、兀苏台二贼除掉。”大将军率兵来到翁牛特旗,派人去传兀拉代、兀苏台二人。从不怕死的兀拉代、兀苏台兄弟二人,满不在乎地跟着差兵渡过西拉沐沦河来到了清军营帐。这时,早已埋伏好的兵士们簇拥上来,将手无寸铁、毫无戒备的兀拉代、兀苏台二人羁押到清大将军的蒙古包前问罪。清白无辜的二兄弟突然遭到这种不白之冤,怒不可遏,大声骂道:“你们这帮畜生,土匪,为何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侮辱成吉思汗的后裔、大清王朝的功臣?”大将军想审问几句,但是兀拉代、兀苏台没理睬他。又大声

骂道:“我有话要跟朝廷说,犯不着跟你们这帮土匪罗嗦!”清军大将军气坏了,令手下人将兀拉代、兀苏台押下去斩首。

二位贞杰英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遇害了。杀死兀拉代、兀苏台之后,大军北渡西拉沐沦河,直取弘吉刺惕部住牧地,见人就杀,见物就抢,逼近伊塔古图南麓兀拉代家。这时弘吉刺惕部少数几个人同大军交战,向他们猛烈射击,打死打伤若干清军官兵。这样更加激怒了清军大将军,他下令要灭兀拉代三代九族。清军像疯了一样,逢人就杀,见房就烧,把弘吉刺惕部住地践踏的一片废墟,悲惨荡野。在这次的野蛮屠杀中,兀拉代的二儿子、三儿子和很多乡亲被杀害,剩余的都被大军掳去当奴隶了。兀拉代的季子敖特根和少数几个人跑出去躲进了幄布尔山密林中脱险。大难过后,敖特根在幄布尔山巅上立石头敖包,尊为“阿其图萨图罕乌拉”(即救命之山)、经常祭祀。现洪格尔苏木北边的“伊塔吉图”山,就是当年的“阿其·图萨图罕乌拉”。由于历史久远、演变为伊塔古图山了。

兀拉代的季子敖特根幸存下来,带领众乡亲建敖包祭英祖的消息传到旗札萨克王耳朵之后,旗札萨克速派兵抓回敖特根,革其台吉头衔,交给巴林的外佐领给一个巴林台吉当了隶民。弘吉刺惕部的首领兀拉代本为蒙古孛儿只斤氏,但不是台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被革去台吉爵位所造成的。

由于弘吉刺惕部所有活动都被限制,祭祀“阿其·图萨图”乌拉的活动也被迫终止。八佐领的人们只好祭就近的

山山水水了。洪吉拉德第七、八个佐领的近百姓在一个缓坡土岗上垒敖包,命名为弘吉刺惕敖包,一年四季祭祀,举行那达慕大会进行好汉三赛。旗札萨克王府发现后,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好,摔跤手(即好汉)辈出,若不破坏此山风水,后患无穷。这样就派人在弘吉刺惕敖包西麓挖一条深深的壕沟,破坏了这个土岗的风景。因为风景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人们也就不祭这个弘吉刺惕敖包。这就是现在洪格尔苏木南边的洪格尔敖包,在其西麓挖壕沟的疤痕如今仍依稀可见。

由于弘吉刺惕部越发被王府歧视,瘟疫蔓延,连年遭灾,民不聊生,弘吉刺惕部台吉诺颜们心里惶惶不安,为了消除灾祸,唤来兴旺,他们去叩拜大活佛,请求指点拯救之法。大活佛说:“若想招福得安,必建造圣庙于方土之北,诵经拜佛。”弘吉刺惕部头领们商议后,在“乌胡格尔音固日斑敖瑞”(意为死尸遍地的三座山)建一座庙,号称弘吉刺惕庙大兴佛事,旗札萨克王发现后,为了控制他们的活动,从大板西庙派去几个爵位较高的喇嘛掌管了此庙。今洪格尔苏太南固日斑敖瑞山之中峰上有一座古建筑遗址,就是当年弘吉刺惕建筑的旧址。

清朝统治者在弘吉刺惕部之间进行各种挑拨活动,致使相互猜疑,互相战争,两败俱伤,双方能打仗的兵马寥寥无几。这他们还不满足,为了除掉巴林部的一些台吉,满族陪官们指使亲清政府的少数人多次上书朝廷进谗言:“葬固伦公主之地,风水殊异,日后巴林可能出现帝星,篡夺皇位。”清朝皇帝见书后,立即下令迁移固伦公主陵。巴林旗

札萨克王接到圣旨后,将固伦公主陵从巴尔达穆哈拉乌拉之赛音宝力高迁至巴彦胡特勒山南麓,色布腾郡王陵地附近。然而,清族陪官们这样还不心满意足,又联名复奏,说:“自将固伦公主陵迁至嘎日迪山(即凤凰山)之后,帝星更加明亮,嘎麻彦峰有腾飞之势,征兆对皇朝不利。”皇上看了奏折后,立即派大臣和有名的阴阳先生,强令巴林札萨克王在赛音宝力高地方挖了很深的堑壕,破坏原地形风貌,并在嘎日迪山东侧巴彦胡特勒山上开了一条深沟,意即切断了凤凰的翅膀,使之无腾飞之力。同时又将固伦公主陵移至达马金巴彦日迪和硕(山)。几年后,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因为达马金巴彦和硕山形似大牦牛在巴林一定出现很多英雄好汉。这样,又在布哈山(蒙古语,牦牛山,即巴彦和硕、)半腰凿一个大洞,挖出两块白色圆形巨石以示阉割了牦牛山,这虽是迷信的口头传说,可是山豁和堑壕的痕迹,到现在亦然明显的存在着。

敲吸蒙古人骨髓成性的满清陪官们经常无中生有地向朝廷告色林部的不是。为了彻底镇服巴林部,康熙十八年间,清朝皇帝亲自来巴林视察。皇帝在各地巡游,亲眼目睹了巴林人的魁梧健壮的体魄,诚实善良憨厚的性格和对朝廷的忠诚品性之后,夸赞巴林人历来英勇善战的好汉。此后,每次镇压远近的叛乱,都派遣巴林旗兵去参战,采取了通过战争消耗其人力、财力的策略。

镇压蒙古厄鲁特部叛乱的战役,就是以巴林部为主力进行的,在此次战役中三等台吉、协理达萨率兵出征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当他从战场上回来时,王府内外的诺颜们花

天酒地,而将士们的家属和家乡父老兄弟的生活非常困难。达萨协理看到此情此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气冲冲去找札萨克王指着他的鼻子,斥责:“我巴林弟子秣马厉兵屡出沙场,众多仁义之士流血茫野,抛骨他乡;而他们留在家乡的父老兄弟,孤儿寡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可你们这些吸血鬼,整日挖空心思搜刮蒙古族乡亲的财富,送到魔鬼的嘴里,换取翎支顶珠。真是丧尽天良,无羞无耻!”事后,上书朝廷,指名道姓揭发了巴林王和一些协理、章京的累累罪行,吁请朝廷以国法惩治些败类,要求为弘吉刺惕十佐领另立旗制。

达萨协理这一状告上去,却给京城官宦们开了进财之门。他们故意把这官司拖好几年,受够巴林王公们的贿赂之后,才下旨“达萨诬告清官,离间旗民。当革除官职,押入地牢。”这个判决,助长了巴林王和台吉们的嚣张气焰。他们污蔑八佐领,散布了“奈林山沟阴影不散,东八佐领官司不断”的恶言诽谤。

弘吉刺惕有一名叫呼宝音的银匠,手艺绝佳。巴林王就把他叫到府上,常年给自己制作各种金银饰器。因呼宝音早年丧偶,他的小儿子阿由尔扎纳从小随父东奔西跑,形影不离。父亲进王府,他自然常在王府中玩耍。阿由尔扎纳眉清目秀,性情温和,虽然年尚幼,待人接物象成年人,文雅得体。王爷看中了他,便给自己的独生子(二公主、即固伦荣宪公主所生)琳布当胡德(即伴童或伴当)。阿由尔扎纳当了胡德之后,跟琳布一起念书。这个孤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经常帮助琳布温习功课,颇受先生的钟爱。经几年

的勤奋学习,阿由尔扎纳达到了能够通读蒙、满、汉三种文字的水平。

多罗郡王乌尔袞报效国家多次参战,于康熙六年在军营亡故。其子琳布继王位。琳布承袭王位后,把好伴童阿由尔扎纳封为旗札萨克衙府塔木干笔帖赤即掌印书吏,对此,府内满洲陪官们十分不满,聚众当面斥责琳布:“自太祖有明法,而今你小小的琳布竟敢更改祖宗法度,让一个小珠拉沁(司灯)担任这个职务,岂有此理。”琳布受到这顿指责,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初我承袭王位的时候,这群无恶不做的豺狼制造事端反对我袭位。而今我已经袭父亲的王位,任用一个小小的笔帖赤,他们都不让,简直是欺人太甚。”他越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喝斥:“我们蒙古人,别说一个笔帖赤,还能主宰世界。你们识相点!”盛怒之下,他当场打死一名侍卫,严惩府内一些腐败的官吏,换掉了一部分官吏和苏木扎兰(即参领)。这件事引起了满族陪官们的愤恨。他们煽动那些被撤职的官吏和弘吉刺惕、巴林二部中亲清者给年轻的琳布王爷罗织很多罪名,上告清朝皇帝。没过几年琳布王终于被这帮奸佞恶棍诬告削爵。

满族陪官们把琳布王告倒之后,更是得意忘形,猖狂至极,自以为皇帝的亲外孙札萨克王(琳布王爷是固伦荣宪公主之子,康熙帝的外孙)都被我们整下去了,还有谁敢跟我们过不去?这时,他们手下那些贪赃枉法、溜须拍马、好进谗言的蒙古诺颜们也狗仗人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在旗札萨克府中横行霸道,使阿由尔扎纳无立足之地。

阿由尔扎纳对这些丑恶世态,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正

在苦闷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一位老差夫匆匆忙忙地跑来悄悄告诉阿由尔扎纳:“今夜必有大祸,立刻逃离此地!”阿由尔扎纳听了老差夫的劝告,左右寻思了片刻,心想:到此地步,“逆也亡,跑也死”。于是,他一横心,当夜潜入衙府内,打开密封的印柜,将弘吉刺惕部早年被盗的祖传宝玺取出来揣在怀里,跨上骏马,向故乡奔驰而去。

机智勇敢的阿由尔扎纳离开王府的时候,故意找到那守夜的更夫,说:“你进府内告诉王爷,就说我阿由尔扎纳带着弘吉刺惕祖传宝玺回家去了。”更夫从心底钦佩阿由尔扎纳的胆量,不愿把此事通报王爷,但又怕为此连累身家性命。犹豫良久,最后还是照阿由尔扎纳说的去做了。王爷府里顿时人喊马叫,乱作一团,王府官员们说:“府内进盗贼了,旗札萨克的大印被盗走了。”喊着便集合骑兵,下令追捕阿由尔扎纳。

阿由尔扎纳快马加鞭一口气爬上了查日斯台山梁,他回首了望,清楚地看到王府的骑兵黑压压地追赶过来了。他整理马鞍,系紧肚带,稍歇片刻,等骑兵们追到跟前时,对着兵士大声喊道:“兄弟们,我只是找回来了弘吉刺惕的祖传宝玺。弘吉刺惕部与巴林部本是同宗兄弟。我不希望兄弟之间干戈相见,希望你们平安回家。”说完,纵马下了山。追兵深知阿由尔扎纳的武艺高强,不敢鏖战交手。他们派两名兵丁回府报告情况,然后远远跟着阿由尔扎纳,以免让他跑掉了。走到长满柳条和芨芨草的弘吉刺惕敖包,阿由尔扎纳突然不见了,追兵们十分焦急。正在这时,满族陪官们率兵赶到,大发雷霆:“你们这些酒囊饭袋,眼睁睁地放跑

了一个活人!”蒙古军务梅林只好用花言巧语替自己辩解:“在查日斯台山梁上我们同他拼杀了一战,只是黎明前天太黑,才让他趁机溜掉了。”满族陪官们下令:“放火烧树林和草滩,挨个搜查弘吉刺惕的浩特,活捉盗贼阿由尔扎纳!”在满族陪官们的带领下,王府旗兵们放火抢劫十来天之后,在昆都楞芒哈上同阿由尔扎纳相遇。阿由尔扎纳同追兵们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格斗。虽然他身上负了几处伤,但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箭袋空了,他举起刀大喊一声:“砍掉满洲陪官的脑袋!”直冲上来砍死几个追兵后阵亡。满洲陪官们跑到阿由尔扎纳尸体跟前,从他怀里取出弘吉刺惕部祖传宝玺(据传说,搜到宝玺;但据家谱记载,没有搜到宝玺)后,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阿由尔扎纳盗走了巴林札萨克大印。并且从此污蔑东八佐领“为奈曼苏木音胡控嘎其”即(盗贼的乡八佐领)。今在独石苏木南部的“朝黑勒都干达坝”(即打仗的山梁)就是当年王爷的军务梅林与阿由尔扎纳拼杀一阵的查日斯台达坝。今胡日哈苏木境内的塔玛干芒哈,就是当年阿由尔扎纳决一死战,最后将弘吉刺惕部祖传宝玺又一次被夺走的昆都楞芒哈。如今祭祖的塔麻干芒哈敖包,就是安葬阿由尔扎纳的地方。

达萨协理、琳布王先后被害,阿由尔扎纳不幸遇难之时,正是满族陪官和当地的贪官污吏们胡作非为,祸殃巴林旗的时期。王公及其家族台吉们争夺权利,勾心斗角,一方面巧立名目增加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另一方面亲近朝廷,四处行贿。尤其弘吉刺惕群众不分尊卑,都被诬陷为达萨的同谋、阿由尔扎纳的窝藏者,仓谷六畜被没收个净光,连

一条好猎狗也都被抢去。巴林的迫害日益加剧，弘吉刺惕人实在难以为生。于是，沿西拉沐沦河岸居住的弘吉刺惕部第九、十佐领的牧民纷纷南渡西拉沐沦移居翁牛特贝勒旗境内。巴林王发觉此事后，立即派兵在西拉沐沦河北岸设了许多哨卡把守，不准弘吉刺惕部其余八佐领渡河。因此，有了“哈日吉”这个地名。今胡日哈苏木“哈日杰”嘎查就是当年的哨卡“哈日吉”（印：看起来）有了哨卡弘吉刺惕部大批迁徙已不可能，但他们从未中断一两户地偷渡西拉沐沦河。于是，王爷又下令沿昆都楞芒哈南边立一行木头界牌，禁止弘吉刺惕人翻越。但是，哨卡和木牌都未能阻止弘吉刺惕人南逃。后来，巴林王派一批巴林的四等台吉进驻此地，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些充当密探的巴林浩黑台吉（即没有奴隶的四等台吉）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得到王府的赏识和提携，竟把弘吉刺惕人家常话都记下来，加油添醋地向上报告，陷害无辜，制造冤狱。因此，东八佐领的人需要私下交谈时，先把对方叫到一边，避开那些密探，贴着耳朵悄悄说话。在这弘吉刺惕人中间已相沿成习。至今巴林的一些老人看见两个人悄悄私语，就开玩笑说：“你们是在唠八佐领的家吧？”

满洲陪官们对弘吉刺惕施加种种压力，禁止用“弘吉刺惕部”这个名称，把洪吉拉德改称为“东八佐领”，将该部台吉降为“外奈曼达”（过去，在乡村有过专管一项事务的毛根达之类的小官，因多年禁用弘吉刺惕这个名称，当今奈曼苏木（即八佐领）的人多数都不知道自己也是弘吉刺惕部的后裔了。另外。由于巴林王决定不准八佐领的人担任旗札萨克

府衙内任何官职，直到清朝灭亡，八佐领里没有一个出任章京、协理之类官职。有人说，曾辅佐旗札萨克王的布和章京是八佐领人。不过，布和套格套章京不是弘吉刺惕人，而是宇桑氏。宇桑并不是蒙古部落名称。据传，早年弘吉刺惕部派兵出征镇压吴三桂叛乱时，兀拉代将军的两个儿子查干毕力格和苏门查干从战场上俘获两个姓朱的汉族孩子。两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惹人喜爱，实在不忍伤害他们哥儿俩，使用绳头拴在骆驼车的车辕前头牵回家中，起名吴三桂，将其后裔称吴三桂氏。吴三桂（ᠠᠨᠢᠯᠠᠳᠠ）一词年久转音成于宇桑（ᠤᠰᠠᠨ）氏。因为用绳头牵回来的，所以兀拉代家族人称他们“博格音图日勒”（即绳头氏族）。

旗札萨克衙府内的一些权贵们认为，八佐领里不断出现现象达萨、阿由尔扎纳等英雄好汉，是因为把拉布泰洪台吉的遗骨安葬于“塔本套勒盖山”这风水宝地的缘故。将来也可能出现更伟大的人物，统辖漠南五部喀尔喀，篡权夺位。因此，旗札萨克下令把拉布泰洪台吉的陵墓挖出来，易地而葬。挖陵墓时把原陵园内的一棵高大的檀香树锯掉，为防止从树根上再长出嫩芽往树墩上又浇了滚烫的小米粥。这样还不放心，经满族风水先生察看地形后，把拉布泰洪台吉的遗骨迁至名不吉，形不利的哈日少荣（即黑山头），但八佐领的人们在满族阴阳先生指定的地方垒一堆石头，把拉布台洪台吉的遗骨埋葬到美丽的屯特根罕山。为了不让对方发觉动土的痕迹，赶来马群，让马群踩了一遍。

巴林王府被烧前前后后

撰文：恩和巴图

译文：巴 特 尔

审文：穆 松

巴林王府位于巴林右翼旗沙巴尔台苏木所在地，故也叫沙巴尔台王府。明末清初的沙巴尔台河西岸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大草原。于后金天会年间蒙古巴林部开始居住时，在沙巴尔台河西岸似乎没有人烟，只有契丹族的旧居遗址和坟墓及梯田遗痕而已。在沙巴尔台河西岸的山川丘陵地区都被原始森林覆盖着，沙巴尔台河被杨柳覆盖着，不能任意涉过的淤泥汤，故称沙巴尔台河（即：淤泥汤）。距今一百多年前，一猎人活捉一只狼交给王府，王府把狼圈在铁栏内喂养，一日不慎跑出，王府东一位叫明干牧主的狗把狼撵到沙巴尔台河，狼进到河中竟陷死在河里了。

一、沙巴尔台王府

于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元月，巴林部色特尔的儿子色布腾王被清廷封为辅国公，把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王色布腾，淑慧公主下嫁巴林部时，巴林王府就在沙巴尔台

（详见《蒙古游牧记》），公主来巴林部之前奏禀皇上：“西拉沐沦河巴林石桥已年久失修，如不修复，过河有危险……”。世祖帝恩准在西拉沐沦河上架了一座新桥，群众称之为“公主桥”。在修桥期间，巴林王在全旗招民工修了从巴林桥至沙巴尔台王府的一条路。公主下嫁车辇来到西拉沐沦以南二百华里处时，巴林王迎公主的首迎式就在此地进行，故把此地叫做“乌嘎塔拉嘎花”，汉意为迎亲土岗（现翁牛特旗乌桐花镇）。次迎在“门德和硕”。三迎在“察则尔图”（今巴彦灯苏木察则尔图艾里）。在沙巴尔台王府北侧有一芨芨滩，当地人把它叫做“上王古里”（汉意旧居），但此地从不见瓦砾等旧建筑痕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王公贵族有可能还是住在毡券里。

固伦淑慧公主来巴林之后，从内地请来风水先生，看风水宝地，把王府从沙巴尔台迁至套白山南麓（即：现大板镇所在地）。并把套白山南麓称之为五龙相争之雄姿，是英雄辈出之地，把查干沐沦河称之为闯过十三道石门（即该河从头到尾绕过十三个山头），是具有十三道永攻不破的防线。遗憾的是，于癸丑年（1918年）战乱中沙巴尔台王府被烧，金银财宝被掠，贵重的文物和王府被焚。因此，沙巴尔台王府究竟于何年始建，于何年迁到大板等史料，也只能靠其他历史记载了。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把巴林王巴图封为多罗郡王奠边将军，派往乌力雅苏台驻守。当年冬巴图王从现在大板起程，十八天到达乌力雅苏台。以此推断，于1776年以前巴林王府已迁到大板。

于咸丰三年(1853年)清亲王曾格林沁统率清军镇压农民起义军赵文时,巴林王那木吉勒旺其格派以色英、色日布为首的巴林兵丁。色英原是从战场回来不久,在他出战时,他父母先后病故,家里别无主事之人,故他向那王禀报请求免除兵役,但没有被获准。他走时,从沙巴尔台王府到查干大坝(离王府五华里)从未回头看一眼之说。故当时王府在沙巴尔台可能也是事实。

巴林王府是由蒙、汉、满各族工匠建造的古典式建筑,宅由前后两院组成,东西88米宽,南北160米长,用大青砖砌成的两米高院墙,有东西两个大门。王府东侧隔一胡同建了一处衙门,北侧有马圈,衙门东侧还有一处院是为王公服务的喇嘛住处。于王府西约7—8华里之处建有座“格萨尔庙”,王府东约7—8华里之处,建有一座“菩萨庙”。

二、西部垦荒,沙巴尔台居民

距今八十年前,沙巴尔台附近人烟稀少,只有在东西浩饶钦居住着少数几户王府隶属车夫,牛马羊倌等牧户。丙午年(1906年)至己未年(1919年)间,巴林西部地区的牧户逐渐迁移到沙巴尔台附近。

由于清朝长期被几个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入侵,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卑躬屈膝,卖国求荣,连连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并兼兵荒马乱,在内地出现了大量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批准他们到北方牧区逃命求生。当时成群结队的贫苦农民陆续逃荒到北方牧区。正当这时,热河省大地主团二瞎子,把

克什克腾旗从哈拉嘎坤地到石拱桥大片土地买下,并向热河省都统庭杰恳求在巴林西部开荒救难民的要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热河督统向清政府提出,在左右巴林开荒的请示,当时巴林王扎噶尔道尔吉虽然没答应,但只过了一年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年,在清政府威逼下把巴林西部的8252顷地,以四万两白银卖出。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此地建立了林西县。当时地界北部由浩布吐坝、额莫勒达坝、楚老图之坝、碧流台坝山的分水岭至乌珠穆沁旗接壤,西部以黄花梁。

山的分水岭为界与克什克腾旗接壤,南以西拉沐沦河为界与翁牛特旗接壤的广阔地带。

这些地名从南往北排列:

营图毛胡艾里 *ᠮᠠᠮᠤᠮᠤᠮᠤ* (现在叫英桃莫河村),滚额尔阁艾里(现叫公益阁村),当时系著名的牧主哈日敖海的居住地。白音查坤兑,现在下端叫小城子,上端黑音达拉古艾里(现在叫海棠湖村),老格西胡艾里(现叫老虎石沟村),达奇艾里(现叫大金沟村),古力板图力嘎山南大川(原叫十二吐),哈拉盖图艾里(现叫十二吐),乌力雅苏图坤兑艾里(原名桃里艾里,现叫大营子乡),乌力雅苏台敦达艾里(现在林西县所在地),苏必达桃海艾里(现冬不冷乡),乌力雅苏台坤兑西边的嘎斯台河北岸叫道老和硕,南岸叫奈曼都硕,原来在此地有一位叫博力亚西拉的牧主居住。博尔坤兑(玻璃沟)现在孙家营子村。营坤兑(大营子)是东西两个大川,大川中间土山叫波恩巴西里,原来有一户叫翁克尔梅林的牧主,拥五百峰骆驼,把公驼放西川故叫博尔(公驼)

坤兑(大川),把母驼放东川,故叫营(母驼)坤兑(大川)。再往东,哈达乌苏坤兑,苏曼柴尔图巴尔图(四块石头),诺根宝力格等地(现在是官地镇和三段乡所在地,此地系有户牧主叫依热乐吐的放苏鲁克到乌珠穆沁、好奇德两个旗。现在的两棵树是他们的夏营地),原来毛盖图艾里(现统布乡),因原系常统领和暴勒统领所驻守的地方,故叫统领。

楚老图大坝、额莫勒大坝包古图(鹿山)、花和硕等地新林镇,郝碧图大坝、乌牛台坤兑(现五十家子镇)。

热河省原计划把查干沐沦河西岸的大片土地全部放垦,巴林王当时没有答应,他们伪造合同书向上告也没有赢。当时嘎斯台河北岸的哈丰嘎章京,色布兴格扎兰、比达拉梅林、特格喜江嘎等地方官员和牧主没有让此地划归林西。地界:西边芒来代敖包,北边巴彦查干山,东边发财西里、达拉图西里,南边嘎斯台河为界。在查干沐沦河西岸因由金奇显章京、乌勒慧充阿扎兰、巴彦德力海梅林、格勒格嘎扎兰、拉西斯楞扎兰等人出面阻止,查干沐沦河西岸未划归林西。阻止划出的:北以阿贵洪硕尔、依苏山界、东西里、达拉图西里;东以查干沐沦河的地或(现在官地乡两棵树、中兴村),珠尔沁庙属的一部分地区,如公主坟周围地区、三步灵、葱尔坤兑等地。

巴林旗卖给林西的共十个大川,三个河流两岸。此处居住的牧民被迫迁移,其中一部分搬到沙巴尔台附近,从此沙巴尔台地区附近的居民开始多起来了。

三、“黑军”、“黄军”和沙巴尔台居民

丙、午年(1906年)热河省派遣王逊存负责巴林西部的垦荒事宜。他把垦荒局设立在林西县东门外的苏必达庙上,并驻扎一部分军队,垦荒的同时,大兴土木工程,开始兴建林西县。驻扎在苏必达庙的军队官兵随意进神殿,扰乱喇嘛庙会,用棍棒敲打念经喇嘛的脑袋,嘴喊“一个秃驴、两个秃驴……”。管家喇嘛劝他们出去时,他们不但不出去,反而动手打人,乘机抢劫寺庙内的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并同时抢劫喇嘛个人财产和日常用具,连烧柴都难于幸免。使喇嘛无法在寺庙内继续维持正常庙会和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他们把珍贵经卷及贵重物品全都搬到沙巴尔台王府隐藏起来,许多喇嘛回家的回家,出家化缘及到别的喇嘛庙暂时栖身。这样苏必达庙的佛灯熄灭,钟声断绝,庙会活动在停止数年的情况下,乌勒慧充阿章京把自己家院献给苏必达庙,把家搬到查干沐沦河西岸(现隆平农场所在地)。

垦荒军不顾军纪国法,抢掠烧杀,干尽了破坏宗教,坑害百姓的勾当。他们穿黑色服装,干尽黑心勾当,当地牧民叫他们哈日其日格(黑军)。黑军不但抢掠苏必达庙,而且嘎斯台庙、岗根庙、乌牛台庙等庙宇也未能幸免。同时巴林西部地区未来得及搬迁的牧户,被抢劫的惨案也是不胜枚举。

巴林王看到不断出现的各种残害事件后,多次派遣使节与林西县衙门进行恰谈。县里每接见使节都以酒肉款待,以甜言蜜语劝阻回去,但抢掠烧杀的勾当从未间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腐败统治之后,北洋军阀篡夺革命的成果,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时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乘国内战乱之机宣布蒙古独立,自封蒙古日光皇帝,并组建蒙古圣军(巴林称黄军)。哲布尊丹巴向蒙古各盟旗派遣使者,号召全部蒙古盟旗归顺大蒙古帝国,并发出“圣旨”号召蒙古族青壮年来参加圣军。在当时内蒙古各盟旗有部分蒙古人响应号召,但巴林王扎噶尔道尔吉认为哲布尊丹巴是喇嘛教头,喇嘛掌权坏国事,女人当家坏家事,并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了巴林部。只有与刑事案件有牵连的暴勒等几个人逃跑参加了圣军。但他们到外蒙古边界的优格吉尔庙,就被抓起来,把他们当作“汉奸特务”重刑烤打。从此“圣旨”与“圣军”在巴林旗失去信心,没有多少人参加。

壬子年(1912年)前线司令米振标率毅军来林西,防御北部入侵。毅军刚来时军纪尚好,得到蒙古人的赞许。

从壬子年冬开始,毅军也干起了抢掠之勾当,使嘎苏台河、查干沐沦河西岸的牧民们纷纷东迁,在沙巴尔台附近定居。从那以后,毅军也以防御之名来沙巴尔台附近,以搜查蒙军枪炮为名,抢掠牧民的财产,先抢金银财宝,贵重首饰,后来连皮袄、牲畜也被抢,使牧民无法生活的地步。当时牧民大批东逃,到东乌旗、扎鲁特等地。当时有一个叫吉格木德的一家六口逃到东乌旗南沙漠时被毅军追上,只剩吉格木德一人逃了命,参加了“圣军”。在林西的毅军的迫害下,成千上万的牧民背井离乡,东奔西跑,受尽了人间痛苦。

巴林王多次往林西派遣使节,请求和睦,但毅军将领无

视巴林王府的求和要求,继续骚扰巴林旗各地蒙古族牧民。为此于癸丑年初夏巴林王令业喜诺尔布公爷恢复旗军,招募兵丁,维护全旗安宁。巴林王自己以治病为由去了北京。在招募过程中,由于强迫抓来的牧民不愿当兵,其中额尔敦孟和、巴图孟和、那顺巴达拉夫、苏达那木仁钦等人逃跑。后来被撵到外蒙古,他们参加了“圣军”。

癸丑年(1913年),外蒙古“圣军”派遣军队到克什克腾旗麦斯干庙等地,打击了毅军势力。当时有一部分毅军在沙巴尔台附近抢掠牧户的牲畜和财物。在沙巴尔台附近沙巴尔台喀喇沁蒙古人乌尔古代、额尔敦扎布两人(他二人都喜讲汉语),想把米司令部队的劣迹向热河都统告发,这个消息被巴林王府贵族知道后,把他俩叫到衙门:“好事的喀喇沁流民,为什么这样大胆,为我们惹是生非,赶快从巴林滚出去!”他俩离开沙巴尔台去往林西,想参加毅军,但毅军把他俩以巴林特务抓了起来,后来没有音讯。

癸丑年(1913年)秋,外蒙古军(黄军)攻占克旗经棚镇,继而围攻林西镇。米振标有九个营1800人驻守林西县,情况十分危急。幸亏沈阳军阀派遣大批军队从外攻打,才把“黄军”赶离林西,尔后赶出经棚。

毅军受到“黄军”的打击,憋了一肚子气无处泄,只好往巴林人民身上发泄。于癸丑八月末,王府的放马人快马加鞭来到王府报告:“有数不清的黑军往这边来了。”得报告,巴林兵迎着黑军出发了。来探听消息的巴林左旗的秦本喇嘛所带十几名兵丁也一同出发了。他们赶到离王府十多里的胡都格硕楞山顶时,后大川黑呀呀一片全是黑军。巴林

的几十个兵丁怎能抵抗得了这么多黑军。但他们占领山头向敌方开火。黑军分兵三路，一路占领北山，一路占领南山；中路直往巴林兵猛扑过来。巴林兵看到这个阵势，只好放弃山头回到王府，保护着老少往东败退。这时黑军已来到王府西山、北山。有一名蒙古兵，利用山沟复杂地形隐蔽，待黑军来到近前时向黑军猛烈射击，打死打伤十多个黑军，把子弹打光后，拔出刀子自杀身亡。

往东败退的王府人马行至阿布达林台山北麓时，看到王府已被黑军焚烧，冒着滚滚的黑烟。他们失声痛哭：“完了，完了！祖宗留下的金银财宝，经卷史记全完了！”这时有一人提醒王爷大印遗留在府里。这时有一位叫傅宗宝的王府小官自告奋勇，单人匹马往王府奔驰。傅宗宝来到王府附近时，王府上院已成为火海。他在炎热的秋天穿了一身大皮袄装疯卖傻，唱着歌跑进王府，见着黑军就竖起大拇指哈哈大笑，直往王府大院跑去。来到王府莲花池前磕磕绊绊张进池内打个滚窜出池子就往火里钻；进到印章殿，找到王爷大印，揣在怀里跑出来，到井边扔在井里。

这次毅军是分兵三路进攻巴林的。一路经沙漠进攻巴林南部；一路进攻巴林北部，把珠尔沁庙、乌牛台庙烧光；另一路途经南沙巴尔台，烧王府之前，烧了岗根庙，并把乌勒慧充阿、布和夫、花吉如木等富裕户的房屋全部烧尽。他们路经一户叫呼和图、斯其格夫妻俩之家时，将其两子绑在蒙古包内活活烧死。还枪杀了蒙古人乌恩图并将其小儿子掳走，音信皆无。他们还打死一名抱着摇车子的牧民名特木尔阿其嘎，并将孩子也打死。其母名任其格玛，见儿子和孙

子皆被打死，当场就吓疯了。

从沙巴尔台往东追击王府人员的一股毅军从和尔逊山北麓到阿布达林台山时被巴林兵击退（当时天以黑无法交战）。另一路从和尔逊山南麓到乌兰海，被巴林左旗兵打回。黑军把逃跑的牧户抢掠一空，并把草场上的牛羊成群赶走。还赶着铁车把牧民的粮食、奶食等食物也全部抢走。

逃跑的牧民们回来后，看到家乡已被抢劫一空，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也被抢光。那年秋天马希毕力格等二十多个人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跑到外蒙古参加“黄军”去了。从被抢劫以后，巴林王府想派一名使节到林西找米司令评理，但是很多人都怕毅军，谁也不敢去。一直到半个多月后也没有一人敢去。这时第五苏木扎兰乌勒慧充阿：“黑军要想血洗巴林，我们巴林人的性命都不会太长了，所以我先去，要死只不过我先死几天罢了，给我找一名好翻译就行了！”这样乌勒慧充阿当使节，赵特格希当翻译去了林西县。在县城住了两天，才获准见米司令，他们进县城时，毅军手端刺刀在路两旁站了两行，翻译赵特格希吓得在乌扎兰后边寸步不离跟了进去。到司令部门口，更是戒备森严，乌扎兰等阻在门外。乌勒慧充阿吼道：“米司令批准接见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让进？”翻译赵特格希吓得没给翻译，但乌勒慧充问把交叉的刺刀给推开钻了进去。见到了米司令。

见到米司令后，他陈述自己的来意时说：“贵军认为巴林已反叛的看法纯属误解，你们说巴林有人跑到外蒙参加“黄军”，这实际上是极少数没有生活着落的牧民，我旗的大

小官吏、富裕户一个人也没走,连十户长、十头畜的牧民也没走。如果我说得有一点谎言,请贵军调查核实,首先砍我的头。如果继续威逼巴林,群起而攻之,那时后果是怎样,请贵司令考虑!”乌勒慧充阿这次作为使节,什么礼物也没带,空手而去,据理雄辩,使米振标及其毅军的行为有了一定的收敛。

丙辰年(1916年),巴布扎布在东北受到奉军的打击撤退过程中,在路经巴林时,听到驻在林西的毅军虽然人多,但军纪松懈,不得人心,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巴布扎布就决定攻打林西。以乃登公为先锋向林西进攻。于十月初六,乃登的部队来到沙巴尔台,部队驻扎在色登梅林家。

林西的米司令也听到巴布扎布要进攻林西,就派了两个骑兵连前往沙巴尔台方向探听消息。随后又派了两个营的步兵阻击巴布扎布。十月六日晚乃登公听到毅军也派兵来到查干沐沦河西岸的消息后,就兵分三路包围毅军。十月七日晨由石成率领的毅军第四营来到亚马图山西南时与乃登部队相遇。乃登占领有利地形向毅军猛烈开火,营长石成被乃登军击毙,全营被消灭。马芳迪领导的第一营毅军在查干沐沦河畔听到枪声,集中部队(当时正在抢掠牧户)还没来的及出发,就被乃登军包围,在沙日他拉死伤几百人马,只剩十几人逃往林西。这时巴布扎布大军也已来到。

林西毅军米振标听到损失两个营的兵力,巴布扎布大军已兵临城下,加紧部署兵力,加强城防工事,死守林西县城的同时,向热河都统发电告急。八月八日巴布扎布的大

军从三道西利、大小地坡占领苏必达庙。巴布扎布下令用大炮轰击林西。毅军看到县城已将攻破,无可挽救的情况下弃城向西逃窜。正在这时,巴布扎布军队的炮火停止,军队也不见进攻了。因为巴军正在进攻,胜利在望之际,巴布扎布被他手下的炮手侍卫兵巴图孟和打死,巴军官兵失去指挥,已没有信心继续战斗,全部撤退。趁巴军撤退之时,毅军调转枪口进行反击,巴军无力反击,继续向喀尔喀河方向溃退。

关于巴布扎布被手下打死一事,据参加“圣军”回来的一人说:是由沙巴尔台的巴图孟和所杀。原因是:癸丑年在恢复旗军时,额尔敦孟和,巴图孟和亲哥俩由于善射是打枪的好猎手,所以强迫他哥俩招募为旗兵。额尔敦孟和到旗衙门诉苦:“家有老少,无人照顾,要求在他哥儿俩中留下一人照顾家里。”但旗衙门不准其所请,他们就串通几个好哥们连夜逃跑,到锡林郭勒参加了外蒙的“圣军”。经过几次战斗,他俩确实能打善战,又是神枪手,被巴布扎布看中,把他俩作为自己的近卫。在巴军他俩立了几次功,得到嘉奖。别人对他俩无限恭维和羡慕,他们就产生了骄傲情绪。于丙辰年(1916年)巴布扎布军队在突泉一战中由于额尔敦孟和违反军纪,使巴军受到严重的损失,伤亡惨重。巴布扎布一气之下,下令枪毙了额尔敦孟和。不久巴布扎布溃退途中攻打林西,在战斗中巴图孟和为了报杀兄之仇,打死巴布扎布,跑到林西,向毅军投降了。当时米司令说他是危难之机挽救毅军的功臣,宽待几天。后来战斗结束后,米振标把他叫来说:“你虽然立了功,救了我们,但你是侵犯主子的

罪人!”此后,毅军说,巴布扎布虽然是我们的敌人,但他是一代英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在林西东门外,在巴布扎布被打死的百合图敖包为巴布扎布修了一所墓。把巴图孟和押到巴布扎布墓前,宣布他是侵犯主子的反叛者,为警戒后人,执行枪决,把他打死在墓前。

注:以上情况是根据参加过“黄军”的敖力布嘎其勒、吉格木德二老人的口述进行整理的。敖于壬子年(1912年)去锡盟拉盐的途中参加“黄军”,吉格木德于癸丑年(1913年)战乱中逃到乌珠穆沁旗后参加“黄军”。他们二人都是暴勒的神枪手,后来同暴勒一起返回巴林的。

四、战乱暂息,扎噶尔王从北京返回巴林

由于战乱,巴林旗特别是沙巴尔台附近的蒙古族牧民们深受其害,四处逃跑,人心不稳。民国政府为了稳定人心,让扎噶尔王返回巴林。同时,对蒙古各盟旗的行政建制,原封不动地保持清朝时期的建制,并保留王、公、图苏拉克、扎嘎其等官职。由于巴林部深受战乱之害,民国政府拨给了救济金、救济物资和减免税收等办法,缓解人民的困境,但到基层时牧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都让旗衙们官僚贵族们吞了。如色布景格排散达(官名)在那音太白音那里一次没收370匹骡马,把沙巴尔台的乌仁夫(额尔敦孟和之妻)仅有的一头二岁小牛犊也没能幸免,给没收赶走了。扎噶尔王回来后,派人到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地,动员逃跑者返回家乡。毅军也停止了搜捕参加“圣军”回来人员的活动。

北洋军阀政府虽然实行了“仁政”,但地方军阀、恶霸地主和奸商互相勾结,把巴林西部查干沐沦河西岸的一部分牧民全部赶走,抢占了又一大片土地。

巴林西部的蒙古族居民中不断发生抢劫牲畜,家产的事件。旗衙门多次向林西县提出制止抢劫活动,惩治盗贼的要求,他们虽然口头上满口答应,但抢劫盗窃活动从未间断。在林西以南古鲁板图力嘎(锅撑山),有一户贫苦老人夫妇和四个儿子一起生活,巴林把此地卖给林西后,他们一家不愿意离开家乡留在旧地。有一天来了几名毅军把老头和三个儿子一起抓走,在林西南门外召集大会,宣布他们是偷盗巴林牲畜的盗贼,把父子四人全部枪毙。老头的老伴,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儿子逃到巴彦尔灯,后到沙巴尔台住了一段时间,生活无着落,又迁到锡林郭勒。此事件以后,不久在查干英格艾勒附近发现一具死尸,来了几名毅军到该地的四个较富裕户(沙格德尔扎布、乌日图那斯图、吉木彦等)家,以人命案相威胁,抢走一部分牲畜。此事件之后,该处十多户牧民先后迁移到和布特哈达、沙巴尔台等地。以后在毛道布、额尔根图、巴彦琥硕……等地不断出现类似事件。在这些地区的很多牧民忍痛逃离家乡,大片土地被侵占。

扎噶尔王对参加“圣军”回来的人员,实行不追究政策,并不准对他们欺压威逼、敲诈财物和歧视。并允许外旗人定居巴林。这样郝其德旗的阿尔喜、科尔沁旗的唐古德、嘎亥、阿木尔萨那等十余户人家先后来沙巴尔台定居。后来,林西毅军把嘎亥抓去杀害了,这些外旗人又陆续返回原地。

扎噶尔王表彰了在危难之际作出贡献的有功人员。其中有：报告毅军侵犯王府消息的马倌(不知名)为荣誉牧马人，给双份薪水；有单枪匹马抵抗毅军战死在战场的一勇士(巴林左旗兵)的牺牲地命名为昭日格图花，每年清明节都去烧纸祭奠，此地到现在仍叫昭日格图花(属沙巴尔台苏木)；还有以智谋闯火海抢救王爷大印的傅宗宝提升为管印梅林；还有为巴林人民，不顾个人安危，闯枪林弹雨与毅军米司令论理的使者乌勒慧充阿提升为管旗章京，随同他去林西的翻译赵特格希海林(名誉)梅林。另外还对其他大小官兵和仆人都进行论功行赏。

癸丑年战乱中巴林王府被烧，上院全部烧净，下院也遭到严重破坏。扎噶尔王从北京回来后；想修复下院，不愿迁到大板。但后依据热河省的指示和多数人的意见，搬到大板盖了一处四合院(即现在旗老干部局)居住。

伪巴林右翼旗公署 参事官多田正美覆亡记

口述：张明乐

整理：王兴贵

伪康德十二年七月初，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头几天连续下了几场暴雨，使西拉沐沦河水暴涨，整天泛着黄糊糊的浪头，哮叫着从西北奔东南涌去。雨过天晴，毒辣辣的日头烤着沙地，沙地冒出令人窒息的湿气。

我当时是伪巴林右翼旗公署巴林桥检问所所长。检问所址西拉沐沦河北岸，横跨西拉沐沦河的巴林桥旁。我那时的警衔是警尉补。检问所除我而外，还有两个警察，七八个自卫团员。主要任务是检查通过巴林桥的过往行人车辆有没有犯“私”的物品(因为巴林桥是进出巴林右翼旗的要道)。

七月初(公元1945年8月10日)夜，电话铃刺耳地叫起来，我接过话筒一听，是警务科长木内馨(日本人)打来的，他命令我烧毁一切文件和检问所的房屋用物，带领全部警察和自卫团员到旗公署报到。我当时预感到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因为前几天听到了有关这方面的风声。我立刻

命令他们焚烧文件,但是没有烧毁房屋,遂由赛力莫沟,到东哈拉毛都会合白音汉警察分驻所,和他们一起,共30来人回到大板。

天亮后,我们骑着马趟过查干沐沦河,来到旗公署门前(康熙行宫门殿前面广场)。这时,伪警察职员聚了很多,大都携枪跨马。行宫院内好多人正在忙乎烙大饼。负责召集和维持秩序的一个是警务股长李乔年,一个是保安股长额日和。

早晨八时,参事官多田正美和旗长阿拉坦瓦其尔从旗公署出来了。于是开始整队。警察一队,伪职员一队,自卫团员一队,日本官方人也站一列,约300多人。多田正美是伪巴林右翼旗公署第五任参事官,此人黄白镜子,中等个儿,40岁左右穿将校呢军服,佩带“警正”衔肩章,挎着银柄指挥刀。虽然脸上努力保持着骄矜傲慢的神态,但仍掩饰不住他内心恐慌和惊怕。他站在台阶上,用日语训了半个小时的话随后由李如坦翻译成汉蒙话:这是一次紧急动员会。告诉你们,苏联要侵入满洲国。我们要准备对付他们的侵略。从即时起成立巴林右翼旗国境警察守备队。任命李乔年为警备队长。巴林右翼旗的所有警察、自卫团员、职员都是警备队成员。没有枪的发给枪枝子弹。立刻撤出大板上山打游击。不等翻译完毕,早把旗公署的枪库打开,发枪和子弹。枪是捷克式、三八马大盖、手枪撸子几种,还有一挺机枪。我从李乔年手里接过轻机枪,退到一边儿悄悄地对额日和说:“我看透了,趁这机会把他们突突了得了!”额日和明白了我的意思,偷眼瞅了瞅参事官和在他旁边的

十几个日本人,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抱着机枪朝门口走去。刚支好机枪,李乔年跟过来。他把机枪口拎起,崩着脸对我说:“不可,要是打死日本人,关东军从北边撤下来,就要报复,大板街损失就大了!”

上午10点钟左右,开始分三路撤离大板。一路是参事官多田正美。特务股长招崎带领亲信,过查干沐沦河奔巴彦琥硕山,一路以伪旗长阿拉坦瓦其尔为首,有乌尔图,李如坦等由独石奔阿贵庙,这路最多,约100多人,还有一路过查干沐沦河奔四家(今火葬场)。三路刚要出发,多田正美命人烧旗公署和兴农合作社。

我是随着阿拉坦瓦其尔奔阿贵庙的。我们刚过了查干沐沦河,苏军的飞机就来到了。飞机盘旋扫射,日伪溃跑人员惊慌四奔。我打马猛朝东跑,在独石村遇到了李如坦、乌尔图。见面后,他们说:“小张,你是年轻人,想法把参事官消灭,兴许保住性命。”“参事官在哪里?”我说。他们告诉我。说刚才飞机扫射大乱时,参事官骑马从巴彦琥硕山而来奔阿贵庙去了。当时跟我一块跑的还有两个自卫团员,一个叫达木仁巴斯尔,一个名叫东勒布,我们三个人绕过锅撑子山过河,当晚住在沙窝子一个叫赛音的牧民家里,次日(8月12日)早晨8点钟到了阿贵庙。

阿贵庙是过去巴林右旗四大名庙之一,因建在吉布喀朗图乌兰哈达山的一个洞子前面得名,法名阐化寺。建筑上照例是后殿前庭。我来到前庭时见里面有十来个人。果然参事官多田正美在,还有朝鲜公医、三个日本人,其它有伪兴学会干事长确吉敖斯尔等伪职员。参事官见了我的面

问：“大板街的情况怎么样？”我故意吓唬他道：“大板街全占了，他们（指苏军）过查干沐沦河朝我们这边来了。”还说了几句什么，我偷偷朝确吉敖斯尔使了个眼色。我，庙内主持嘎拉僧活佛、确吉敖斯尔，还有一个姓张的先后离开前庭来到后院。我说了杀死日本人的意图。大家呛呛一阵儿。这时候嘎拉僧活佛说：“要杀千万不要在庙里杀，也别在庙前的麻尼堆里杀。”按说佛门是净地，嘎活佛说的也有道理。怎么能把参事官引出去呢？大家一时犯了难。这时候，侍候嘎活佛的小喇嘛来给活佛倒茶。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便说：“嘎活佛，让你的这位小喇嘛骑马上北山，要打着马跑让马出汗，进庙门大喊着向你报告，说苏军攻过来了！”肥硕粗大的嘎活佛点了头，那小喇嘛便骑着马出去了。不一会儿，满院子响起喊叫声：“苏军来了，满山遍野都是。快跑啊，他们包围上来了。”

这招果然灵，参事官和所有日本人伪职员慌慌忙忙跑出屋子，骑马朝东南跑。我随后紧紧跟着多田正美。跑出四五里地，我喊：“参事官，你的马肚带松了，等我给你紧紧。”多田正要勒住马。我跳下马去给他紧马肚带，我想趁机把他消灭，又一见他一手握着指挥刀，一手握枪，害怕吃亏，便收起枪。在紧马肚带时，我又想在勒肚带时马炮蹶子，把他摔下来。谁知那马踢了我一下，这个办法也没用上。我打了马一鞭子，那马朝前跑去。我也上马在后面追，在跑到一个土坎子时，我正好赶上，我喊了声：“开枪，打呀！”我的手枪子弹射出去，其他的人也都打。参事官多田正美当场被击毙。其他的三个日本人也当场死亡，一个死

在井跟前，二个死在西伯图的大塔拉。

这时，从西伯图方向来骑马的告诉，说从西伯图来十多个日本关东军。其中有寺西茂（佃特务股长，日本人），在西营子抢马呢。我说：“打！”我们四十余人从索勒根图过去，一直把关东军赶到哈什图过了西拉沐沦河往南去了。当晚我们回到索勒根图住下，13日上午返回阿贵庙。

在阿贵庙，见到老旗长赵化民从大板街派来联系的人员哈斯宝（又叫白德英，是伪保安股长），他带来了赵化民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苏军占领大板街，日本鬼子垮台了。苏军命各地伪职员迅速返回大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要是不回去，苏军就要打过来。我们分析了情况，决定回大板，14日住翁根毛都，15日晨来到河岸。我指着对岸的大板街说：“告诉你们进大板街，可不是回娘家，死活不定。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跟我去的过河。”这一下走了一半，跟我回大板街的只有20余人。我枪上挑着白毛巾，刚进了街被苏军缴械，把我们赶到专卖局圈起来。

这以后我和很多伪职员被苏军弄到林西，由而赤峰天义到沈阳在那里受训半年，发给释放证，由我带70余人回大板，当时察隆阿旗长接待了我们。1946年我到林东找阿民布和参加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后来派我到34团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李化亭一家在 巴林右旗胡日哈村

口述：喇嘛扎布

整理：暴云峰 穆松

我是土生土长的胡日哈村人，解放前曾在李化亭家扛过长工，解放后曾任胡日哈党支部书记、村长达三十余年之久。解放前仅在李化亭家牵骆驼参加驼队（骆驼运输队，长达九年），后在解放初李化亭组织武装时我还在其中当兵，曾在兵营当过火夫。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牧改）运动中也参加了李化亭家的清算。所以我对李家在胡日哈的情况比较了解。

（一）

李化亭，蒙古族，又名确吉斯楞。早在民国期间从敖汉旗的老家搬迁到巴林右翼旗胡日哈村定居。

李化亭兄弟四人，老大叫拉斯仁扎布，李化亭为老二，老三叫浩日劳，老四叫满都拉。

老大拉斯仁扎布生有三子，长子李海宝，次子李海套又名毛义很，三子叫巴图。

李化亭家有3处“窝铺”，一处敖汉旗王爷府村，一处敖汉旗翁牛特旗巴彦套海，另一处就是在巴林右翼旗的胡日哈村。

李化亭常住在敖汉旗的老家，李海套跟随叔父住敖汉，同时在敖汉读书。

（二）

李化亭一家从敖汉旗搬来时并不是一个富裕之家。但是到巴林这个地方不久经济有了转折，成了暴发户，说起来这还是有因的：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领土以后，把巴林右旗札萨克扎噶尔王爷调到伪“满洲国”的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任兴安省总裁，扎王前往新京就任时必须途经本旗的胡日哈。李化亭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以及随从十余人迎接途经胡日哈的扎噶尔王爷一行。于是李化亭敬请到家中落脚歇息。杀羊摆席十分热情款待了几天。扎王对此非常满意。扎王一行临行时李化亭向王爷请求了草场和土地。扎王立即让随从找出一张黄纸写了几个字，还在上面盖了王爷的大印（土地改革时从李家翻出来后群众当场烧掉）。这样王爷一挥笔就给李家批复了当地最好的草场五千多亩。具体地盘就是：东至胡日哈，西至现在的马鬃山，北至布敦花，南至迫毛都。从此李家有了草场和土地。不久李化亭招了三十余名长工，并把这三十余人分两班种地（二、八和三、七分成）。第一年收成相当好所以第二年又增加了长工，并开始经营买卖，也搞起了长途贩运。长途贩运重要是靠六链子骆驼。

每一链子为六个骆驼,常年不停地跑通辽、开鲁、大连、沈阳、赤峰、林东、承德等地。一般是从胡日哈出发时驮着当地的牛羊皮和其它畜产品以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回来时驮着海盐、棉布、水缸等农牧民必须的生活用品,去外经商时每次李家都有人带队。带队贩运的次数最多者为老三浩日劳。

从此以后李家的日子就好起来。不久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户了。当时有骆驼一百多峰,牛四百头,马一百多匹,大小畜一千多只。那时李家的人口大约有三十上下。

(三)

李化亭在胡日哈组织了地方武装。情况是这样的,李家搬到胡日哈时就有几支长枪,在此基础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召集了少量的保卫人员,大约有一个班人。后在一九四六年我国东北解放初期李化亭在敖汉旗当上了旗长,同卓盟纵队的乌兰等人联系之后带着李海套返回胡日哈,在贫苦群众中招兵,在原有一班人的基础上很快就扩充到了一个连,并命名该连为“敖汉大队第五连”,任命李海套的弟弟巴图为连长(又名初一),副连长为德宝。全连共有兵力七十余人,分四个排。一排长,鲍金山(胡日哈苏木西热人),二排长尼玛(西拉沐沦苏木人),三排长毛小(胡日哈苏木人,曾叛变投靠过乌日塔匪部)。招兵后李化亭宣布李海套为团长,团副姓赵(因该人嘴唇上有豁子,所以人们叫他赵豁子,不知其名)。并向全军说明其它四个连在敖汉。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李化亭召集的第五连全体人

马转移到了敖汉旗。

(四)

李化亭组织的这个连曾在一九四六年冬和一九四七年春先后两次同叛匪乌日塔部进行过战斗。乌日塔原是在巴林右翼旗迫毛都村居住,曾在伪满时期当过村长,一九四五年巴林左翼旗的清卓力克图(和子章)组建自治军时,巴林右翼旗的兵力编为第三十四团,团长为仲奈,乌日塔是该团二连连长。乌日塔连长期驻守在迫毛都一带。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攻打赤峰、开鲁等地时,乌日塔与阿鲁科尔沁旗的反动上层喇嘛塔日瓦勾结后,从和子章队伍里叛变当了无恶不做的土匪。然后乌日塔一方面利用花言巧语拉拢附近的李化亭这个风云人物,另一方面公开叫嚷“李化亭同我们一起反对八路军、自治军、反对革命”等恶劣手段来扰乱人心。李化亭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坚决反对乌日塔的反动立场,并愤怒声讨了乌日塔从自治军叛变当土匪后所做的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到了一九四六年腊月,乌日塔得知李化亭的谴责后暴跳如雷,疯狂叫嚷“活捉李化亭,消灭其九族”并亲自带领二连的全部叛兵攻打李家大院。这是在拂晓时,李化亭的侄儿巴图在院内炮楼巡回查岗时突然听到外边的狗叫声越来越凶,侧耳细听似乎有马蹄声。巴图立即上炮台观察动静,不远处黑压一大片人马向李家大院靠近。于是巴图鸣枪报警。这时李化亭急忙跑出来询问情况后,命令当时在院内的一班守卫兵:“充分利用炮台的优势,坚守阵地,不靠近不能开枪,节省子弹!”同时全家老少

都上炮台防守阵地。有一个匪徒摸向炮台，巴图一枪就结束他的命。另一股土匪从村北逼进院子时，有一个战士一枪就打倒了他们前面的一个匪徒，这时跟在后面的土匪再也不敢往前冲了，只在附近的土包上向炮台射击。这样双方开枪战斗了长达十九个小时，战斗中乌日塔匪部死了三人，最后被迫撤退。

乌日塔被李化亭打退后，对李化亭更怀恨在心，于是一九四七年正月对李家进行第二次进攻，这时候李家得到了驻扎在白音布统一带的自治军第四师三十四团和卓盟纵队的协助，第二次打退了乌日塔匪部。这次激战中乌日塔的叛匪里死亡一人。李化亭本人也受了重伤，战后送往林东第四师医院治疗。乌日塔被打退撤离途中，在西拉沐沦河北岸的沙布嘎一带遇到了李家的骆驼群，乌日塔把骆驼（一百二十余峰骆驼）全部赶了去，以示报复。

巴林右旗政治处建立前后记实

穆 松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灾难深重的东蒙古人民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

被解放的东蒙古各族人民正兴高采烈的庆贺这一伟大的胜利时，国民党兴安省，妄图统治东蒙古各族人民。对此，在蒙古地区的各界志士和广大劳苦大众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这一擅作威福的行为十分不满，所以尽快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实现民族平等，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深入，当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人心所向。

在这关键时刻东蒙古进步知识分子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同志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王爷庙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各级组织。该党的宗旨是：清除一切封建余毒，发展经济，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美好生活，把蒙古地区的人民无论什么民族都要实现平等的权力，配合中国革命的政党彻底完成蒙汉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家和民族政权未建立前要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指导下，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各级临时自治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在工业交通、内务、外事、财政、文教卫生、经济建设等方面要模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继续协助好，为我们东蒙古人民的解放

事业英勇作战的苏联红军,彻底清除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积极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四五年九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哈丰阿委派当时住乌兰浩特的进步青年恩和森(和子章之子)、老布森普日来、呼和德力格尔三人到巴林左右二旗开展工作(主要是宣传东蒙要自治的主张)。他们三人来时持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秘书长哈丰阿同志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昭乌达盟政治委员、巴林左旗自卫军总指挥和子章(清卓力克图)的亲笔信件。于是和子章把恩和森、老布森普日来二人留在巴林左旗林东,把呼和德力格尔派往巴林右旗大板开展工作。从此他们三人深入当地人民中间,宣传东蒙古自治的主张。

不久和子章在巴林左旗自卫军的基础上通过扎鲁特、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等地联合组建了六个骑兵团,三个司令部直属连,扩大了自卫军的力量。并委派阿鲁科尔沁旗的曹都那木道布和乌梁海白音福二人在林东主持召开了卓昭二盟联防会议,会上成立了卓、昭两盟联防警备总指挥部,并推选和子章为昭乌达、卓索图两盟联防警备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巴林左旗的林东。

一九四五年七月刘少奇同志所批转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关于“内蒙古工作意见书”中明确阐述了在内蒙古地区实行自治,建立自治人民政府的意图(摘引兴安盟文史)。追求光明的东蒙古人民在这个思想鼓励下,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支持和领导下,根据东蒙古各族劳苦大众的愿望,由宝音满都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斯根等人的

积极筹备,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哈丰阿同志因参加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召开的会议,所以这次代表会议由宝音满都胡、特木尔巴根等同志主持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组织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行政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宣言》。从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在王爷庙由宝音满都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同志为首的东蒙古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时受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确巴什和进驻东蒙古的苏联红军的支持,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也来贺电表示祝贺。

不久东蒙古自治政府委任驻巴林左旗林东的和子章为昭乌达盟自治委员会会长、地方武装总指挥、巴林左旗旗长,并责成和子章尽快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四师。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共热河省委和冀察热辽军区的指示,深入热河一带的部分八路军同党的地下工作者王逸伦取得联系之后,在林西成立了冀察热辽二十军分区和热北专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东蒙古自治政府派萨嘎拉扎布为团长的工作团到林东建立昭乌达省。工作团持有东蒙古自治政府领导人哈丰阿同志的信件,找了林东的和子章。于是三月份在林东正式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所属的昭乌达省。萨嘎拉扎布被任命为昭乌达省主席,和子章被任命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四师师长。由此,和子章发布命令,把原来的昭乌达盟自卫军所属各团要听从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的支

配并把各团以旗为单位编为六个团(即:巴林左旗为三十二、三十三团,巴林右旗为三十四团,阿鲁科尔沁为三十五团,克什克腾为三十六团,扎鲁特和奈曼二旗编为三十七团)和师司令部设警卫连、通信连、机炮连等三个直属连。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承德召开了统一内蒙古的“四·三”会议。会议决定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次会议所决定的问题就是:内蒙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各级组织;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同时未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前,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发动蒙汉人民,搞好民族团结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反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后方根据地,冀察热辽分局派党代表吴广文、徐子干等同志到昭乌达盟开展工作,他们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旬,参加“四·三”会议的东蒙古代表哈丰阿等同志一起到达昭乌达盟所在地林东。

一九四六年四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二十军分区,根据承德“四·三”会议的神精,往热北和昭乌达地区派代表,于是在林西的热北专署王逸伦和林东东蒙古自治军的和子章两股力量进行谈判获得了成功,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和子章同意了在林西的热北专署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机构迁往林东。从此,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和昭乌达省接受了热北专署的领导。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林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其领导成员是:

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

分会副主任:那斯图

秘书科长:徐子干

组织科长:义达嘎苏荣

军事科长:阿民布和(和子章之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热北专署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机构迁到了林东,六月五日热河省政府对热北地区的行政机关,做出了新的决定:改建林东的昭乌达省改为昭乌达行政委员会,蒙汉分治。昭乌达行政委员会委员十八人,蒙汉各半数,仍由热河省政府领导。昭乌达行政委员会主席由萨嘎拉扎布担任,副主席由吴广文担任。行政委员会所辖地区有: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翼旗、巴林左翼旗、扎鲁特旗、经棚、林西、开鲁三个县和林东的汉民自治区。

一九四六年巴林右翼旗政府机构及领导成员:

旗长:察隆阿

内务科长:宝音和什格

行政科长:却扎布

财经科长:苏格德尔扎布

民政科长:巴雅尔图

文教科长:特古斯巴特尔

总务科长:宝音图

汉民科长:雷代夫

一九四七年初,热北地委把李子富同志派往巴林右旗建立政治处,驻巴林右旗的白音布统,其领导成员:

政治委员:李子富

组织部长：崔泽林

宣传部长：方许东

当时在巴林右旗共产党的机构，除政治处外，旗政府内还有所设的汉民自治科。

一九四七年三月政治处在白音布统，被国民党军残部五、六百人的围攻，在这危机的情况下，巴林右旗自治军三十四团和其它兄弟部队一同立即应战，打退了国民党残匪，保证了政治处的安全。

一九四七年五月旗政府从白音布统迁到大板，同旗政府的汉民科合并。从此以后，巴林右旗政治处领导全旗各族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四七年七月，旗政治处，在大板组织召开了两级干部（旗和区、努图克）会议。这个会议当时叫做反上层路线斗争大会。会议开了一个月，会址设在大板的东葛根仓。会议内容是：宣传贯彻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精神，并总结了减租减息试点的经验的同时，进一步部署了减租减息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通过这次会议，对旗、区两级领导班子和军内排以上干部进行了彻底整顿，甚至对有的单位进行了彻底改组，其中对原来的干部中少部分人员送往赤峰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该校下设内蒙自治学院、建国学院也叫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中学部）学习，还对少数人进行了审查处理。

这样已将部队的工作由下面几方面人来补充承担：一、由内地来的共产党员和少量的八路军干部；二、内蒙古军政大学毕业生；三、在当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

分子。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宁城县召开了昭卓两盟蒙古旗干部代表会议。会后巴林右旗根据会议精神撤销了汉民自治科。原巴林右翼旗汉民科长雷代夫同志提任副旗长，把内蒙古自治军改编为冀察热辽二十军分区蒙汉联军第四师。把巴林右旗的自治军三十四团改为蒙汉联军三十四团，并任确吉敖斯尔同志为团长，八路军干部吴振邦同志为副团长。

不久，巴林右旗政治处在大板召开了全旗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宁城召开的昭、卓两盟蒙古族干部代表会议精神，组织干部学习和训练土地改革工作队。从此，巴林右旗工作重点转入了土地改革运动中。

索博日嘎一带的初垦

撰文：曹达那木 乌兰巴特尔

译文：穆 松

索博日嘎一带的地盘解放前隶属于巴林左翼旗。这是清朝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塞外的蒙古民族，而在清顺治五年(1618年)把一个古老的巴林部编为左右二旗，当时把索博日嘎一带的这块土地划归巴林左翼旗。

巴林左翼旗同阿鲁科尔沁旗是邻近的两个旗，由于民族生活方式和放牧生产形式的相同，二旗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的。二旗的王公贵族之间和二旗百姓之间经常相互结亲。所以，阿、巴二旗亲家相称。

但是二旗之间经常发生边界纠纷，有时候冲突比较激烈。解放前最后一次的边界纠纷是在民国初期，大约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间。这次的两个旗边界纠纷规模比较大，影响面比较广，参与的人也比较多。为了解决这次的边界纠纷热河都统专门派人带部分兵来到巴林旗，并在巴林左翼旗贝子庙召集了北部各旗县王爷和知县。如：召集了巴林左右二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王爷，开鲁和林西县的

知县，召开解决这次边界纠纷问题的专门会议。

当时巴林左翼旗王爷委派他的管印扎兰清卓力克图(即和子章)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当阿鲁科尔沁旗的王爷提出“乌力吉沐仁河以东的地盘属于阿鲁科尔沁旗所辖”的时候，替左旗王爷参加会议的清卓力克图立即反驳说：“我们的巴林旗同阿鲁科尔沁旗的边界从古以来都有十分清楚的界线，每一个重要边界上都埋有白灰和木炭，这是众所周知的铁证。”这样相互进行争辩一个星期，最后还是按照白灰和木炭为根据解决了这次的边界纠纷。参加解决纠纷的热河省派来的管兵和林西、开鲁二县的知县向巴林左翼旗提出要一笔帮助解决纠纷的报银。清卓力克图立即反驳了他们这种要求，没给分文，这一下惹怒了热河都统下派的官兵和开鲁、林西知县长官。有一天夜间在贝子庙突然枪响了。当时在庙里的喇嘛们都说：“可能是都格尔扎布章京的儿子被害了”。第二天才知道热河都统委派的官兵夜间摸到清卓力克图住的房间从窗外射击了几枪，清卓力克图没被打中，从后窗户跑掉了。他从贝子庙返回敖日盖的王爷府后向王爷汇报了这些情况，王爷听后从他的卫队中选拔了乌兰巴特尔、嘎拉曾、大桑杰、恩和巴雅尔、巴特尔台吉、他嘎拉套格套等二十多名枪法出众的卫兵给清卓力克图，任命清卓力克图为王爷的军统，驻守在贝子庙(今林东)。不久巴林左翼旗的王爷命清卓力克图向北京的蒙藏院和热河省的法律机关提交诉状，上告热河都统下派解决巴林左翼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之间的边界纠纷的管兵的无理行为。最后得到了上级有关法律部门的支持。

边界纠纷被解决之后,巴林左翼旗的王爷在乌力吉沐仁河两岸招进汉人开始放垦种了地。巴林左旗乌力吉沐仁一带的放垦就这样开始并逐步扩大起来的。随着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和关内汉人的逐步迁来定居,牧民开始逐步北迁,大约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乌力吉沐仁河两岸的牧民无法进行放牧的情况下,背井离乡,全乌力吉沐仁艾里迁到如今的索博日嘎一带。起初索博日嘎一带居住的牧民大约不超过四十户。汉人一个也没有。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巴林左翼旗的王爷委派清卓力克图把全旗的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当然有权的王公贵族和其他有地位的富贵人家分到的比穷人多的多。这时候居住在索博日嘎巴根图的协理阿民乌日图分到了现在朝阳乡的白查哈达以下至到太本艾里的地盘,他把辉腾河、巴根图一带地盘交给刘三调、王玉等人种地,收成同协理阿民乌日图三比七或二比八分成。

特木沁葫都格(现在索博日嘎苏木红卫村)一带分给模勒黑梅林,后模勒黑梅林从外地招了些汉人种了这盘地。

阿尔山哈达以上的地盘划给阿尔山艾里斯音高力布毛根达(陵吏)这块地他也招汉人开垦了。

好勤宝勒吉以西的白查哈达以上的地盘划给索博日嘎庙,此外阿民布和、嘎瓦桑布、哈日瓦斯尔和敖德斯尔扎兰等有地位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分到了土地并租给汉人种了田。

这是索博日嘎一带的初垦简况。

昭乌达盟实业学校

叶贺吉茹木

昭乌达盟实业学校成立于1946年春东蒙古自治政府时期。它是由萨嘎拉扎布、蒙和舞乐极、察隆阿、确吉敖斯尔、拉布杰等人的主张和支持下,由图鲁古尔、道尔吉、尼克塔拉奇、色旺拉希、叶贺吉茹木等人着手筹建的“盟立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该校的建校方针、任务和目的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手工业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培养出一支具有中等专业技术水平的民族工人队伍,为振兴民族之目的,创造物质基础和人材条件。

共设铁工、木工、印刷(石印、刻字)、缝纫、皮革、毛织等六项专业科目,学期为三年。

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是:以课堂教课与生产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开门办学,面向社会承揽和经营上述项目之营业。收入归校,以解决学生衣食宿、学费和教职员工的生活补贴以及入股者的分红。其中学校对技术教员的生产工具、传授技术和他自身劳动、作价入股,按股按收入比例进行分红。

建校资金由以下四个来源组成:一、巴林右翼旗伪满时

期“兴学会”的财产；二、向当地民族上层与宗教上层募捐了些牲畜；三、堪布葛根仓（俗称南葛根仓）的全部院落房屋和畜群；四、1946年夏热河省政府工作组对该校进行调查资助边区币三百万元。

1946年夏，巴林右翼旗减租减息运动中，通过运动领导该校接受中国共产党热河省的领导。

组织编制及人员安排：校长察隆阿（旗长兼）、副校长图鲁古尔；教务主任叶贺吉茹木、总务主任色旺拉希；教员奇哈拉格、桑吉雅、阿拉坦巴根、布林贝赫；技术教员陈国卿、袁义、赵××、周国金、黄绍林、夏荣久、长岁；管理员孙常青、炊事员希力布。

自1946年4月于大板南葛根仓院内建校，到1947年9月根据昭盟政府指示，将学校迁往林东盟政府大院。于同年11月间由于当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一切为了支援前线。遵照政府指示学校下马停办。并由盟领导人义德嘎苏荣、吴广文、官嘎丹如布等同志处理学校下马事宜。

对在校生的安排，由学校负责，根据他们的年龄、体质和志愿，有的送工厂当工人，有的送部队当解放军战士，有些年龄小而体质弱的则转校继续求学或返回家乡。对几名携带生产工具被聘请担任技术教员的人员，在搬迁林东之前，由校方负责人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结清帐目，握手告别。对脱产参加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一律由盟政府另行分配工作。

自建校至学校下马，共招收两期学员为六十名。

索博日嘎努图克 发生人间鼠疫记实

王九惠 叶喜

索博日嘎努图克（白塔子）原巴林左旗第五区。于一九五二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规为已林右旗管辖。现索博日嘎苏木、朝阳乡。

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林西县五十家子镇发生了鼠疫。七月间，索博日嘎努图克（现朝阳乡）朱家敖包营子一个农民前去林西五十家子要弄点鸦片（大烟），因为五十家子是疫区，当时封锁不严，这个人进入镇内后，发现疫情紧张他又偷着跑回来朱家敖包营子（现朝阳乡的新合营子），朱家敖包营子人口并不多，只有六户人家，三十二口人。不几日，在这小营子朱家敖包发生鼠疫患者二十九人，因没有防病措施，未来得及救护，这二十九人全部死光，占该营子三十二口人的百分之九十点六，从而相继扩大蔓延到附近村太本艾里、庙前营子、庙西营子和城墙营子等四个营子，发病人三十名，死亡率达百分之百。

在这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由昭乌达盟人民政府派去以博彦陶格套同志带队的鼠疫防治队到疫区现场工作。防

疫队伍一到疫区,与当地政府紧密配合,协同作战,采取积极果断措施,深入开展大宣传,大动员,大挖防疫沟,全力防病灭鼠,全面进行预防接种等综合性防治办法。大干一个多月后,疫情在八月中旬才终息。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索博日嘎努图克海清河营子、城墙营子又发生鼠疫二人,也都死亡。同期在和硕芒哈鼠疫二人,死亡一人。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两年疫情不断发生,直接威胁着人民生命安全。因此,一九四九年昭乌达盟将巴林右旗索博日嘎努图克(白塔子)与林西县五十家子区(五十家子)两处定为疫区。为了加强战地领导,建立了由盟、旗、县、区和防疫部门领导组成的“白五”疫区防鼠疫指挥部,加强了对防鼠疫工作领导,普开防鼠疫工作。对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昭盟很关注,于一九四九年春季,派来以拉西宁布指导员为首的内蒙古防疫队伍,加强疫区领导,充实力量,联合作战,取得了可喜成绩,从此以后,卫生防疫部门,对疫区不断提高警惕,深入地调查研究,采取连年大抓灭鼠拔源,预防接种,鼠疫检验等综合性防治措施,故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没有再发生人间鼠疫。

解放战争时期征粮工作片断

——访明根巴雅尔记实

穆 松

一九九〇年五月,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我带着进一步扩大线索,更加丰富巴林史料的强烈愿望与赤峰市电视台老记者青格勒图同志一道,拜访了解放前曾在巴林右旗工作过的老同志明根巴雅尔老人。

我们到了明老的住处赤峰蒙古族中学家属楼,找到了这位年迈七旬的革命老前辈。与明根巴雅尔老人相识的青格勒图记者做了介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老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明根巴雅尔老人,是一九四六年东北解放后参加了革命,曾任昭乌达盟粮食局副局长,在这个期间曾在巴林右翼旗搞过征粮宣传,征收军马等支援解放战争的前线和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工作。他是当时亲见、亲历、亲闻的知情人,又是亲自指挥征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根据当事人和同明老一起参加征粮工作的老同志们的回忆,明根巴雅尔同志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了重重阻力,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征粮宣传和征收畜产品,征收军马支援前线供给后方的工作上做出了贡献。当明根

巴雅尔老人谈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说，“当初正处于我国自卫解放战争的初期，日本侵略者无条件的投降，我国东北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和自由。这时候国民党的反动派妄图独吞胜利的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猖狂进攻我东北解放区，占据了我原热河省的承德、赤峰、开鲁等重要城镇，中共冀察热辽军区和中央分局按照‘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原热河省党政军领导机构迁到昭乌达盟的所在地林东，这时的林东不仅是昭乌达盟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且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必争之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的九十三军和国民党军李守信部两面围攻我热河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我军针锋相对，展开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畜产品、征收军马等支援前线战争的物资供应工作极为紧张，征收任务十分繁重。根据这个现实，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按照热河省的具体部署组成了征粮工作组，我出任巴林右旗征粮工作组组长，热河省派一位佟富康的科长担任副组长，组员中有华兴阿、塔青阿、额尔德木、吴富胜等二十来名同志。为了保证征粮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保卫征粮队员的人身安全，昭乌达盟公署从卫队连中派了部分警卫人员，尤其是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还专门派了一名警卫员，这个警卫的名子叫仁钦道尔吉。征粮工作组的同志们为了做好征粮宣传，一方面学习上级有关征粮工作的指示，提高工作素质，另一方面领会有关政策，向群众做好宣传，讲明当时革命斗争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大后方都十分需要粮食的基本原则”。说到这儿明老喝一口茶水继续说下去，在战争年代，经济工

作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集中经济力量支援解放战争的同时还要照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的巴林右翼旗，要完成这项工作任务还是比较艰苦，比较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在开鲁、赤峰一带，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袭击，从蒙汉联军叛变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塔日瓦、额勒登格、韩桑杰、乌日塔等匪部经常骚扰，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做，加之当时群众觉悟还不高，思想还不稳定，有的老乡对征粮还很不理解，担任保卫任务的个别警卫战士纪律不严密，所以时常同群众发生争吵，这给征粮工作的宣传带来一定的阻力。如：在羊场村征粮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征粮组到羊场村时，担任保卫工作的几个卫队战士因食宿同老乡发生了争吵，并把一直老大娘气得昏了过去，这时家人和孩子急了，扑上前去夺军人的枪，要同这位战士拼命。幸亏一名队员急告我这个情况，刻不容缓！我立即跳过墙去进行调解。我首先夺下了二人互抢的枪，并命令他们不要撕打。这时有一部分群众围着上来了，还有几个老百姓手拿着铁镐和铁锹，还有的拿木棒要同卫队的战士算帐。说是卫队的战士强迫老百姓要吃饺子、喝酒，还打骂老乡。因此气死了老太太多……他们的火气特别大。我见情况不好，立即到门口堵住这部分群众，劝告说：同志们！请不要再撕打。我们都是同样的穷苦百姓，干革命都有份，为了解放战争征收粮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至于有什么不同意见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不能采取这样的无理的方法相互伤害。我是征收粮食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什么意见大家要

对我说,军人有犯纪律的我负责批评教育……。我一方面劝他们停止撕打,另一方面命令征粮队员抢救在昏迷中的老大娘。在粮队员们用沾水的办法和自带的药品给老大娘服下,采取这样土洋结合的办法终于救活这位昏过去的老大娘。然后我们又通过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这次事端平息下去。另一件还是在羊场村征粮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征粮组的同志们经常采取“游击”形式行动。有一天刚刚黎明队伍出发了。我们出发一贯是卫队在前面开路,征粮组的队员们在后面跟上。这天刚出村时间不长走在前面的卫队部分战士突然返回村中,这时我们征粮组的同志们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停止了前进。我立即派了随身警卫仁钦道尔吉和另一个征粮队员,去现场了解。他回来说,战士们不知什么原因围着一个老乡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我带领部分同志马上赶赴现场,一看果然是卫队的几个战士打一个老乡,打得十分凶猛,我命令停止打人。这时战士还不服,我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是给老百姓办事,是为革命搞征粮的,怎么能打老百姓呢?”我们的话音还未落有一个战士说:“这个人不是好人!他把我们的一个战士打下马了,这是企图谋害革命队伍的弟兄,是反革命行为,应该把他枪崩了。“不能这样做!哪有革命队伍打死打伤老百姓的道理?他有错误我们可以说服教育才是啊。”我狠狠地批评了打人的战士。这时卫队的一个战士说:“如果不枪崩,那就一定把他打一百鞭子!”随即,把那人捺倒在地用皮鞭开始抽打,眼看打了二十多鞭子,这时用我的身体挡住了老乡,并说:“你们如果不听劝阻,一定要打那就打我好

了。”就这样最后制止了这场风波。事后我和征粮组的同志们了解到这位老乡无故被打的情况,于是我带着警卫员仁钦道尔吉同志拿着政府发给我们的几块香皂和一些物品到这位老乡家去慰问并向他赔礼道歉,做了自我批评才算了事。

征粮队伍到了翁根努图克(现在的益和诺尔苏木一带)时,发现一个早年埋藏糜子的窖。翁根努图克的孟根西热图附近住着一个大牧主,他的牲畜达十万头只之多,这个牧主的名子叫哈木图。本人在解收前夕就病故,他的儿子外逃,家里只有常年给哈木图牧主家放牧的佣人。我们在哈木图牧主家附近发现了这个窖藏的糜子。我让队员们用枪把子敲开地面听出空声的地方就深挖地面。这样很快就挖出了挨盘的几个大窖。窖藏糜子不知是何年埋起来的,只见糜子周围腐蚀大约有一尺半左右,我们挖出了这些粮食之后报盟政府和巴林右旗政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十分需要粮食。我们发动一些村民往大板运送,这个窖里糜子较多,我们连挖带运就是二十来天。最后还给参加运输粮食的村民发了部分粮食,这也算是给他们参加运粮的报酬了。

当我们了解当时征粮队员的工作是否艰难的情况时,明老接着说:“征粮工作组的同志们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的前线和大后方的生产生活,不计报酬、不辞辛苦每天工作常达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在乡下征粮宣传时要常常自己带着行李、枪支、干粮等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在缺粮的地方只能以糠菜窝窝头充饥。同志们很少考虑到福利待遇

等,而且大部分同志为了完成征粮任务日夜奔波在征粮工作的第一线上。那时候,从战争的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给了我们征粮队员最大的勉励。”

“我现在想起那些年代,有许多惊险奇特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的岁月,虽然时过境迁但回味起来还仍感到很有意义的、所以我现在经常给我的子孙们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有今天。尤其是那些勇敢战斗在最前列的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的革命来之不易呀!”

不知不觉我们谈了四个小时,告辞前我想了解明根巴雅尔老人的近况。

明根巴雅尔老人一九五一年转到教育事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曾在一九八二年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委员,赤峰蒙古族中学工会主席等职。在我们谈话中明根巴雅尔老人的爱人吴书玉老人拿出了明老奖状、荣誉证书等一大堆。我随手翻了翻,这是有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颁发的《园丁荣誉纪念章》,有内蒙古教育厅颁发的《三十年以上教龄荣誉纪念章》还有解放军总政和民政部颁发的《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模范章》等。看来明根巴雅尔老人不仅在解放初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党、为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曾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时此刻我用十分敬佩的目光望着这位革命老人那饱经风霜的面容,想了很多……。

这时我的向导——清格勒图记者似乎发现了什么,突

然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用右手指着摆在柜台上的一个银白色的双鹤雕塑:“明根巴雅尔老人不仅在解放战争时征粮宣传,征收军马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而且在解放后党的教育事业上三十年如一日……”

“现在明老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上积极努力……”

“明老离休后还受到了国家的很高的荣誉……”

原来这个双鹤雕塑,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中国妇女报等颁发给明根巴雅尔老人和吴书玉老人的银婚荣誉证书。

我举目望去,双鹤雕塑和墙壁上悬挂着的国家部门的奖状端端正正。其中一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同志亲笔题写的《白头偕老,幸福美满》八个大字的奖状,更是光辉夺目,它不仅映照了全屋,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将永远金光闪烁……

巴林右旗畜牧兽医工作发展概况

那·色灯 商润峰

勤劳勇敢的巴林部落人居住这块土地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三百多年来,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和畜禽疾病,为巴林右旗畜牧业生产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在农村牧区落实了畜牧业生产中的各项政策,从而大大地激发了群众养畜积极性。使我旗牲畜总数由解放初一九四六年的近 22 万头(只)到一九八九年发展到 113 万多头(只)。为畜牧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从无到有,目前在全旗内已建立的畜牧兽医工作站、家畜改良工作站和草原建设工作站达 25 个。从事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达 1100 名。

一、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建立与发展

早在一九五二年,原昭乌达盟所辖的五个旗县都建立了畜疫防治站。我旗的畜疫防治站是在同年七月建立。站址设在荟福寺北街白喇嘛(德吉德尼玛)院东侧的喇嘛房中(现乌兰牧骑所在地)。一九五三年夏季迁移到伊德新好日

勒院内(现畜牧局所在地)。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全旗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兽医站。建站的有查干诺尔、翁根、敖日盖、索博日嘎、查干沐沦。暂设兽医站的是大板区和巴彦汉区。当时由阿拉坦敖其尔、希日布、色灯、同拉嘎、曹都毕力格同志任站长或负责人。

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全旗由六个区划分成十个公社。各公社均建立了兽医站。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间我旗基层部分地区民间兽医组建了“兽医社”和“兽医联合诊疗所”。一九五四年,旗畜疫防治站改为畜牧兽医技术指导站。一九五六年改为畜牧兽医工作站。一九七〇年改为农牧林管理站到一九七三年农牧林各自分开后,兽医工作属畜牧管理站。一九七五年又重新恢复了畜牧兽医工作站。以后,在一九八四年恢复苏木、乡、镇中全旗十九个苏木、乡、镇均建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旗设置兽医站、改良站、草原站和经营管理站及两处国营配种站,计 25 处。

二、畜牧兽医技术队伍茁壮成长

早在一九五二年,旗建立畜疫防治站的当时,全站仅有工作人员 10 名,现在职工作的有:色灯(旗畜牧局工作);离退休的有:额尔德尼、胡其吐、希日布、同拉嘎;已经去世的有:昂苏(站长)、王昌法、曹都毕力格。在一九五三年去学习和调离的有朝格图和商能奎。一九五三年在翁根区先后安排宝音和希格和宝音毕力格两位同志,下去住区工作。

到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在扎兰屯、承德农牧学校毕业及呼和浩特畜牧兽医训练班学习结业回右旗工作的

有：宝音毕力格、特木乐巴特尔、吉格扎布、斯日格玛、赛吉尔夫、敖敦格日勒等同志。当时旗站畜牧兽医人员已达 20 多名。

在一九五六年全旗大部分区已建立兽医站，由阿拉坦敖其尔、希日布、色灯、同拉嘎、曹都毕力格分别担任查干诺尔、翁根、敖日盖、索博日嘎和查干沐沦兽医站站长或负责人。

为适应我旗畜牧业生产发展需要，在一九五三年旗政府组织召开了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并建立了“民间兽医联合会”。联合会主任由当时农牧科科长郑国林担任。副主任由旗兽医站站长昂苏和老道板嘎查民间兽医肖金才两位同志担任。会员发展到 70 多名。

在民间兽医联合会的基础上，一九五四年由布特格木吉、尚金才和仁钦道尔吉、仁钦高日布等五名同志在老道板嘎查成立了“兽医社”。后来，在该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古日古勒台兽医站。一九五七年由王吉乐、刘宜、巴塔、毛敖海、毛益很、塔木斯楞、布仁巴雅尔等七名民间兽医在翁根区自愿建立了“兽医联合诊疗所”。一九五八年秋在该诊所的基础上建立了益和诺尔和宝日勿苏公社畜牧兽医工作站。公社化以后，各公社的畜牧兽医工作站招聘了本地民间兽医，扩充壮大了畜牧兽医队伍。

目前旗、苏木、嘎查三级畜牧、兽医防治网已建立起来。据统计全旗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总数达 1100 多人。其中高级畜牧兽医师 3 名，中级畜牧兽医师 34 名，初级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50 名。畜牧、兽医、草原及经营管理的大中专毕

业生 169 名。这支队伍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实践锻炼，技术素质、业务能力都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对畜牧业生产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牧畜、兽医工作在深入开展

巴林右旗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引进优良品种畜开展家畜改良工作，至今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使家畜质量、畜群结构有了明显提高并收到显著的经济效果。从时间上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五十年代为试点阶段，各地先后引入优良品种有短角牛、三河牛、高加索及美利奴种公羊等，应用常温人工授精方法在部分地区开展牛、绵羊杂交改良工作。如：一九五五年冬敖日盖区兽医派牧民尔登其木格、那仁其其格和乌日吐那苏吐三同志去阿旗道德牧场学习人工授精技术。一九五六年夏季引进技术。在旗所在地大板举办了首次家畜改良和草原建设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全年 40 多名。这次学习班聘请了盟畜牧师华祝和草原技术员苏仲纯给学员们讲了课。同年冬季在敖日盖区查干勿苏、乎根嘎查开展绵羊常温人工授精试点。一九五七年在盟畜牧处技术员李玉等同志的帮助下，以查干勿苏嘎查为重点进行了牛的常温人工授精试点，同年敖日盖区兽医阎同春同志做了切断公牛、公马的输精管做试情公畜的试验获得成功。

六十年代为重点推广阶段，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引科萨力斯克、东德美利奴、盖县绒山羊。开始建立幸福之

路、宝日勿苏两个国营配种站。并引入了苏高血，苏纯血种公马，用常温人工授精方式开始马匹改良。

七十年代为普及阶段，绵羊改良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引入了敖汉细毛羊。一九七三年我旗南部地区被列入草原红牛育种协作区，开展草原红牛育种工作。同时在一九七六、一九七六年开展牛的冷业配种试点。一九七五年在羊场乡开始了绒山羊常温人工授精试点。

八十年代是推广、普及冷配和开展育种工作阶段。一九六二年开展了绒山羊冷配试点。一九八四年开展了绵羊冷配、试点。目前每年大小畜冷配过双万头(只)(牛冷配1万头以上，山、绵羊冷配1万只以上)，一九八〇年以后开始了草原红牛育种工作，一九八四年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近年来，我们正招手巴林白绒山羊的育种工作。

几年来，我旗在家畜改良工作上本着积极提高牲畜质量，抓好种畜管理，重点扶持专业户生产，继续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努力增加畜牧业经济效益，逐步实现畜种良种化为指导思想，使我旗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成倍增长。据测查一九七六年全旗绵羊平均剪毛量为2.47公斤，一九七九年提高到2.83公斤，一九八二年达到3.4公斤。由于个体剪毛量的不断提高，加之改良羊的逐年增加，使得全旗羊毛产量逐步上升。卖给国家绵羊毛一九七六年是39.15万公斤。一九八五年上升到91万公斤。改良山羊的经济效果更为明显。成年本地母羊平均产绒量为217.3克，而改良山羊成年母羊平均产绒量达425.3克，比本地羊提高产绒95.7%。畜产品的增加，经济效益的提高为繁荣右旗经济，提

高人民生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畜疫防治工作早在一九五四年开展了一些项目。如驱虫工作在老道板嘎查的敦达日布的200多只羊群中用硫酸铜进行驱虫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羊的药浴工作也是在该嘎查布特格木吉的羊群(200多只)中用来苏尔、滴滴涕、煤油和水配制的溶液进行试验的。也同样取得了较好效果。同年内蒙牧科所副所长哈斯朝格拉嘎和农牧学院陈副教授与我旗几位同志在老道板嘎查，研究牛焦虫病的防治。第二年扩大试点范围，西北农学院陈先生等同志也主持了牛焦虫病的防治试验，并划定了预防方案。一九五九年中央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邓先生等同志在查干勿苏进一步调查研究牛焦虫病的防治，提出当年三次战疫的有力措施。一九七五年，旗站额尔德尼同志负责在巴彦查干苏木贝硫磷防治牛皮蝇试验获得好成绩。

建国以来，我旗的畜牧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畜疫病发生造成死亡，影响了畜牧业发展，以前由于检疫制度不健全，防疫制度不严格等原因造成较多疫病患发流行。据调查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过的畜离传染病共33种。寄生虫45种。近些年来，我旗在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方针的前提下，对家畜传染病的防治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目前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了22种疫病的发生。

一九四八年土匪进入大板纪实

陈文增

1948年辽沈战役我军解放锦州时,国民党招降的一股土匪武装苏和巴特尔部漏网,约2000人。这股溃匪漏网后,向锦州的西北方向当时属于解放区后防的热河省东北部、昭乌达盟地区窜来,妄图作最后垂死挣扎。11月进入中旬,这股溃匪窜进巴林右翼旗境内,骚扰翁根区、查干诺尔区,11月3日窜入巴彦汉区西部(现巴彦尔灯苏木)。

我党政军得到情报,这股溃匪要攻打大板。

当时大板驻军有一个大队,大队下属一连、二连两个连队,两个连加大队部共有280多人,武器装备全是“七九”“九九”“套筒子”步枪,只是大队部有一挺经常出毛病的轻机枪。旗政治处(旗委)、旗政府,公安局、大板区等机关干部共100来人,13日都发了枪、子弹,同我军一起与土匪作战。我军和机关干部共有380余人。

11月14日清晨,我军和机关干部出发进入阵地。占据的地形是西从大板西梁至大板北石桌子山(现烈士塔陵园),大板近围的这些山头。约11点钟左右,土匪从西面窜来,占据了与我军和机关干部对峙的外围山头。

战斗打响了。土匪的武器完全是美式冲锋式机枪,我方人数、武器处于劣势。大队部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只打了一梭子就卡了壳,出了毛病。

约中午一点半钟时,土匪打了一炮,炮弹落在现在的气象站东沟边上。我军首长和党政领导,考虑到敌我人数、武器相差悬殊,若坚持战斗,定受损失,决定暂时退出大板,撤往林东。于是机关干部先撤,部队首长用红色绿色旗子指挥一连、二连轮番后撤,部队最后由大队部首长掩护。

土匪见我军人员向东撤退了,他们纵马追来,追在前边的几个匪徒嚣张地狂叫“捉活的,捉活的!”妄想俘获我军战士。

大队部傅教导员断后掩护战士撤退,哪里出现危急,他催马出现在哪里,他用驳壳枪一梭子一梭子向土匪扫去,子弹在匪徒跟前“噗噗”掀起土浪,匪徒们才不敢追了,叫嚷:“骑黑马的这个家伙利害!”①(傅教导员骑一匹黑马)。

大板邮电所的一个同志身背一部手摇电话机,驽骑着马,从大板撤退时晚了点,被土匪围住俘去(三天后他逃了回来)。

我军和机关干部撤退后,土匪分四路进入大板,一路从西梁汽车路进入现在的大板街西头;一路从现在的工农路北头进入大板;一路从现在的幸福路北头进入大板;一路从现在的巴林路北头进入大板。进入大板的土匪约有400人,这股土匪年龄从二十多岁至六十多岁的都有,胡子邈邈,个个面如死灰,都是些大烟鬼(吸鸦片),进街涌入老百姓家抡起马棒、马鞭子就打,张口先要大烟(鸦片)。大板内

立时鸡飞狗跳墙，猪跑马嘶乱糟糟。大众合作社工作人员蒙长瀛被匪徒打伤，大板第三村农会主任管×××的妻子被匪徒打伤……大板被土匪打伤计有10余人。匪徒们涌入于寿山小铺，将他货箱内的白梨抢光后还要，于寿山说没有了，匪徒们举起马鞭就打。他们找到贮梨的窖窖口，下窖将白梨抢劫一空。

土匪们在大板内折腾约有两个多小时，这时时间大约已到了下午4点钟，他们不敢在大板宿营，怕被我军包围。一个腰插双枪的匪首叫出“扳垛”的军师，让他算算往哪个方向走太平。“扳垛”的匪徒拆了“八门”，算完说：“点上三把火，向北走太平、大吉。”匪徒们抱来耙搂草，分成三堆点燃，顺现在的巴林路像马群一样乱烘烘地向北窜去。

据说这股漏网的溃匪奔井洼、胡勒斯台、要日吐这趟川到索博日嘎，窜过坝去进入锡林郭勒盟。不久我军一野战部队跟踪追击，时间不久，在锡林郭勒盟就将这股土匪全部歼灭了。

①注：从我党政军暂时退出大板至傅教导员掩护撤退，是采访参加与匪战斗的知情人忆述记入。

巴林境内的古长城 ——边堡·界壕

穆松

公元一一一五年勃兴与松花江下流域的女贞部落(今满族)建立了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王朝。

一一一〇年金朝攻破了辽都上京临潢府，不久金王朝与北宋联合，于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详见《金史》)。

在我国东北地区迅速崛起强盛的金王朝，一方面要虎视中原，另一方面又要阻击不断强盛的北方蒙古族南下，同时南宋的抗金运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北方蒙古骑兵不断地对金王朝骚扰，对金朝的威胁日益增加。金朝统治者在这一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和日益紧迫的军事形势下，为了维护金王朝的政权曾多次召集文武百官大臣“议决边事”及“北边开壕”之事谊，史载金王朝“边事未安”召集六品以上的大臣商讨攻守大计，参加会议的有八十四人，主张攻打的只有五人，主张坚守的四十六人，主张攻打和坚守结合的有三十三人，所以众人意见不合一时没有议决，这说明当时的金王朝面临强大的蒙古民族围攻有一筹莫展之势。

金王朝建立之后，南宋的抗金运动虽然一时十分凶猛，但由于内部倾轧而失败。金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阻止蒙古骑

兵南下,从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章宗承安年间,调集了数百万军民,大兴土木,修筑了这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边堡、界壕。特别是金世宗他的雄才大略,经过二十余年的社会改革,国富民强,军事力量也明显的强盛了,开始了防御北方的蒙古族骑兵的骚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建筑防御设施。筑边堡、开界壕堑。《金史·本纪事宗录》中记载:明昌六年(1195年)“以大量财货赏北防军”。至章宗明昌时期,筑边堡、界壕,增北边兵力分署诸堡,会兵于临潢一带,增加税收,以给军饷,并以金、银、布、衣等赏劳将士和筑堡前线的苦劳者。经过金世宗和章宗两代近四十年的兴建、扩建、改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东起今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西南至大青山南麓。长达三千五百余里的古长城。史称金朝边堡、界壕,或明昌长城、兀术长城,后在这里聚居的蒙古族叫这个绵延几千里的界壕为“宝日合日本”(意思是说紫色的墙)。

这一金代的长城,经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嘎布其庙西越过和尔木达坝伸入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木浩尔图,再越乃林达坝前谷,经雅马吐山进入巴彦乌拉苏木的要力阿日、乌兰白查,又经努胡吐白查古城址稍西北,进入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乌兰达坝、常兴辉腾河,越石匠山进入朝阳乡海清河村,再越海日其格山伸入林西县境内。该长城在巴林境内长约206华里。

今巴林一带金朝时为临潢路辖地,是金朝北方军事重地,凡对北用兵,会集士兵多在临潢地,所以边堡建筑规模较大,结构坚实雄伟,防御设施严密,体现了临潢路在金代

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在构筑界壕时,依据蒙古骑兵善于驰骋越障,迅速凶猛的特点,为了有效地削弱骑卒战斗力,该边堡的设计上突破了历代城墙的传统设计模式,构造上有外壕、外墙、内墙、内壕等四重防御工事,全长达四十余米,极为壮观。内墙上每隔六至七十米修一土堡,古称一箭之地以为士卒戍守、了望,两土堡之间对射距离为三十余米,可见当时弓箭的杀伤率之高,土堡前后位置相错,可以左右开弓。界壕沿线每隔血公里左右修一大土城,每城内可容四五百人,专为屯兵,戍守。重要的关隘、如巴林左旗乌兰达坝、巴林右旗索博日嘎、林西县新林镇等地,在界壕以南均修筑规模大的关城,筑造坚实,布局严谨,是为前沿指挥,调遣的处所。据调查:索博日嘎苏木境内的顿德达坝、常兴村、骆驼井子稍西到王坟沟和朝阳乡海清河北额莫勒达坝等地都有当时防御重地界壕城堡所见。在索博日嘎苏木常兴境内有一段边墙附近、顿都达坝附近有一个二百余米的四方形城堡的遗迹,南墙的中间有城门遗址,它的壁高三米左右,宽大约五十米左右,该城堡较大,内有建筑物遗址,这里经常出土辽、金时代的白瓷片和灰陶片等物。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金代长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是我国古代长城营造史上的创举。金朝界壕是我国中世纪规模宏大,工程浩繁之工程。是为熙宗皇帝时开始修筑后经过世宗、章宗时增筑。《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东北路抬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归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达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住视其处署、自鹤五河堡于到撒里乃、皆

取止、列署堡戍，评事移刺敏言、东北及临潢署土堵樵绝、当今所徒之民枯逐水草以居，开壕堑以备边……四月，遣吏部郎采胡失海经面壕堑，施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金史·本纪章宗录》记载：“戊午（1198年）召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金长城在修造期间由于北方沙大，常常被埋没，几经测绘，几经重修。可见修筑这座界壕的将士卒们的艰辛，可是这一伟大的工程壮观的边堡、界壕中渗透着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这所雄观的边堡、界壕经过八百余年的大自然风雨的冲蚀，与初建筑相比外观发生很大变化是很自然的。但这一工程边壕的走向遗迹仍很清晰可见。有的被破坏较轻的地段，高度仍在一丈开外，雄风犹在，不减当年。它告诉后人，这里曾是鼓角相闻、狼烟滚滚的古征战之地。在威武壮观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巴林这块土地曾经是这一历史舞台的重要地带。

当然金朝界壕的修筑，并没有使金王朝逃脱土崩瓦解，一朝覆没的命运在各族人民抗金王朝的浪潮中，在北方蒙古族骑兵的冲击下，加上金王朝朝廷矛盾重重，金王朝象一条风雨飘摇中的破船，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了。然而作为宝贵的历史遗迹——金王朝边堡、界壕却永远的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学习历史、教育后人的珍贵历史教材。

出土金银葬具实录及其他

韩仁信

1975年11月25日，幸福之路公社保冷队的牧民，在开挖草原水库的配套灌渠时，出土了金银葬具。当时公社的书记特古斯以及恩克图布新等领导同志闻讯后，奔赴现场及时进行了宣传教育，搜集文物，清点件数等工作，使绝大多数文物得以幸存。

—

文物出土的地点，在草原水库西北约五华里；古鲁满汉大车店门前“双林线”公路南小山包西南约20米处灌的南帮，距地表约1.2米。

二

该段灌渠，地表至渠底均未见有砖瓦等遗物。在整个灌渠将要竣工的1975年11月24日傍晚，技术人员验收时提出了：渠南帮的坡度略小于要求，渠底稍浅了一些。当时气温已变冷，第二天清晨渠帮的表土已成冻层，渠底因已见泥，更冻结了一层硬盖。牧民们为了尽快和保质保量地完

成任务锹镐齐下,人人争先恐后。其中有一人,只一镐下去,文物就露了头。文物出土后,牧民们认不清是些什么器物,有人说是一些破铁盒里装了骨头。后来发现盒子里有粘性东西且有一种邪味,再加上都是年轻的民兵,希奇好胜你争我夺,有些人还不愿用手去拿,而是用锹或镐打击粘附在器物内外的泥土,结果致使葬具残损变形。后经多次调查和在现场清理等工作,再未发现其他遗物。当事者讲这批文物出土情况是:首先是发现了银三角等饰件;其次是大银箱子,里面装有一些碎骨头;再次是小银箱子,外面似乎是用绸缎衣服包裹,里面也是骨头;再里是金箱子,箱子上好象有把铜锁,一动就碎了,里面有些发粘并散发邪味的东西……因该渠竣工后随即一次通水成功,所以这批文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葬式,虽经调查也实难说清。

三

出土器物如下:

(一)黄金箱一件。为内外双层,外层用纯金,内层使纯银,经捶揲铆钉而成。长 23.1 厘米、宽 12.4 厘米、高 9 厘米、呈正六面体长方形,重 1950 克。除底部外,通体篆刻精美饰纹;并有 25 处嵌饰点,分别是:上部 7 处,前部 10 处,左右各 4 处。上部篆刻团龙图案。该龙驱体蜿蜒,首尾俱全,脸部较长,下唇启口,毛鬣披散,鳞纹均匀,鹰爪虎掌;上一爪攀火焰珠光、一爪拨云弄雾、下两爪托海水江涯。周围用了十朵如意云补白。周边又廓以近似菱形的凸边。边外的四角上,又辅以缠枝卷草纹。笔触细腻,主次有别,龙体

矫建勇猛,栩栩如生。前部与后部两面图案相同,为吉祥图案。主体纹为石榴梅花和兰草湖石。上下对边满饰缠枝卷草纹,四角辅纹亦为卷草。图案给人以层次多而不杂乱,画面满而不臃肿,浑然一体感。左右两面的图案也完全相同,仍为吉祥图案。主纹为石榴绶带兰草湖石。上下对边的图案与前后两部的纹饰相同,唯四角独以掐丝花纹。(见附图)

(二)大银箱一件。长 39.6、宽 23.5、高 27 厘米(其中盖深为 4 厘米),重 2400 克。箱体用白银捶揲而成,六面光素无纹。箱盖和箱身的开合处采用子母扣。扣的上下外沿均焊饰了一道含银量较抵的白铜双弦纹窄带,使开合扣加固,箱后仍用白银铆钉成折页。箱前部因残损过甚,似原应有吊扣一类的装饰。

(三)小银箱一件。长 31.7、宽 17.5、高 12.8 厘米(其中盖深为 3.5 厘米,重 1225 克。箱体残损严重,六面光素无纹。开合等与大银箱相类。

(四)银三角等散碎嵌片计 15 片,重 250 克。这些银片,应为木箱子上的饰件。木箱子什么样?多大无从可考,只在灌渠的土中发现极少而又严重腐蚀的红漆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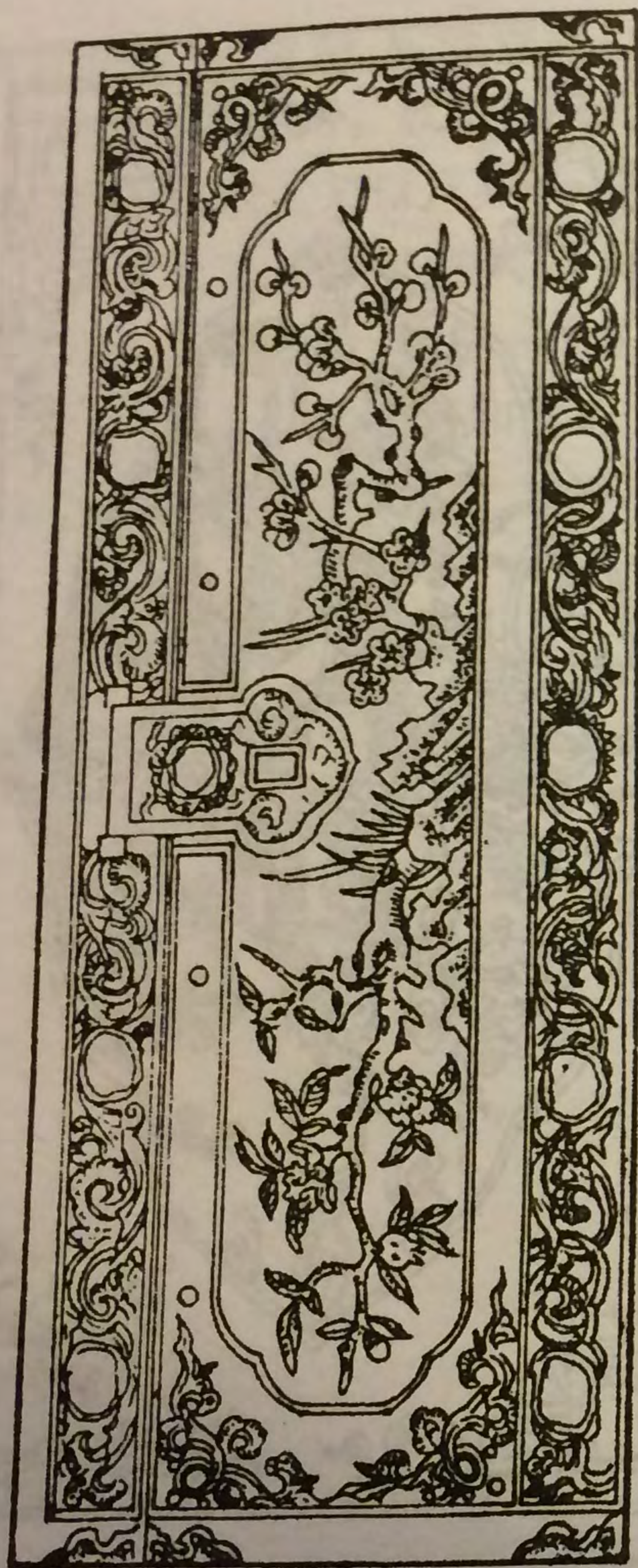
(五)此外,还出土了两颗铜扣和四颗料扣以及一颗猫眼石。猫眼石下面扁平,上面呈球面,直径 1 厘米。半透明,闪现黄绿彩,中间折光带为白色,光强时光带为三条,夜间不现任何光泽。

四

这批文物就其质地,造型、纹饰等等,应是清代王室的葬具,绝非是普通的人可使用。就出土文物而言,必将为研究清代捶揲篆刻金银器的工艺以及葬具、葬俗增添依据外,至于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采取此种高贵而又简陋的葬法,更何况发现和出土于巴林境内,应是一个有待考究的问题。笔者虽经调查以及翻阅了一些史籍和方志,至今仍无着落。今特收录于文史资料中教于大家。望能早日解开这应解之谜。



金箱顶面图案



金箱正面图案

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苗润华

1983年7月,旗农机研究所的李玉廷同志在巴彦塔拉苏木古日古勒台嘎查搞农机试验时,于太阳能电站北面的向阳山坡上发现并采集了新石器时代的部分陶片和石器 etc 文物标本,随即送交旗文物馆。我馆于7月中旬、11月上旬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工作。

1987年6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的两位专家在旗博物馆同志的陪同下,亲临遗址考察,并确认古日古勒台遗址具有时代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内涵。前后三次调查均采集了较为丰富的实物标本。

一、地理位置和遗址概况

古日古勒台河自东北向南流,在都希苏木汇入查干沐沦河,注入西拉沐沦河。古日古勒台村位于古日古勒台河中段北岸,距河约0.5里,西南距大板镇9公里。这里南临古日古勒台河,北依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遗址座落在村北的黄土坡上,高出河床约七、八十米。由于近年来在山坡上挖沟防洪、掘坑植树,致使遗址遭到严

重破坏,部分遗迹扰乱,遗物残破。据民间调查,遗址内曾有完整的陶器出土,但多被打碎丢弃。

山坡脚下为清代嘉佑寺庙址废墟,站在上面仰望遗址,发现遗址上部有几条不甚明显的南北坡黑土线。下部有一排东西排列的方形圆角房址。可分辨的有三座,边长约4米,半地穴式。房内堆积为黑褐土,夹杂着零星的红烧土。在遗址东北隅发现一座圆形灰坑。从树坑坑壁及雨水冲沟断面上观察,没有发现明显的文化层。

二、遗物

古日古勒台遗址内采集到的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及蚌壳、动物骨骼等。现就我馆三次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群众送交的标本做综合介绍。

(一)石器:石器标本比较完整。有打制、琢制、磨制三类,暂分大型石器(相对细石器而言)和细石器两类分别叙述。

1、大型石器:种类有磨盘、磨棒、耜、斧、铲、饼形器、杵形器、刀等。

磨盘:一式两件,其中一件残。花岗岩琢制。长方体两端呈圆弧形,盘面由于长期使用中间明显下凹,凹低达2厘米,盘底平整。通长35.5、宽22.5厘米(图-1)。

磨棒:5件。皆为花岗岩琢磨制成。分为二式:

I式:4件。长条形。两侧为磨面,两端有平、弧之分。
①、断面呈长方形。长20.5、宽7.2、厚2.8厘米。
②、断面呈梯形,两端旋弧。长21.2、宽4、厚3.6厘米。
③、断面呈横置梯形,上下两磨面同侧倾斜,两端近平微弧。长21、宽

4、厚3.8厘米。(图-2.3.4)

II式:1件,残。柱状手柄式,手柄加工精细,柄与磨面间一面有阑,手握合度。因使用时经常变换角度,有宽窄不等五个磨面。残长20手,柄长6.8厘米(图-5)。

石耜:4件。可分两型四式。

A型:柳叶状。

I式:灰褐色凝灰岩,打制。整体修长略曲,两侧较尖,向下收缩成弧形尖峰、刃部及腹部突兀处理有明显使用磨擦痕。长31.2、宽(指最宽处下同)10.2、厚1.8厘米(图二、1)。

II式:青灰色砂岩。打制石略经磨制加工,粗身两侧两面打制较尖,两侧内收呈尖刃。长24.8、宽11.5、厚2厘米(图二、2)。

B型:顶端打琢出凹槽。

I式:淡绿色砂岩,打制。顶端有半圆形凹槽,两侧两面加工较锐,直刃微弧,偏锋。长25.2、宽11.8厘米(图二、6)。

II式:赭色页岩,打制并经磨制加工。阔叶形,顶端有凹槽,两侧弧尖,弧刃,两面磨制加工正成锋,下膜部有使用磨光痕迹。长23.5、宽12.5、厚1厘米(图二、5)。

石斧:3件。分二式。

I式:2件。凝灰岩,打制。体态扁平,平面呈梯形,上部两面经磨呈弧形,正锋微偏,弧刃较钝。长14.8、宽9.5、厚2.2厘米(图二、4),

II式:1件。青色砂岩,通体磨光。平顶,两侧呈弧形

略平,断面呈椭圆形,弧刃、正锋。长 11.4、宽 6.7、厚 3 厘米(图二、7)。

石铲:一式两件。均为赭色页岩,亚腰形,体态端正,弧刃、半圆形刃,正锋,刃部有使用磨擦痕。长 24.8、宽 16.8、厚 1.9 厘米(图二、3)。

饼形器:1 件。凝灰岩琢制。圆饼状,两面较平,固边较规整。最大径 9.8、厚 3.2 厘米(图二、8)。

杵形器:1 件圆柱形,底面研磨平滑。长 10.6、直径 2.8 厘米。

石刀:1 件,残。淡绿色叶岩。直背弧刃,近背部有一对铅孔、偏锋锐利。残长 5、宽 4、厚 0.65 厘米(图二、9)。

2、细石器:主要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石凿。均为压琢制成。

石核:一式两件。青灰色燧石质。整体呈圆锥状,底面为不规则圆形,周身有石叶削落痕(图三、1、6)。

石叶:7 件。乳白色暗灰色燧石和蛋白石等石质。分双脊、单脊两种,宽窄不一,在 1.2 至 0.6 厘米之间。其中三件刃部有使用痕(图三、2、3、4)。

刮削器:一式两件。指甲形,黑色燧石,底面较平,突兀面遍体压琢,周边做刃(图三、7)。

石凿:1 件。长方体,两侧较直、偏锋,直刃微弧,较锐。长 4.9、宽 2、厚 0.8 厘米(图三、5)。

(二)、陶器:采集陶器残片约 150 片,征集高领罐一件。

陶系分为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褐陶、夹砂黄褐陶四类。泥质红陶陶质精细,火候较高,器壁较薄,器表多

经磨光,有的似涂有红陶衣,约 10 余片,多为钵的残片。夹砂褐陶系陶质粗松,火候较低,器壁较厚,部分器底尤为厚重,断面近内壁部分多呈黑褐色,近表部分多呈红褐色,泾渭分明,陶胎中夹砂粒的成份较高,个别夹有少量云母颗粒。陶色不纯,内壁多有黑色烟炱。

夹砂褐陶系纹饰种类繁多,图案丰富。主要以凹弦纹、交叉纹、折线纹、网格纹、“之”字纹为主,其次是指甲纹、戳点纹、指印纹、管印纹、器底印编织纹等。

凹弦纹最多,平行施于口沿下,一般在 3—12 道之间,沟槽宽、窄、疏密不等。压印短线交叉纹(或只压印出单线未形成交叉)、压划平行线交叉组成的网格纹、竖压横排、横压竖排“之”字纹施于其下成为组合纹饰。也有凹弦纹带而下施“回”字形纹“管”印纹的。平行折线纹者,压印而成,施纹方法类弧线“之”字纹,折线相连似水波状。

弧线“之”字纹仅发现四例,分线纹和篦点纹两种,各两片。

遗址发现彩陶两片。均为泥质红陶饰黑彩,平行条带状纹。

陶器均为手制。红陶系器类制作精细,器表和内壁隐约可见平直的加工磨擦线痕,似经慢轮修整。部分磨片附带板耳,多属示意性,以并列的两乳钉式形存在。有一夹粗砂厚胎陶片,膜部附加条正横板,具有实用性。有一夹砂褐陶片,圆唇,外唇饰指甲纹,口沿下用细圆形器具由内向外戳器壁,因未透,内壁出现小圆洞,器表被顶起乳钉状泥突。平行排列绕器壁两周。

发现特异凸弦纹陶片四片。夹细砂含云母，黑褐陶，薄壁经压光，火候较高，凸弦纹（亦有平行并列斜凸条纹）多施于器物口沿下，1至5道不等。

遗址采集陶片可辨器型主要有钵、罐、支钉(?)等。

钵：口沿残片6件，素面，均经磨光。可分三式。

I式：2件。红陶夹少量粗砂，圆唇，直领，下腹斜收微弧。口径28厘米(图四、1)。

II式：2件。泥质红陶。圆唇敛口，孤肩斜直腹。口径25厘米(图四、2)。

III式：2件。细泥质红陶。圆唇，斜腹近直。口径31厘米(图四、8)。

高领罐：收集，1件。泥质红陶、火候高，素面，通体磨光，手制似经轮修，口沿表面有制作轮线。圆唇，侈口，高领，广肩，孤腹，小平底，腹中部有对称桥耳，一耳残。口径14.8、底径9.2、高38.2(图四、9)。

筒形罐：1件，残。夹砂褐陶，腹唇较尖，口微侈，唇饰一固指甲纹，下为竖排、横“之”字纹。口径19厘米(图四、10)。

折腹罐：泥质红陶，素面磨光，圆唇，斜折腹，口径5.2(图四、4)。

敛口罐：夹砂褐陶，圆唇，孤腹，敛口，口沿下穿孔由表及里一面钻(图四、5)。

直口罐：夹细砂褐陶，器壁较薄，火候高，内外壁均经磨光。沿下有破损连缀孔，腹上部施凹弦纹一周。下为竖凹纹，竖凹纹间隔一饰篦点纹。口径20厘米(图四、6)。

素面灰褐陶罐：2件。一件圆唇微侈。一件圆唇微敛。口径分别为20、15厘米。

陶支钉：1件。泥质褐陶。实心，一端有凹坑，呈脚趾骨状。直径2.2厘米，高3.6厘米(图四、11)。

(三)、骨器及其它；

骨乃柄：一式两件；一件刃部残。系用牛肋骨加工制作，整体呈扁平长方形，首端偏一侧有对钻圆孔，下端磨刃，偏锋，直刃较锐。下半部两侧加工出镶嵌石叶的凹槽，槽深2毫米。制作精细。长15.2、宽9、厚0.7厘米。

清理被扰乱灰坑一座。出土较多似牛的骨骼，伴出有其它动物骨骼。遗址内还采集到部分蚌壳残片。

三、结语

古日古勒台遗址出土的遗物虽系调查采集获得，但文化内涵是很复杂的。

在1984年我们对这批材料做初步整理时，就发现该遗址除存在已经被认识的红山文化遗物外，同时存在着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石器以条形和手柄式磨棒、石耜、亚腰形石铲、饼形器及打制石斧为代表。陶器陶质疏松，胎厚、砂夹量大，多为褐陶，器表施丰富的纹饰。以凹弦纹、压印短线交叉纹、压划网格纹，以及凹弦纹带与交叉纹、横竖排“之”字纹、“管”戳纹、“回”字形纹等组成的复合纹最具特征。这些特征明显不同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因无地层关系，当时对其尚没有认识。然而，我们曾预示，“其文化性质会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逐步揭示出来。”《考古》1985年第10期发表了《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我们高

兴地看到,这种类型的遗物已被定名为兴隆洼文化。

遗址中红山文化遗物亦占较大比例。舌形石斧、细石器,高领双耳罐、红陶钵,陶器纹饰中的“之”字形线纹、篦点纹、器底印编织纹和彩陶片等均富有红山文化特征。

石耜,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一般形体硕大,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而古日古勒台遗址出土的石耜器体相对较小。B型石耜顶端加工凹槽(当与缚捆木柄有关),似与目前发现红山文化石耜存在着差别。这种石耜的性质若属红山文化,则为其增添了新的型别:若属兴隆洼文化,无疑为该文化增加了新器类。同时亦不排除区域地方性特点和新的文化类型。

遗址内出土骨刀柄两枚,这种型式的骨器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都有发现,与前者出土的同类器似乎更近似些,能否说该遗址与富河文化也有某种联系。

黑褐陶薄壁凸弦纹陶片特征鲜明,从众多的陶片中分离出来。其时代可能稍晚些,其文化性质有待于今后研究探讨。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碳 14 测定为公元前 5290 ± 95 。红山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350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古日古勒台遗址至少经历了上述两个考古学文化阶段,大约在距今七千多年到五千多年这个时期,长达两千年之久。

房址的发现和遗物的集中出土,说明氏族公社时期生活在古日古勒台的人类已经定居。加工谷物用的磨盘、磨

棒,农业生产工具石耜和石铲的出土,以及随着原始农业出现而诞生的各种陶器的出土,说明生活在此的先民从事着原始农业的生产,并以农耕经济为主导。动物骨骼、蚌壳和细石器的出土,也反映了狩猎和渔捞仍为当时的辅助经济。

吉日古勒台遗址的发现,是迄今所知分布最北的一处兴隆洼文化遗址,为兴隆洼文化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这种类型的遗址(或遗物)在我旗巴彦尔灯苏木敖包恩格和巴彦汉苏木那日斯台均有发现,从而,标明了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及命名的重要性。同时,也为研究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线索。

古日古勒台遗址是目前我旗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也是最早的一处人类居住遗址。它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七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巴林草原就已经有人类定居,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

附记:

旗博物馆韩仁信、清格勒、朝格巴图等同志先后参加了该遗址的调查、整理及绘图工作,乌力吉、王长春同志做了拓片,在此谨表谢意。

清百寿图玉碗

乌兰其其格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有一件百寿图玉碗，收藏者是本旗都希苏木人，从这件玉碗的工艺制作、造型构思看亦可识定是清代玉制精品。

清代曾有三个公主下嫁巴林王，此碗就是和固伦淑慧公主有着密切关系，并且淑慧公主故后也曾葬过都希苏木凤凰山。固伦淑慧公主，名阿图，满族，后金天聪六年（1641年）二月二日出生于盛京（今沈阳）帝官，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女，为孝庄文皇后所生。淑慧公主出嫁时其母被册封为庄妃，她遂被晋封为和硕长公主，庄妃被尊为皇太后时，淑慧公主晋为固伦长公主。清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十七岁的淑慧公主远离京都来巴林，嫁予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辅国公色布腾。淑慧公主对母亲孝庄文皇后十分孝敬，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孝庄文皇后患病，公主回京探视，亲自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因而得到皇后的怜爱，皇后嘱咐康熙皇帝要“护视阿姑”。此后康熙皇帝承祖母训谕：“迎养以乐暮年，毕姑一生，皆朕之事”（祭文）。固伦淑慧公主于康熙皇帝三谏祭文，并将遗体送葬巴林右翼旗，初葬于巴彦汉山

赛音宝力格，后迁葬于凤凰山西南，再迁于查干沐沦河中游西岸额尔登尼山前。

这件玉碗为青玉、口微外撇，曲腹，足亦外撇，通高为6.6、口径12.2、足高0.6、足径0.6厘米，外口壁沿处饰四道凹弦纹，弦纹中间刻有近“卐”字连续图案，外壁腹部底端由十三片莲瓣组成，外膜壁中部镌刻有一百零八个篆书白文“寿”字。“寿”字分三行排列，每行为三十六个字，字的间距很有规则，并且错落有致。内壁口沿外有二道平行的凹弦纹，中间刻有四十八个“福”字，“福”和“寿”字现均见有锉金痕迹。“寿”为长寿，“福”为满福。

玉碗质地细腻、器薄微透明，碗外壁的篆书“寿”字笔画自然，富有艺术感，从“寿”字的笔画上看可以分粗细曲线、回曲线、鸟形线等三种。如：两个复杂优美的篆体寿字刻画很弯、婉、斜形。就象“篆尚婉而通，婉转以求勾，通顺而无滞”。则给人以运动轻快，文雅和优美的感觉。两个长方篆体寿字刻画给人坚硬、有力，质朴稳定整齐美观感，一个“鸟”形篆体寿字极为罕见的象形字明显是鸟形图案。从以上几点刻工看，不仅有篆刻书法艺术也有它独特的谋篇匠心。同时，从“寿”和“福”字的用意，以及“莲瓣”的风格，篆刻艺术，玉碗的器形来讲完全是清代的典型风格。

荣宪公主之章

布和朝克图

这一“荣宪公主之章”是五十年代从巴林民间征得的。最近经有关部门的学者专家鉴定,确认此印章为真品,为清朝康熙年间制做。



印章之主荣宪公主,是清圣祖皇帝康熙的次女,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月。据有关史料记载,著名的乌兰布统之战之后,乌尔袞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见和奖赏,当年乌尔袞才只有二十岁,康熙皇帝一见乌尔袞英姿勃勃,有勇有谋,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当即决定把十九岁的和硕荣宪公主嫁给乌尔袞。第二年六月,也就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荣宪公主带着二百四十户随嫁仆从,到巴林右翼旗与乌尔袞成亲,于是乌尔袞被清廷封为和硕额附。康熙三十四年乌尔袞嗣封王爵,并统理昭乌达盟十一旗事。公主下嫁蒙古旗,是清朝政府为巩固政权实行“南不封王,北

不断亲”的“和亲”政策的产物。这种政治联姻,是皇室对边远地区精骑善射的英雄的蒙古民族政权的笼络。固伦荣宪公主在巴林草原共生活了三十七年。荣宪公主生平慈孝,对下有恩,上下威望很高,所以当地牧民和陪房人对公主敬之若神明,对公主的每句话都是奉行唯谨,通称为二公主妈妈。

荣宪公主“克诚克孝,竭力事亲”。清圣祖康熙皇帝患病,荣宪公主日夜不停地赶到北京,对其父皇的用餐睡觉、煎汤熬药等都是亲自来做,早晚问安,关心备至,四十余天从没休息,因而在康熙帝病愈之后,传旨奖励说:“诸公主中,你是最好最孝顺的一个”。所以封为“固伦荣宪公主”并亲赐她一件珍珠团龙袍,以示父爱。

所找到的这枚印章石质为水晶,质地纯正,清亮透明。印呈长方形,兽钮状,通高为五点二厘米,钮高为二点五厘米。兽形为私印常用的避邪形象逼真,造形生动,洒脱。印面呈正方形,二点二厘米见方,上面刻有“荣宪公主之章”六个篆体汉文朱字印文,印制作保留了清初印章的特点。内蒙古博物馆将此物列入一级文物收藏。

珍奇的古袍

郭振有

赤峰市博物馆陈列的三件古袍,是我们巴林右旗出土的珍贵文物。虽然笔者只是观赏一两次,但它却时常牵动着我的情思。

三件古袍都是满清时期的艺术珍品。为首的是珍珠团龙袍。珍珠团龙袍同皇帝穿的九龙袍很相似。它虽在地下埋藏二百五十多年,但那明黄的缎面,月白色的珍珠,仍保持着原来的质地,色泽,光彩绚丽。袍子的前后襟分别用珍珠绣着三条团龙,两肩绣着二条团龙。因此,人们亦称珍珠团龙袍为八龙袍或珍珠袍。据专家鉴定,此袍用的珍珠,乃岭南合浦所产米珠。它的个头比小米粒略小,很似粟粒的个头儿。究竟绣成这八条龙用了多少颗珍珠?据说一位文物爱好者用放大镜照着,数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数过来。

与珍珠团龙袍并列在陈列室内,还有一件苏绣旗袍和一件素袍。

那件苏绣旗袍也珍奇得很,满袍竟整整绣了一百只蝴蝶。一百只蝴蝶形状不同,蝶姿迥异,堪称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在翩翩起舞的百蝶中,缀着一句唐人韩翃的七绝句:

“春风无处不飞花”。如画龙点睛,将整个袍子的诗情画意点染得淋漓尽致,使目击者不能不拍案叫绝!

再看苏绣袍的绣工,确实是巧夺天工。只只彩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的如立蕊采蜜,有的似引逗花情,有的好象扑面而来,有的似如掠扰而去……,真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令人宛若置身于百花争艳的园圃之中,大有花恋蝶,蝶恋花,花香袭人,蝶影翩翩之感;单就刺绣的针脚而言,不仅每只蝴蝶身上觅不出丝毫的败绽,就连袍襟边檐的针脚,也都匀匀称称一丝不苟,绝无长短不齐、大小不整之弊。这绝巧的手艺,纵使当代高明的缝纫大师在它面前,也会惊叹不已的!

当然,那件素袍同珍珠团龙袍与苏绣袍相比,自然大为逊色或者根本就不可比拟了。因为它是主人的贴衣袍,犹如今人的衬衫,恕我就不赘笔墨了。

这三件衣袍同穿在一人身上,外为珍珠袍,中为百蝶袍,内为素袍。斯人二百五十年前就已长眠地下。那么她到底是何许人也?斯人就是清朝康熙皇帝的次女荣宪公主。

墓志对荣宪公主有所记载:

固伦荣宪公主,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五月出生于北京,乃清圣祖仁皇帝次女。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月下嫁巴林部右翼札萨克乌尔袞。她下嫁时,从北京带来七十二行工艺工匠陪房仆从二百四十余户。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按西大庙“普觉寺”的规模型式,于大板兴建了一座十分壮观的“荟福寺”,至今完好。公主生平慈孝,对下有

恩,所以当地牧民和陪房人尊称她为“二公主妈妈”,对她敬之若神明。

由珍奇的古袍联想到其主人荣宪公主,由荣宪公主使我联想到王昭君、文成公主,她们不都在历史上于国于民做过贡献吗?而人们总不会忘记她们的。她们在那种环境,能毅然离开京都去边塞“和亲”,这不能不称之为是一次壮举。尤其是她们所到之处,都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这一点,不惟载入史册,也更深深地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至今,我旗查干沐沦苏木的蒙汉族群众仍在念念不忘公主的好处。1990年,他们自愿捐款,为大公主——固伦淑慧修建了一座纪念灵堂。虽然规模不大,但虔意深长。堂内供奉着公主的肖椽,一人看护,每日香火缭绕,远近敬慕瞻仰者络绎不绝。由此可以证实,虽然时过境迁,但凡是有益于人民的人,她的所作所为,将永不为人民所忘怀的。

拉西彭楚克及其《水晶念珠》

乔吉

《水晶念珠》,原名《大元国水晶念珠》($\text{ᠳᠠᠢ ᠨᠠᠭᠤ ᠨᠢᠰᠢ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在学术文献上通常称其为《水晶念珠》(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成书年代]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即1774—1775年)。

[作者]漠南蒙古巴林部三等台吉拉西彭楚克,约于十八世纪后叶生于巴林部贵族车楞达日札家里。拉氏从青年时代开始服务于巴林郡王旗,任旗协理,精通蒙、汉、满、藏文。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拉氏著作只有两部。一部是于1772年写的巴林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生平传记《格勒克坚赞·赛音绰克图活佛传》。另一部是本文所介绍《水晶念珠》。

[版本]根据我们手头拥有的资料,《水晶念珠》有五种不同的抄本:一)乌兰巴托国立图书馆抄本A,共9册,515页。二)乌兰巴托国立图书馆抄本B,共52页。三)鄂尔多斯手抄本A,共9册(本应十册第五册遗失),496页。四)鄂尔多斯新手抄本B,共一册,47页。上述两种抄本均由田清波教授从鄂尔多斯获得。五)四子王旗抄本,共9册(每

册分上下集,共18集,缺两集),此抄本原保存于蒙疆政府图书馆,今不知下落。此外,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一部《水晶念珠》抄本,此件与乌兰巴托抄本A相同。一九四二年,由蒙疆政府资助将四子王旗抄本在张家口石印出版,共四册,书名为《拉西彭楚克著蒙古国史》,学界称其为张家口石印版。一九四六年西德海西希将田清波获得的鄂尔多斯抄本A的第十册在北京影印出版,共一册,书名为《水晶念珠》,学界称其为北京影印版。一九五九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柯立甫教授将田清波获得的鄂尔多斯抄本A和B以及与张家口石印版一起列为蒙古古典之三在哈佛燕京学社影印出版,共五册,书名为《水晶念珠》,学界称其为哈佛影印版。一九八五年,内蒙古的胡和温都尔先生据哈佛影印版和张家口石印版以及一九四一年的抄本等五种抄本进行校勘后在呼和浩特出版,书名为《水晶念珠》,学界称其为呼和浩特铅印版。

[内容梗概]《水晶念珠》原文除绪论而外分作五章。绪论中作者提出了编写此书的目的和意义,并解释了《水晶念珠》这一书名。第一章:论述蒙古族族源,择录了蒙汉文献中有关蒙古族族源的记载。第二章:蒙古汗统源流,其中主要以自孛儿帖赤那到也速该为止的世系为主线,描绘了成吉思汗先祖的历史。第三章:本书的主要部分,成吉思汗的历史,蒙古诸部的统一,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元朝诸帝及元朝的灭亡。第四章:爱育识里达腊汗至达延汗为止的蒙古诸可汗,林丹汗的经历,林丹之子额哲·洪果尔降清。第五章:成吉思汗诸弟及诸子后裔,蒙古诸部诺颜世系,俺答汗

及佛教传人蒙古等。

[史料价值]拉氏所著《水晶念珠》一书在所有十八世纪的蒙文编年史中以极为详尽而得到蒙古学界重视。拉氏编写此书时大量参用了《元史》和《续资治通鉴纲目》等汉籍,但《水晶念珠》中所出现的很多史料在上述几部汉籍中几乎不见,从而拉氏所用史料可称其为比较珍贵,对研究蒙古古代史很有参考价值。《水晶念珠》所记历史年代,在很多情况下与汉文记载有所不同,故在考证蒙古史历史年代方面此书也有独特的一面。《水晶念珠》在十八世纪蒙文历史文献中以宏大的篇幅,严谨的体例,翔实的内容和简洁优美的文书被学界所推崇,同时《水晶念珠》的作者在所有十八世纪蒙古史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具有独特见解的史学评论家。拉氏对于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发出了不少议论,并写出了专论。拉氏史学思想对于研究十八世纪蒙古族史学观的发展和形成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必须指出,在所有的蒙古编年史中这部书最彻底地列举了成吉思汗以来的血统系谱,从而使蒙古编年史的类型达到完善。

[国内外研究]在国外,最早研讨《水晶念珠》是匈牙利著名蒙古学家李盖提教授。早三十年代初,他在蒙古地区旅行之际发现了《水晶念珠》。一九三三年李盖提教授发表《内蒙古旅行简报》(布达佩斯,1933年,第26页)时写评论称《水晶念珠》为“一部尚不为人知晓的历史著作”,从此西方人知道了《水晶念珠》。其后,西德海西希教授对《水晶念珠》进行了较详尽地研究。一九四六年海西希在北京影印出版《水晶念珠》(《水晶念珠》,北京天主教大学“东方学研

究”第十期、北平辅仁大学,1946年)时写绪论,对其各种抄本及其异同,并对其内容和作者等方面进行了首次详尽地研究,成为研究《水晶念珠》的开拓者。十二年以后的一九五八年,海西希教授在其巨著《蒙古宗族与宗教历史》(威斯巴登,1959,第198—200页)中又开专章进行了补充研究。美国田清波教授也是研究《水晶念珠》的一位卓越学者。早在1911年,他在鄂尔多斯期间收集了《水晶念珠》的两种抄本,并于一九五九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影印出版(柯立甫主持出版),书前田清波写绪论,全面论述了《水晶念珠》。苏联普齐科夫斯基在其《东方研究所所藏蒙文手抄本与刊本》(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第47—51页)一书中开专章介绍了《水晶念珠》。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璞尔来、毕拉、察罕等人前后曾发表文章研讨过《水晶念珠》。国内研究《水晶念珠》及其作者的有内蒙古的呼和温都尔和乔吉。一九八五年呼和温都尔先生将《水晶念珠》的五种抄本校勘注释后在呼和浩特铅印出版。乔吉研究《水晶念珠》的作者拉西彭楚克,发表了《拉西彭楚克生平考述》(见《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二期又见西德《中亚研究》第19期)一文,对拉氏生平及其家族等进行了较详尽地介绍。此外,乔吉于一九八七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拉西彭楚克写的一部新发现的传记即《格勒克坚赞·赛音绰克图活佛传》。

乌勒慧充阿

撰文: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色 杰

审文:穆 松

乌勒慧充阿,蒙古族,尼楚古惕氏,汉名乌善清。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巴林查干沐沦河畔,景斯图山包东侧的蒙民的村庄里,他的父亲桑嘎是个普通牧民。乌勒慧充阿成年后,身材高大魁伟,红光满面,眼睛特别明亮,炯炯有神,性格刚毅。晚年留下胡须,很有风度,更显得精神抖擞。

热心教育 兴办学校

乌勒慧充阿是巴林十二、十三代札萨克两代王爷时的三个章京之一。幼年时曾在王爷身边当侍者时,就学于“必车赤书斋”精通蒙、汉、满文。

乌勒慧充阿十七岁那年,使巴林右旗从一次灾难中解脱出来,所以在他十九岁时,负责管理旗衙门内务,二十三年那年,当上了管旗章京。

乌勒慧充阿对于历史、地理、法律进行过多年的研究,

他写过一本历史书籍《查干图和》，详细叙述了蒙古旗边境的自然地理情况，记载了巴林出现过的历史事件。乌勒慧充阿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特别注重民族文化教育。

二十世纪初，在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乌勒慧充阿认识到，蒙古民族要想从封建礼教和愚昧中解脱枷锁，就得接受新文化，就得办教育，这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所以他提出了兴办学校的建议。当时蒙古地区注重建立寺庙，对办学校根本不重视。乌勒慧充阿办学的主张，得不到很好的支持，办学困难重重，障碍很多。他亲自去北京、承德，给当时的热河督统送去了十小瓶装饰华贵的礼物。督统以为瓶里装的是大烟，他答应了乌勒慧充阿办学的请求。其实里面装的全是韭菜花，这真使他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后悔不及。乌勒慧充阿克服了办校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1910年在大板创办了“普励学校”，一年内就招生一百多名，这所学校是我旗民族教育的摇篮，为发展巴林文化教育起着奠基的作用。“普励学校”已发展成为我旗的重点学校之一（现大板一校的前身），为我旗学习与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做出了贡献。

乌勒慧充阿与哈丰阿章京合作，于1905年请来满族教师乌簿山给附近村里的孩子教书，后又聘到“普励学校”任教。1920年乌勒慧充阿又聘请来在多伦任教的阿木古郎老师（汉名张辑武喀喇沁中旗人，蒙古族）在苏布都庙建立学校，给十几个孩子教书。这样以来，查干沐沦、沙巴尔台、巴彦尔灯等苏木，涌现出更多有文化的人，村里的学校也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

使家乡摆脱困境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巴林已遇到连续几年的干旱，草场干枯，全旗的牲畜有被灾难吞没的危险。乌勒慧充阿以一个青年章京的身份，把阿巴嘎纳尔旗王爷、乌珠穆沁王爷请到本旗西北边境地带，举办那达慕大会，请求两位王爷在他们旗与巴林毗邻的地区，划给一部分草场。乌珠穆沁王在宴会上，借着酒劲儿满口答应说：“巴林有十张牛皮大的草场足够了！”乌勒慧充阿表示感谢。到分草场那天，乌勒慧充阿弄来十张大牛皮，将湿牛皮割成细细的皮条儿，用细牛皮条儿为量绳，在阿巴嘎纳尔、乌珠穆沁、克什克腾三旗交界地带西南面的呼来塔拉，西北边的哈拉特尔郝来，东北边的达兰图路戈壁，东南方包括扎哈乌兰呼和布尔淖尔，量出草场几万亩，建了“巴林敖包”，全旗牲畜都到那里专出场，使右旗摆脱了旱灾，牧业逐渐兴旺了起来，这地方当时人称“巴林锡利”，在克什克腾旗北面，锡林浩特南边几十里的地方，属现在的锡盟白音锡勒牧场管辖。

巴林王长期驻在北京，费用很大欠下了大批外债，用王府的全部牲畜偿还欠款都不够，加上牧业税较高年份，不能按时上缴。朝廷来令，再三个月不缴税，就向王爷问罪，并没收本旗全部牲畜。巴林王这时也心急火燎，坐卧不安，就在这危急时刻，十七岁的乌勒慧充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京城里的几百名乞丐集中起来，每天给好饭吃，并组织他们一早到午朝门外，堵截所有来人朝的大臣官吏，不给钱就不让他们进宫上朝。乞丐们每天能收集到几百两银子，这

些银两交给巴林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积累了不少的银子,上缴了全旗的欠税和还清了全部借款,使巴林人民免去了一次灾难,脱离了一次危机。

民国二年(1913年)的“癸丑荒乱”是由于袁世凯统治下的北洋军阀与王公贵族之间的激烈争夺给巴林人民带来的灾难。在热河督统姜桂题和“前敌司令”、毅军首领米振标的包庇下,一伙地主在巴林宝日音古日本浑迪。其诺土音古日本浑迪、樱桃莫河等地大面积开荒,引起牧民的不满。

米振标以加强边防为由,从毅军二十营四万将士中,调出十七个营的兵力,在赤峰以北的经棚、干珠尔庙一带驻防。当时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告独立,网罗内蒙部分王公,组织军队,准备内犯。

1916年1月8日,外蒙“独立政府”再次派遣的巴布扎布率部内犯攻到林西城东门外,占据了有利地形,用大炮从山头往城里轰击。毅军被围在城内,形势危急,眼看城内军民开始从西门撤退,当时巴布扎布正站在城东山头用望远镜观望毅军情况的时候,其部下有个叫巴图孟克的,为给死去的哥哥额尔敦孟克报仇,突然飞马持枪将巴布扎布打死,后投降了米振标,去请功受赏。巴部见主将身亡,仓惶溃退。

米振标因伤亡了很多将士,愤恨交加,他与从开鲁前来增援的统领关德胜五个营的兵力汇合一处,声称要“血洗巴林”。以平乱为名,将沙巴尔台王府纵火焚毁后迁回大板,被奉毅两军烧毁的还有岗根庙、乌牛台庙,索博日嘎庙、珠

尔沁庙、苏布都庙、新庙等,并抢劫百姓的大量牲畜。急报传到旗王府里,当时旗衙门只有25名卫兵。在家乡人民遇到危急的关键时刻,乌勒慧充阿与他的车夫格力格仲奈主仆两人,从大板出发到旗西侧杜归希热,正是米司令率部扎营之地,说有要事,必须面见米司令。米司令已知乌勒慧充阿独身一人,必定有事,他把卫队排成两行,举刀持枪,让乌勒慧充阿从两队丛中进来。乌勒慧充阿面无惧色,从容镇静,昂首挺胸走到米振标身边。他严厉地说:“我是巴林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代表本旗,面见司令,我们和哲盟、锡盟保卫地方家乡的联合部队,就要来到了。你们再敢前进,就接上了火,但战事都有损失,谁胜谁负怎能预定?我今天孤身一人前来,考虑到双方的利益。你们不动兵的话,我说话算数,决不会和你们作战,你们如果想打下去,就在这儿把我砍死也行!”米振标原来就认识乌勒慧充阿,一听他说的有理,再加上如果有援军,就不好办了,因此他决定收兵回林西,并处决了杀主求荣的巴图孟克(在林西南门外)。为逃避荒乱的巴林牧民,游牧到呼伦贝尔、阿鲁库伦,过了几个冬春才回到巴林家乡、重建家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伸张正义 秉公断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刚建的林西街道上,增添了不少买卖货摊。当时克旗有一个人到林西来赶集,买了不少货存放在这家货店。正当他回店找车来拉货物的时候,店里的小掌柜翻脸不认,说是已把货物早就拿走,还要什么?还找来旁边卖糕点的给他做证。克旗人说不通,扭不

过只好去找驻林西的巴林翻译室(又称“巴林衙门”)的乌勒慧充阿,向他告状。乌对克旗人说“不要着急,先回去吧!”乌勒慧充阿准备了酒席,宴请林西街买卖行的掌柜们,克旗人买货的商店大掌柜,接到乌勒慧充阿的请柬后,他受宠若惊,穿上绸缎长袍马褂,打扮得很漂亮,前去赴宴。席间乌勒慧充阿指着他的马褂说,你这衣料真好,做得也合适,我也想做一件你这样的衣服,把你的马褂暂借给我,我找人买来布料,按这衣样做一件。大掌柜忙脱下衣服交给乌勒慧充阿,乌勒慧充阿命手下人拿着大掌柜马褂到其商店,对小掌柜的说:“大掌柜告诉你们,将克旗人的货物全部交给我们!”并拿出大掌柜的马褂作证。乌勒慧充阿从那里拿来了克旗人买的全部货物,可吓坏了这家铺子的大掌柜,他一看情况不妙,急忙给乌勒慧充阿送礼,乌勒慧充阿将货物和送来的银子装上车,到米司令的“镇守使”署,见到米司令后说:“这个案子,你处理吧!”米司令毫无办法,他对乌说:“你接手的案子,还是由你来办吧。”乌勒慧充阿把那个骗人财物的买卖掌柜和那个为虎作伥作伪证的卖糕点的商人一起,敲锣打鼓的在林西游了街。

有一年冬天,乌勒慧充阿与很多车伕去锡盟贝子庙搞运输回来,在乌珠穆沁路上,他把自己一件很好看的长袍搭在骆驼鞍子上,和赶车的车夫边走边聊天,突然有一个骑马的人从路边窜出,将搭在骆驼鞍上的长袍抢走后逃跑,随行的人们大喊大叫,“有人把乌章京老爷的长袍抢走了!”乌勒慧充阿不慌不忙说:“没事的,拿去就拿去吧!”他制止了随行士兵们的追击。不一会儿乌勒慧充阿说这些日子,大家

都很累,我们到前边井边休息两天。

正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井边来了一大群牛,乌勒慧充阿指着一头胖牛说要杀了吃肉。大家不敢抓牛杀,车夫中有一人说:“乌章京让杀牛,我们就把牛杀了吧!”乌勒慧充阿告诉大家杀牛时不要把牛头和牛皮损坏,并让大家把牛头和牛皮放在显眼的地方,大家杀完牛后,把牛头和牛皮放在宿营地的两侧。不一会儿,一个身穿蓝袍骑着一匹大白马的人,来到宿营地。看了看死牛的全部特征后,与大家问安的同时又问道:“这头牛是你们买的吗?”乌勒慧充阿抢先答道:“我们杀着吃的!”来人说这头牛是我的,记号也都清楚,你们都看清了吧!乌勒慧充阿说这牛确实是从这个牛群中抓的,特征也不假。这牛是刚才那个骑马的汉子抓来换去了我的长袍你不知道吗?可能也是你们的人吧!牛主人停了片刻就走了。第二天早上,牛主人抓来了抢去长袍的人。乌勒慧充阿对牛主人说:“把这偷牛的人交给你,把长袍还给我。”就这样,不但找回了长袍,还吃了一头牛。

自从实行“移民实边”以来,一时垦局林立,人口逐增。搬迁户在巴林越来越多,拦路抢劫,偷盗成风;查干沐沦的一帮拉盐车到通辽卖盐,在回来的路上,有十几辆拉货的车辆被土匪抢走,遇难的牧民回来找乌勒慧充阿章京哭诉案情,乌问清并弄明白被抢走的都什么样的牛,什么样的车以及车牛的特殊记号等,向被抢劫者老布僧的儿子问明后,又领着到现场附近村落去查看,在一户人家,他们发现了牛车大鞅上的记号(乌力吉江嘎),以此为线索,最后侦破了案子,追回了十五辆牛车货物。

不畏权势 保护家乡

林西开垦后,有个地主,外号“田瞎子”。他与热河汤督统相勾结伪造假证,把本来没划给林西的巴林西部几百顷土地想占为己有,他说“你们(巴林)王爷已把此地卖给我了。”

当时的管旗章京乌勒慧充阿识破了田某等伪造的假公章,他与旗里的同僚们协商后,调集了旗兵,一方面备了酒席,宴请“田瞎子”和从热河来的官员。在酒桌上将他们扣押,然后乌勒慧充阿便准备到北京去告状。

动身时,乌勒慧充阿对大家说:“你们不用到北京来看我,想知官司的输赢,就去田瞎子家,若看到田家房顶上长满草,窗玻璃破了,就当我打赢了官司。”经通上面核对旗县界限,揭穿了“田瞎子”的阴谋,终于打赢了官司。

光绪二十年(1896年),敖汉王担任盟长(大王),他下令从巴林拿出一千斗储存粮给保安团当口粮。乌勒慧充阿与敖汉旗的管旗章京那顺套格套吵了起来,他说:“朝廷有这方面的财政规定吗?如果有,请拿出来,如没有,不管是谁,我们一粒粮食也不给!”敖汉王再没敢要粮食。

乌勒慧充阿亲身参加过多次边界的纠纷。在与克旗边界纠纷时,按照旗界线埋上的木炭、白灰。边界划到英桃莫河川上部一块地段时,克、右两旗发生了边界纠纷,各不相让,朝廷派来的特使同意按照克旗方面的意见划分,乌勒慧充阿看说话不起作用,忙叫随从们准备供品,杀羊备酒,准备香烛,到争议地段的一个象坟堆似的土包前,祭奠起来。

他跪在土包前哭着说:“您不忠不孝、无能为力的子孙乌勒慧充阿向奶奶叩头啦!我太无能,连埋葬您的咱家坟地都划给了他乡。”说完大哭,很是悲哀。朝廷特使通过翻译,弄清乌勒慧充阿哭什么后,决定把这块地方划给巴林。

根据《巴林右旗志·人物篇》记载:敖汉王爷达木林达尔达克(光绪五年袭)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任昭盟盟长时,非理向巴林右翼旗衙门要四千名喇嘛的度牒费,每人按五两五钱,计两万多两银子。对此当权的人们怕盟长的权势,计议着按折半交付。乌勒慧充阿时任“必车赤”,他自告奋勇到敖汉旗交涉,拒理力争,结果按理藩院规定,仅付四百名喇嘛的度牒费,每人三两三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阿鲁科尔沁旗王爷当盟长,借口巴林右翼旗王爷扎噶尔的袭爵,没按章走手续,处罚七千两银子。当时的管旗章京巴拉吉尔,不敢抗拒(出给了欠据),后由乌勒慧充阿去交涉。他到北京后,拟出向理藩院,呈诉的稿子,准备告御状。阿旗王爷听到后,自知理亏,忙托人说和,赔情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乌勒慧充阿到北京去上缴巴林一年的牧业税,把银子交给银库领收据时,记帐的官吏把数量故意写少了。乌勒慧充阿说:“您这样压低数量收税,我就不交银子,给我退回来!”那官吏冷笑着说:“你那银两已放进银库,你认识自己的,就拣出来吧!”乌勒慧充阿在银库中,拣出了自己的银子,过秤后,不多不少,正好够数。因为此银两由骆驼驮着,经长途跋涉,撞击磨擦,去锈生光,所以好识别,那时乌勒慧充阿还不到20岁。

朝廷的一名大臣曾捎话给巴林王府说：“把乌勒慧充阿给我的话，我给你们一县之地！”但巴林王没同意。满清时，赤峰街有个叫“白帽铺”的买卖摊，每年到坝后做买卖，成群地赶回牛马。当时规定，赶牲畜经过别人旗地，必须向该旗纳税。可“白帽铺”因有权有势，几年没向巴林纳税。

这一年，乌勒慧充阿去北京面见王爷，路过赤峰时，突然将“白帽铺”掌柜抓起来游了大街。“白帽铺”大吵大闹地要求放人，乌勒慧充阿说：“纳税是国法规定！俗话说‘有山大的汉子，也有天大的国法’，你们掌柜把国法不看在眼里，那我们就去北京处理！在这解决不了！”“白帽铺”的到处托人说情，通过县官老爷进行谈判。最后按照巴林右旗方面的提议，“白帽铺”必须交给右旗罚金，数量相当于巴林右旗一年应上缴的全部国家税金。并负担乌勒慧充阿这次往返北京的路费。签字盖章达成协议后，马上兑现。乌章京就这样又免去了家乡一年的应缴税，而且又花着“白帽铺”的钱去出差。

他为家乡 人民不忘

林西放垦时，将平川地绳丈后放垦出去。其间高山、大河、沙包，高寒不可耕之地不计算在放垦地亩之内。巴林西部的巴日斯图敖高宝力格（也叫马尔沁本布尔）、套热乌拉和日木吐达坝等山就留给了自己。乌勒慧充阿去世后，呼勒斯图布郎的艾登扎布老头从巴日斯图敖高宝力格拉三车烧柴，路上被一林西人抓住，说砍了他们山上的柴禾，艾登扎布老头说：“这山是巴林的山！”但不管用。通过巴林驻林

西的“翻译室”，好不容易要回了牛车。从此巴林人就议论，如果乌章京活着，我们能丢掉巴日斯图等地方吗？

乌勒慧充阿晚年酷信佛教，他为了做善事，给全旗范围十三所大庙，每庙一个红铜海锅，又做24个红铜水桶，大红铜壶24个，捐赠给这十三所大庙。铜海锅上面刻了献词，下面刻有：“施主乌勒慧充阿献赠”之语。他也曾在原公主桥南边加修了个小拱桥，直到解放前，这座桥起着连接西拉沐沦河两岸的作用。

乌勒慧充阿1927年因病去世，享年63岁。他幼年成了孤儿，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为官清正，他热爱民族，热爱家乡。在人民受难之时，他挺身而出，想方设法，解救家乡人民。他为巴林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有关他的故事广为流传，可见人们没有忘记他。本传就是根据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下来的乌勒慧充阿的事迹整理和编写的。

我从1983年开始搜集和整理了乌勒慧充阿的有关资料。上述关于他生平事迹的整理。我先后采访了知情者查干诺尔的敖敏齐那尔、沙巴尔台的乌力告门德、带珠尔、华夫、额尔德穆（巴林左旗）、敖日布等老人，以及乌勒慧充阿的侄媳玉珍老人。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白帽店出路费》、《土匪抢盐车案件》的主要内容由巴彦他拉的道尔吉老师执笔写的，在这里一并致谢！但由于资料缺乏，年代久远，此文远不达意，望知情者多指教，以求完善。

暴乐梅林

清格乐巴图 穆松

清末民初，一度在巴林草原上的风云人物暴乐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巴林右翼旗巴彦尔灯村蒙古族牧民东日布家中。暴乐幼时家中贫寒，到了十二岁，就在附近牧主孟和家做零活。一九一一年，暴乐牵着牧主孟和的十挂蒙古勒勒车，前去锡林郭勒的额吉诺尔运盐。归途中在西乌旗一个牧民的出场点附近宿营，于是好奇的暴乐到那个牧民家做客拜访。主人与客人虽然相互不认识，但蒙古族的热情好客的习俗，主人把暴乐请到蒙古包又是敬烟，又是献茶，格外亲热，席间暴乐看见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支架)上挂着一支连珠枪，于是暴乐随手拿下后啧啧称赞，主人看到暴乐对这个连珠枪很感兴趣，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小伙子如果你能舍得两挂车，那我再加上二百发子弹送给你好啦。”就这样暴乐用孟和的两挂车(车、牛和车上拉的盐)换了这支连珠枪和二百发子弹。回到家后暴乐受到了孟和牧主的指责。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清晨听见外面有枪声，暴乐出去探看时只见有一帮陌生人在门前井沿上，其中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正蹲在中间向暴乐不慌

不忙的射击，暴乐看到此情景后十分生气，便进屋拿起换来的连珠枪，摸到井沿附近草丛中瞄准那个打枪的人就是一枪，了解了他的生命。跟在后面的那个随从看事不妙就跑进了森林密布的沙窝子里，无影无踪了。事隔不久孟和牧主亲自来找暴乐并把他请到家里，以酒肉招待，并夸他有胆略，是个蒙古人的英雄好汉。还说把换枪的那两挂车和车里套的牛，车上拉的盐就算送给他的酬谢费，因为他消灭了土匪头子，为民除了害，也保护了我们的财产等。于是暴乐从孟和牧主的口中才得知，在井沿上被他打死的那个人，就是远近闻名的土匪胡日嘎。这个土匪是经常北渡西拉沐沦河到巴林一带进行抢劫民财，偷赶牧民的牛马，调戏民女无恶不做的害人虫。

暴乐击毙这个土匪头子胡日嘎一事传到了旗衙门，有一天巴林右翼旗王府管旗章京金齐贤派人把暴乐关押了起来，说是暴乐杀死了来历不明的外地人，如果有人来要人就把暴乐送去偿命等。这时巴林的地方势力者们不断到旗衙门给暴乐求情。最后衙门的看守士兵特日格道尔吉等人密谋把暴乐放跑了。暴乐回到家后，找来他的亲朋好友达日玛、达力扎布、占布拉等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投奔正在招兵的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

暴乐四人主意已定便离开了家乡投奔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四人走了几天几夜到了蒙古边界内的优格吉尔庙时正逢哲布尊丹巴部下的哈日诺海等人在这里征兵。他们四人前去说明来意时哈日诺海等怀疑暴乐四人是内蒙古来的探子，不但没让他们参军，还把他们关了起来，也没收了暴乐

带的那个连珠枪和马匹以及四人自身带的烟具、蒙古刀等物品。事隔几天哈日诺海等出发,准备出发前枪决这四个“探子”,于是命部下拉出去押往刑场之际,暴乐脸不变,心不跳的大声说:“你们杀我们可以,但你们一定告诉内蒙古的同胞们,遵照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圣旨,为了大蒙古国的兴旺,从内蒙古最早来参军的巴林好汉暴乐四人,被哈日诺海怀疑成探子杀害的事,避免今后许多内蒙古的同胞来送死……”。正在这时,庙院里出来一个胖喇嘛,找哈日诺海等一些官员商量后免遭杀头。这个胖喇嘛还问暴乐是否愿意参加哲布尊丹巴的军队?于是暴乐和达力扎布表示愿意参军,达日玛、占布拉二人想起眼前发生的一切吓破了胆,说什么也不参军了,不久达力扎布也开了小差回巴林来了。就留一个暴乐参加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军队。

一九一二年八月,苏鲁克旗的巴布扎布带领三四十人到外蒙古后,暴乐归属巴部。一九一三年冬,暴乐来侦探林西毅军情况,返回时征兵三十多人,后又带兵从沙巴尔台进来在永胜豪战斗中被毅军打退,跑回外蒙古的优格吉尔庙。几次战斗中暴乐不怕死,英勇善战,受到了巴布扎布的奖赏,并提升为团长。

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攻打突泉时,暴乐带领先头部队三次激战攻克了突泉县,这次他们先后攻打了洮南等地,洮辽镇守使吴俊升受伤。暴乐听到驻林西的毅军司令米振标派部队增援吴俊升的消息后,熟悉地形的暴乐带领部队打前站,夜以继日赶路,一天一夜来到了乌苏伊很,并在沙巴尔台同毅军相遇,暴乐在这里听到从林西出来的毅军只有

一个营,营长姓石等可靠消息后,就在查干沐沦河岸迎战。两军交火之后,毅军实力弱边战边往林西撤退,暴乐把部队分为两路,一路从太本庙,另一路从伊玛图进攻,最后把毅军包围在西日他拉一带,这时巴部的大批人马赶了上来,在化石山附近全部消灭了毅军的这个营,据当时人说:只有两个士兵跑回了林西。

一九一六年阳历九月十三日,巴布扎布率领的蒙古部队开始攻打林西城的毅军司令部,战斗十分激烈,毅军的司令部设于林西城北门下,此时城内弹雨横飞,人心慌慌,巴布扎布的炮火甚猛,林西城岌岌可危,这时巴布扎布突然挨黑枪身亡于军营内。关于巴布扎布的死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在林西城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毅军的米振标悬赏,有能用西山头大炮击退敌者,立即提升为连长,部下推荐了一个叫许克武的“闲员”,系革职炮目。米振标立即命令其赴炮台,于是测量距离,试射了第一炮,炮弹落在骑兵中爆炸,蒙军溃乱。发射第二炮,炮弹即将巴布扎布蒙军一门大炮炸毁,并将在炮兵阵地指挥的巴布扎布炸死。另一种说法是:打死巴布扎布的人是沙巴尔台艾勒的巴图孟和,此人在巴部当兵多年深得巴布扎布的信任,所以在巴布扎布附近当警卫。巴图孟和的弟弟额尔敦孟和也曾在巴部当兵,因有一次违反军纪律被巴布扎布军法处置。对比兄长巴图孟和对巴布扎布恨之人骨,决心给弟弟额尔敦孟和报仇,但一直没有找到报仇的良机。这天巴布扎布正在骑马往来指挥战斗,并到城东山头的炮兵阵地手拿望远镜观望毅军动向,胜利在望的梦想之际,跟在后面的巴图孟和突然开了

枪,打死了巴布扎布。巴图孟和枪杀巴布扎布后就飞马逃到林西城内投靠了米振标。米命部下用酒肉招待了这位“英雄”几天几夜。有一天米振标召见这位巴图孟和说:“你杀了巴布扎布给毅军解围,这是我们的功臣,但是你杀了自己的主子叛变投敌,是一个不忠之徒,日后你也会干得出杀主求荣的卑鄙事情,我不能留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小人。”说罢下令枪决了他。枪决巴图孟和的地方就是巴布扎布挨黑枪身亡的那座城东土山包。米振标枪决巴图孟和后给巴布扎布这个风云人物立了碑建立了一个小庙。巴布扎布被自己的随从枪杀之事,至到如今巴林人都有谈论,而且在溥杰写的文史和《蒙古史文稿》等书上也有同样的记载。

巴布扎布的蒙军见主帅身亡,斗志顿丧,其他头目亦无心指挥。遂吹撤退号,将正在攻城队伍撤回,至此巴布扎布蒙军混乱,四处逃散,有的当了土匪,有的还乡,也有的向毅军投降,只有暴乐率领的团返回外蒙古。

一九一八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也失去了靠山,于是暴乐认为大事已去,就率领家乡弟兄百余人回到了内蒙。暴乐回来后驻在巴林北部的巴彦沙那一带。不久暴乐亲自到北沙巴尔台找驻在此地的毅军统领常德胜要求投靠毅军,常德胜请示米司令,米表示如暴乐率领他的队伍消灭围场和拜查山一带的土匪,即可收编。

暴乐得到米振标司令的命令后,率领部队声扬米振标的毅军换防围场、白查山一带。暴乐的部队当,即进驻此地,暴乐从外地请来一个戏团,给这个山村无偿演了四、五天,到了第五天暴乐突然命士兵捕捉了看戏的大部分当地

村民。并在被抓起来的人中,挑出十几个可疑人,进行刑讯,结果他们供出了十六个有名的土匪头子和同土匪有来往的人。暴乐经过审查收编了其一部分,通过沙巴尔台的统领常德胜向米司令报捷。米振标听到暴乐只有二十来天大破匪窝,想到十分惊奇。米振标便同意收编暴乐部队。不久常德胜被调回林西,暴乐继任沙巴尔台驻防的毅军统领。暴乐任统领后修复了原常驻的统领府,驻守在此地。后来米振标调换了暴乐手下的一些同乡好友和亲信,引起了暴乐的不满,暴乐便告老还乡为由辞去了统领职务。离开了毅军。米振标在巴彦沙那给退职的暴乐建造了一所较豪华的住宅,据调查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四合院西北角和东南角建造了两座炮台。院内还有粮仓,畜圈基本齐全。

暴乐定居巴彦沙那之后,巴林王爷扎噶尔道尔吉封暴乐为巴林右翼旗军务梅林职务。

一九二七年暴乐正在掌握巴林右翼旗王爷卫队之际,从河北围场过来一股土匪绑架了哈日毛都艾勒牧民斯楞、扎木苏二人并抢走了牛、马几百头匹。土匪还叫嚷巴林方面要用一百支枪和一百匹战马来换人,否则二人的生命难保等,对此巴林王扎噶尔命暴乐出面解决,暴乐首先拒绝了土匪的无理行为,并亲自带领王府卫队几十人在村民中又选了一些猎手凑了四百余人攻打了围场的那股土匪,把扎木苏、斯楞二人接回了巴林。事后得知这股土匪是住在围场的几个大土豪劣绅联合的抢劫团伙搞的鬼。

一九三〇年,九世班禅大师来巴林传经,得到了大量的

金银和珠宝。当班禅大师动身赴锡林郭勒盟时，扎噶尔王又派暴乐护送班禅大师，暴乐受命亲自率领安全护送到西乌珠穆沁旗。据护送人回忆，当时班禅带着巨额金银珠宝，几股土匪和土豪劣绅贪财而暗算过班禅大师，但由于听到远近闻名的好汉巴林暴乐亲自护送班禅大师的消息没敢轻举妄动。

东北沦陷时期，暴乐被任为巴林右翼旗警务科长。暴乐虽然是伪满洲的警务科长，从没有欺压老百姓，仍住在巴彦沙那，过着一个普通牧民的生活。对此当地穷苦牧民群众十分尊重暴乐，当时巴彦沙那一带的牧民们谁家有什么难处都来找暴乐帮助解决，因此，暴乐在这一带有很高的威望。

日伪时期住在大板警务分所的两个警察，在巴彦沙那给百姓照像办理当时实行的“良民证”之际欺压老百姓，干出不少坏事，暴乐得知这个情况很气愤，有一天暴乐手拿着曾任警务科长时期的警衔证书，找到了这两个警察说：“你们欺压无辜的老百姓，侮辱孤儿寡女，如果继续这样胡作非为我就用这个东西（指自己警衔证书）换你们两个的狗头。这两个警察深知暴乐敢做敢当的刚毅性格，今天自己遇到了暴乐的严厉指责特别害怕，当晚逃回离巴彦沙那数十里的胡乐苏图宝楞村，再没敢回来胡闹。

暴乐自来讲义气，为人正派。对时局很关心。一九四五年八月，林东的和子章组建地方武装一自卫军，十月驻守查干沐沦河畔的珠拉沁一带，当时和子章要暴乐参加自卫军，暴乐推辞说：“如今我年迈已退出军政舞台多年，你组建

保护家乡人民生命财产的自卫军，这是件好事，我没有啥好的支援，库里有些粮食给你拿出点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这样暴乐支援自卫军五十石粮食、十几匹军马和车辆等。不久林西的大地主韩天陶拉了一帮匪兵亲自来请暴乐，用花言巧语引诱暴乐攻打驻进林西的八路军。暴乐说：“八路军同国军打的很激烈不知谁胜谁败，胜者当朝败者要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能参与，听说八路军讲义气讲道理，为百姓办事，这就有胜利的希望，号召打八路恐怕不合适吧？”韩天陶看出暴乐不跟随他就走了。

暴乐，上不献媚，下不欺压，性格开朗，身材魁梧，从不闲待，更没有吃喝玩乐为荣的恶习，经常同佣人们一道做家务劳动，也与佣人同餐，他深通蒙汉两种语言，蒙文比较深。晚年时期他同自家种菜的佣人喀喇沁籍的特木热那里学到了一般的医药方面的知识。暴乐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医药知识。也掌握了部分当地草药的用法。暴乐用药治疗从不要钱物等报酬，无论是蒙族还是汉族，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都是同样对待。按他本人的话来说：年轻时期当兵杀生为荣，如今年迈一定多做些行善之事。据当地人回忆，有一次住在巴彦敖包村的农民贺民的妻子，因难产生命十分危急的关头，暴乐得知后飞马前去给病人灌了一粒自制的丸药，立即就生了，而且母女无一损伤，对此这位姓贺的汉族农民，给暴乐送来牛马等重礼。但暴乐“行善做好事，不能接受酬谢”为由最后还是拒绝了。对此这位农民感激万分。暴乐对穷苦百姓治病的例子很多，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流传在巴林草原上成为美谈。

暴乐没有专门的伺从人员,更没有家奴,只有六户农民(其中包括喀喇沁旗的菜农特木热一家)给他种三七地。每到农忙季节暴乐亲自带领全家老小参加农务,特别是秋收季节暴乐同这些种地农户同吃同干参加秋收。

暴乐爱讲述故事,特别对自己的战斗经过讲起来特别有趣,讲哪个伤疤是在哪个战斗中受的伤,哪个战斗中如何摆脱了困境等。

一九四六年春的一个大风天,暴乐带领全家老小垛牛粪,营子里边来二十多个人给暴乐家帮助垛牛粪,中午时大家正吃着荞面条,忽然有一个叫萨嘎拉的人从外面进来说,外边有两个人说找暴乐有要紧事商谈。暴乐放下碗筷子立即到外边去,当他走到大门外时有两个身穿灰色军衣全副武装的陌生人,见有人出来就说,告诉暴乐出来给我们溜马。他们显然是不认识暴乐,暴乐说:“有人给你们溜马就是了,非找暴乐干什么?”说着扭身往回走。当暴乐走到大门口时,那两个人突然向他开了枪,子弹没有打中暴乐,打在门框上。暴乐跑进院内上炮台一看,已经被许多穿灰色军装的人包围了,便让自己的干儿子嘎拉丹上东南炮台,他同自己的亲儿子拉西道尔吉带上一支长枪上了西北炮台,然后又把儿子撵下来,自己向西北山包上支着挺机枪的射手开了枪,打死了射手。双方打了一阵后,枪声稍停,暴乐探头往墙外观望时,从炮台下面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入暴乐的头部,暴乐当场死去,年仅六十岁。

事后,巴彦沙那的老乡们,得知是林西五十家子的恶霸地主崔金宝,为了个人得失的目的,向驻在五十家子的八路

军热北分区进驻林西后刚刚改编过来的土匪武装盛世恩部挑拨说:“暴乐为了打五十家子的八路军正在各地招兵买马。”盛部信以为真,立即让崔金宝带路进军巴彦沙那攻打暴乐而发生的战斗。

暴乐死后,巴彦沙那的乡亲们制做了蒙古族传统葬具坐棺,把暴乐安葬在附近风水优美的景斯图山脚下的阳坡。五十家子的崔金宝也谋得了暴乐的牛马羊及家里的细致物品发了横财,成了一鸣惊人的大地主。崔金宝由于阴险毒辣欺压百姓无恶不做,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当地群众镇压。

编撰此文时根据宝音贺希格同志撰写的蒙文材料“暴乐统领”一文和参阅了热河省档案馆保存的“热北建军问题”以及《巴林右旗志》等历史档案,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拜访了几十名知情人,在此一并致谢。

蒙古族才女桃崇阿

穆松

桃崇阿，一八八六年出生于巴林右翼旗历史上著名将军王——第八代札萨克郡王巴图后裔那顺孟和毛根达(清朝官吏名称)家中。

桃崇阿出生在这样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中，所以巴林各界都习贯的称她为桃儿努努(贵族小姐的尊称)。

桃崇阿，自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初，活跃在巴林右翼旗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上的一代著名的巴林女性。

桃崇阿，自幼时就很聪颖好学。她刚满七岁就随其父亲那顺孟和学蒙、满两种文字，又和其兄和伯父学藏文，后来又上了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衙门所办的“笔车赤”学校，读了汉语文。桃崇阿经刻苦学习，各门课程都很出色，受到了家长和老师们称赞。

桃崇阿的不断努力和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蒙汉藏满等四种语言和文字，同时也拜民间艺人为师，学会了画山水和鸟，画各种蒙古族传统的图案，也学会了竹笔和毛笔字以及各种美术字。

桃崇阿，喜爱素装，自生活在百姓之中，喜欢同牧民交

朋友。

桃阿崇在青年时期已读了《蒙古秘史》“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故事的海洋”“三国演义”“成吉思汗的箴言”等蒙古古典文学和其它一些历史书籍。也熟读了“蒙药验方”和“蒙药四部医典”等重要医药书籍。桃崇阿对读过的古典诗歌和药典的歌诀等很认真，有的都能背诵。

桃阿崇把教书、作画，行医传播文化艺术知识和救死扶伤作为一生中的最大的乐趣。这种选择对桃崇阿来说还是有原因的，她学到文化和艺术知识刚走上社会的年轻时代就目睹了清廷的日益没落，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种种坎坷以及遭到的不幸、封建制度的裂痕，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清廷在蒙古地区实行“北不断亲”的笼络政策和推行喇嘛教毒害，愚弄和欺骗愚昧无知的蒙古族人民，特别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巴林一带的刘桂堂、汤玉麟的匪部抢夺烧杀无恶不做的野蛮行为，伪满时期日伪军的铁蹄糟踏了辽阔的蒙古草原……广大的蒙古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情景。这一切对桃崇阿的影响很深，她对这个黑暗的社会更加不满。桃崇阿目睹的列强侵入，国是日非，清廷的腐败，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欺压百姓，人民安无宁日的情景，觉得中国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受欺负，受苦受难是因为文化太落后，人民没有觉醒，所以愚昧无知的蒙古族人民信仰喇嘛教，一切希望寄托在天神的保佑和菩萨的仁慈上。看到这一切的有志者桃崇阿，想到了兴办教育启发巴林的民智，并下定了决心。

桃崇阿本人不仅出生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中，而长大

成人后也因旧社会门当户对的蒙古族婚姻观念被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官吏之家。她的丈夫是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衙门的管旗章京金齐宪。所以桃崇阿不仅是一个贵族努努而且还是名符其实的官太太。但是她的中心已经产生了兴文办校、启发愚民的强烈愿望之后依然抛弃了这一切荣华富贵的生活。桃崇阿同她的丈夫金齐宪商量后,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金齐宪,自己从家中摆脱出来到巴林右翼旗旗立学校任教。旗立学校的前身是早在一九一〇年创办的“普励学校”也是桃崇阿幼年时期曾读书的母校——“笔车赤”学校。该校在一九二二年巴林右翼旗遭到军阀和土匪的抢夺以及连年受灾等原因被迫停办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春。

桃崇阿自摆脱家务之后到旗札萨克衙门找到王府的笔车赤(文书、秘书)沙格德尔札布等有才学的人,并同他们一起求见了旗札萨克王扎噶尔道尔吉,提出了兴办教育启发旗民请求。札萨克王扎噶尔当即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任命沙格德尔札布为校长,桃崇阿为教师,命名校为“巴林右翼旗旗立学校”。

学校的架子搭成之后,由于刚起步具体困难很多,如:教材自己编,招生也到各家各户去做细致的工作,给牧民群众讲明读书的好处,学校没有经费,所以也要发动各方面力量和官户捐款。通过桃崇阿和她的同事们的努力学校办成了。学校的课程以蒙汉文和算数为主还教绘画、校歌,也结合其它游戏和体育活动。贫苦家庭的孩子的食宿、笔墨、纸张等学习费用由学校设法调解,特别是桃崇阿老师的影响下该校的二百余名学生中七十多个女学生,这在当时的文

化落后、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旧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桃崇阿老师任教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住在巴林右翼旗北部比较偏僻的山村巴彦锡那艾勒的暴乐梅林要办私塾,对此他多方协商后聘请了桃崇阿老师任教。桃老师到了暴乐梅林家中,办起了梅林家的私塾,招了三十余名山村的孩子。桃老师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以及不同成绩,编了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班级,她的上课内容比较丰富,不仅教蒙古语文和汉语文,还结合美术字,如蒙古传统的竹笔字、毛笔字等各种书法。教算数的时候还结合珠算和记帐技巧等。她还给学生教体育和演唱等课程。最近她的学生离休干部额尔德木同志等回忆桃老师画的一棵大树,树上一只喜鹊在喳喳叫,还有一只也往树上落下的情景的一幅画,如果你细致看的话那就是一句诗歌或者是一句箴言、对联。这充分说明桃崇阿的艺术创作和文学才能,她还让一些女学生从家里带来一些针线活计,如:蒙古靴子的靴帮,靴底等部位和其它一些针线活计,教她们怎么样制做,教她们绣花艺术,据知情人额尔德木老人等回忆当时有一个女学生刺绣方面特别用功学的比其他学生快,于是,桃崇阿老师很高兴并赞扬这个孩子能文能武有出息。并把自己的心爱物较高级的皮坎肩赏给了这个女学生。

桃崇阿老师的学生现在遍布整个内蒙古地区,其中有的学生相当闻名。如有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画家,社会有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社会上受人们尊敬的人民教师,及其它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这与桃崇阿老师的精心培养

和针对学生的不同爱好有目标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桃崇阿的文学修养和教学技巧不仅受到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敬佩,而且至今还在社会流传着佳话。

桃崇阿这个女性不仅有文学修养和教学上有卓越的成就,还擅长做画、刺绣、剪纸。特别是桃崇阿的做画刺绣有超人的艺术才能,她用一笔就能画出较复杂的图案。也能绣上有五片绿叶,下有凤凰起舞的妙图。她吸收了蒙古族传统的刺绣图案及其作品的精华,所以她的遗作中发现蒙古民族民间气息比较浓厚的刺绣图案占主要地位。现已找到了桃崇阿的遗作三百余件,这些图案大部分系蒙古民族民间流传的各种风格的图案和活灵活现的蒙古族风格的刺绣作品。如:蒙古族古典文学书籍的封面图案,蒙古族古老的烟荷包以及蒙古族服饰传统刺绣图案,蒙古靴子各种部位的不同云纹、蝶纹等图案,工艺十分精巧,各种枕面的刺绣、被面刺绣图案等。她的这些绘制绣成的花草鸟兽、龙凤蝴蝶色泽鲜明,栩栩如生。据知情人回忆:桃崇阿在二十年代曾绣过特大的佛像,约有两丈多高,别具一格,远近闻名。该佛像到解放后仍悬挂在巴林右旗寺庙中的有名的八大庙之一古日古勒台庙会经殿正中央。一九三〇年班禅大师来巴林,桃崇阿自己绣制的“查干舒乎尔图汗”“那木苏来”等两个菩萨像,受到了班禅大师的称赞和寺庙僧人们的敬佩。

桃崇阿在绘画、剪纸、刺绣上大有名气,受到了巴林各界的高度赞扬。她描绘和刺绣的花草、树木皆取材于家乡巴林的山野、草原的美丽风景。如:巴林赛汗罕山,巴彦罕山,套白罕山,查干沐沦河的风景,是她的艺术取材的源泉。

她也曾刺绣过这些山水风景为题材的大幅风景图和各式各样的风景画。但是她的这些作品同她的七十余篇诗稿、几十张剪纸艺术作品,在一九四八年的牧改中被“清算”,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的非常时期被当作“四旧”和“毒草”烧毁了。现已幸存的三百余件图案和几件刺绣作品,是从桃崇阿的亲属达木仁旺吉乐家中找到的,所以特附几张供欣赏。

桃崇阿不仅教书、绘画、刺绣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但她晚年时还研究过蒙医蒙药。特别是对蒙医“四部医典”比较精通。她在那时曾说明过:自己的医学研究只不过是晚年时期的一种爱好。桃崇阿到了晚年常到达尔罕山、巴彦锡那山、阿布德仁台山、查干宝力格和巴彦套白山等地采草药几百种并配成药进行治疗,有时还自带药到邻近的敖特尔(即放牧出场点)和邻近的村庄去行医。她行医一般都是免费,特别对贫穷家庭不收分文。

解放初一个时期,根据桃崇阿的医药造就,人民政府聘请她到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办的全旗第一期蒙医蒙药培训班任教。一九四八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二岁。

撰写本文时采访了桃崇阿的学生长寿同志和她的亲属额尔德木、达木仁旺吉勒等,也参阅了达木林巴斯尔同志蒙文撰写的《桃崇阿》一文。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

整理：那·宝音贺希格

译文：白占柱

一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是巴林右旗清代四大寺庙之一阿贵庙（即阐化寺）的葛根（活佛）。位于舞乐极山西坡洞窟之前的阿贵庙，分西、中、东三个大院，各院转世一名葛根，嘎拉僧葛根因住中庙院而以“敦达葛根”（中活佛）远近闻名。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于一九一三年（即癸丑年）二月四日，出生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哈日根台苏木巴彦琥硕一位牧民琶哈巴拉希家中。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系琶哈巴拉希长子，乳名乌其拉图，兄弟五人，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藏名叫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法号叫锡热图葛根。

二

据历史记载，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的第一世是“巴林锡热图固什”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

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是巴林郡王的臣民巴拜次子，其母宝茹很信奉佛教。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出生于巴林右翼旗查干诺尔。格鲁坚赞自幼性情善良，聪慧机敏，从小在公主之侄罗达所属一老喇嘛身边长大。一七一六年，十三岁的格鲁坚赞出家当喇嘛，受比丘戒。此后，一七二〇年，拜巴林右翼旗圆会寺（俗称西大庙）乌云达赖喇嘛为师。一七二二年乌云达赖喇嘛身患疾瘟，格鲁坚赞守护送终后，自己也染上疾瘟。痊愈后继续潜心致力于佛教事业。

一七三〇年，内蒙古乌拉特旗绰尔济喇嘛去科尔沁返回时，将格鲁坚赞带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拜见了崇福寺（俗称小召）三世奈只托因，并在此学佛经两年。

一七三二年，格鲁坚赞从归化城回到巴林右翼旗，于家乡舞乐极山洞窟而居，读经习典，并开始行医治病。他的持戒苦行为当地僧众树立了楷模。

桑利达郡王去会盟时，听说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以十三两银子雇用班斯拉嘎查、敖木汗等人，依山掘洞，将为王爷会盟万事大吉诵经祈愿之事，赏赐二十五两银子，称其为“珍善坐禅喇嘛”。

乾隆五年（1740年），格鲁坚赞前往西藏深造，次年至哲蚌寺，在此习经九年，获得“热绛巴”学位。此间，他先后谒见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0年）和六世班禅罗桑见丹意希（1738—1780年）。七世达赖为了给进藏学经的蒙古喇嘛创造方便条件，意欲在哲蚌寺修建蒙古喇嘛康村，授意格鲁坚赞应“修大福德”，为修建康村积极募化广为布施。格鲁坚赞欣然允诺。达赖遂赐予其“额尔顿、墨

尔根、绰尔济、宝贤法主”封号。格鲁坚赞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离藏返回巴林右旗时,途径安多,到郭隆寺(即佑宁寺)拜见了青海著名蒙古法僧松巴堪布·意希班觉。然后到归化城,又拜见了圣者奈只托因三世。

乾隆十五年(1750年),格鲁坚赞从西藏回到巴林右翼旗,奉旗札萨克琳沁郡王命,为巴林右翼旗第一任坐床喇嘛。不久,格鲁坚赞即为修建哲蚌寺蒙古喇嘛康村云游募化,走遍了漠南蒙古诸旗。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二次入藏,将募化所得的三千两银子献给达赖和哲蚌寺,受到七世达赖的嘉赏,赐予其“法服法冠”,并预示:“汝所祈愿教化诸生所在东方,应为东方之众生宏扬佛法,广施利益”。于是格鲁坚赞遵照达赖旨意,次年返回巴林。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其原来修法诵经之洞窟前建成寺庙,后被理藩院赐名为“阐化寺”(俗称阿贵庙)。格鲁坚赞任阐化寺第一任法召。他于此修习经典,宏扬佛法,还利用更多的时间为草原牧民行医治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巴林右翼旗协理三等台吉拉喜彭斯克奉巴图郡王之命,亲临阐化寺,拜访格鲁坚赞,而后写出《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活佛传》一书。此书至今流传于世,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格鲁坚赞一生潜心于佛教,志在进取,先后两次入藏,以宗教为桥梁,沟通了巴林草原与雪山“圣地”的往来,促进了蒙藏间的文化交流,对巴林右翼旗蒙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

有关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前世们的传闻中:有一次,格鲁坚赞诵经时,哈日毛都一位猎人到格鲁坚赞的洞窟。

风,不一会,门突然被风吹开,格鲁坚赞忿然用袈裟捕捉了一个萨满教的护神偶像。他使用火钎敲打偶像头部时,进来一位满脸流血的巫师,叩头认错,求走了自己的偶像。此人乃跟格鲁坚赞有仇的黑龙江的巫师那木斯来,日落时分,当猎人求宿时,格鲁坚赞说:“住宿倒没什么,夜间可别睁眼。”猎人睡一觉醒来,忘了格鲁坚赞所言,睁眼一看,见有只大老虎躺在托拉嘎(锅撑子)左边。老猎人大为惊骇之余,倍增对格鲁坚赞的敬佩之情。这虽说是在牧民群众中流传下来的传说,但也表现了对格鲁坚赞的智慧和才华的夸耀。从此,远近的善男信女们更加信奉,推崇格鲁坚赞,有关他的神奇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在草原人民中间。

乾隆年间,巴林右翼旗第八代札萨克多罗郡王——巴图将军,奉皇上之命驻守乌里雅斯台时,清廷奸臣大学士何大人进谗于皇上。皇上遂即降旨于巴图将军:“七天之内从乌里雅斯台进京,违令以斩首论处。”将军巴图遵命离开乌里雅斯台,马不停蹄地入京,途经家乡巴林右翼旗时,到阐化寺拜见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祈愿时,格鲁坚赞用红绳系如意结于他右手说:“别担心!勇敢些!”从而将军巴图在京途中遇毒蛇而不中毒。到京后,参加皇家围猎,不仅遇虎而生擒之,献予皇上,并几百步射鹿,深得皇上赏识。然后

跟皇上借火点烟，皇上遂赐予他镶有二龙戏珠图案的火镰。将军巴图平安归来后，大兴土木，扩建阐化寺，赐封格鲁坚赞为呼毕勒干。

因阐化寺的日益扩大，庙会也随之增多。格鲁坚赞呼毕勒干上孟和召（拉萨之蒙语旧称），谒见达赖喇嘛：“请五身佛（即法、极、化、身性、不动金刚佛）到吾旗。”为此，达赖喇嘛把拉僧（喇嘛教的学部）座位下首的秃喇嘛给他带去。归途中，几次失而复得这位秃喇嘛，终于请到了巴林右翼旗。

在格鲁坚赞第九世呼毕勒干时，阿贵庙丢失一峰母骆驼，几年无音讯。后来听说在阿鲁科尔沁旗阿拉坦锡热图葛根的驼群中，已繁殖成五峰，遂派人前往求回。阿拉坦锡热图葛根归还骆驼的同时，送给呼毕勒干一件礼物。当呼毕勒干打开包裹，见是一尊泥佛，随即扔到庙院外，原来这是一种诅咒。因此，呼毕勒干的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均转世为瘸子的传闻。

当红帽子（金丹教事件）横行，逼近巴林边界时，旗札萨克郡王亲自上阿贵庙，拜见呼毕勒干，说予此事。呼毕勒干听了后说：“好好察看下巴彦汉山，有没有受伤之物？”王爷立即派人察看巴彦汉山，回报呼毕勒干：“巴彦汉山主峰上独棵松的西枝已劈裂。”于是呼毕勒干亲自上山为劈裂处扎缠，救治了几乎枯萎的松枝。后来，当红帽子土匪赶到西拉沐沦河边时，看成少数巴林兵马为大部人马，草木皆兵，望而生畏而退回。这些毕竟有些神化了的传说，但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的前世们，热爱故土，

造益于人民的博大情怀。

四

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之十二世呼毕勒干圆寂后，商卓特巴（喇嘛职位、总揽庙仓之权）、绥本（活佛的主管侍从）等人藏，由拉巴哈葛根占卦。葛根告诉他们：“你们的呼毕勒干已在西乌珠穆沁旗转世。”商卓特巴和绥本立即前往西乌珠穆沁旗寻认呼毕勒干。当他们找到哈日根台苏木一村子时，有一个六七岁的黑男孩迎过来说：“你们要找的喇嘛就在后村子，我是巴林阿利曼山的坐禅喇嘛。”到后村子时，一位胖男孩迎出来，让他们进屋。当商卓特巴和绥本等寒暄问安后，拿出鼻烟壶说明来意时，那胖男孩机智而谨慎地说：“这烟壶不是我的，我的在你们怀里。”果然在他们怀里有前呼毕勒干的用具，那男孩又说：“我们是贫寒人家，你们就在外边灶台上自己做饭吧。”喇嘛们按照他们的话，把自带的锅放到灶台上时，灶口不大不小正合适。所以他们确认他就是转世的呼毕勒干。

事情原来是这样，喇嘛们来那天早晨，那男孩求他奶奶掏一口灶，奶奶以为小孙子要玩，就给他掏了个碗口大小的灶，可小孩不让，用手指头在外边划圈，让他奶奶有尺寸地掏好以后说：“今天我家来客人。”

这男孩叫乌其拉图。就是后来的阿贵庙“敦达”葛根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就这样，一九一九年，七岁的十三世呼毕勒干被请到阿贵庙（阐化寺），改藏名为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在阿贵庙当锡热图喇嘛,习藏文。一九二八年去青海省塔尔寺习佛经典几年。

一九三〇年(庚午年)阴历九月,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从西乌珠穆沁旗来大板荟福寺(东大庙)传经时,本旗末代王爷扎噶尔,将义子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以转世第十三世呼毕勒干身世向班禅作了介绍,班禅将其封为葛根。

众所周知,嘎拉僧葛根在宗教界有着较高的地位,且资财万贯,但他秉性耿直,谦恭随和。在医学方面颇有造诣,行医治病,普渡众生。

嘎拉僧葛根,不仅为发展阿贵庙医学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本身还是位出色的喇嘛大夫。尤其以擅治疯癫病症而出名,他以一百天的受戒治疗,治愈了打死疯狼后精神失常几乎疯了的哈日毛都著名摔跤手丁克尔扎布,享名旗内外。

伪满洲国初年,兴安西分省统计宗教时,将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定为巴林宗教创始人,选他为兴安西分省佛教协会理事,选阿贵庙东庙院喇嘛阿旺东日布扎木苏为佛教协会巴林右翼旗分会理事。

一九三三年,嘎拉僧葛根由青海塔尔寺回到巴林右翼旗,比较学习蒙藏医药学。同年,伪满洲国成立宗教协会,嘎拉僧葛根被选为协会会员,伪满洲国宗教协会兴安西分省分会负责人,巴林右翼旗协和会会员,喇嘛教务所副所长。掌握全旗教务权。他为了尽职尽责地行使职权,培养有识之士,曾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年,分别派古日古勒

台庙德木其喇嘛确吉敖斯尔和西大庙德木其喇嘛高力布尼玛赴日本吉安院留学,并给予大力资助。

一九四一年,嘎拉僧葛根在旗文教股长蒙和舞乐极、旗喇嘛教务分所所长阿旺东日布扎木苏、仁钦道尔吉(后任喇嘛学校教师)和确吉敖斯尔等人协助下,在荟福寺成立“喇嘛学校”,给喇嘛教藏文和蒙文。共办学三期,每期三个月。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很多喇嘛,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成为人民教师、医生和革命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伪满洲国后期,嘎拉僧葛根意欲办一家喇嘛大夫诊疗所,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一九四六年末,巴林右翼旗“减租减息”时,听说嘎拉僧葛根为建立喇嘛大夫诊疗所,为民造益,不仅把所有的家产捐献,而且亲自到全旗各地募化,筹集资金的消息。虔诚的佛教徒们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施舍牲畜银钱。这样,较短时间内便筹集七百只羊,八十四匹马,七十多头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在大板西大庙绰尔济喇嘛确丹扎布和拉龙家,巴林右翼旗第一个医疗机构——“喇嘛大夫诊疗所”成立。嘎拉僧葛根如愿以偿。

一九四九年,该诊疗所与巴林右翼旗卫生院联合,成立了“巴林右翼旗中心联合诊疗所”。于一九五二年,嘎拉僧葛根参加昭乌达盟医疗技术考核,成绩合格,并获《医疗证书》。同年六月,巴林右翼旗人委发给嘎拉僧葛根《行医证》。

五

一九五八年,旗卫生院从“巴林右旗中心联合诊疗所”分离出去时,带走了喇嘛大夫诊疗所几年苦心经营,筹措起来的全部财产。嘎拉僧葛根等喇嘛大夫们又筹集资产,重新起家,将把喇嘛大夫诊疗所办成蒙医院而积极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嘎拉僧葛根自幼学治疯癫病,后来开始用药行医。他治病不看患者富贫贵贱,一视同仁,对症下药。并只能收回本钱,从不讨价还价,鱼肉百姓。所以,牧民群众极其崇拜,患者都愿意找他看病治病。

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在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指导下,以身作则,协助党和政府积极主持了“巴林右翼旗中心联合诊疗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亲自深入到全旗各地,动员喇嘛大夫们走联合之路的结果,在全旗建立了七个蒙医联合诊疗所。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昭乌达盟对各旗县中蒙医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业务培训。嘎拉僧葛根在巴林右旗主办了七期蒙医进修训练班,为培养蒙医大夫,提高医疗技术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建国三十多年来,嘎拉僧葛根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不仅是位注重年轻医生学习掌握民族文化、新知识和现代医疗技术的医生,还是位爱国、爱民族、致力维新、改革的进步思想者。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亲自主持了“喇嘛大夫诊疗所”。一九六二年,改“喇嘛大夫诊疗所”为“巴林右旗蒙医研究所”,嘎拉僧葛根任研

究所所长至一九六八年。

在“文革”期间,嘎拉僧葛根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从没中断过行医治病。

一九七三年,嘎拉僧葛根恢复工作,被安排到巴彦尔灯公社医院当医生。此医院虽然在偏僻的沙土窝,但是从乌珠穆沁、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巴林左右、赤峰和呼和浩特等地来治病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一九七九年给他落实政策,聘任为巴林右旗蒙医研究所主治医师。在此三年中,他在身患严重“高血压脑病”情况下,把自己积累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传授给蒙医药界。并于一九八〇年在昭乌达盟医学分会出版的《昭乌达医学》刊物上登载了《精神病疗效观察》一文,为治疗精神病提供了宝贵的临床实践经验。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在治疗精神病研讨会上,嘎拉僧葛根荣获昭乌达盟医学分会二等奖励。在出版《蒙医验方》和《秘方》时,他提供了《精神病治疗秘方》。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晋升为蒙医主治医师。一九八〇年四月九日,嘎拉僧葛根通过昭乌达盟卫生局统一考试,再次晋升为蒙医主治医师。

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年时间中,嘎葛根连续被选为昭乌达盟医学分会副理事长,巴林右旗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

一九四六年春,当杀人不眨眼、两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土匪头子韩桑杰(一九五三年被镇压)带几个随从,来到阿贵庙问嘎拉僧葛根:“我应该跟八路军,还是反对八路军?”

葛根规劝他：“你不应该跟共产党、八路军作对。”这苦口良言虽然没能制止住韩桑杰这刽子手的反革命行为，但对他的随从们却起了较大的影响，大部分人都离匪回乡。

一九四七年春节，在洪格尔庙围歼韩桑杰等大部分土匪的蒙汉联军骑兵四师的指战员，来阿贵庙休整几天出发时，嘎拉僧葛根带领徒弟们敲锣打鼓地欢送部队，并祝愿：“痛歼敌匪，凯旋而归！”

一九八六年六月七日凌晨零点二十五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佛教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会员、巴林右旗第一届、二届、三届、五届、七届、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昭乌达盟历届政协委员、常委，巴林右旗政协首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巴林右旗蒙医主治医师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因高血压脑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大板病故，享年六十九岁。当天下午四点钟，在巴林右旗火葬场礼堂举行了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的追悼会。当时，阴云密布，细雨绵绵，但来参加追悼会的有四百多人。在葛根遗像前，摆放着他生前友好永松葛根、丁克尔葛根及其他朋友、徒弟等赠送的花圈，中国佛教协会及个人发来了唁电，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和发来的唁电。

巴林右旗政协所致的悼词中说道：“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的不幸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年一起工作，并十分信赖的朋友，使我们蒙医事业失去了中坚力量，也是佛教徒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遵照嘎拉僧葛根“我死后，把骨灰洒向巴林大草原”的遗愿。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七点半，在宝日勿苏

飞播种草机场，举行了洒骨灰仪式，洒灰小组成员说：“今天，我们遵照普日来扎木苏葛根之遗言，将他的骨灰洒向广阔富饶的巴林大草原。愿象巴林草原的花草树木一样万古永存！”

骨灰由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之老弟曹德宝及其女儿萨仁格日乐坐飞机，从萨日那吐山顶向北洒到赛恩章图开阔地带。

附录：

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内蒙古图书馆所藏《锡热图固希格鲁坚赞赛因朝克图活佛传》及《阐化寺来历》等有关书籍。并采访了原喇嘛大夫诊疗所书记七十八岁的赛因朝克图，信奉葛根的巴彦尔灯牧民，巴林右旗政协委员六十六岁的丹巴斯尔，还有在葛根的资助下赴日本留过学的七十三岁的高力布尼玛以及葛根之兄弟豪高力格、曹德宝等。

察隆阿

阿其图

察隆阿,汉名叫边振生、原籍阜新人、男、蒙古族、一九〇四年出生在贫牧家庭,因当时的生活处境困难,幼时随父挑筐卧篓由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迁到阜新定居。全家务农赖以糊口,生活吃苦耐劳。以后在一个贵族台吉家当仆从,他珍惜光阴,自幼好学,利用劳作之间隙勤奋自学,苦练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深受邻居和相识者的好评。

这个时候在奉天(沈阳)开始筹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从各处招收蒙族青年,当时贵族台吉认定察有培养前途,保送到该校。在校读书四年,学习成绩优秀,与哈丰阿(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当年二十八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后,察立即返回故乡。时局紊乱之际,排除万难,在当地村中为了提倡民族教育,普及青少年文化知识,亲身组织当地青少年进行义务教学工作。

一九三四年(伪大同三年)察听说在开鲁要建立兴安西分省公署的消息后,为了谋求职业,他奔到开鲁,后被录用

到省公署当属官,委任三等七级,原任总务股长。

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由省调往巴林右翼旗公署任总务科长,一九三八年兼代旗长职务半年,并兼任大板上畜产学校校长,培养了不少青年技术人材。在任期间,生活朴素,谦恭待人,不谋私利(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特别注重发展教育事业,提倡改革喇嘛教,主张建立喇嘛学校,从喇嘛教徒中选拔好青年入学,改造他们的世界观。重点扩充了大板上公立国民优级小学,亲手调来蒙和舞乐极同志(原东北蒙旗师范学生),任该校校长,开始发展蒙文、蒙语,学校制度逐步得到改善,学校与家长之间,开始来往,家长们在蒙老师的耐心劝导下,打消了平常疼孩子不愿送外地去学习的旧传统习惯。

察主张发展大板街里的个体工商业,沟通城乡贸易,开设了牲畜、粮食交易市场。察一生中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饮酒,经常深入下层到大板村公所召集大板街里烟民开会,讲解鸦片对中国人的害处,劝诫烟民对忌烟的好处,曾向全旗发出过禁烟令。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由巴林右翼旗调回兴安省任秘书官,荐任七等九级(伪满官吏录记载)。在此期间与省文教科长布和贺什格(汉名梁粹轩清华大学生,奈曼旗人)协同在布的住宅院内创办了蒙文学会当名誉顾问。提倡振兴蒙文、蒙语、文字改革(新蒙文),设立石印印刷,利用业余时间亲自组织青年职工以及社会青年进行业余义务教学,印发《青旗》蒙译叫胡河陶嘎一书和翻译《成吉思汗传》、各种论文及蒙文杂志刊物,着重普及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地向

社会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撤销伪新京(现长春)兴安局,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立兴安总省公署,察担任秘书长,荐任三等(伪满官吏录记载),在此期间扩建了兴安师道学校培训了很多师资。

一九四三年(伪康德十年)任伪兴安西省公署实业厅理官荐任三等勋七位(伪满官吏录记载)。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解放,在王爷庙以博彦满都、哈丰阿为首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紧接着召开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东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担任总编室翻译工作,始终站到中共代表乌兰夫一边努力工作。

一九四六年随同昭乌达省省长萨嘎拉扎布来昭盟任巴林右翼旗第一任旗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领导减租减息、土改工作。首先在东大庙召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察在会上主动地向代表们,将在日伪时期在右旗当过两年伪职员的经过,作了自我交待要求大会审查,一致通过表示没有意见,从而轻装上阵,参加土改,亲身领导农牧民群众,始终站到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建立了三级政权。

当时右旗东西部地区,以乌尔他、韩桑杰为首的地方武装叛乱,这时察利用当地的上层活佛喇嘛向他们作了几次规劝工作,并通过叛变家属动员他们亲手写规劝信,叛匪丁合尔扎布及另一股匪徒额斯尔门德等共五十五名叛匪,向我军三十四团缴械投诚,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面。并在全旗开展了发展牧业的大生产运动,建立了大众合作社(商店),施行多种经营。

特别在土改工作中,深入下级层联系群众,同农牧民同甘共患难,有时徒步跋涉,有时骑马、骆驼下乡,不辞劳苦地完成土改工作,稳定了当时的民心,右旗人民给了他高度的评价。

一九四七年一月,亲身代表右旗各族人民带领乌云格日勒(妇女代表)、他木(牧民代表)及各界的代表那顺孟和道荣嘎(青年代表)、秘书恩和巴图等人赴林西迎接乌兰夫(云泽),表示坚决拥护中共领导。时隔不久,乌兰夫去王爷庙途经大板,暂住一夜,在乌兰夫主席接见的屋子里第二次见到乌兰夫,察用很流利的汉话向乌兰夫主席汇报说<摘自《内蒙古自治报》第七十六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五内蒙古档案馆存>。作者鲁获,是当年跟随乌兰夫同志途经大板去王爷庙的记者。摘录原报导如下:

巴林右翼旗蒙汉人民共计六万,蒙、汉各占一半,自解放以后建立了三级政权,五个努图克,二个汉区(当时以白音布统、乌兰套海地区为主)由旗汉民科,领导汉民。过去不能解决的蒙、汉人民纠纷,今天在中共的政策上解决了。察很实际的列举了些比喻:“过去汉人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经商,再即是开垦,经商汉人往往欺骗蒙古人,自治政府开办了合作社,教育商人这种现象已渐绝迹。

大板过去文化是比较落后,自民主政权建立后,创办了一个实业学校,招收了七十余名知识青年,学习印刷、缝纫、皮革、木工、铁工等,有利于牧业发展的课程,另建七个蒙古小学,入校儿童三百多人。

其次汇报了办合作社的情况。

在欢迎宴会席上,乌兰夫主席笑着为内蒙人民革命胜利干杯之后,接着开了干部会议,乌兰夫主席在会上有力地结语是:团结各个革命阶层及全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领导下,完成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

一九四八年秋后,察调回乌兰浩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担任翻译工作,一九五〇年东部。区党委和政府翻译搬迁张家口,察任政府翻译处处长。

一九五一年政府办公厅一直担任翻译工作,察精通蒙、满、汉、日、俄文。

一九五八年,察当年五十四岁,因患脑炎,病故于呼和浩特市,他生前对自己的家属嘱咐: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到第二个故乡(巴林),埋葬在凤凰山南(即现在都希苏木葛根少冷)他的家属和政府按照他的遗嘱落葬。

察隆阿同志的一生是辛勤劳动的一生,他只活了五十四岁,从事翻译工作,在这二十多年里察隆阿同志翻译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和文章。他到了晚年时间抓得更紧了。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二年却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和时间拼搏着。

察隆阿同志,这种刻苦学习,珍惜时间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郭俊卿参军记

王兴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周年前夕的1950年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听取英雄们发言,并向英雄们询问模范事迹。当朱总来到郭俊卿身边时,有人介绍说,郭俊卿女扮男装同男同志并肩战斗立了许多战功,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古时候有个花木兰,我们部队也出了个女英雄。”此后,被誉为现代花木兰的全国特级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名字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所敬慕。那么郭俊卿的童年生活及其参军情况是怎样的呢?最近笔者借工作之便,来到朝阳湾村她的胞弟郭荣家采访,笔记如下。

郭俊卿民国十八年(1929)出生于凌源县北甸村。父亲名叫郭连成,母亲宫彩霞,世代务农。母亲生下她们兄弟姐妹四人由于贫病交加,夭亡二人,仅剩下俊卿与其弟郭荣。其时,军阀战争,连年灾荒,官府逼勒,匪盗四起,贫苦百姓生活无着。在俊卿四岁时,父亲母亲为了择条生路,带着她和弟弟逃荒到巴林左翼旗草帽山,投奔其叔郭连池。在草帽山落脚后,父亲靠给地主扛活打短工养家老小糊口度日,

受尽苦难与压迫的父母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决心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也要供儿女念书。就这样俊卿在七八岁时在本村念了两冬天私塾。她聪颖好学,记忆力很强,很快能识会背《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启蒙课本。先生喜爱她,她的俊卿的名字就是先生给起的。但是,旧社会天空断不了乌云,穷人断不了灾难。俊卿八岁这年冬天,父亲上山打柴累伤冻坏,又无钱看医买药,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母子三人只好乞讨为生。那时候,日寇铁蹄残酷践踏巴林草原,对草原人民疯狂掠夺,民生凋敝,讨要无着。在沿村乞讨时。母亲恐怕女孩讨要受人欺辱,又害怕被人拉去当童养媳,便给女儿剃了光头,换了男装,当儿子拉扯。就是这样,也不得过活,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俊卿 11 岁时全家离开草帽山投奔林西县的一个远方叔家。

在林西裕丰粮栈谋事的其叔郭子玉收留了她们母女三人。此后,母亲在街里为人缝破补烂,俊卿则在街上开烧饼卖。那时日伪横行,连年出荷,一天卖不了多少钱,有时遇上日本宪兵、特务、满洲国警备军不但买烧饼不给钱,还连烧饼篮子都抢去。为了生存俊卿忍辱受难,沿街叫卖更不敢暴露女性身份。因此街坊邻居都不知她是女子。

1945 年“八·一五”光复,抗战胜利,日伪垮台。苏联红军在林西县驻防的那一段时间,俊卿看见红军里边有女兵,便很羡慕,借卖烧饼之机主动接近她们。此后红军撤走,八路军开了进来。俊卿目睹了八路军爱民的许多感人事迹,便爱上了这支队伍。队伍里不要女兵,更好,郭俊卿女扮男装充当男兵报了名。1946 年秋,她把参军的意愿告诉母

亲,征得母亲同意后,便把母亲安置在白塔子胡仁套海村舅家(今巴林右旗朝阳乡朝阳湾村),把弟弟郭荣安排在林西县一家木匠铺学徒,于这年冬天阴历十月初八,便参加了热辽纵队 80 旅 68 团,在团部当通讯员。

俊卿入伍以后,仅在林西县呆三天就随部队出发了,打听说先林东而白音布统随后南下了。可是一去四年没有音讯。母亲惦念女儿,差不多每天都朝南望,望得脖子酸,流干了眼泪。四年后的腊月天气里,一个英俊的女兵终于站在她的面前:比参军时长高了,体格很健壮;不是男装而是女妆;军装的前胸戴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奖章和许多枚功勋章纪念章——时间是 1951 年 2 月 15 日,阴历是腊月二十八。

郭俊卿回来探家了,看望母亲弟弟和亲人了,护送她来的还有一个机枪班,两个通讯员一名记者。乡亲们热爱自己的英雄,附近村落的人们主动组织秧歌队给俊卿拜年。当地政府照顾英雄的母亲,给她戴上光荣花,为她建起三间房一处院。

郭俊卿探亲手上并没有带回什么礼品,唯捧回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和热爱亲人热爱家乡的眷眷之心。从腊月二十八日到来年正月初二离家,仅住了四天就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是在四天时间里,她还参加了村里区里许多座谈会,鼓励乡亲们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郭俊卿探家虽然时间短促,但是现代花木兰形象和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却永远留在家乡人们的心中。

据郭荣介绍,郭俊卿自幼患有妇女病,在部队披露女性身份后,于苏联治愈回国,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三年,分配到地方工作后,于1954年1962年曾两次回朝阳湾村探家。

陶 格 陶

王兴贵

陶格陶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巴林敖日盖河畔查干勿苏艾勒一个牧民家中,因为他姓和力特(古老蒙古克烈部)所以也叫和·陶格陶。

陶格陶童年在敖日盖王府学塾读书。稍长考入开鲁伪兴安西省省立国民高等学校。“八·一五”光复以后,虽然日伪势力土崩瓦解,但内蒙古地区仍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统一与分裂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陶格陶毅然选择了革命道路。一九四六年三月,赴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以旺盛的民族解放热情,坚强的革命斗志和拥护党的政策,拥护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鲜明观点,获得院领导的赞许和同志们的称道。在参与赤峰地区的社会活动时,他多次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了他,使他增长了才干。

陶格陶在校学习期间,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四月三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东西蒙统一的“承德会议”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此后各盟都成立分会。领导

内蒙古革命运动。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陶格陶作为自治学院第一批调出的学员之一,参加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组织的群众工作队,赴喀喇沁右旗喀喇沁中旗开辟工作。他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放下背包即深入到群众中去。他们宣传“四·三”会议精神,发展自治运动联合会会员,动手组建旗和苏木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在他工作的苏木,政策贯彻得彻底,运动开展得稳妥,深受当地群众的称赞。

当年六七月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欲占领赤峰,党为了加强武装力量,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成立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陶格陶被调任武工队队长。他坚决听从组织分配,二话没说,带领全队指战员投入保卫胜利成果,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去。这个武工队在对敌战斗中不但狠狠打击了敌人,完成了各项任务,而且锻炼了一批青年干部。

九月,经中共冀热辽分局和冀热辽军区批准,在赤峰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武工队被编入纵队第一支队。当月,在火线上,陶格陶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三月,在第一支队教育整顿过程中,他被提升为支队一中队队长。此后,接受命令带领部队开赴西拉沐沦河两岸剿匪。在翁牛特旗东部沙漠的剿匪战斗中,他带领同志们深入群众,侦察匪情,指挥作战勇敢果断,给匪徒们以致命地打击。他自己也荣立大功一次,小功一次。

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卓索图盟领导机关第一支队同昭

乌达盟骑兵第四师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时,陶格陶被提升为十师三十三团团长的职务,时值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东北全境得到解放,原昭卓地区投靠国民党军的匪徒们在受到重创之后,回窜昭、锡、察盟广大地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陶格陶带领部队执行剿匪任务。此次战斗十分艰苦,又值严寒的冬季,但是他带领全团指战员依靠群众和我地方政权,摸索土匪的活动规律,准确判断情况,积极主动出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在作战中,因指挥果断,荣立小功一次。

一九四九年六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骑兵三十三团改编为骑兵第八团,陶格陶任第八团团长的职务。这一时期他按照上级要求组织部队指战员进行战术训练,期间参加修筑辽河大堤的工程建设和大兴安岭博克图林区的灭火工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五一年一月调任兴安军分区骑兵第七团团长的职务。一九五二年五月,在内蒙古军区所属骑兵部队整顿编为国防骑兵第五师时,陶格陶被任命为该师第十三团团长的职务。翌年又调任十四团团长的职务。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两次率领骑兵十四团部分指战员参加国庆受阅,受到阅兵指挥部的好评。一九五五年实行军衔制度,陶格陶被授予中校军衔。

一九五七年十四团归属昭乌达军分区。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他带领部队奉命赴青海执行任务。期间,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部队纪律,同藏族干部广交朋友

友,团结民族上层,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获得总参、总政的通令嘉奖,兰州军区授予部队题有“丰功伟绩”的奖旗,陶格陶本人荣立三等功一次。

一九六零年初升任锡林郭勒盟军分区副司令员,军衔晋为上校。一九六四年十月调任伊克昭盟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六年底响应中央军委号召,转业地方,在伊克昭盟卫生战线工作。陶格陶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为发展蒙医蒙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陶格陶同许多蒙冤受屈的革命领导干部一样,被关押揪斗,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他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积极投入工作中去。既使后来离职休养期间,仍关心党的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大计,关心党的民族工作,始终在想思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

(由内蒙古军区政委席达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

东 鲁 布

文 辑

东鲁布同志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翼旗索博日嘎的一个牧民家庭中。

一九四五年,他怀着民族解放的满腔热情参加了内蒙古昭乌达盟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东西蒙统一后该队伍改变为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后经整顿改造,改称冀察热辽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东鲁布同志在该师二十二团任副排长,参加了开鲁、天山、鲁北一带的多次战斗。一九四七年一月被选派到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学习期间,他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思想进步,毕业后是留校工作的少数蒙古族干部之一。该校改编为“朱德骑兵旅”,东鲁布同志任教导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员,参加了解放多伦、承德的外围战役和朝阳、义县地区的围城战役。一九四八年三月东鲁布同志调骑兵第五师通信科工作,同年四月随师深入到冀东滦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牵制和阻击敌军的战斗,平津战役中在顺义一线参加了围困北京的作战。平津战役结束后,随部队南下至河南,参加了驻马店、洛河地区和伏牛山区的

剿匪反霸斗争。一九五〇年随部队北归辽西。在东北军区骑兵五师十四团任通信股副股长,后历任军干校队长、校务处副处长、防空团通信营营长等职务。抗美援朝期间,曾开赴鸭绿江一线,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一九五五年东鲁布同志入解放军通信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在内蒙古军区骑兵五师任十四团参谋长。一九五八年奉命进入青海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由于他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对上层人物的统战政策,严明部队纪律,在战斗和工作中不顾个人安危,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荣立三等功一次。一九六一年被提升为副团长,同年二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一九六五年八月任骑兵第五师后勤部副部长。

十年动乱中,东鲁布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精神上 and 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坚持实事求是,同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东鲁布同志在部队工作中几十年如一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军事业务。他英勇顽强,勇敢作战,不畏艰难,在枪林弹雨中曾两次负伤流血,从内蒙古草原到东北、华北和中南战场、从东北平原到青海高原都留下他战斗的足迹,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

他注重培养思想作风,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坚韧不拔,

维护民族团结,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他为人公道正派,爱护和团结同志,平易近人。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谋私利,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二年离休后,他依然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关心国家改革,热情支持干休所的建设,保持了革命晚节。在他身患重病和爱人去世期间,精神上受到极大压力,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但他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告诫子女,“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有困难自己克服。”

东鲁布同志的一生,是立党为公,坚持党性,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努力工作光荣奉献的一生。

艾里学校和必车赤学斋

达木林巴斯尔

艾里学校

一、学校

17世纪中叶,札萨克衙门的扎赫日格其、梅林在各自家乡办学。之后,一些富裕的牧民也延请教师,教自己的孩子或亲友的孩子读书识字。或以自家为主,或以自然村落为一处。后人把这种教育形式称之为“艾里学校”。^①

据考证巴林右旗的“艾里学校”为本旗培养了不少人才。例如拉喜彭斯克^②、佰赫吉雅^③、乌力赫充嘎^④等人最初就是在巴林右翼旗的艾里学校读书学习的。据考证,从1860年到1945年的80多年间本旗先后共有90多人办过艾里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爱勒门图萨拉嘎其阿布日敏德,和硕阿他,哈波尔来拉喜、扎赫日格其哈丰阿,都格日扎布、布和套格套、梅林阿拉丰嘎、巴参道尔吉达瓦嘎日布喇

^① 据《蒙古族简史》记载艾里学校大约出现在13世纪末叶,1648年设置巴林右翼旗之前,巴林部是否有过艾里学校,就目前发现的史料看,尚无文字记载。

^② 拉喜彭斯克(约1775—?)巴林右翼旗人,三品台吉。他精通蒙、满、汉、三种语言文字。著有《水晶念珠》等书,在国内外史学界有名望。

^③ 佰赫吉雅(约1864—?)巴林右翼旗巴彦尔灯人。四品台吉。他精通蒙、满、汉、藏四种语言文字,在同治皇帝召见时,因其才识渊博而被赐以公衔。

^④ 乌力赫充嘎(1864—1916)巴林右翼旗查干沐沦人。曾任管旗章京,是普励学校的创办人,因其多谋善断,当时人称“乌青天”。

麻毕勒格图以及富裕牧民曾格嘎日布等。其中波尔来拉喜的曾祖父起,其家就开始办学,到1945年,已有200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些人中,有的是热衷于办学的官吏或富裕牧民,有的是直接从教的教师。他们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有书房和读书间,还有名贵的“文房四宝”。他们把自己的书房称为“查干乌日格”(意为“圣洁的书房”)。书房藏有数百册书籍。其中不乏经典著作,而且大部分是艾里学校学生的手抄本。现在流传下来的有《蒙古秘史》、《黄金史》、《巴林大黄金史》、《巴林小黄金史》、《成吉思汗箴训》、《世祖圣训》、《智慧之鉴》、《天文研究录》、《自治通鉴》、《五方元音》、《格斯尔传》、《唐五传》、《东汉故事》、《东辽故事》、《济公故事》、《施公案》等。

二、教师

艾里学校的教师,大部分从当地聘请,也有从外地聘请的。当时称老师为“巴嘎希”(有的书上写为“榜西”)。学生叫做“沙比”(有的书上写做“舍比”)。蒙古族人特别尊重老师,让孩子首次拜见巴嘎希时,要向巴嘎希敬酒、献哈达、行蒙古式叩首礼。蒙古族有一种规矩,即学生若有不尊重或污辱老师者,应罚一匹马,并向老师送全羊赔礼道歉。艾里学校的主办人,不仅供给巴嘎希一年的吃穿,到年末还要用一匹全鞍马或一头四岁牛来表示感谢。而学生也多以礼品报恩,夏季送各种奶食品,冬季则送一只羊。《夷俗记·尊师》中有“至学会书写结业时,再谢以白马一匹、白衣一件或布帛丝缎等物,随贫富而定”的记载。可见尊师在蒙古民族地区是一个传统习惯。蒙古族的家庭不仅愿意送孩子入艾

里学校读书,而且也希望自己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教师。当时的教师,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

艾里学校的教师,也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他们教学大多是被认真负责的。比较有名的有:

阿拉丰嘎(1851-1929),艾里学校教学时,经常在深夜领着学生观测星座,教授天文知识。

查干沐沦苏木胡斯宝冷艾里有一位叫福林台的老师,他少年时代去喀喇沁旗求学,学成回来在苏布敦庙教学。他学习的是汉文,教的也是汉文。后来学生家长要求教蒙文,他又求师学习蒙文,几年后回来教学生蒙汉文。他教的学生中,出了不少有才学的人。

色布兴格排散达从喀喇沁旗请来一位叫高兴嘎的老师,他先教过那顺孟克、那达木德、关其格、特古斯巴特尔等人。这位老师突然双目失明,不能教学。他去翁牛特旗找一名叫毛劳然吉木喇嘛,治好了眼睛。回来又教阿拉坦其其格、莫德格玛、日其格玛等五名女学生。

大板附近有位叫业兴敖日布的老师,他通晓蒙、满、汉三种语言文字,他用满文写的文章,当时深受满族文人学士的称道。他教过许多学生。他的书房收藏过几千册蒙古典籍,是当时巴林右翼旗重要的文房之一。他每到北京、奉天等地,都要买回一些贵重书籍,让学生再次手抄成多本收藏起来。

巴彦尔灯的波尔来拉喜老师,也精通蒙、满、汉三种语言文字。他的学生说,他讲读、分析文章透彻、深刻,要求严格。他的学生中出了不少有文才的人。

此外,还有在自己家里办学,不要报酬的哈斯巴特尔、都仍毕力格老师,还有自制粉笔,办学有方的温彦老师;还有为青壮年学文字过程中,用蒙文翻译“四书五经”并加注释,用其做为教材的阿木古冷老师。

三、教材

艾里学校对初学的学生,首先教蒙文字母和满文字母,学完字母并经过拼认阶段,再用蒙古传统教材、蒙满文对照教材和藏文蒙译教材教学。清朝统治时期,对蒙古族实行“蒙禁”,禁止学习和使用汉文。学校只准教授蒙文、满文。但巴林右翼旗有的艾里学校仍教汉文。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宣布彻底开放蒙禁,之后,巴林右翼旗的艾里学校普遍使用蒙汉文字对照的教材或汉文教材。

蒙古族传统教材:

《乌云图勒胡尔》

1.《乌云图勒胡尔》在巴林右翼旗蒙古族教学当中使用较早,也较普遍。艾里学校学完字母会拼能写后,接着就学《乌云图勒胡尔》。该书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同时又有教化作用,在当时的教材中占有重要地位。

2.《训蒙骈句》(摘自麻吉格扎布老师的手抄本)

《训蒙骈句》是巴林右翼旗的文人编纂的。该书用蒙文以对偶句的形式写成。内容多为名言警句。如“瑕玉能琢器,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益寿篇》

《益寿篇》是巴林右翼旗的学塾先生用蒙文编写的。健

身益寿是该书的主要内容。如“人生在世健身为贵,春季早睡晚起,违者伤肝,至夏伤寒,夏季晚睡早起违者伤胆肺,至夏咳嗽,春食少吃酸多吃甜,冬季益苦忌酸,酸多伤脾。早饭吃饱,晚饭吃少……”。

4、《尼莫根乌斯伯合》^①

尼莫根乌斯伯合有“浅薄”之意,汉文译为“浅易杂文”。这本书是巴林老学塾先生琶嘎巴扎布编写的书中有“爱护财物”、“断事公正”、“戒骄戒躁”等十课。该书讲述透彻,评论有序。如“具有真理的人,遇艰险不避,逢贫穷不欺,看富贵不贪,碰权势不畏,舍生命不惧……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5、《莫日根葛根训诫》

《莫日根葛根训诫》为乌拉特旗莫日根庙葛根喇嘛老布曾比扎拉参所著。该书内容为劝学,做人之道,以格言谚语的形式写成。如“学要有志,言之成理,有知不骄,谦者有为……”。

6、《苏布喜地》

《苏布喜地》是萨班·贡嘎坚赞以格言形式写成的语条性韵文。该书起初用藏文写成,后来译成蒙文。译本很多。其中14世纪太日纳其喇嘛苏那木卡热的蒙译本,有19世纪乌拉特喇嘛老布曾旦比扎拉参的蒙译木刻版本;有苏玛代加注的蒙译本。《苏布喜地》除有木刻版本外,还有很多手抄本,在本旗流传和使用也比较广泛。书中有很好的教

^① 此书现藏于内蒙古师大教授纳·赛喜雅拉图的书房。

育内容。如“双雁夹飞的癞哈蟆,张口自夸落村坞。不知愚蠢的愚蠢人,终究一天摔跟头……”。

7、《考经》

元武宗皇帝海山命中书右丞李罗铁木尔用蒙文翻译《孝经》,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①。巴林右翼旗的文里学校曾用蒙文。

四、教学方法

文里学校的教学方法基本是课堂教学,个人进度。教师在一个教室里教五六名或十几名学生。教学的进度并不一样,而是根据学生的年龄、智力、制度快慢两种或多种进度。在一定的教学时间内,教师教完一个进度的学生,再教另一个进度的学生,有的甚至一个学生一个进度。同一年入学的学生,因为进度不同,所以学习年限也就不同。一般说来,识字阶段(包括能读会写)需要2—3年,会记帐能写用文书信一般要用2—3年,能讲读和翻译课文,能撰写文章需4—5年。教师对初学阶段的学生采取领读的方法。学生学到三四年以后,开始静听老师讲课。学生每天早晨要向老师背诵学过的课文,然后老师才讲授新课,如果学生背诵课文不流畅,老师不但不授新课,而且要惩罚学生。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常常对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训练。

1、语言训练。为了使学生做到发音正确、词汇丰富、说话流畅,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经常教学生说多种

^① 参见《元史·武宗实录》486页《孝经》的手抄本做过教材。

内容的“绕口令”，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技巧。

2、书写训练。在学字和拼音阶段，让学生用竹签（剥竹子做成的笔）在油灰书板上练习写字，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则用毛笔在油漆书板上练习写字。在学生掌握了蒙古文字的结构特点之后，就让他们用毛笔在纸上抄写小说或民间故事。

3、智力训练。艾里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智力训练，如：让学生猜谜语，讲童话故事；说对口“好来宝”等。这也是蒙古族教育孩子所经常采用的形式。

4、记忆力训练。艾里学校常让学生背诵一些格言、谚语、赞歌、颂词等，牢记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一些基本常识。

此外，还有心算、珠算等数学方面的基本训练。

艾里学校有较严的校规。如：学生见到老师要行屈膝礼，学生在教师面前要规规矩矩的站立，不准东张西望，不准乱说乱动；学生在听老师讲课或向老师背诵课文时，在老师面前要单腿跪地而坐，不准交头接耳，当天的课文必须当天背熟，不准学生吸烟、喝酒、说下流话、唱低级歌曲，违者要受挨鞭罚跪的处罚；学生如果要请假，须由家长亲自出面，而学生本人请假则不准许。

必车赤学斋

一、必车赤学斋始末

必车赤学斋是培养通事（翻译）和必车赤（文书）的学

校。1648年，巴林部分左翼右翼旗，分旗划界以后，本旗札萨克衙门奉行清朝政府的政策法令，衙门的大小官员不仅须懂得蒙满语言文字，而且需要能够准确通达地翻译和起草蒙、满语言文字的书信和文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后，带来了蒙藏文化交流，医学、天文、历法等，都要从藏文中翻译。因此，札萨克衙门建立了必车赤学斋，以培养这几方面的人才。本旗札萨克衙门的必车赤学斋大约在17世纪中叶建立，一直到1910年普励学校建立之后才撤销。本旗必车赤学斋的最后一位教师是毕力格图。

二、培养对象和教学内容

1、培养对象。札萨克衙门开办必车赤学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忠于清朝的统治，忠心为王公贵族统治服务的人才，因此，培养的对象，以贵族和官员的子弟为主。有的时候，平民中比较聪慧的孩子，如果被王公看中的话，也可能被选入必车赤学斋学习。如巴林右翼旗的吉赫日嘎其乌力赫充嘎和金奇山二人，本来是平民，就是被王公看中，进入必车赤学斋学习后成为札萨克衙门官员。

2、教材和教学内容。必车赤学斋的教材和主要内容有：

《成吉思汗箴训》

《成吉思汗箴训》是成吉思汗告诫官员和子弟语录，它用诗歌的形式写成。在巴林右翼旗流传较广，有过许多手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不仅是青少年学习的课本，也是人们品德修养的准则。其内容多为强调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鼓舞人们艰苦奋斗,勇于克服困难等等,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人民性。

《巴林黄金史》

《巴林黄金史》是记传体史书。它记录了巴林部和巴林王公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巴林实录》(蒙语为“乌兰韶高木必车格”)。

《巴林实录》记录了巴林右翼旗的一些重要事实。《巴林黄金史》和《巴林实录》都是札萨克衙门的必车赤记录而成。因此,培养必车赤也用这些书做教材。

此外,还有《札萨克王诫酒令》、《圣谕广训》、《天文研究录》、《五体合璧》。汉文的“四书五经”及一些辞书等。

清卓力克图在巴林 教育事业的贡献

撰文: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穆松

蒙古和利特部(《蒙古秘史》、《元史》等历史书籍记载的古老克烈部)后裔清卓力克图(汉名和子章)及其家族,是巴林兴办学校、普及文化教育的一个名门之一。

清卓力克图的父亲笃固尔扎布曾就学于东土默特来的私塾先生,学得蒙汉和满文,当上了巴林左翼旗札萨克衙门笔车赤(自元朝以来各级政府内的文书,译言,记者等工作为笔车赤)之后,更加勤勉,后来当上了管旗章京(职责为总理旗丁,参与全旗行政事务的实权人物,人选多自贵族名门、也有从属丁拣任的)。笃固尔扎布章京住敖日盖时请了家庭教师,办了一所家庭学校。主要是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和亲属的孩子传授蒙文和满文。起初在这个家庭学校读书的有笃固尔扎布的长子阿优尔,次子和喜格套格套,三子清卓力克图,四子阿民布和等。后增加了笃固尔扎布的五子乌日图邵斯图,六子清巴图,女儿巴达玛、查干,孙子恩和图布新、恩和森以及亲属的孩子乌日喜叶勒图、拉布坦,还有

本村的几个孩子共三十余人。

笃固尔扎布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对教书先生的要求也比较高,常到校内了解情况,听取教书先生的教学手法并常说:严是爱,松是害之类的教诲。

笃固尔扎布章京办的家庭学校里,清卓力克图的学习成绩卓著,所以笃固尔扎布把他同四子阿民布和一起送到当时比较繁荣的宝日浩特(今翁牛特旗乌丹镇)的一个私塾馆,跟一个姓周的先生学习汉语汉文、算盘,记帐等。到了一九一八年巴林左翼旗札萨克阿格旺业喜色丹那木吉拉旺宝进北京纠缠与巴林右翼旗的旗界官司,管旗章京笃固尔扎布随行,清卓力克图便以跟差身份被带进北京。

清卓力克图聪颖好学,见在北京的同龄人上学读书羡慕,便求父亲央求阿格旺业喜色丹那木吉拉旺宝王爷开恩,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进入北京齐华门南小街万顺成草铺半日制学校读书。

二十年代初巴林旗面临边界上的纠纷,土匪骚扰,清廷的放垦移民等风云之际,巴林左翼旗的权贵们深感人才的匮乏。清卓力克图这个进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自然被王爷和札萨克衙门权贵们的器重。这样清卓力克图担任了王爷府的笔车赤。到了一九二三年奉王爷之命当上了林东垦务局交涉员,一九二四年升任巴林左翼旗印务扎兰。一九三〇年升任巴林左翼旗札萨克王爷的印务梅林,掌握实权。第二年秋季,从开鲁方面来了一股土匪,约有四、五百余人,匪部首领绰号“火龙”扬言踏遍巴林二旗,而巴林左翼旗王爷按清廷制度备有五十二名兵员,加之久废

不用,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敢做敢当,胸有成竹的清卓力克图闻警先把王爷府老幼安顿到离王府五十华里以外的床金庙暂避,自己带上王爷府的三十来名卫兵在旗南查干哈达一带御敌。从双方兵力来说,清卓力克图的三十来人战胜“火龙”匪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清卓力克图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和敏感,从土匪的“火龙”二字联想到用火攻的办法。于是打仗开始就即时从西北纵火,最后大获全胜。在自己的三十来个卫兵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击毙了二十来名土匪,赢得了全旗上下的赞誉。巴林左翼旗札萨克阿格旺业喜色丹那木吉拉旺宝十分高兴。晋升清卓力克图为统率全旗武装的军务梅林章京。

解放后清卓力克图参加了革命,曾任内蒙蒙汉联军副司令员,四师师长,内蒙古军政部部副,内蒙古人民政府一级参事等职,对党和国家特别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清卓力克图的弟弟阿民布和也成了德才兼备的政治军事风云人物。解放初曾任内蒙古蒙汉联军参谋长,骑四师师长,内蒙古畜牧处处长,曾在巴彦锡勒草原上创建了内蒙古第一所国营牧场,为内蒙古的民族解放和畜牧业建设上做出过贡献。所有这些当然是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刻苦学习的结果,也是他们的父亲巴林左翼旗管旗章京笃固尔扎布所办的家庭学校中受到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清卓力克图少年时代目睹了晚清的日益没落,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在巴林地带,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土匪四起民无安日。封建制度的裂痕,社会的黑暗腐朽,特别是清廷对蒙古地区实行“北不断亲,南不封王”的笼

络政策和推行喇嘛教毒害愚弄和欺骗愚昧无知的蒙古人民,教育方面虽然兴学堂,但仍是萎靡不振,但广大蒙古族人民在封建统治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这一切对少年清卓力克图的影响很深,他常对伙伴们说:“我们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曾有过横跨欧亚两洲,震撼世界的光辉历史,但到了如今成了软弱无能,愚昧无知的被欺压的民族,原因就是忽视文化教育,忽视军事,所以人民愚昧无知,士兵毫无战斗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但一个人在自己范围内做出对自己的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也是一个人的荣誉。”清卓力克图不仅是这样说的还是这样做的。为了启发旗民振兴巴林首先是从教育入手的念头占据了他的脑海。于是清卓力克图向巴林左翼旗札萨克王爷色丹那木吉拉旺宝递交了训练军队(指王府卫兵)和腾出王府部分房屋办学堂的呈请。可是循规蹈矩的王爷对此并不理解,不知是处于维护王权的直感,还是担心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招惹出以外的麻烦,起初是完全是反对的态度,并通过清卓力克图的父亲笃固尔扎布章京严厉训斥之后,摘下了清卓力克图的顶戴花翎。但是清卓力克图并没有屈服,用自己聪颖才华,经过持久的舌战终于说服了札萨克衙门的权贵们,最后王爷也就同意了办学校一事。清卓力克图便在王爷府内腾出些房子办起了平民百姓儿子可以进学堂读书的第一所学校——笔车赤学校。接着在阿力木图的公爷府,林东贝子庙,黑拉根吐庙,查干哈达等十几个嘎查村牧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办起了家庭私塾或者艾勒学校。到了一九二八年在林东又办起了

“公立蒙古族学校”。在这些学校的影响下,住在乌苏义很的额尔敦白音梅林也办了一所家庭学校。不久索博日嘎的松迪扎布,十三敖包的刘锁儿,塔拉宝力格的树嘎斯迪梅林的儿子色旺巴斯尔等艾勒学校前后开了学。

一九二九年清卓力克图又从喀喇沁旗请了学识渊博的青年人宝力格,在自己的院内办了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教学用具,学生的用品等比以前进了步。为了学生的方便专门制做了凳子靠背后带着写字台的新式学生用具。抬爱了自己的儿子恩和森,塔拉宝力格嘎查的那顺朝格吐、昭那苏图,敖日盖艾勒的那顺巴雅尔、叶喜斯楞,海勒斯阿木义勒的双珠、太明、拉西东力布、叶喜桑布等三十来个学生。教书先生的吃住工资以及学生的吃住、文具费用等均清卓力克图免费供应。甚至贫寒家庭学生的穿衣也清卓力克图承担。

清卓力克图这所学校的进步教育。教师宝力格等人的积极努力启示下,学生们头脑中逐渐灌输了爱国爱民族的进步思想,后将很多的学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贡献了青春才华。如:受到该校启蒙教育的恩和图布新来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所在的白塔子区搜集伪军警散落的枪支组织当地牧民成立了保护牧民生命财产的自卫队,后清卓力克图组建内蒙古自治军时出任三十二团团团长,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在该校受到启蒙教育的恩和森来说:他是日伪投降后,中国共产党西满分局的领导下的东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委派到昭乌达盟开展工作,公开宣传革命道理

的第一个干部。恩和森同志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个著名蒙古族电影艺术家，曾任中国电影协会理事、内蒙古电影协会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此外还有昭那苏图、那存朝格图、那顺白音等都在祖国的解放事业，民族的繁荣，内蒙古的振兴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到了七月时林东建立了巴林左翼旗伪公署，这时地方实力人物清卓力克图被任命为公署的总务科长，第二年担任旗长的巴林左翼旗原札萨克王爷色丹那木吉拉旺宝去世，清卓力克图代替旗长职权处理旗内事务。于是清卓力克图利用行使的旗长权力，重点加强了旗内的教育，把原来的林东蒙汉合办的学校分为两所学校。并聘请了北京蒙藏学校毕业生、深通蒙汉两种文字的陶格陶布为教师，兼蒙古族学校的校长加强了这所学校的教师力量。并在索博日嘎的艾勒门协理家、敖日盖王府、十三敖包、查干哈达、黑拉干台等地分别建立了“国民蒙古族学校”，并命各校的校长根据地区的特点和民俗习俗制做了颜色不同的五个校旗。王府学校制做了蓝色的校旗，被命名为蓝旗学校。林东的蒙校制做了红色的校旗被命名为红旗学校。查干哈达学校制做了白色的校旗，被命名为白旗学校。黑拉干台学校制做的黄色的校旗，被命名为黄旗学校。索博日嘎学校制做了黑色的校旗，被命名为黑旗学校。这些学校在参加旗里的那达慕大会或者大型运动会时都高举着各自的彩旗，特别是参加长跑运动员们根据各自的校旗颜色做运动服或者头束着四指宽的彩绸飘带，快跑起来格外显眼夺目。观众也一眼就能看出谁

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一九三五年，清卓力克图反对日本参事官小手川胜彦拆毁蔚为壮观的林东贝子庙一事，遭到伪政府的“反满抗日嫌疑”被受审，然后引咎辞职。清卓力克图辞职后，深感处境之险，于是去北京治病为由，转到沈阳隐居一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德王招兵买马。清卓力克图带着强烈的民族热情策马巴林二旗各地，招得嘎尔玛巴斯尔、乌兰巴特尔、嘎拉增、阿拉坦乎雅嘎、西拉梅林、关布斯楞等四五百人，没有骑的从自己家马群解决好马，去多伦参加了德王的蒙疆军，清卓力克图被任命为蒙疆军第八师二十二团上校团长。在日本人来说，当时不论是东部的满洲国，还是西部的蒙疆军政府都不过是关东军的自制玩具。当清卓力克图利用自己的影响东奔西走招兵时日本人还是满支持的，但当他把人马带到多伦后，就很快发现德王的蒙疆军还是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而且日本人仍怀疑曾反对过日本参事官的清卓力克图这个精神焕发的年轻人和他带来的几百名巴林骑士，所以起初没有武器弹药，一直到王英在日本人的指意组成的“大汉义军”攻打洪格尔图，德王调兵百灵庙增防，才临阵发了枪。清卓力克图对此非常不满。后来到了四月日本人把清卓力克图调到蒙疆军总部，任上校参议。这实际是把他调离部队靠边站。清卓力克图一气之下挂职告退。当到了巴林后日本人对他还是不放心，暗中注视着清卓力克图的每一步动向。明明白白感受到这一点的清卓力克图索性把家从敖日盖搬迁到日本人眼皮底下的林东城内。到了一九四三年，清卓力克图聘请了开鲁国民优级学校的尖子生

吉如木巴图,在家中第二次办起了家庭学校。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动乱的影响把孩子送往庙里当喇嘛的人口日益增加,而是送学校读书的人极少,因此清卓力克图向旗民发出告示,其内容是:我身为巴林的名门之子,为了启发旗民,让我们巴林蒙古族继承祖先的伟业决定依靠自家的微薄财产办一所平民学校。招收无衣无靠的孤儿、因家贫读不起其他学校的学生,要求各寺庙派三名小喇嘛到我校读书,这些学生的一切吃住均免费供应。清卓力克图发出告示后,着手筹备工作。学生的服装是:夏季男生服装均为蓝色的大纹毕几,女生均为毛蓝布上下装。冬季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均为青色毕几上下棉衣。并对每一个学生都准备了被褥等生活用具,也从自家的粮仓内拿出了相当数目的粮食供应学生;也规定每一个星期必须改善二次学生生活,管事的(即家庭的管理员)不得有误。

清卓力克图虽然为了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而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但是旗民对读书不那么认识,同时在社会上流传着读书的孩子将来送出国外等谣言的影响,多数百姓不愿把子女送到学校。特别是送到庙上有吃有穿的那些小喇嘛更是不愿到这个学校读书。如:巴林左翼旗喇嘛庙的道尔吉宁布,后召庙的嘎拉曾那木吉乐等人便求该庙的活佛喇嘛,于是喇嘛庙的活佛丹毕扎拉曾,召庙的乎毕乐干喇嘛派手下的大喇嘛金巴等人带着礼物去林东清卓力克图那儿再三央求让该庙的孩子免除读书。对此清卓力克图说:“蒙古人信佛,这是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蒙古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神的保佑、佛爷的恩慈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这也是实事,

现在当喇嘛的人越多,我们蒙古族就越是走下坡路,但你们请求免除读书的只不过是几个孩子的事,到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根据活佛的意思不在喇嘛庙和召庙上招生了。”在清卓力克图的多方努力下在巴林招收了父母双亡无衣无靠的孤儿和家贫无法读书的孩子以及部分寺庙上的喇嘛等五十余人。一九四四年,清卓力克图又聘请了一个叫呼和他拉的日语教师,给学生们增加传授了日语课。

一九四五年,东北解放。清卓力克图在林东筹建了昭乌达盟自治委员会和昭乌达盟自卫军。十月东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任命清卓力克图为巴林左旗旗长。他担任旗长职务后,在旗总务科内设立了文教股,并责成文教股立即恢复各个学校。同时亲自批准了“兴文学校”校长陶格陶宝和“启文学校”校长王藩二人复校的请求。并且一方面给学校解决了经费,也派人给学校聘请了十几名蒙汉文老师,恢复了授课。

一九四六年春清卓力克图在敖日盖的老家,修复了房屋第三次办了家庭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有萨仁格日勒、旺吉勒、那仁满都拉、锡金满都拉等三十来个学生,接着清卓力克图责成索博日嘎的义利达木办艾勒学校,并自家的财产中拿出了二万元现金。对此义利达木积极筹备当年四月正式开学。解放前后的十几年中在巴林左旗(今包括右旗的部分地方)在清卓力克图的倡导和积极关照下,原巴林左旗(今部分地区划给巴林右旗)前后共建立了六次家庭学校二十余所。仅在家中办了三次家庭学校。这些学校对社会培养出了大量有用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

遍布内蒙古和祖国的各地。其中有的人闻名国内外，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人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如：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团政委，解放后曾在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驻日本大使馆任秘书长、政务参赞、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等重要职务的斯布吉德道尔吉同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内蒙古自治军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等职的著名蒙古族作家阿·敖德斯尔同志，曾任赤峰市市长，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专职常委职务的才吉尔乎同志，解放战争中曾立过多次战功，解放后曾任内蒙古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曾立过多次战功的陶格陶同志；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曾受到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的内蒙古第一位特级教师萨仁格日勒同志；内蒙古政协常委，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副社长高级编审旺吉勒同志等党政军各界的著名人士都是清卓力克图倡导下恢复和创建的巴林著名学堂——“兴文学校”、“启文学校”、“敖日盖王府学校”、“查干哈达学校”、“索博日嘎学校”和清卓力克图的家庭学校分别受到过启蒙教育的学生。这些人在祖国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繁荣昌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嘉奖，人民的爱戴。

清卓力克图一九四六年任内蒙古蒙汉联军副司令员，投身于伟大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从此他离开了巴林。但是清卓力克图在军阀混战，土匪四起，日本帝国主义欺压中国各族百姓，巴林人民暗无天日的极其困难时期，他为了觉醒

愚昧无知的蒙古族同胞，积极倡导兴办教育启蒙人民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铭记在巴林人民心中。

注：撰写此文过程中：①采访了清卓力克图老家敖日盖（今巴林右旗岗根苏木海勒斯阿木嘎查）嘎查老支书七十多岁的旺其格老人，老教师叶喜桑布、义利达木，内蒙古军区离休干部赛音巴雅尔，清卓力克图的妹妹巴林右旗政协委员查干等几十名知情者，在此致谢。②参阅了《巴林左旗教育志》、《昭乌达盟教育志》、《巴林右旗校志》等史料。

叶纯浦私塾

陈文增

1945年8月大板解放后,日伪办的大板优级小学校也不存在了。街里的学生没有学校上学,有些学生结伙打群架,对抛土块、石子。年近七旬的叶纯浦老先生看在眼里,他想得让这些孩子们念书,往好道上走,于是叶纯浦老先生在郑苗家租了三间东厢房,北间一间东面是炕,炕上放两张炕桌,地下放上两张方桌,中间一间放两张方桌,办起了私塾。南边一间为叶老先生住宅。

一开学,念私塾的学生只有五六名,时间不长学生增加到二十多名。都是十一二岁至十五六岁的男生(其中也有少数蒙古族学生)。女生只有一名叶素娟。

念的书首先是必读启蒙的《百家姓》、《三字经》,接着是《千字文》、《弟子规》、《民贤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念私塾,为了记得牢靠,讲究背书。叶老先生也是沿用这种办法教学。先生教给你一段书,这叫“号”书,你拿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念、背诵,能背下来啦,就拿着书到先生那,将书本交给先生,叶老先生坐在椅子上,将书本打开放在八仙桌上,学生转过身去背对先生,背诵给“号”

的书。背诵下来了,叶老师再给你往下“号”书。如背着扳住了,叶老师让你想,想一会儿,要是想不起来,叶老师给你提(说出)一个字,扳住上边的第一个字,如经提一个字还背不下来,叶老师就把书本交给你,让你再去反复念背。背熟后,再来背诵。

这种私塾传统的教书法,只适合于有几个学生的私塾,学生一多就不适用,因学生的智力、记忆力不一样,课程的进度就不一致,成了一个学生一个进度,每日从学生进了屋到放学,老是不断学生来背书、“号”书的。因此,叶老先生特别吃力。

学生除背书外,叶老先生还给每个学生布置默写《百家姓》、《千字文》等书,将默写的作业,交给叶老师判。写得好的,叶老师就判“最优”。写得既好字又干净,就判“优秀”。写得不算太好,就判“优”或“优良”。写得一般的,就判为“良”或“可”。写得不好的,就只给写上判的日期,将写错的字和不规整的字,用笔划一道子,提示注意。

写毛笔字稍有一点基础的,叶老先生还给打仿影,让写仿。在家写,三天交一次仿。叶老师给判仿,写得好的部位,就给用红笔划圈圈上,写得某一笔好,就给划小圈圈上。

由于学生多,事情多,从学生中叶老师指定两名岁数大、个子高的学生高志清、邹云生为“大学长”(即班长)。学生谁有点小事,不必惊动老师,就找“大学长”解决。

每日叶老先生的工作量很大,学生们从进屋学习到放学,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也倍觉腻烦。老师、“大学长”和学生们共同商量,每天上午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学生们有四

五十分钟的时间在室外统一活动。学生们由“大学长”指挥，排队练左、右转，向后转，齐步走，正步走。有时踢毽子、跳“磴格”等。更主要是每天这“体育活动”时唱歌。因刚解放不久，新学的歌，每天必唱《蒙汉团结歌》：

蒙汉同胞，
团结起来，
共同的建设我们新的中国，
有自由，
又民主，
男和女享幸福，
大家齐努力，
共同的建设我们新的中国。

……

叶老先生很欣赏爱听歌曲，每到这“体育活动”时，他也走出房门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听听这新的歌词，呼唤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的号角。

叶老先生的大儿子叶宝树参军在部队上，他回来探家，教给学生们歌《一杆红旗》：

一杆红旗高空悬，
随风飘来随风展，
千万只眼睛向上看，
千万只手臂举向天。

离开祖国十三年，
盼望祖国眼欲穿，

民主政府成立了，
从今后有了自由权。

大板成立农会。大板第三村在郑家这院成立农会。叶老先生的私塾搬到了张国全的房子（现在民族街西段的前街）这院有正房三间，东耳屋子一间。张家住西边两间，叶老师住东边一间，在东山花开门，出入走东耳屋子。

东耳屋子挤挤巴巴只能放两张方桌，学生大减，只还有七八名。这时，有的学生弄到了晋察冀边区民主政府出版的语文课本，要学此书，叶老先生是一个思想比较进步，很快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开通人，于是老先生很同意，就教这“语文”课本。有的学生上私塾就是为了识字，多识字，好应用，就来快当的念《四言杂字》。叶老师就教他《四言杂字》。《杂字》其中笔者记得有这么几句……爷伯父叔，奶妈婶娘。锅碗瓢盆，筐箩抬筐。金针木耳，大料茴香。雷云雪雹，雾露霞霜……

这时学生每天没有“体育活动”了，但还是要唱歌，在屋里唱。有时学生学来新歌，在抄歌词中，将歌词抄错，在唱时，叶老先生还给校正歌词。

叶老先生在张家这房子住了有半年，因房屋太小无法办私塾，又找到租赁一处比较宽敞的房子，是本街往东荷花家的三间房。这是正房三间，叶老师住家在西间，东间为“课堂”。这时学生最多到十五、六名，其中增加了两名女生，女生坐在老师的住室里念书。每天唱歌改为下午放学时，学生在院里站好队，叶老先生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听学生们唱三四支歌后就解散放学。

在荷花这房子办私塾有七八个月，大板第二村农会占用此房，叶老先生又搬到郑志龙的房子（现在的大板街西头路北）。

叶老先生长期患慢性痢病，咳嗽大口吐痰，病情逐渐加重，因健康原因，私塾办不下去了，从此，办了二年的私塾停办了。

叶老先生的私塾停办了，有些学生想念老师，还经常去看望叶老先生。在部队上的叶宝树给在家的小弟弟叶宝霞，经常不断地买来好多“小人书”画本。看望叶老师的学生们，又借“小人书”看。“小人书”画本中有《不死的王孝和》、《祥林嫂》、《王贵与李香香》、《刘巧儿》、《李二嫂改嫁》、《包工身》、《申新纱厂》……通过看“小人书”画本，学生们不但从中学了文化，还懂得了要翻身解放，要自由，要民主，要推翻封建剥削阶级当家作主人，解放全中国，跟着共产党走的道理。每次借“小人书”四五本，看完再去换。这样叶老先生家又成了他的学生们的“图书馆”。

见日本侵略军初进大板

莫胡尔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巴林右翼旗以前，巴林右翼旗属热河省管辖，当地仍由封建王公统治执行一切政务。但那时巴林扎噶尔王爷常住北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巴林前二年时才返回大板。

当时军事设置旗内没有自卫军队，只有护卫王爷府的守卫二十五名兵士（好林他本其力格），还有公爷府几名看家护院兵。常驻大板的军队是由热河省第九旅的一个连，连长姓徐。后来又由热河省派遣第十旅的赵团来大板驻防。

不论是九旅的徐连或是十旅的赵团，所有官兵极端腐败，都是欺压人民群众和吸食鸦片的烟息兵。他们在平日里耀武扬威，打骂群众是常事。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东北时，他们借口组织力量，抵溃外敌为名，变本加厉地压榨人民，任意抓人给他们服役，还到处抓“乌拉”（摊派牛车、马车）。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个早晨，赵团兵士排成很有秩序的马队，全副武装，十分威武的出发了，并声言去抗击日寇。巴林群众看到此举，虽然平日受到极端蹂躏，但认为击溃日寇，免遭当亡国奴的

心情,对该部队抱有希望之感。不料当天晚就跑回来了,他们跑的溃不成军,他们已吓破了胆,在大板都未敢站脚,乱轰轰地向林西方向溃逃下去了。

事后,我们听说,赵团出发走到老道板、吉鲁忙汉一带,听到日军已占领了林东,他们不但没有打一枪一炮,而且还没有见敌影,就吓得慌忙溃退,闻风而逃。

一天我在大板后山(喇嘛坟西山)放羊,看到由麻斯他拉东少荣山北坡道上,过来了几十辆马车和军队。还有一些盖着苫布的车辆,另一部分车拖着长脖子的东西,都是八至十几匹马拉着的铁轮车,以后据说是大炮车。两边和后尾的人都背着背包和枪,头戴钢帽子,身穿土黄色军装,数量不到二百人,其中还有骑马的,前头拿着红色圆日白旗,因为没有受到抵抗,他们没放一枪,没打一炮,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大板。日军进街后住扎在王爷府门前。在大板住了两、三天就往西走了。留下多少人,都是什么人,那就不详细了。

日本侵略军来后不久。伪满洲军就进入大板,人数很多,完全是骑兵,也是身着土黄色军装,伪军头前举着上边有红蓝白黑的黄色旗帜,不知这些军队什么番号。他们大叫大喊着找人、找住处,溜马喂马、号饭。伪军是很恶劣的,不是打人,就是骂人,有的还调戏妇女,此伪军在大板并未常驻,不几日往西开走了。

又相隔一段时间,伪满洲派来伪警察约三四十名,他们住在东大庙后的巴嘎什葛根仓。这些伪警察就在大板街住下来。

解放初期妇女运动的一段回顾

武云格日勒

一九四六年的夏天,以道布钦巴拉珠尔、徐子干、确吉敖斯尔、娜仁高娃等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减租减息工作团一行六十余人来到巴林右旗开展工作。工作团中以娜仁高娃同志为组长的六人组成的妇女工作小组,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哈斯其木格同志,其次是菱花和我。

工作团来后不久,就分为两个分团,一个分团驻在旗所在地大板。这个分团的负责人是,确吉敖斯尔同志和徐子干同志,另一个分团是赴查干沐沦区,分团团长是道布钦巴拉珠尔、娜仁高娃同志和孟和比力格同志,我被分配到这个分团工作。我们工作团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在牧区现阶段削弱封建势力,进行民主革命,使广大贫苦牧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在经济上得到翻身。特别是在封建王公贵族的剥削压迫下,社会政治地位最底层的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

工作团中,我们女同志所负担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在广大各界劳动妇女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要起来闹革命的启蒙教育。实践证明,做好这项工作,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顺顺当当的。当我们初次接触到各基层劳动妇女群众,特别是当一辈子“印吉”(陪奴),甚至当几辈子奴隶的妇女姐妹们谈话时,她们异口同声的不肯承认自己是受剥削、受压迫。用她们的话说,“人的命运从来是富者则富,穷者则穷,这是命运所定的。我们之所以穷这是老天爷给注定的,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他们的命好”。依照她们的思想逻辑,我们要发动她们反封建,反剥削,这似乎好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工作团的领导们意识到,发动群众的工作,只采取单纯的、笼统的在大范围内进行一般性的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让广大妇女自觉地起来革命的目的。因此,工作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广大妇女的发动工作,首先,要抓典型,以典带面的方法开展工作。于是我们在查干沐沦区和大板区两地采取了普遍号召广大劳动妇女起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坚持男女平等教育的同时,为了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我们工作团中的妇女工作小组,根据当时牧区广大劳动妇女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没有人身自由的种种表现作了一番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道德,严重地束缚着牧区广大劳动妇女。如王公贵族、封建牧主,依照封建礼教为手段,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谁家的姑娘长的俊,就一声令下拿到他们家为他们的阔小姐、太太当奴隶,如果小姐们出嫁时,这些奴隶竟成为陪嫁的嫁妆一样被他们嫁送出去。有的“印吉”(陪奴)到了四十岁还不能结婚,最后只好在大财主允许下与一把斧子拜了天地,以此称为终身伴侣。并且,还规定已嫁了斧子的

女人不能再嫁别人。另外,在当时牧区社会中,有钱的人多数为一夫多妻和小女婿以及娃娃亲等极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一句话。当时社会的女人只能当男人的附属品,女人在行为上应当是,“笑莫露齿,坐莫摇身”,行动上不能有违规之处。

我们根据调查到的这些生活材料,一方面编写小话剧给群众演出“小女婿”,女婿十一岁,媳妇十八岁,为了侍候公婆而娶的媳妇。这个剧说明婚姻不自由不自主为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买卖婚姻在牧区需“五个九”“九个九”的财礼(牲畜头数)这样媳妇嫁十一岁的小女婿在梦中找妈妈,而且上了妈妈怀里。另一方面在劳动妇女中选择受苦最深、年龄较大的奴隶进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教育。翠梅、花梅二人就是我旗远近有名的佟、白两家财主的奴隶,我们亲眼看到,她们身上穿的衣服(蒙古袍子)补丁摞补丁,不知有多少层,不知穿了多少年,简直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了,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奴隶花梅盘在头上的发辫就象多年风吹雨打的毡片一样,她们二人从十几岁就给这两家财主家当奴隶。其中,花梅到了四十岁还是老处女,她非常悲痛地向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忌斧子的名字。”言外之意,她已经与斧子拜了天地。通过这种方法教育的结果,终于提高和唤醒了广大劳动妇女在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觉悟,以后许多横遭摧残,备受束缚的妇女自愿找到工作团谈心里的话、倒苦水、控诉封建压迫。如,大财主家奴说:“我们侍候那些老爷、太太、小姐,一不如意,就挨打受骂,一不小心打破了什么东西,更不得了。今天你

们给我们作主,我们更感到非常亲切……。”与此同时有的陪嫁妇女和小女婿之妻以及做妾妇女积极要求离婚,还有娃娃亲解除婚约,她们都请求工作团解决。广大年轻妇女和青年姑娘纷纷要求走出家门参加革命。为满足广大各界劳动妇女的要求,工作团选择有培养前途,有点文化的女青年送入当时的干训班和“自治学院”等地学习。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都被吸收为当地妇女组织的骨干力量。这些人乃至以后的土改运动中,有的已经参加旗、区(努图克)工作。

回顾解放初期妇女解放的一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当时的减租减息运动和解放妇女的工作,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没有广大劳动妇女在正确路线的感召下,没有坚强的自觉性,要想削弱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顺利的进行民主革命,解放广大劳动妇女是不可能的。

忆乌日塔叛变初我的一段经历

口述:抗喜

整理:乌力吉木仁

一九四六年,我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军三十四团,却吉敖斯尔部队,乌日塔连当战士(二连),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哈日陶高(又名陶高起),我们两个人到团部后,我主要为却团长服务当警卫,并做些零活。有一天,团部听说:阿旗的自治军已经公开叛变,严重地影响着益和诺尔一带的乌日塔队的军心,所以驻守林东的联军司令部命我团要深入到二连了解情况。却团长、参谋乌恩其通信员道尔吉、抗喜、胡日查巴特尔、朋斯格敖力布等一行七人,骑马出发,来到黄花庙待了二天。然后,我们从黄花庙出发,来到东西热白头山附近遇着一位牧民在赶牛,我们问这位牧民:“老乡,这里驻守的部队在哪儿?”他说:“就在前营子呢。”我们去后,正好遇见白清林,白一看却团长来了说,咱们到旺吉乐梅林家吧。时间正是农历冬至月十四。在行军途中,团长说:“我们这儿与阿旗不远了,我们要提高警惕,到那儿后,注意岗哨。”当时我们七人,带九匹马,全副武装。我们骑马走着,

突然从前面来三个骑马的人，都带枪，他们三人来到一看，就说是来看团长的。这样到了旺吉乐梅林家，住宿了。住下后，马鞍子都没揭，天快亮时，旺吉乐梅林家扛活的仆人说：“不好了，要抓你们呢，现在已经不少人把你们包围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马上骑马往东北方向跑，听到在我们后边有骑马的人追上来了，并开了枪。我们几人分开跑，我和朋斯格敖力布一起，因我骑的马不好，他的马也不太好，所以就落在后头被俘了。我俩到了东西热敖其尔家里，见叛匪把乌恩其同志抓来了，我们七个人中，只有却团长、通信员道尔吉、胡日查巴特尔、老布僧西日布四人算跑出去了。但是，老布僧、西日布年龄比较小，跑着跑着，跑到土匪跟前去了，所以，最后只有却吉敖斯、道尔吉、胡日查巴特尔三人跑出去了。他们三人跑的经过，听说是他们跑了很远，人疲马乏了，无奈就牵着马匹徒步赶路，正在赶路中，突然问道尔吉通信员的马被打死了，又跑出几里后，发现前边有匹马，团长命胡说：“把前边那匹马抓来你骑上。”结果胡下去要抓那匹马之时，道尔吉却与团长骑着胡日查巴特尔的那匹马跑掉了，胡日查巴特尔去解马鞍时被抓住了。就这样朋斯格敖力布、抗喜、胡日查巴特尔、乌恩其、老布僧西力布我们五人被俘，被他们捆上拿到翁旗格日僧一带，整整待了40多天，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晚，从右旗来两个人，我们当时正住在翁旗博博牧主家里，当时他们说，别害怕，不久要放你们。放后，你们愿意与我们干也行，不愿意可以回家。从那儿我们就过河到了乌日塔家，这时候，乌日塔的排长古力格说：“连长要放你们呢，放后，你们不能一起走，要分散

走，等明早给你们杀一只羊吃。”当时我们很害怕，根本不想吃羊肉，第二天早晨，古力格又说：“吃完羊肉要放你们不要害怕。”吃完后还没放，又说：“到哈木吐牧主家放你们。”这时候听说，蒙和舞乐极等九名同志也都被俘，只有毛小未被俘，要在哈木吐家开会后才放我们。我们几个人被带着前往哈木吐家走着，这时候前边又来几个骑马的人，其中我只认识白清林。白清林说：“把他们不要带到哈木吐家了，就在这儿放吧。”这样才把我们放了。我一气跑到自己家，这时候听说，韩桑杰等人把西部闹得很凶，我也很害怕。后来听说，却吉僧格、赛乌云吐、乌恩其、排长喇嘛等人都被杀害，孟主任受伤，流血过多牺牲。

在奥伦陶勒盖的交锋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关布扎布

枪弹飞啸着落在马蹄下，击碎和扬起着沙土，留下碗口大小的弹痕。从其落弹的弹痕上看，射击者不是什么新手，而是个相当熟练的老手。

我们虽然很年轻，但从其枪声来判断他们使的枪不是日本造，而都是捷克七九、苏式连珠枪。

1949年盛夏六月初的一天，我们同叛匪韩桑杰的残部八个人在奥伦陶勒盖以弹头交了锋。这个地方曾流传着格斯尔圣士从这里射箭打出豁口的“哈日巴”山梁的传说。

他们虽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无穴可钻但仍继续顽抗，你们握的是钢洞枪，我们手里的也不是烧火棍！

翁根努图克以厚和满都夫为首的二十来岁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和射击能手长寿道尔吉以及老成持重的洪振声等人怒气冲天，快马加鞭，反击土匪。

土匪同我们经过多次交锋，他们对我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共同感觉，但却自以为被那么多的大队人马跟踪追击，因幸运活到现在，无论如何也不把命运交给你们几个小孩。因此，他们对准我们人马不断开枪射击。

无家可归的这些丧家犬，虽然依仗他们自己的钢枪，依仗他们自己的杀人双手，疯狂反扑，但由于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斗争的目标明确。因此，我们不怕死，不怕苦，象打猎的逐渐紧缩着我们的包围圈。

确切说，我们早已得到土匪残部八个人外跨四匹备用马，在黄昏时分，象惊弓之鸟般的从半山腰横越他本陶勒盖又奔向奥伦陶勒盖的可靠情报。在努图克所在地查干西热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主任厚和满都夫，副主任长寿道尔吉，副努图克达李振帮（蒙族），公安委员洪振声等八名干部商议决定从明天起早带领十来名区小队战士，大力发动群众，把过去的四方远围打猎的哈日巴山梁，全面搜索，包围奥伦陶勒盖山。因此，当夜通知巴彦查干、哈鲁、老房身、敖包图、沙布嘎、西热、牌毛都、胡尔哈等八个嘎查村。就这样起早聚集到这里了。

我当时在哈鲁嘎查工作。我从哈鲁出发在太阳即将落山时候，到宝日道布组保管员达来老人家投宿，我就吃点炒面小米粥，在他那小屋里抱着枪入睡了。忽一觉醒来窗下的我那小青马不停地用马蹄扬土、嘶叫，早已按捺不住了。我起疑地坐了起来瞅它，因此它虽然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叭牲口，但它比什么都机灵，这匹马是巴彦查干嘎查老牧民仁钦巴特从小驯的本群马，从他那里我们用带驹骡马换来的。由于这匹马经一人手驯养，认识它的主人，所以别人喂它的草料不但一口不吃，而且也不让别人靠近它，何况别人上绊上鞍。尤其是他听到或发现什么不吉之兆，它就当即返回主人跟前，本能地用前蹄扬土嘶叫。因此，大家都很好奇

它。因为当时土匪很多，人们都把自己的坐骑当作生命。我这时听到我小青马的嘶叫声后，马上拿起自己的长短两支枪和三颗手榴弹，走出去。

仔细探听起来。从西边横渡哈通河，在德尔苏草丛中有两个骑马的人往这边走过来。

我忙警惕地韁好了马。

一个说：“我们到达来老人那里打听黄毛丫头便知道他在哪里。”听起我的绰号是个好熟悉的声音，另一个又说：“被那高个黄毛丫头的黑连珠打中，就象塔麻哈山梁的黄羊似的一去不复返啊。”听起来也是同样很熟悉的声音。

真奇怪呀！他们说的虽然都是平常玩笑的话，但这一带当地土匪头子全知道我们几个干部的姓名，年龄的。由于二年来同这些顽固土匪经几次交锋，我们汲取了他们掠夺我们群众财富^①；枪杀了我们扎木萨同志^②；烧毁了我们的努图克所在地^③；镇压了我们的同志^④，等等严峻教训，这一切早把我的天真烂漫的思绪驱散了，从而使我有了很大疑心和警觉。

“谁呀？口令！”我躲在墙角里，上好子弹，瞄准目标向在德尔苏草丛隐隐约约走过来的两个骑马人，突然喊了一声。

“我是努图克的参布拉，给你送信来的。”说着下马走过来，回答口令，他们可能是听出我的声音了。

① 土匪当时基本抢光了西拉沐沦河沿几个嘎查。

② 扎木萨是沙巴嘎嘎查的牧民会主席 1948 年春被韩桑杰杀害的。

③ 1948 年 10 月扎鲁特土匪苏和巴特尔匪部火烧翁根努图克驻地。

④ 麻子东日布是马鬃山人，卓盟纵队派来的射手。

我们三人回到屋里，把送信的事托给达来老人后，直奔正南方向——努图克所在地去了。听到风声的有些人家都可能不那么安宁了，东北角上的几户人家的好多狗都在狂吠起来。

通宵奔波，第二天早晨到达奥伦陶勒盖。

奥伦陶勒盖，是个把右手掌往里抻开似的多峰山地，并山后有一斜洼地，附近没有一户人家，全是丘陵地带。

土匪听到人们的喧哗声和马蹄声后怕被包围，他们不但不回顾在和尔木图梁被我包围，弃枪弃马，狼狈逃窜的情景拼命想占有利地形，全力往高处爬。

我们把带有好枪的人都留在奥伦陶勒盖山后，把骑有好马的人全派往迎面合围。

把奥伦陶勒盖山从两翼合围，带枪者在内线包围，无枪者在外线助威。射击能手长寿道尔吉加鞭青马，同斯楞钱布勒一起从右翼冲锋，其次是骑黄骠马的厚和满都夫，骑白鹤马的瓦齐尔珠尔和横冲过来，第三是骑枣红马的胡和桑、骑云青马的鲍国章，二人阻挡着土匪。蛇眼睛潘景文，骑兔褐马的周殿有，骑大红马的洪振声和我从左翼直冲上去。打后围的是骑黑马的李振帮，骑淡黄马的倪万良等人扫尾过来。迎面合围的是达兰台湖的骑高个大青马的驼背敖力布，西热艾里骑青白马的老布僧扎木苏，骑小克马的小个子张其布等人都在迎面围上来，他们枪支全是八门黑、单抽帽子、拽把子和马喜朝格图梅林时期建造的大口双龙火枪等等，对此我还记忆犹新。

土匪从高处用望远镜了望我们后，发现我们人多枪少

的底细,就留下带有好枪好马的两名后卫,其余人马都突围往马鬃山方向逃去。

这天的炎热甬说,好象从鼻孔里都冒烟。滴水不见的山冈地带,野杏却是解渴的好东西。

奥伦陶勒盖山的最东边的高地上攀上去的骑大黑马的高个子,把马匹隐蔽在高地下边,自己隐蔽在欧李丛和灌木丛中,射击我右翼两枪。长寿道尔吉坐骑青马往后躲闪了一下,他的西边高地上的小个子只开一枪把潘景文打退了。

土匪总不乱开枪,这说明他们子弹是有限的。

我们却不一样,能看得见,就把他恨之人骨,瞄准射击。

打仗是与打架确有区别的。我们几个人被他两个人打得前进不得,被围困在朝西的一个小湾子里。怒羞交加,饥渴难忍,坐立不安。就啃着华兴嘎秘书备给的羊肩胛肉,以消怒气。

“啊呀!这还了得。”洪振声摘下帽子,露着光头,生气地说。

“长寿道尔吉你赶快上前面高地击退西边高地上的土匪。潘景文、武力更格你俩跟我去东梁冈后面杏树林中隐蔽前进,同东高地上的那个黑大个子交锋。其余人把马扔在这里,在那长满苦艾丘陵上攻击土匪。”

洪振声虽然不是总指挥,但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谁敢违抗他!

太阳已小上午。我250发子弹中已减少了50发。

按照洪振声的安排,各自占据了战地。

长寿道尔吉的枪响了三下。西高地上的小个子的枪再

也不响了。我们的青年长寿道尔吉是象麻子东力布似射击能手,肯定那把小个子报销了。正在这样高兴之机,东边潘景文的枪又响了,原来老潘早已瞄准好了那个黑大个子。再往东细瞅随着枪声老潘隐蔽的小杏树被打断了。幸运他翻了个儿,继续大声骂着。我咬牙切齿地躲在田鼠拱土后面趴着,我用黑连珠打了一枪就往后滚下来,随之田鼠拱土高高扬起,几乎把我灰色上衣全给埋没了。

我从十六岁开始扛枪以来咬牙切齿还是就这一次了。

老洪振声的枪也为我报仇而响起了。在那东高地上的那个家伙,象只寒鸦似的从敖包上面探头探脑。

“让你见阎王爷的老子在这里呢!”我差一点喊出来,从斜度瞄准他脖子开了枪,他立即蜷缩下去,再没露头。

我们几个莽撞的年轻人,同翁根努图克的英雄人民一起,连续打了近二年的阻击战,经过这次在奥伦陶勒盖交锋,我们胜利了,他们那些土匪一去不复还了。

现在,我为怀念我的神圣摇篮和风雨同舟的战友,而奉献这篇可笑的文章,实在深感遗憾。因此,到此住笔!

忆昔日巴林青年的追求

——记内蒙古自治学院的一段回忆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曹 都

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学院如下片段的回忆，就可了解到那些热爱家乡为群众尽力的巴林青年们的命运选择和他们的追求。

在那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当时政局不定，群众处于不安的时刻。

在圣人格萨尔用射妖魔的箭射出豁子的阿斯汉山北处巴林王府前面流的沙巴尔台河市岸斜峰——吉尔嘎朗图附近居住的纳木吉拉朋斯格、胡勤达来等人，在一个晚上议论时局时传出了一个喜讯。

“说在张家口，有一个叫乌兰夫的土默特人，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从苏联回来，为了广大蒙族人民，在赤峰成立内蒙古自治学院，有消息说正在招生……”

在巴林右翼旗公安队的纳木吉拉朋斯格、希日布二人回家向同代的兄弟们传达旗所在地大板议论的这一消息吸引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巴林草原与整个东北地区一样，于一九四五年秋，在苏联红军的无私援助下得到了解放，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四年统治。当时对于分不清时局变化的方向和是非曲直的乡下人来说对此顾虑重重。

“在那个学校学什么呢？”

这对于在要尔吐小学当过教员的喀喇沁籍、稳重人希日莫以及被抓去当过日伪兵经历的胡勤达来等人来说对此不能不注意和考虑。

“校长是云泽，是那个叫乌兰夫的土默特蒙古人，副校长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金启先，是有很高学识的蒙古人。学的是关于内蒙古解放的道理……”

希日布是一个老实巴交、相信自己所见所闻的小伙子。他说着这些听到的话，便决心自己要入这个学校。

“怎么办好呢？！”探寻方向的那几个人观察他们的脸色。

正如常言说的，“呆在家里的智者不如周游四方的愚人。我是要决定走了！”

胡勤达来这个稳重小伙子这样鼓动在旁边闷头不语的弟兄们。

连沙巴尔台河都没有过去的几个青年，这时兴奋得手舞足蹈。“时局还没有稳定，假如走对了还行，如果走错了……”

乡亲们和家长们在他们担心和忧虑，即不摇头又不点头，沉闷不语。

有的表现老练、小心谨慎的态度，他们说啥都有。

“曾在外蒙古圣佛吉布僧丹巴那里当过兵的结果怎样？跟随日伪政权干事的后果如何！”那些抱小心谨慎的人说服他们，还是牧养牲畜拣粪拾柴比干事当兵的要好。众所纷纭，各说不一。

“不论事情如何，归根怨自己，咱们还是要走！”那些青年已下定决心，谁能挡住呀？！

一九四六年春月时间，沙巴尔台河滩的纳木吉拉朋斯格、胡勤达来、希日莫、希日布、全普乐等人，身穿羊皮袄，腰扎皮带，带上装炒米的口袋，坐上牛车赶往旗所在地大板。那时没有通用的货币。他们绝大多数户没有羊，骑用没有马，除了在身上穿的外均没有其它铺盖什么的。因此，全普乐的哥哥朋斯格那木吉乐送他弟弟临走时给一小口袋青盐做盘缠。

这些青年抱着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和兴旺作贡献的愿望，为追求人生正道而这样离开家乡走去了。

那时政局不定，群众心理不安定。巴林百姓虽然摆脱了外来侵略和暴政统治，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那样的党派。多数人担心，究竟变什么样的政权，不知跟那个好？正如在雾烟弥漫中迷失方向那样，人人为难。正在这时，本旗有一名望的人物出来，一边维持地方秩序和群众安定，一边观察时局，指望以后不论在谁的管辖，都能得到地位。

曾在本旗几届担任重要职务的赵发财(景文泰)召集一些文职人员成立地方机构，维持秩序，扎噶尔王的女婿仲乃组织自卫军维护本旗治安。

在这个动乱时期，敖汉籍的韩桑杰带领三十余名兵痞却叛变当土匪，鼓动当地的富人和官吏，扰乱社会，抢掠群众的财物。

在这日夜不分、是非不清的紧急关头，一些关心家乡兴衰的有识之士和追求进步、反对压迫剥削的青年一代，把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什么作为选择终身事业的关键一步，是理所当然的了。沙巴尔台的纳木吉拉朋斯格、胡勤达来等为首的年轻人虽然缺乏领导能力，但是终究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方向，成为巴林青年一代的榜样。在他们的影响下绝大多数青年先后奔赴内蒙古自治学院、热河省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和内蒙古军政大学等加入了革命行列。而叛变当土匪的却占极少数。

纳木吉拉朋斯格、胡勤达来等为首的一些青年高兴得腿脚轻快起来，比牛车先到旗所在地大板，找到文教科。

文教科在清朝康熙皇帝行宫，即伪满旗公署瓦房里办公。纳木吉拉朋斯格等人找到文教科长拉布杰述说他们的愿望，并要求给予帮助。

拉布杰十分称赞和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尽力给他们解决了介绍信、车辆和盘缠等。去赤峰的学员由纳木吉拉朋斯格、胡勤达来二人带队，希日莫当通事，布日嘎苏台的额尔德尼，和布特哈达的赛音乌由图，赛日莫的特格希都楞、全布乐，合木和特忙哈的塔日巴扎木苏，巴拉诺尔的奔宝(格日乐图)，沙巴尔台的希日布、全普乐(赛音朝格图)等十一个人坐上两辆牛车出发。

被远大理想所鼓舞的这十一名青年由大板至赤峰的4

百里路程却坐上牛车走移场式的赶了路。

赶着牛车,长途跋涉,过巴林巴彦汉南麓,渡西拉沐沦河,途经翁牛特巴彦罕山北麓,穿越山川沙漠。几个青年在途中唱起“欢跳的蒙古青年”、“老虎的力量”、“莫呼如、莫呼如,少冷哈达”等歌曲,解除赶路的凝乏,不怕路上有拦路抢劫的土匪,跟着牛车,抡起柳条,蹦蹦跳跳赶路。

纳木吉拉朋斯格是个既顽皮、滑稽又能说会道的小伙子。小时候他和其木德道尔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俩在沙巴尔台河滩放牧羊羔牛犊,唱对口好来宝,让奶牛和牛犊混了群,受到家长的斥责。他是清下嗓子就能唱,拿起胡琴就能说好来宝的人。以他为首一同赶路的人还不热闹吗?!大家欢声笑语、高高兴兴赶路。

胡勤达来、希日布他俩当过几年兵,自来就沉默寡言、老练稳重。可是往火上浇油却错不了的小伙子。

希日莫、塔日巴扎木苏、尔德尼、奔宝、特格希都楞等人老实巴交,时而弹耳朵,以笑来表示一切,听从伙伴们的话跟着走。

两个全布乐因年龄小,绝对听从长者的话。可是这两个健壮的小伙子要求学习和进步的决心并不比别人落后。

“老牛车赶路,何时到赤峰呀?”

“昔日喇嘛不是能步行到塔尔寺吗?!”

“人们不是用牛车从额吉诺尔拉盐,送到赤峰,赶路一个半月回来的吗?!”

他们这样拐弯抹角地谈论,相互鼓励着赶路。

两个车夫也把所见所闻当做故事谈论,使青年们逗乐,

高兴地走。

他们经几天几夜赶路,野营露宿,到乌丹北门。

事情不顺却遇到了军人的查问。

穿灰色衣服,带长短枪的几个人出来挡住牛车,对他们几个穿皮袄的人进行搜查。

用奇特口音说话,搜查那样细致,令人惊讶。

喀喇沁籍,通晓汉文汉语的希日莫同他们谈话联系,且拿出介绍证明给他们。

军人对待他们和颜悦色,并把他们送到街里一个正南大院。

牛车和穿长袍衣服显然引起了南方人的兴趣。

从草苫正房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矮个、身穿鸽灰色衣服、紧扎腿绷,青脸稍瘦的人面带笑容地迎接他们,了解他们的原委,互相握手,把他们请到屋里。这就是八路军吗?”

他们之间低声耳语,在谈论。

那个人如同亲戚一般,亲切地挥手谈论一切。

这帮为追求解放之路、学习革命道理的青年,如同到姥姥家一样高兴,忘却了赶路疲倦。

经希日莫通事交涉和传达,使这帮志同道合的青年了解到,这里是热北地区八路军的一个团,那个人是这个部队的政委,他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学校,并把这两个牛车及车夫打发回去,明天用大马车送他们到赤峰等话语,他们心里十分高兴。他们在乌丹受到八路军的热情款待,第二天一大早坐上大马车唱着歌儿欢快高兴地赶路。

春天的一个晴朗天,从乌丹一大早出发的马车急促赶

路180里地,没太阳以前到达赤峰。

赤峰虽然刚解放不久又和国民党占领区较近,但街里秩序挺好。

对于没离开过巴林,除了大板街以外没到过别处的这帮青年来说,感到赤峰是个迷人的大城市。

内蒙古自治学院校址占据着赤峰三道街至六道街以北向南两个胡同中间(六道街北大院是现在的红山区委、政府大楼,六道街南大院是现在的赤峰蒙古族中学大楼),一排排土瓦房三个大院。

他们找到校部交给介绍信并报了名。

校部负责人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并给每个人发了两个大碗一双竹筷子。从此,这样开始了供给制的艰苦生活。

“把你们分配到新近办的蒙文班,宿舍和教室在东边两栋房西头的房间,现在就要安排宿舍,把你们介绍给老师们!”

象是学校工作人员模样的一个人较笨的说着蒙古话,指给宿舍以后走了。

没有多久,进来了四个人。

他们介绍了一个教员模样的人。

介绍了蒙文班负责人胡格吉夫,他的脸上长了疙瘩,眼睛机灵,身穿灰色大衣,是个敏捷而身材端正的人。

胡格吉夫老师观察了一下这些新学员之后,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从胡格吉夫老师介绍中了解到该院院长是云泽(乌兰

夫),副院长是金启先,教育长是齐永存,左智。

介绍那个高个子、长脸,象古代文人一样身穿蓝色长袍,头戴毡帽头儿的人为蒙文班的老师赵国藩(清格尔泰)。

又告诉那个中等身材、眼光锐敏并戴眼镜、身穿青缎马褂、头戴红疙瘩帽头儿的人为戈瓦老师。

谈论当中了解到戈瓦老师善说能讲,学识渊博,使人们钦佩。

对他们的关怀中可以知道,身穿皮袄的几名巴林青年到达后不仅活跃了校内气氛,而且在赤峰以及冀热辽地区引起了领导们的关注。

那当时,政局未定,战乱未停,反动势力未被平定,群众没有觉醒,因而学院的各方面条件很差。

论住址,以宿舍、教室、食堂三位一体的土房,象乡下车马店一样,带对面炕的空旷屋子。

吃的是小米饭、素淡粗菜和开水。

学校所处的这一切环境条件,更加激发着这四个班级四百多名学员的干劲和智慧,为追求真理而学习,为无产者穷苦人的解放而奋斗并准备付出生命和一切,实践已经证明他们学习上的进步和工作中的成绩。

虽然学校条件那样艰苦,但是学员们在老师的教导下,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社会发展史、哲学及内蒙古解放之路和文化知识等。在布赫老师的带动下跳舞唱革命歌曲,每个星期六召开生活会,以使校院内造成生动活泼的局面。仅仅几个月时间,明白了很多道理。

在校期间,很多优秀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从巴林去的

十一名学员中,纳木吉拉朋斯格、尔德尼等人经胡格吉夫老师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党。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进犯赤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能在赤峰驻,因而在一个连兵力的掩护下,全校用大马车转移到后方的巴林左旗林东镇。

搬到林东以后,从昭乌达盟各旗招收了很多蒙古族学员,在巴林青年一代中,乌力更、穆仁、布仁巴图等人入了内蒙古军政学院,那孙达来、孟克宝力格等人入了内蒙古军政大学,其哈拉嘎、业贺吉如木、孟克巴图、特古斯巴特尔、尔德木图、胡尔查等人入了鲁艺学院。其他都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

当时,那些青年在革命军队和革命运动中成为优秀骨干力量。

最后去赤峰学习的十一名青年回到林东后参加两个巴林的减租减息试点工作。从试点回来后由昭乌达盟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给他们分配工作。纳木吉拉朋斯格被分配到巴林右旗公安局工作,尔德尼被分配到巴林左旗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希日布、赛音朝格图等被分配到巴林左旗查干哈达、比鲁台区自治运动联合会任主任,胡勤达来、赛音乌由图等人被分配到巴林右旗34团1连、2连任指导员。格日乐图被分配到34团工作,希日莫被分配到查干沐沦区自治运动联合会任主任。

曾受到革命教育的这些同志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革命事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赛音乌由图担任34团2连指导员期间,于1946年冬天被乌尔他的土匪杀害。

胡勤达来在骑兵34团期间,于1947年春天遇难。

纳木吉拉朋斯格在担任锡盟法院院长期间,受牵连所谓“套格陶、纳木吉拉朋斯格、宋迪叛国集团”冤案,于1968年“文革”中,在锡林浩特市不幸去世。

得到解放的人们永不忘记这些同志的功绩。

内蒙古自治学院于1946年秋天搬到林东以后到1948年,前后办了几期军、政班,培养了很多蒙族青年,为革命骨干力量的成长,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革命的摇篮。

1948年以后,以阿鲁科尔沁旗籍的阿尔斯郎为校长的内蒙古自治学院分院在林东继续办学,又培养了很多行政干部和教师。

(根据赛音朝克图等人回忆整理)

回忆扎噶尔王片断

口述：德力格尔

整理：叶 喜

我今年已七十六岁了。原籍滨图旗人(现已撤销行政建制),家里遇难父母去世,我为了寻求生活,离开家乡经扎鲁特等旗,来到巴林右旗通过好友莎嘎斯格尔,进了巴林王府大门,我见到了王爷大人。王爷是一个身体魁梧,五官端正,语气温和的人。从此相处决定了我在巴林草原落脚的命运。我便成了王爷的仆人。

进了王府我有了靠山,并承担了为王爷做民族式餐的重任,我是即感到光荣格外高兴,又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最后下了严于律己为王爷卖力的决心,那时我才十八岁。

一九三三年王爷调离家乡巴林右旗去开鲁任兴安西省省长要职。我们也随同王爷到了兴安西省省会开鲁。省里专门为省长扎噶尔王爷安排了一处独门独院住宅,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很宽敞。除王爷和随同人的住间外,还有会客厅等,但室内设备简便,普普通通的。

王爷在开鲁任职五年期间,在省长住地来客甚少。有时也来些客人,但不是经常不断,有时候日本人来,亲属朋友也来,其他人也有。我本人是为王爷专做民族式餐的厨

师,对他们不认识不问,客人来,办公务,还是办私事就不晓得了。我知道有的人是专门来同王爷玩的,“打麻将”、“抽大烟”或饮酒玩乐的,比如甘珠扎布之类人。扎噶尔王爷本身特点是好抽大烟饮酒适量。不大玩乐,特别是他极力反对饮酒玩乐过程中叫女人来唱唱跳跳之类的事。

我记得大约在1937年或1938年又把王爷从开鲁调到新京任总裁。我们也跟随王爷到了新京,那里也为总裁安排的很好,有比较宽阔的一处住宅。王爷到新京任总裁期间,他的生活和活动方式一直同样。

巴林王的日常生活方式不那么特殊。王爷吃食适量,每日多数吃两顿(早晚),有时候加午餐,除王爷外他人一年四季全部每日两顿饭。指早晚餐,主要是吃些米饭、面饭,菜类,随时搭配,量不多、数多,顿顿六碗六碟(都小碟)。这是王爷和随同人员的家常便饭,王爷要吃民族饭都安排在中午,主食有炒米、奶豆腐、黄油、糕点、肉食和奶茶外,还加饺子、包子、面饼之类食物。有时候中午还要吃些肉粥或面条等。凡有特殊情况,宴请高级官员、有名之士时专雇厨师准备饭菜。我在王爷跟前呆了八年之久,我感到他们日常生活俭朴,从不浪费,饮食同餐。主要生活资金来源于靠自己的俸禄维持,但从家乡巴林右旗也送给他些钱财。因他是高级人物,啥都不缺就是了。

对他们的活动方面,对公务、政务活动我就难知。一般性活动比如逛逛街,散散步,普通的人来戚去,小型玩乐等知道,但难说全知。我认为王爷是平易近人,性情温和,有爱戴部下感。我们有一次同王爷去商店逛逛,进了商店王

爷问大家,你们需要买什么东西啊?说呀!要买东西由我来点钱。大家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言,但有的人买了香皂一类小型物品或小来小去的東西,王爺就付了款。如买大件的,我们也不敢要呀。有时候王爺去商店自己购东买东西,我们跟随着,有一次他想要一件长袍,当场试穿后,问大家,你们看看好不好?合适否?众说,好合适呀。王爺就说,我看不太好,相不中,你们谁要呀?谁也不敢说要。王爺瞧一瞧大家,想给谁就给了,他也一文不收送给了他人。

扎噶尔王爺有一个独特的稳情,我和他接触八年来没有琢磨透。一是王爺上班或出外行步时。从他衣兜里向外拉拉钱的,这王爺本身有意无意我们不明。将这个钱谁要拣起来都如数交上,给王爺送时,他说:啊是我的钱吗?我丢了吗?好好就收下。如果谁拣了不交或少交就不行啦。叫那个人来不训斥、不发火,语气温和的对他说:你在我跟前缺钱了吗?那么,你就回家种地养畜生活吧。王爺有话谁也不敢,动身就回家了,二是他的剩饭,指粥一类,他和我說,德力格尔你把这饭给留着,我以后吃。冬天还可夏季怎么办呢。我就按他旨意留着,过几天后还得追要那个剩粥,有的发臭根本不能吃,我就拿来给他看,一看实在不能吃,王爺说算了吧。若是将剩的饭他人吃了或不给看扔了的话,那可就坏了。把那个吃的人或扔掉的人叫来,又说了:你在我这里吃不好,吃不饱吧?我那天的剩饭你给我吃了?好吧,你就明日返回老家吧,把他就打发了。

巴林王爺极力反对那些占、贪、馋者。在他跟前多吃多占多用的人站不住脚,王爺也不用这种人,我旗随同王爺的

人一时不注意,途中回来的大有人在。不仅与贪王爺的东西,占他人或百姓的也不行。但是王爺对部下温和,仆从人员有一定好感,对某一个人从没有愤怒发火,训斥殴打,很是宽厚,能够各展所长。巴林右旗王爺从清朝到中华民国,以及“满洲国”席位很高,是堂堂有权有钱有势的高层人物,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王爺在开鲁、新京呆了十余年,当时扎噶尔王爺才五十来岁的壮年人,也没带领福晋,很长的时间都过着独身生活。在这期间我没有发现和听说王爺做奢侈、淫欲之类事。那时候他即是王爺又是总裁,有权有势的人,我认为什么事情都“合情合理又合法”能干得出来的,但巴林王爺就没有这样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人物。

我年龄近八旬了,有些事忘了的,但以上我所说的是亲眼亲历的片断望参考。你专程来走访我,了解五十多年前的历史事实,让我口述,虽然讲了些情况也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啊!我个人向你表示感谢。

我的活佛生涯

口述：元旦扎木苏

整理：叶喜

我一九二七年生于巴林左翼旗乌义尔图(今划为巴林右旗)的蒙古贵族孛儿只斤氏(鲍)后裔色旺敖日布家里。母亲斯其格是一个纯朴的蒙古族家庭妇女。我弟兄三人中排老三,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九三一年我才五岁把我确认转世活佛。一九三三年又把我请到床金庙,从此我开始了上层喇嘛活佛的生涯。这里我就十余年来的活佛生涯简述如下:

巴林左旗的床金庙是一个建筑宏伟壮观较大的喇嘛庙。该庙是清康熙年间由巴林左旗贝子王爷札萨克满珠习礼创建,是巴林左旗历代王公贵族最为信仰的喇嘛庙,所以人们均称该庙为旗庙。

于一九三一年该庙的活佛去世,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床金庙的大喇嘛们在左旗札萨克王爷色丹那木吉拉旺宝的支持下认定活佛喇嘛活动。正当这时确认我为床金庙转世活佛。于是把我选为活佛的这一年,班禅大师来内蒙古各地传教,我父亲和上辈也把班禅大师敬请到我家里,让全家老少、亲朋好友们及乡亲朝圣叩拜。这样一来我的名声也不

一般了,人们都认为我是真正的床金庙转世活佛。我离开家到床金庙,是在一九三三年,当年才七岁。我走进庙门后我的师傅和老喇嘛以及有学之士者开始教起了经文。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就在我进庙第三年,那年我已十岁,把我送到阿鲁科尔沁旗罕庙深造,目的是跟该庙活佛查干葛根为师学徒。所以我到罕庙的第一天起就敬拜查干葛根为师。于是查干葛根给我教了沙尔经(一种密经)、篆经(美术经)、经译(经文翻译),还教我本民族语言文学等几种。另一个师傅叫拉布哈,专教我经卷,念经等事。我在那儿学经期间,一心听从师傅们的教导,集中精力,毫无动摇的真心学经,从未违犯庙规,比较认真讲究佛门礼。在罕庙学经十年,我在师傅们的经心传教下基本上掌握或精通了普通的经卷,并且有了一定的念经知识。如我在学习期间,该庙每次举行的大型经会上念大经时我高声念经,背经较熟,并未教我的经卷我师傅监视着。在罕庙学经期间我的成绩还不错,所以受到了师傅们的好评和爱戴。

在一九四四年从阿鲁科尔沁旗罕庙回到家乡床金庙。来到之后,庙里的一切宗教事务由我会同有关人士来操办。在庙里举行大型经会或其它宗教活动时,由我出头露面,即来磕头的,在允许的情况下,用经卷点一下来叩拜人的头;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来磕头的人,在外屋见一面,待受礼后,磕完后同样,用经卷点一下来叩拜人的头,即行回避。我在佛堂庙上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

我除床金庙庙仓的财产外,还有三处葛根仓(活佛专用财产)。在床金一处住宅外,还在索博力嘎庙和查干白棋庙

各一处。我的这些住宅处也宽阔好大的，特别是床金住宅独门独院，院内分为前院、中院、里院和东西两院。西院指沙日音仓（活佛仓、主要对内的，喇嘛专门朝圣之地）；东院指哈日音仓（主要对外俗人朝圣所准备的）。

我为保护财产，有几个亲信管家人，当然不仅是几个人，有很多人为我跑前跑后的。但主要人物是元旦扎木苏为道尼尔（管内勤），玛格苏尔和额木和二人（管外勤），玛格苏尔的特点是在地方联系面较广，人熟地熟，并有一定威望的人物；额木和这个人在外交上有一定高招，特别是同日本人能合得来。同时，我为了保护个人名誉和财产安全重用这些人。他们也为我卖了力。

一九四五年东北解放，东蒙古自治政府在巴林左旗建立了第一个革命领导政权——巴林左翼旗政府。第二年由于当时国内解放战争的复杂环境条件，旗政府曾一度搬迁到床金庙办公，开展工作，当时我或多或少接受了革命道理，在思想上有了一定转化，对民主革命也很羡慕。所以，我主动腾出整个大院交给了旗政府。时不久政府开始动员青年喇嘛参加革命队伍，当时庙里的喇嘛都认识不一，是否参军参政等问题上争论很大，也很激烈，特别是一些老的大喇嘛们根本想不开，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认清革命发展趋势，便同政府联系后亲自带头带领五名喇嘛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减租减息运动。这件事在巴林左旗喇嘛界中影响极大。从此以后，政府对我更是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思想上帮助，经常给我宣传革命道理。我当时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一些革

命道理，并下决心还俗参加革命。党和政府也根据我革命愿望，把我送往林东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完全结束了荣华富贵的活佛生涯。

我经过了民主革命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成绩应该归于党和人民。

一九五〇年根据组织的安排调入卫生战线，后来把我调到巴林右翼旗卫生行列。在这参加革命的四十多年中我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认认真真地完成了党政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有一度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给我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平反昭雪。市、旗两级党委、政府也给了我两级人民政协委员的重任和荣誉，对此我向党和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末民初巴林右翼旗畜牧业的经营和商品生产交易略述

韩士龙

(一)

清代,巴林右翼旗所饲养牲畜数量未有详细的记载,也难以考证。相传清初巴林南部的益和诺尔有一家牧民牲畜达十万头只,并打了“宝木”之印(即万头只)。幸福之路有宝木本浩特格尔的两个地名,一个在查干勿苏艾勒附近;一个在他拉宝力格嘎查东南部同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交界处。这两个地名的来源,经过地名普查办的调查和考证,均为清代牲畜达到了十万头只的牧民居住地,而且烙了“宝木”之印而得名。也调查到了十八世纪时,巴林的牧畜业有过相当发展的历史。但后来,特别是在清末民初以来巴林的牲畜头数逐年减少,草场日益退化,牧民生活日益艰难。这显然是自然灾害、兵匪掠夺等原因造成的。但主要两个原因就是由于清末民初放垦后牧场缩小,牲畜密度在可利用草场上日益增加引起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巴林西部放垦,民国十四年林东放垦的地,都是水草相连的丰美牧场。据一九三〇年热河省政府建设厅

调查记载:林东垦务局四次放垦荒地四万八千顷。林东设置辖区,是原来巴林左右两旗属地。其中属原巴林右翼旗放垦的二千六百余顷。置林东设置局,迫使巴林右旗牧民三百户被迫离开水草相连的乌力吉沐仁河岸,迁到他玛哈芒哈(今迫毛都一带)、哈通河等沙漠地带,土质贫瘠,在畜牧业条件上都比不上原来的地方,放牧场狭小,打草场地缺乏,牧民养畜十分困难。

在同一时期,旗内二八地面积年年增加,并他本沟、巴彦琥硕等地,都是春季出场和打草的好地方,也都变成了耕地,成了影响畜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兵匪掠夺、战乱的损失。在民国三年发生的牛年之役,蒙汉双方的队伍,抢劫骑马(外蒙军在古日古勒台一带两次即赶走一百匹马)、宰杀牛、羊无数,旗北部的牧民赶着牲畜,到坝后避难,没有冬营设备,所以牲畜冻死惨重。这次战乱的损失,据知情人的回忆,仅在坝后(今西乌旗)的损失,就有一万头以上。在当地的损失头数也很大,总计约有三万头只牲畜的损失。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历年都有大小匪帮在各地抢掠牲畜。仅在民国十年的一次窜来一股土匪将四家屯牧民的三百多匹马赶走。沿旗南部,类似事情更多,三十、五十被劫走的牛、马不计其数。

自然灾害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民国三年(1914年)冬天的大雪,冻死牲畜近万头。民国五年(1916年)春,大批牲畜主要是牛因瘦弱而死的,除查干沐沦一带外,达到全旗范围,损失了三分之一,个别户死亡超过半数,当时有人估计云:大巴林牲畜损失五万头以上。

到了三十年代,牲畜头数日见恢复。但是,从一九四〇年起,日伪统治者施行强盗式掠夺,“出荷”有军马出荷、役马出荷、肉牛出荷、役牛出荷、皮毛出荷等名目繁多的项目。每种出荷每年都有一至二次。牧民群众常因牲畜不合格受到责骂,结果是忍痛把最心爱的骑马、耕牛交给日寇。综合在五年间本旗出荷的马八千四百匹、牛四千一百头、羊二万五千只,总计将近八万头(只)。这对牲畜的增长和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经营管理上仍因循守旧,不采取跟群放牧,冬季多数是有圈无棚,有的连圈也没有,遇到暴风大雪,就受到损失。一九四五年春,暴风成灾,牲畜顺风溜走,全旗计损失牛、马二千多头匹。牧民的保守思想也表现在管理不善,对牲畜配种极不注意,牲畜的饲养管理完全依靠自然,听天由命。在受到一次严重打击之后,重新以坚韧的精神辛勤劳动,繁殖积累。所以,牲畜的发展极不平稳,忽高忽低。民国以来,连年都有程度不同的人为灾害。

牲畜的疫病:旧社会由于防疫措施跟不上,历年各种畜疫不断发生,如牛疫、牛瘟、牛肺疫、羊痘疹、羊疥癣、驼癩等。当时既没有医疗机构,更没有各种疫苗和防治的药品。牧民虽然有些传统兽医技术,由于保守思想严重,也不能传播推广,仅局限于少数人。因此谈不到根治或预防。一旦发生畜疫,就要有大批牲畜死亡。一九三八、一九四二两年发生过两次较大的牛疫,当时是日伪时期,虽都采取过防疫措施,但也未免曾发生牛疫。在一九四三年作了全旗范围的牛疫血清注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日本人的统治下,

他们是为了出荷,才做到这项工作。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根治。因此,由于各种畜疫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牲畜的增殖。

(二)

清初巴林一带的蒙古族人民所需生活用品,除了内部实行简单的物品交换外,主要依靠清政府通贡和指定的樵场等小范围的内部来解决,并无其它活动。到十八世纪初,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也有一些小商贩到牧区经商,商业规模很小,主要形式物品交换。到十八世纪中叶(即雍正、乾隆)清政府施行“借地养民,移民行边”政策,大量的农业移民入昭、卓两盟,由此向北开垦牧区。开始出现了农业人口聚集的居民点。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建筑房屋,设立店铺,开始经营农牧业所需商品,并逐步扩大。随着经商规模越来越大和店铺的增加,开始组成商品经销帮会,各自划分经商势力,逐步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商业,也形成了城镇。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嘉庆年间)商铺猛增,商业活动也日益扩展。

到了十九世纪初,有不少商铺为资力雄厚的巨大商号。并且与当地的王公官僚地主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封建性的商业垄断,他们不仅垄断物价,操纵市场,而且也在各地的商业垄断,他们不仅垄断物价,操纵市场,而且也在各地构成了某些商帮的势力范围。他们以土地和牲畜为抵押借给钱,借给物品等手段拉拢当地的王公贵族。结果,这些商人不仅控制了封建统治者,而且揽得了大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牧民中间进行商业活动和高利贷剥削,并向广大牧民榨取和勒索。后来由于牧草场连续不断的放垦,农业区逐

渐广大,蒙古族牧民除了极少一部分转为农业外,大部分向再偏僻的牧区转移,或进入沙漠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丰富畜产品而兴旺起来的商业,也有相应的变化。在城镇设铺的经营重点主要转向农区市场,有极少一部分转向为牧区的所谓“做旗下买卖”的专业性商店。与此同时,相应的也出现了“出拨子”、“贩子”等游动于牧区的特殊商人。随着帝国主义的人侵,一部分商人又转为买办或代理店。总之,解放前的商业,根据地区特点,经济特点和社会特点形成了它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买办性质兼而有之的特殊形式。由于农区的扩大,主要商业城镇距牧区越来越远,加之语言习惯的不同,特别是由于经受商人的欺骗和受剥削的牧民产生了憎恨心理,很少携带自己的商品到城镇进行贸易。这样,一部分商人便到牧区活动。这些商人活动于牧区的各个角落,把各种各样的商品卖给牧民,主要是把牧民的畜产品购买下来,然后销售出去,这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汉族文化和活跃牧区经济生活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以诈骗、巧取、压价、高价为手段,也给广大农牧民带来了损害,这就是流传下来的所谓“旅蒙商”。

上述商人在牧区的商业活动形式各地不尽相同,但也是大同小异。大体上分为深入牧区与牧民直接交易的,以行商为主要形式的“出拨子”和“贩子”以及在重要商路或集散地设店立铺专门从事牧区商业的“做旗下买卖”的杂货铺、牛马店、皮毛店以及城镇市场的牛马经营等。

“出拨子”是指携带商品尾随牧民的游牧活动,在喇嘛

庙附近以及牧民来往频繁的地点设立半定居点(也是用蒙古包)贩卖货物的商人可住,他们在牧区常年累月游动经商,绝大部分牧民生活用品经“拨子”之手购进,而绝大部分畜产品也经“拨子”转销出去。所以,“拨子”在牧区商业活动中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出拨子”主要是大集散地和城镇大商号,以店员若干人携带货物组成,也有个人集股组成的,规模大小不等。活动方式有游动和坐庄之分。坐庄是拨子在牧区简易定居货店。有些拨子派出一个或几个小拨子深入牧区的偏僻地带作游动拨子。一个拨子通常由四、五个人组成,较大的达十余人,由掌柜的一个人率领。掌柜的必须精通蒙语,通晓商业知识,并为牧民所熟知的人担任。在牧区,经商信誉是基础,所以,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就不能担任。否则无法招揽生意。

拨子携带的商品,大商号派出的就由自己店中挑选,而多数拨子是在临行前从货栈赊取。等换回畜产品后再偿还,所以不需要多少资金。携带的商品数量和种类,也因规模大小或地区条件不同而有差别,少者二三百元,多者几千元不等。种类原因,地区条件和利润多寡而定。各地区的拨子根据本地区的产品和换回的畜产品种类要求也不一样,也很注重牧区有声望的货物。北京拨子携带些轻工业产品,如木碗、首饰、珠宝、绸缎、蒙刀……等。换回的是绒产品,如木碗、首饰、珠宝、绸缎、蒙刀……等。换回的是毛皮张。其它拨子林西、乌丹携带糜子、面粉、荞面……等。换回的多为牛马。他们往往是以假充真,以劣等货物稍加修饰后假冒名牌,以烧料代替宝石,以造丝代替丝绸,旧铜

器重镀新面,粮食面粉掺假,酒中掺水等,都是拨子常用的最普遍手段。

拨子一年当中出动到牧区三次到四次,每次按牧区生产季节安排活动。春季抓羊毛,秋季抓牲畜,冬季抓皮革,此外,还要赶庙会。

拨子不仅抬高他们手中商品的价码,而且通过实际上的物品交换,把作为贷款的牲畜、皮毛等的价码大大压缩,然后,再把这些牲畜和皮毛经过城镇的老客经纪、皮毛店、牛马店之手转销出去,前前后后几经周转,就能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额利润。所以广大牧民不仅受王公贵族压迫榨取,还要受这些奸商的盘剥。那时的牧区经济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日趋衰落。

“拨子”是不携带货物,只深入牧区购买牲畜和畜产品,然后到城镇市场出售的人。因为贩子不携带货物,而从牧民手中购买牲畜和畜产品,所以必须在牧民中有很高的信誉。实际上贩子在牧区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常常是王公贵族的债权人,这些王公一方面在生活上奢侈腐化,一方面去北京、围场朝见和围班时需要大量现金,不得不有求于贩子,于是贩子便乘机成了高利贷的债权人,从而倍受王公的优待,在牧区任意活动,变成了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收购的牲畜或畜产品有时付给现款,但多数是订立合同,把收购的牲畜、皮毛运到市场出售后再来牧区结帐。结帐一般是一年一次,也有的售完后回来结帐。结帐时付现款,有的用“票子”,票上注明品名、数量、店铺号等,牧民可以拿这个票子到指定的“坐庄”或附近城镇的店铺中换取票上注明的货

物。这种贩子实际上是不用现金,只在市场和牧民之间起到传递作用的投机商人。

做“旗下买卖”的这是一种商铺。多设在靠近在牧区的城镇,如经棚、林西、大板、乌丹、林东等地。他们经营方法与普通的商店无异,只是他们专作牧民的买卖。在这种商铺的栏柜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刻的标志,他们备有供牧民住宿的房屋和栏牲畜的棚圈,掌柜的都精通蒙语。他们代牧民销售牲畜和皮毛,并满足牧民需要的货物,在这种周转过程中,提高货价,压低牲畜的皮毛价格,牟取厚利。这些商铺大多派出拨子或坐庄,平时也经营牧区买卖。

“六月悠热鲁庙会”是牧区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大板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才有了少数的商铺,在商铺出现之前,牧区内部实行简单的物品交换和一些行商外,就依赖于六月庙会了。商人们根据牧民生活的需要的必需品,衣料、杂货等进行贸易交换。在大板最热闹的市场,就算是六月庙会了。大板的六月庙会,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的全旗十三个庙的喇嘛参加一年一度的“六月悠热鲁庙会”(蒙文《巴林王公世系一览表》载)大部分在大板东大庙举行。每年的庙会期间,经棚、乌丹、林西、赤峰、锦州、张家口、太原、北京、天津,还有从热河、辽宁、河北、察哈尔等省赶来通商,设摊营业,交流物资。从日杂百货,到酒馆妓棚应有尽有。内容繁多,热闹非凡,活动项目引来了来自各处(如锡盟牧民赶着勒勒车拉着蒙古包,赶着要卖的牲畜,买回一年所需的商品)各方的几万人,一年一度的庙会,实际上形成了规模很大的交易市场,也是各地商人牟取高额利润的一

次机会,一九三〇年以后,有了十几家店铺,但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牧区的大批牲畜大量皮毛被运出去。这样的庙会、商品交流,长达两个多月,现在已成为“那达慕”大会了。至今草原上的人们还传颂着昔日庙会的动人情景……

巴林右旗境内森林资源及其历代的被破坏略述

莫胡尔

巴林右旗境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山区都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树、榆树和柞树、山柳、山黄榆、山杏、山丁子等多种乔灌木组成的混交林。

右旗境内的森林分布于三个主要山区,除此之外,还有大小不同面积的散生林和大量的灌木,这些灌木分布于山区之外的沙漠、丘陵、土山和平川地带。根据其分布的不同地带和不同树种等情况,概括如下:

第一个主要山脉是罕山(赛汗罕乌拉),这个林区是右旗境内最大的山脉,山脉走向是由东北方伸向西向。所以,罕山是大兴安岭支脉,北至锡盟西乌旗的哈拉根台连接的林区。罕山的原始森林资源,是以落叶松为主的白桦、风桦、山杨、柞树组成的原始森林。

第二个山脉是西拉沐沦河北部、查干沐沦河南的巴彦汉山和巴彦和硕山。巴彦汉山东至葱根吐山,西至巴润哈日毛都。巴彦和硕山东至葛根少冷山,西至亚马图山,西到山脉的中间是赛力木沟。这两处山区的森林面积较小,但

都生长着独特的珍贵树种。如巴彦汉山的自然林是以油松为主的柞树、山黄榆、山杏等组成的混交林。赛力木沟内生长着茂密的沙榆树。

其次是巴彦和硕山区的北坡生长着以杜松(土名称为臭松或刺松)为主的山黄榆、山杏等组成的混生林。向阳坡的山脚下沙丘陵地带生长着固沙的金鸡儿等灌木丛。

第三个山脉是巴彦套白山,这个山区的范围:东至阿布得仁台山,西至查干沐沦河以东的台本敖包、哈布其拉山。这个山区的自然林是乔木少而灌木面积最大,桃山北坡生长着以白桦为主的柞树及山黄榆等组成的林区。该山区的阳坡和其他山川、沟坡等地带均为柞树、山黄榆为主的山丁子、山杏、榛柴灌木。虽然都是灌木,但在历史上生长的面积都贯串到全旗的沟川平坦地带,当时的灌木丛郁闭度达到0.7至1.0的程度。该山区的西哈娄川(原名叫巴仍坤地)都生长茂密的高大榆树林。

境内还有大小不同面积的散生林,最大面积达100公顷,最小面积20公顷左右,如珠腊沁庙、十家子、老道板东沙丘和古日古勒台庙东坡的榆林。葛根少冷山前的柳树林。要日吐庙前山和鸥布根色尔拉山、黄花坝,巴彦沙那等山区都是以白桦、风桦为主和柞树林组成的混交林。

右旗东部东哈娄一带山区有少数的亚乔木林以外,多数是灌木丛。还有石匠山、他本沟、尔根乌苏等地区的大面积土山、丘陵、平川地带都生长着茂密的山杏为主的其他多种灌木林。

上述三个山脉的森林和各地区的散生林以及灌木丛,

都是巴林右旗历史上的宝贵物质财富。是广大牧民的牧业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资源,同时对珍贵的鸟兽野生动物繁殖巢息等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巴林右旗宝贵的原始森林资源,被毁灭性的遭受严重破坏,都有其历史根源而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由三个时期造成损失比较突出,现分述如下:

第一是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巴林右旗的王公贵族和其他上层权势分子,为了建筑其豪华的府第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府衙。用迷信手段,统治奴役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而建筑了大小不同的各种庙宇和寺院,因此,那些王公贵族和其他的上层台吉门,特别是清王朝的两个公主下嫁到巴林札萨克王爷以后开始的,首先建筑札萨克府和康熙行宫。并引进喇嘛、佛教,以便更有效地统治愚昧无知的广大蒙古族,建筑两个大庙,东大庙(荟福寺)和西大庙(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札萨克和他的幕僚贵族台吉们,为了把喇嘛、佛教发展到旗内各个角落,又继续兴建大小不同的喇嘛庙、老道庙、和尚寺等,如阿贵庙、古日古勒台庙、黄花庙、会庙、要日吐庙、沙巴尔台庙、太本庙、嘎拉斯台庙、苏布台庙、珠腊沁庙(大公主陵)、十家子二公主陵。

其次是康熙为了祈年而建筑一处玉皇庙,公主为了在年节礼佛而建筑一处娘娘庙,还有经堂庙、老爷庙等。除了建筑上述庙宇寺院以外,那些王公贵族上层台吉们和活佛喇嘛们相继建筑王府,公爷府、协理府和上层台吉的府第以及各喇嘛庙的葛根仓等,还有每个庙居住的喇嘛宿舍。所有这些寺庙和府第都是大型建筑群、需要大量各种类型的

木材,完全是由旗内自然森林资源中砍伐。

例如:赛汗罕乌拉山的大面积落叶松,特别是平坦地和易采运的山坡,沟川等地的原始林被乱砍滥伐和不断的发生火灾。从而使大部分地区原始林变为白桦为主的、山杨、柞树组成的次生林,密林变为疏林,同龄林变为异龄林,有很多的落叶松迹地变为灌木或变为光山秃岭。

第二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扎噶尔王以报效名义将右旗西部土地放垦,1912年划出林西县,由巴林王收取地租。那些王公贵族和部分上层,人物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为所欲为,乘机开始出租经营农业谋取不劳而获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招集旗外农户进行毁林和草原开荒,其手段是以“二八”、或“三七”分成的方法开荒垦田,从而使平川地的自然灌木林和大量草原造成绝迹。

其次是民国时期,热河省派遣第九旅的一个连队,连长姓徐常驻大板,撤走后,热河省又派遣第十旅的赵团来大板驻防。他们任意抓人派工为他们服役,在一年四季派工派车砍伐平川和丘陵地带的灌木做烧柴,乱刨杏树、柞树根疙瘩烧炭取暖。致使大板附近山川和丘陵地带的灌木丛和草原受到又一次的严重破坏,从而出现水土流失,丘陵地带草原逐步形成沙化。

第三是日伪时期,右旗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同时,相继设置伪政权机构,如右旗伪旗公署下设很多机构,还有伪警察署在各区设分驻所,并在全旗的各要道口都设置伪警察派出所,除此之外又建筑大量的日本人的家属宿舍和日本医院、建筑常驻大板一个团的驻军设施。

需大量的木材,除部分从外地运来外,绝大部分是在当地砍伐的,以及这些伪机构常年需要烧柴、取暖用烧木炭等燃料。对右旗的自然森林资源和大面积的灌木林进行掠夺式乱砍滥伐,使历史遗留下来的散林迹地又遭严重破坏,所有的山杏、柞树、黄榆、榛柴等灌木林几乎绝迹。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林东街(外号彭粗脖)的包工头彭继武,在巴林左旗日伪旗公署的支持下,雇佣一批人,在小罕山的大东沟和正沟设立“木局子”。对罕山的大东沟、正沟和小西沟的次生林进行了大量的乱砍滥伐,对易采运的坡地和沟川的成熟林,如桦、山杨和针叶(落叶松)等基本采光。一九三八年前后巴林左旗日伪旗公署,又对小罕山散存的落叶松进行一次掠夺性的砍伐。使平缓山坡上生长的落叶松全部采光。仅在深山、陡壁和不易采运地带存在着残缺不堪的落叶松和极少量的云杉幼林。小罕山北边哈拉根台山区也存在部分落叶松,早已划归锡盟西乌旗管辖。

右旗伪旗公署对自然林进行恶劣破坏的同时,又采取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在一九三七年左右,以搞林业事业的美名,在大板南查干沐沦河北岸,建立一处四五十亩左右的苗圃(现大板桥北,路两侧),培育的主要树种是小叶杨之类。

清王朝统治前期,巴林的牧民群众都以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居住的房屋都是蒙古包,并无高大的建筑物。自然森林资源被人为的破坏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山区的自然森林和平川、丘陵地带的灌木林保持了稳定性,达到植物生

态平衡,但有时也曾发生过人为的火灾等。从清朝至日伪经过三个时期中的任意破坏,造成大面积的郁闭山区变为光山秃岭岩石裸露,水土流失,草原沙化等恶劣环境。到解放初期,全旗天然次生林总面积仅剩 80 余万亩,森林覆盖率只有 6%。

一九四五年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开展和改善祖国的自然面貌而提出“绿化祖国,保护森林资源,建设和发展林业”的伟大号召。并提出护林防火和封山育林的重要指示。从而使林业建设事业提到党和政府议事日程。右旗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林业政策和指示,在一九四八年八月成立农牧科。为了更好地加强林业的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单设林业科。一九五七年将农牧林水等各部门合并为农牧林水利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原农牧林水利局分设为农林水利局,牧业分设为畜牧局。一九七〇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农林水利局改设为农牧林管理站,一九七二年,原农牧林管理站又分为三个站:林业管理站、农业管理站、牧业管理站。一九七五年九月,原林业管理站和农业管理站合并成立农林局,下设一个林业工作站管理全旗的林业事业。一九八四年二月,原农林局又分为农业局、林业局。林业局内部设经营站、种苗站、林业站、森保站。

为了全旗森林资源和草原安全生长发育,加快恢复自然面貌而防止人为的火情火灾发生,在党委和人民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设置防火工作站,开展全旗的护林防火工作。组织群众,宣传群众,领导群众,依靠群众,在林区的要道口上设立防火站和专职和义务护林防火人员。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和“护林有功者奖,毁林者罚”护林防火方针。基本杜绝了人为火灾的发生和乱砍滥伐现象,对林业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加速全旗林业的开发,恢复生态平衡,改善右旗的自然环境,达到“青山常在,永续不断”,使森林资源“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目的。在一九五六年成立罕山经营林场,一九五八年成立黄花造林林场,一九六九年成立巴彦沙那林场,一九五九年将大板苗圃和大板林场合并为巴林桥林场,一九七二年成立巴彦尔灯治沙实验站。开展群众性造林,改变埋杆埋条造林为实生苗木并达到良种壮苗和速生林,改变埋杆埋条造林为实生苗木并达到良种壮苗和速生林的要求,一九五八年建成巴彦琥硕苗圃,一九七二年建成大板良种苗圃。特别是在一九六三年以来,对自然林实行林权下放,国营不易经营管理的小面积分散林和灌木林划给公社经营管理,从而使自然林不但得到保护,而且逐年发展扩大。积极贯彻落实“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造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由于林业政策不断落实,对集体造林和群众个人造林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广大的农牧群众认识到育苗造林的重要意义,通过实践和学习不断提高了一些群众的育苗造林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术。如幸福之路、宝日勿苏、胡日哈、巴彦塔拉等地区基木出现自育自造的新气象。对右旗的绿化工作创造了有力基础。

右旗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开发林区建设,发展林业生产,设置各级组织机构以来,右旗的残缺不堪的森林迹地,得到保护和不断杜绝了大小火情火灾的发生,严禁乱砍滥伐,得到好的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又设置经营机构,配备林业专业人员,开展了封山育林,采用结合,育苗更新造林,特别是对有条件的林区,如小罕山林场提出经营管理好,在现有次生林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兴安落叶松、华北落叶松、云杉、黑松、樟子松等珍贵树种,同时采取就地育苗、就地栽植。根据各类树种的生活习性不同要求,栽植于不同的立地,通过几年来的更新造林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王坟沟内栽植樟子松四百亩左右,成活率达80%至90%。又如落叶松和云杉基本适应该林区的立地条件和气候环境。

对现有次生林按照技术操作规程,根据林分的郁闭度和林相采取了不同的采伐作业。从而达到无林改有林,疏林改密林,阔叶林改针叶林,灌木林改乔木林的要求,使右旗的林业建设事业出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新局面。至一九八六年,全旗天然次生林面积为191.37万亩,比解放初期增长1.4倍。立木蓄积量达到85.78万立方米。

生产部

陈国卿

1947年那时干部是供给制。干部的吃穿用和政府费用开支得当地政府自己解决。巴林右翼旗政府为了筹措干部们的供给物资和政府费用开支,成立了有商业、手工业、运输为一体的一个企业,企业名称:“生产部”。生产部归旗政府财粮科领导。

在当时的大板十字街东侧路北朝南盖了五间门面房(现大板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址),中间三间为门市部,经营布匹、百货、烟酒、日杂货等二三百种商品。东头一间为印刷室,有四开石印机一台,承印表格、信纸、票据。西头一间为经理室和办公室。院内有黑皮革作坊,制作轧杠皮、笼头、搭腰、坐鞞、肚带、三花子、马绊、鞭头、鞭梢和攢麻绳等产品。

运输方面:拴有三套的骡马胶车(当时称大轱辘车)四辆,胶车除给本企业往回运货外,其次搞运输(当时称跑运销),采购、跟车员(那时稳掌包的)杨文衡。有骆驼运输队,骆驼最多达120峰。有勒勒车八九十辆。骆驼和勒勒车专去乌珠穆沁旗盐池拉盐,运回盐再用胶车运出销往通辽、赤

峰等地。运输队队长赵清泉。

生产部共有四五十人。经理时翰文。

生产部收入上交旗财粮科,解决政府费用开支和干部们吃穿用等消费。

1949年8月,将要建国,建国后干部将实行工资制。政府经费和干部工资由国家财政拨款。生产部至此撤销。

福和斋

陈国卿

1940年春季,林西县“福和斋”印刷局为了扩大营业范围,决定在大板设立分号,经营印刷、刻图章、纸张、文具文化用品。派一姓翟的人来大板看应设多大范围和选铺址。来人一看大板连象样的街道都没有,仅有将成雏形的东西街一条和南北街一段(现在的大板街和幸福路),有约300户人家,规模太小。回去向东家、掌柜作了汇报,东家、掌柜的认为大板虽然规模小人口少,但有伪巴林右翼旗公署、协和会等一些机关,还是可以设分号的。于是在大板十字街往西路北租了孙家药铺的一所房子。租的房有临街门面房3间,中间作门市,出售纸张、文具等文化用品,东间为柜房,刻图章和宿舍,西间为作坊(车间),后院有正房3间。两间为仓库,一间作伙房。初建人员只有4人,加上伙夫才5人。林西总号定名铺号也叫“福和斋”印刷局。到了初夏,铺排妥当旋即开业。从此始巴林右旗有了印刷行业。

福和斋机器设备有四开石印机1台,小“手扳子”1台(小型印机),2号铅字和5号铅字五六十斤。四开石印机,其名叫“机”,其实是一种完全以人力、劳动强度很大的笨重

手工操作工具。印刷时首先要做版,将要印的表格或文字写在药纸上,用两个人费很大力气,将表格或文字涂在石版上,再用桃胶、松香、硝酸原材料做成版。操作者副手用湿布在石版上擦一遍水,操辊者手持油墨辊往石版上滚一次油墨,铺上一张纸,副手用一尺来长木棍包上棕树皮的刷子,双手用力在纸上刷一遍,揭起来才算印出了一张。这么速度慢又劳动强度大的纯手工印刷,两个人一天也就印七八百张。小手扳子只能印小型印刷品。2号和5号铅字,是使小“手扳子”印名片用。那时名片很时兴。福和斋只能用石印印数量少的印刷品,如来了印数较大的活,收下就送到林西福和斋总号去印。林西总号有铅印机。印完运回大板交货。

福和斋的资金没有准数,铺里不存钱。印刷、刻图章的收入和销售的纸张文具款,十来天就一次专人送到林西总号去。仓库保持一定数量的纸张,少了就到林西总号去拉。那时福和斋经常雇白音尔灯十家子的白音、扎木苏用勒勒车拉脚,去林西总号往大板运纸。

大板福和斋印刷局鼎盛时期是1943年,又增加了四开石印机1台。全铺人员增加到7人。陈发起为掌柜(经理),有“劳金”(技术熟练,挣工资的工人)3人、学徒2人、伙夫1人。全员除1人是林西的,伙夫是乌丹的,其他全是河北人。福和斋的伙食平日细粗粮搭配,逢年过节放假,摆席面,过年(春节)放假5天,过了初五即拉开护窗板开门营业。

1945年7月初,深夜里大板下大暴雨发了特大洪水,

十字街附近有十几户被淹。福和斋门前水深近五尺,门面房3间被洪水冲倒,院里3间房的后檐墙被冲塌,成捆的信纸、美浓纸被冲走,受到很大损失。福和斋已不能营业,林西总号将人调回林西2人,大板仅剩5人。水落下去后,雇工抓紧时间盖房子。房子盖完时,时值1945年8月12日,大板光复解放了。林西福和斋总号掌柜来大板福和斋视察受损失程度后,回林西即决定:大板福和斋分号遭洪水损失严重,关闭。将盖起的新房归还孙家。开业五年的大板福和斋至此“关门”了。

大众合作社

陈文增

1946年春,在大板十字街南路西曾开过回民饭馆的房子由可复德、江云潮、栗宝和、蒙长瀛、张秀田等人筹建“大众合作社”。资金来源由大板居民入股,每股边区币3万元(合人民币3元),盈利按股分“红”。到6月,大众合作社开始营业,初开业经营商品种类很少,只有窄面土布、砖茶、火烟、麻油等商品。经理可复德,副经理江云潮,管帐(会计)栗宝和,采买(采购员)张秀田,站柜(售货员)董德福。

开业一两个月后,大众合作社迁移到大板十字街西南角座西朝东原“合记”糕点铺房子(现大板社百货门市部西南斜对面春华商店址)。新址临街门面房两间,南间作办公室,北间为门市,后院有三间房是仓库。

迁到新址经营商品增加,有青(黑)市布,“白五蝠”市布、青(黑)、白、蓝线,线麻,鞭头、鞭梢、轧杠皮、缰绳、笼头、烧酒、粉条、火柴、锅、碗、筐箩、簸箕、水斗子等几十种生活生产用品。主要进货地赤峰,其它有开鲁、乌丹。1946年10月至1947年5月国民党进入赤峰期间,主要从林东进货。麻油从乌丹的五分地集上采购,线麻、粉条、筐箩、簸

箕、水斗子从隆昌集上采购。

以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兼营收购活牛活羊及牛羊皮张。将南边合作社原址院里圈收购的牲畜,屋内放置收买的皮张。牛销往赤峰,开鲁,羊销到路程较近的南部旗县。

大板努图克成立后,大众合作社归大板努图克管辖。1947年4月,大板努图克派来褚广山任经理,会计换蒙长瀛。褚广山担任经理不久病故,由刘从礼暂任经理。张举也任过几个月时间的经理。1947年秋,旗派来李树堂为经理。人员已增加了贾青山、周显、陈连福等。

大众合作社从1946年6月开业,到1949年初秋全旗各努图克建供销合作社时止,大板入股的股东群众分过一次“红利”。

帕 尔 吉

撰文：特·武力更

译文：孟 和

在牧区有许多有趣的游戏，玩帕尔吉就是盛行于巴林草原，深受蒙古族牧民喜爱的游戏之一。

帕尔吉，也叫益布，润布、嘎西帕尼。因为是用贻贝做成的，所以汉语称之为贻贝。贻贝是软体动物，壳很厚，三角形呈褐色，肉制干后称为没菜或壳菜。生活在浅海岩石间，在北方的草原深处属罕见。但可在药店买到。把贻贝正面的凸圆处磨平，在里面灌入蜡或沥青等胶状液体，打磨后就成为游戏用具帕尔吉。

玩帕尔吉，要有棋盘和棋子，棋盘是在四方形，十字形的白布上面划出方格，边角绣以图案。棋子是帕尔吉游戏中必不可少的，对奕各方要有数目相等的棋子（具体数字，可自行商定），以不同颜色相区别。帕尔吉分三种，絮帕尔吉、白帕尔吉、海螺形帕尔吉。对不同类型、颜色、大小的帕尔吉要进行选配，挑选出颜色、大小一致的六个帕尔吉。

玩帕尔吉时，人数不限，可一人也可几个人结组，各方人数要相等。如果一方少一人，可给一次“那木西克”（加发权），替代人。

帕尔吉游戏是以投撒帕尔吉（在木盘内或毡、皮褥上）观其正反两面的数字，以此确定棋子上棋盘和棋子的行走。如：投撒的六个帕尔吉，正面（磨平灌入蜡的的一面）均朝上，叫“查嘎来——六”，棋盘上的棋子可走六步，同时有一次“那木西克”（加发权，再撒一次帕尔吉）。如果出现五个反面，一个阳面叫“二十五”可使一棋子上棋盘，同时行走二十五步，另有一次“那木西克”。如此有“扑拉——十二”、“二里”、“三里”、“四里”、“毁”，“奥德荣”等计数奕棋之法。

棋盘上各方棋子的多少是决定胜负的标准，投撒帕尔吉确定棋子上棋盘的个数和行走步数，只是胜败的基础，而盘上的对奕则是胜败的关键。每个棋子在棋盘上按顺时针方向行走，不得后退，中途如不被对方吃掉，转一周后安全返回自家门内，可谓完成使命，得一子。帕尔吉也和其他棋类一样，讲究步法奇绝，使人大动脑筋，但又以投撒帕尔吉为基础决定奕棋，所以更多的是充满游戏色彩。

蒙古族玩帕尔吉已有很久的历史，但从不用之做赌具耍钱。取胜者可获一些牧民自制的点心和奶食品，负者则要用嘴咬着棋盘向胜者行礼问安，或按所输的棋子个数“赏喝”几碗凉水。在牧区玩帕尔吉是有季节性的，一般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祭灶日开始，过了二月二结束。不影响牧业生产。

帕尔吉是蒙古族民间游戏之一，对活跃牧民节日生活和启发人们智力都有很大作用，故而流传至今。

巴林蒙古族传统生活用具

叶贺吉茹木

巴林蒙古在生活上很讲究文明礼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用具也富有特色,并反映他们的风俗。现介绍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几样传统用具。

一、火 镰

在火柴、打火机之类火种问世以前,不少民族使用过火镰。巴林蒙古族也不例外。况且,由于他们曾经从事过游牧生活的缘故,火镰从他们生活中被淘汰的时间更晚。

巴林蒙古族火镰的形状基本有两种:一是铲刀形,二是月牙形。两者的构造都是由钢片和皮囊组成。用钢片在火石上打火,在皮囊中保存火石和火绒(艾绒)。其用法是,在打火时先将火绒撕出新毛毛垫在火石的平面上,一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另一手卡住火镰,将它在垫火绒的火石棱角上,由上向下用力摩擦致使飞溅的火星落到艾绒引燃取火。

为携带方便和防备丢失,人们为火镰还增加了两个附件一是火镰带(锁链或皮条),用它将火镰面蒙古刀的托海

牌相连结,二是将火镰疙瘩与火镰相连接,携带时将火镰疙瘩掖入身后的腰带里面。

二、蒙古刀

巴林地区蒙古刀的种类有带筷子的和不带筷子的两种。但,二者都带刀鞘。前者多被富人和老人使用,后者多被野外劳动者使用。如,放牧人、狩猎人、赶车人等。

蒙古刀是选用上等熟铁中间夹钢锻造制成的单刃直刀。其规格大致上是长不超八寸(包括刀柄),短不低五寸,宽不过五分,厚不到一分(刀背)。刀柄用各种硬木、牛羊角和驼骨在铁把两面铆钉制成。刀鞘用红、紫、乌木,外面用白铜或白银包口包底和加箍制成。个别富贵者也有用带黄金箍的绿色鲨鱼皮刀鞘。刀鞘口下约一寸处有个带轴的活动环是用于系刀带的(用丝绒编制的带穗儿专用品)。用刀带将刀鞘与托海牌相连接。托海牌和托海钩是用活动折页相连结。火镰带系在托海牌上将火镰同蒙古刀相连结。蒙古刀用托海钩要挂在右胯骨后侧的腰带上。

托海牌是有规定图案美观精制的艺术品。其形状虽多种多样,但,巴林地区广为流行的有蝴蝶、蜜蜂、蝙蝠、杏花、盘链、六链环、双喜字和中间是专写的万字周围是向内飞翔的五蝠等。同时人们根据爱好还用珊瑚、玛瑙、琥珀、白玉、绿翠、珍珠、宝石等珠宝镶嵌装饰托海牌,使它五颜六色,琳琅满目。也有不镶嵌任何装饰品的原制金属的托海牌。所以,蒙古刀是不同价值的同一商品。昂贵者用一匹上等马也买不来。价廉者却有用一只羔羊便可换取。

然而蒙古刀的用途很广。如切肉、切奶豆腐，宰杀牲畜，必要时也可用它修理套马杆等劳动用具，甚致还可用其做为防身器。使用蒙古刀的规矩巴林蒙古族对蒙古刀的使用规定了许多戒律。

其中将主要者归纳起来有十不准和十戒。十不准是：不准用蒙古刀指天、地、山、水、人、畜、日、月、星、火、佛；十戒是：戒不让小孩玩刀，传递时不准来回扔刀，给人递刀时不准刀尖对人和刀刃向上，不能用刀尖插地、插树、插烤肉、插肉吃、或插肉递给人、插肉供佛以及从刀上面迈过去等都属于戒的范围。

三、闻烟壶

闻烟壶是装闻烟的小瓶。它的形状象壶底儿、壶脖儿各有特异外，壶的形状大致有下列五种：球形、扁圆形、椭圆形、圆筒形和三角形。制造原料一般用杏木根、冬青根、陶瓷、玛瑙、玉石、翡翠、牛角等制成。闻烟壶是由壶底、壶肚、壶身、壶肩、壶脖、壶嘴、壶盖和壶勺等部位组成。壶勺多用白银驼骨、象牙制成。壶勺同壶盖相连。闻烟壶的价值是以论其最料的高低，加工的精细和形状的美观而定，对陶瓷制品分现代制品和古玩。

敬闻烟的礼节

敬闻烟时很讲究礼貌，有长幼、平辈、挚友之别，对长者敬烟时右手抓壶左手托底稍微屈膝欠身，双手将闻烟壶递给长辈，以表尊重。这时长辈者用右手接烟壶的同时左手在右手下面掌心向上，一则防备失落烟壶，二则表示双手接

壶，以表尊重对方。长辈者将接过来的烟壶壶盖轻轻碰到鼻子尖之后，将它立即还给小辈。接着长辈者取出烟壶向小辈单手递壶。小辈者履行接受烟壶的礼节并将它恭恭敬敬地还给长辈之后入座，假如宾主是同辈的话，双方就座之后同时取出各自的烟壶将它互相交换，以表彼此敬烟。双方都履行接受对方敬烟之后，又将各自的烟壶还给本人。双方如果是关系密切或知心朋友的话，将各自的烟壶还给本人之前欣赏对方烟壶和品尝他的闻烟，由此引出有趣的话题。

四、褡 裢

褡裢是中间顺开口，两头装东西（一头装闻烟壶）的长方形小口袋。携带位置是挂在左胯骨前侧的腰带上。携带方法是使从腰带搭拉的褡裢两头不要重叠而要上下并列。为了使褡裢板正，厚实，坚固耐用，缝制褡裢一般不像用柔软单薄的绸料，而要选用较厚实板正的卡叽布、华达呢、亮服呢、小帆布、钦布（藏卡）、特日木（藏粗毛料）等料作面并用光滑耐磨的丝绸缝里。褡裢有下列四种：一是用原缝材料做面的；二是绣花的；三是原面外面再用库锦或花边儿修饰美化的；四是表面将专门制作的（商品）褡裢花面缝上的。

五、旱烟袋

旱烟袋是吸旱烟的用具。它主要由烟嘴、烟杆和烟锅组成。但，为了美观起见不少人在安装烟嘴和烟锅之处再

套上两个银箍。银箍有三种：一是带雕花的；二是雕花上面再喷上珐琅的，三是纯白无花的。烟嘴用火石、玛瑙、玉石、翡翠等制成。烟锅用白铜、白银或两者混做合制，有的则用黄、红、白铜制成带花的精致美观的烟锅。烟杆是用上漆的硬木和不上漆的乌木制成。在野外劳动者也有用杏木、文冠果木、万年蒿和老鸱眼等木料自制的。

使用旱烟袋向人敬烟的礼节

使用旱烟袋向人敬烟的礼节是与使用闻烟壶给人敬烟完全相反，是用本人的烟袋向本人敬烟。所以，来宾进屋就座之后小辈者伸手索取烟袋。这时长辈者检查自己烟袋通气良好之后将烟嘴对人烟锅对己用右手递给敬烟人，小辈者用右手接过长辈的烟袋后，从自己烟荷包中为对方装一锅烟将它仍按烟嘴对人烟锅对己，右手递烟袋左手作衬托动作，以表双手敬烟尊重对方。长辈者仍用右手接受烟袋。接着小辈者取出火镰打火，将点燃的火绒（艾绒）放到长辈者的烟锅上面使他自己抽着。这时长辈者将自己烟荷包递给小辈者让他自己从中装烟。等到对方装好烟时，长辈者将自己的烟锅对准对方烟锅扣住并轻轻向外吹气，以协助对方点烟，省略再次打火。但，起初打火任务总归小辈者。这被认为是小辈者对长辈者的尊敬行为。而烟锅对准烟锅的接火则是长辈者对小辈者的回敬动作。假如宾主双方是同辈的话，来宾进屋就座之后，宾主双方同时左手从腰带取烟荷包和双方各自检查自己烟袋通气良好之后互相交换烟袋，两人都从自己烟荷包中给对方袋烟，用对方的烟袋向对方敬烟。这时一般情况下打火任务仍归年小者。主人表示

热情时可劝来宾不必打火。可在同辈人之间点烟时，打火镰取火者总是自己先点着自己烟，然后将烟锅扣给对方烟锅接火。然而，居住邻近，非常熟悉的个别同辈中年男性之间，也会出现为显示火镰的质量和打火的技巧而双方比赛打火速度的情况。同时说些俏皮话以取笑落后者。

未婚男女青年一般都不用烟。所以，中老年人也一概不向他们递烟壶或索烟袋。

六、烟荷包

烟荷包是内装碎旱烟的小口袋。制作的料主要有：缎子、大绒、条绒、卡叽布、华达呢、小帆布、充服呢和熟鞣皮革。种类有下列五种：一是原缝素料制成的；二是利用带花的料制成的；三是绣花的；四是用库锦和花边装饰的；五是用熟鞣皮革制成的。

为防止丢失还要做一个精致的疙瘩，将它用带与烟荷包连结起来，携带时掖入腰带里。做烟荷包疙瘩的原料多种，形状多样。概括起来劳动牧民用的有：杏树根、冬青根、铜币、银币、鞍座大钉、牛角、牛骨、海螺等物加工制成。富人用的有：银币中间镶嵌珊瑚的，中间穿眼的大块珊瑚，大块琥珀乃至玛瑙、白玉、绿翠等料的各种雕刻。烟荷包上的附件物有烟袋钩和防火罩。富人和老人也有将耳勺和牙签连在烟荷包一起。

巴林蒙古族的马具

叶贺吉茹木

套马杆

套马杆是用来套住马脖,从而抓马的工具。巴林地区的套马杆主要由杆儿、杆梢儿、杆绳(套绳)和缠条儿组成。杆儿多用紫皮柳制作,无此料时也用桦木。杆梢多用桧木条,但在春季对大马群进行剪鬃、骗马和烙印的劳动现场,由于杆梢的耗损量大而就不太讲究其质量的。

巴林地区的套马杆绳有下列六种:一是先将半熟半生的上等牛皮去毛割成宽度均匀的皮条儿,然后将它适度拧劲绷晒干成为半透明的弓弦式的杆绳;二是将同上牛皮割成宽窄均匀的三根皮条儿,然后将三根皮条一个一个地向同一方向适度拧劲,接着将这三股合在一起向相反的方向拧成三股合一的皮绳绷紧晒干制成;三是用将完全熟好的牛皮同上方法制成;四是用肠衣(羊肠)制成的弓弦套绳;五是将牛筋从肉中剔出放进酸奶中熟好晒干,将它在木砧上用锤砸成纤维搓绳拧劲合股制成(牛筋不够用时可用种公牛鞭“生殖器”添补);六是在数九寒天或青黄不接的春季套马时为了防止勒伤马脖而也有使用马鬃杆绳的。但,拴在

杆梢和杆上部分的两头必须使用皮条儿。

制作套马杆绳的皮革要有三条要求:即一必须使用皮条;二况且是宰杀的牛寝(不可用死牛皮);三是割开皮条时不许转圈或横向割,而必须是前后顺向割。

制作缠条的皮革也有三条要求:一是熟透柔软;二是即薄又结实;三是割皮条时宽窄均匀。

职业牧马人(马倌)的套马杆有六戒:一戒让孩子玩耍,二戒借给非职业牧马人使用;三戒将套马杆横倒在地人畜践踏;四戒让饿狗啃咬杆绳和缠条;五戒让猫啃咬杆梢皮(桧木);六戒让坐月子的妇女接触。

二、马笼头

马笼头是将马从马群用套马杆套住之后戴其头上驯服它的马具。

巴林蒙古族马笼头制作方法虽很简单,但,据考查它形成现状之后再无半点突破和发展已经几个世纪了。巴林地区马笼头的用料和制作方法如下:一、用料是直径1.2寸的铁环两个;上等熟鞣压杠皮两根零3.7尺;将3.7尺压杠皮分成为2.5尺的一段和1.2尺一段。二、制作方法是用一根压杠皮制作马的笼头的部分;用另一根压杠皮制作笼头的缰绳部分:用2.5尺的压杠皮折成两股在其扣中套入一个铁环将其两头合并系在马笼头外侧的三连处;用1.2尺的压杠皮两头穿孔上头儿接马笼头里侧的三连处,下头儿通过套入笼头下段后半部分死口铁环之后在其顶端系上另一铁环,由此铁环连接缰绳皮。如上所述,所以使用2.5尺

的压杠皮折成双股制作马笼头下段后半部分是因为该部分是在整个马笼头中最吃力的地方；其次所以使用相同的两个铁环是因为上面的铁环是为了使笼头下段后半部分上下滑动灵便并保持一定的伸缩性便于给被套住的马戴笼头解套绳时不费时间；下面的铁环是为了保持上述伸缩性的一定限度，使上下两个铁环横竖碰到一起时即到规定限度，以保证不使缰绳从铁环脱落而将马放跑。

三、马嚼子(镮)

马嚼子是将马嚼铁和马嚼环用皮笼头和皮缰绳连接起来戴在马的头和嘴里使它进一步顺从人的又一种马具。其用料和制作方法如下：1、用料通过穿眼的羊角孔眼来回拽拉强力折压成圆棍形的压杠皮两根；割断1尺长的压杠皮两根割断1.5尺长的压杠皮两根；铁嚼子一副。2、制作方法：用一根压杠皮系马嚼子的笼头部分；用另一根压杠皮系马嚼子的缰绳部分；用1尺长的两根压杠皮折成两股系马笼头与马嚼环连接部分；用1.5尺长的两根压杠皮折成两股系缰绳与马嚼环连接部分。此外马笼头和马嚼子都有一条笼头扣绳(亦称后兜绳)。系笼头扣绳的位置是在紧靠马的脖子下面和下巴后面的三角处。其松紧程度一定要恰如其分。紧不至勒，松不搭拉。系它的方法是在笼头外侧压杠皮中间上下顺着割开一个穿入笼头扣绳的死口，然后将扣绳一头由外向里穿入此口，里面皮头拽出一点在上面捅开一死口。在外面长皮条与里面短头相并紧靠压杠皮处在长条皮上捅开一死口。然后将短头皮从里向外穿过这死

口。接着将长条皮再从里向外穿过短头皮的死口至此已系完马笼头扣绳外侧部分的工序。内侧压杠皮同外侧相对的地方，上下顺着割开与外侧部分相同的死口，在此死口上用鞣软的皮条系上一个扣，然后从外侧拉过来的上马笼头扣绳的尽头安装上铁钩、羊角别棍或将皮条穿过铜币钱眼系上疙瘩固定住。至此已系完马笼头扣绳的全部工序，将笼头戴上马头，将笼头扣绳从马脖子下面拉过来别进内侧的扣口即戴牢了笼头。只要扣住马笼头扣绳的扣之后，假如人不去解开时，它本身决不会自动解脱。况且，在不解开马笼头扣绳的情况下，连马的主人想要将马放回马群都抹不下笼头来。

四、马鞍

马鞍是背在马背上供人骑坐的马具。巴林蒙古族的马鞍由木鞍、鞍垫、座钉、泡钉、鞍岔、马镫、镫皮、鞣绳、鞍褥、马肚带、肚带根等等一系大小零件组成。巴林蒙古族马鞍的突出特点是后坐短而宽，骑上马合身并舒适。巴林地区的鞍座复杂多样，故从中选出劳动牧民普遍使用的典型性马鞍简记于下：木鞍巴林地区流行的木鞍有两种：一是商品木鞍，二是牧民自制的木鞍，这里简记后者。牧民自制的木鞍由前后两个挡板、中间的三块座板和左右两个夹板等形状不同的七块木板形成。制作木鞍是有一定规格、尺寸、角度。第一步是将七块板对成后互相连接，用水胶相粘连，接着将重叠的地方透圆孔，将合适木楔涂胶打进孔内待干后将木楔多出的两头锯掉磨平；第二步是将整个马鞍安装完

毕后需露在外的木面上上色或抹漆。普遍使用的颜色和抹漆方法有四种,如:上深红、淡黄色的油漆。只上亮油(桐油)护木和涂上木本油料油浸透;第三步是根据木鞍上面面积的大小剪出一整块刮毛泡软并彻底割掉内面肉渣和洗净油污的生牛皮,趁它还尚未干透发硬之机将皮绷紧用球皮钉整个钉在涂上水胶的鞍上面。然后待水胶和生牛皮干透后进行适当修边和磨平光滑;制作木鞍的四点要求:即分量轻快、坚固耐用、角度准确抓力强、附着均匀不伤马背。第四点是用凿子和木钻凿出钻通穿蹬皮、鞣绳、座钉和系肚带根皮的孔眼,到此结束木鞍的加工工序,接着安装整个马鞍的全部零件。座垫是用细毛毡作里儿,用大绒、条绒、钦卜(藏呢)挤马皮或相牛皮作面儿缝纫包边后用四个座钉穿皮条,将座垫固定在鞍座上。马镫是用双层镫皮,上头穿过木鞍上的镫皮孔,下头穿过镫鼻儿,用皮带牵儿连接两头安装的。鞍鞯是为了美观和盖住镫皮牵儿防止它硌着乘马者的大腿内侧皮肤,而在鞍垫的左右两则下面安装的。鞍鞯大致有三种:相牛皮的、掺合油皮的,自制熟鞣皮革上上色刷油的。其形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装饰式样有多种。鞍鞯,其形状有方,圆两种。品种有四:相牛皮的、掺合油皮的、冬季用的裁绒鞯和夏季用的水龙布鞯。使用鞯的作用与目的有三:一是为了美观让鞍鞯完全挡住马肚子和肚带等部件;二是为了防止马镫碰撞马的胸部和腹部,三是为了防止马的汗水浸湿人衣和腐蚀镫皮、鞣绳肚带根皮,作肚带根的皮革是从熟鞣好的整皮中选择最好的部分并且将它通过羊角孔来回拽拉强力挤压大大增强其耐磨性和受拉力性

之后才可使用的粗细、长短相同的四根圆棍性皮条。马肚带,是选用上等活马鬃搓成拧劲相反的黑白分明格外美观,拧向抵消保持板正。制作方法是,将黑白两色拧向相反的四根或六根鬃绳并列起来,长短一致,松紧统一,用纫麻线的大针来回穿缝纫完后再用宽度约6寸的两条原皮在中间折叠处统穿一圆孔,安装肚带牵后让它夹住肚带绳的一头,用锥扎眼,麻线缝牢。将其另一头拴在外肚带根皮上,马鞍吊肚带,是系在内侧肚带根皮上,用四根、八根或十二根皮鞣编成的,宽度能够通过肚带牵的,中间有均匀孔眼的扁形皮鞭。它是通过肚带牵勒紧肚带甩的鞍鞯,是用马鬃赶毡方法制成。无马鬃时可用山羊粗毛制作。鬃制鞯的优点是弹性强,汲收和蒸发汗水快。鞍鞯的前后两边儿要用条绒、钦卜(藏呢)或小帆布包边儿。在其中下端被肚带受压此处缝上四条宽于肚带两倍至三倍宽的板皮,以保护鞍鞯。

五、马 绊

马绊是用来绊住马腿即让它吃草休息恢复体力又控制它不让跑回马群的一种马具。巴林地区的马绊是用绊身、绊臂、绊爪、绊扣和别棍形成。别棍用羊角和木料制成。巴林马绊的种类有三种:一是普通绊(即标准绊),它是用来绊住马的前两条腿和右侧后腿的;二是横绊,它是用来绊住马的前两条腿的。三是顺绊,它是用来绊住马的右侧前后两条腿的。系马绊用料和制作方法有下列六种:一是鬃绳绊,它是用纯马鬃或鬃麻混台制成。制作方法是先用原料搓出

尺寸够系马绊用的双股细绳,然后绊身是将适当尺寸的双股绳适度拧劲,先将 $\frac{2}{3}$ 其合成两股绳,接着将其余 $\frac{1}{3}$ 挤入两股绳内使它成为拧度均匀的三股绳,这就是绊身。接着系好从绊身前头儿向左右分开并连接前两个绊爪的绊臂部分,绊臂部分制作方法与制作绊身相同将三股细绳拧劲合成一根粗绳。绊爪部分是将并排的三股细绳用纫麻线的大针来回斜穿缝纫制作后插入别棍即成。绊扣是将并列的二根细绳用同上方法缝纫制成。后腿的绊爪与绊扣的制作方法同前腿完全相同。二是皮革线它是用酸奶熟成的上等牛皮制作,其制作方法同制作鬃绳绊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其绊臂部分是用四层板皮而不是同绊身一样三股的皮绳,绊爪部是两层板皮,绊扣部分是将单层板皮通过羊角圆孔来回拽拉强力挤压成圆棍形皮革制成。三是带环绊,它是在绊身前端利用一个一环套三环的相同的四个铁环与皮革相连接制成的。四是铁链绊,它的绊身和绊臂是用一个铁环相连接的铁链,只有绊爪和绊扣部分使用皮革而外其余部分全是铁链。五是混合绊,它的绊身是利用方形的废轮带按需要长度切断并在其两头将套铁环“C”形铁片铤眼,将轮带夹在铁片中间用铆钉铆上,然后由铁环连接前绊臂和后绊爪制成的。六是纤维绊,它是用尼龙或塑料纤维搓绳拧劲合股制成。上述六种马绊中后三者是由于近年来党的政策提高了畜产品的价格,从而调动了牧民向国家多出出售生牛皮积极性的产物。

六、马鞭

马鞭是乘马者在紧要关头催马加快的马具。巴林地区的马鞭有下列四种:一是带把的马鞭,其总长度约2.3尺左右,鞭把占 $\frac{2}{5}$,鞭条儿占 $\frac{3}{5}$;二是无鞭把的全皮马鞭,其长度不超过1.3尺。为灵便和安全起见职业牧马人(马倌)专用这种马鞭;三是用藤条制作的马棒,它是从南方运来的商品。为了防止崩裂而在它的上头或用牛角紧箍或用骨头粘牢,在其下段约从0.4尺以上处开始用洁白细棉绳密密缠牢1尺左右地方以保护藤条。它是当地的王公贵族、葛根活佛和外来的旅蒙商人以及放高利贷者们喜欢用的马具。马棒本是打马的用具,但其中个别奸商与当地土豪狼狈为奸对广大牧民敲骨吸髓。对还不上债,交不上利息的穷人往往挥舞马棒,残酷毒打。因此,在巴林草原上不直接称呼他们的尊姓名,而给他们起绰号在他们的姓氏下面贬称“大马棒”三个字。如,张大马棒,郭大马棒之类,并诅咒“啃草的下巴定变白,被啃的草滩会发绿”。四是用桉木条仿造藤条的桉木马棒,它的下段是用皮条牢牢缠上的。所以,其坚固程度远远超过藤条马棒。中国向来有“城里孩子,乡里狗”之说。牧区的狗不比农村的狗温顺些。为了防备被狗咬伤,这种土造马棒倍受老弱病残者的欢迎。由此自古以来在巴林草原上流传着:“饿狗仇视持棍人,贪官憎恨揭短人”的谚语。

种漫撒籽地的大犁杖

叶贺吉茹木

巴林蒙古族至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止曾经经营过小面积、简便的种植业,它的名称叫“漫撒籽”。种漫撒籽地是一种比较原始式的种植业,其耕种方式是,一不耕地二不施肥,三不浇地,夏初开犁播种,中秋动镰收割,在此中间只管不让牲畜进地糟踏外其它一切全都听天由命。但,据老年人讲,巴林人过去耕种漫撒籽地,是有它一定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根源的:一、因为它是不锄地除草,故它的播种季必须是到各种杂草繁茂的“小满”之后方可开犁播种;二、因为它是不施肥,故在一个地方只能连续耕种两年,最长不超过三年;三、因为它是不搞田间管理,故只可种糜、黍子、荞麦这三种晚田作物;四、旧社会巴林地区国家不统一供粮,况且由于各种原因经常出现灾荒,这种情况下口粮都保证不了,何谈与边疆少数民族搞粮食贸易;五、蒙古族牧民爱吃的炒米,只能用糜黍作原料,而糜黍和荞麦都是低产的晚田作物。所以,农民也不愿大量种它;六、巴林蒙古族祖祖辈辈依靠畜牧业生产生存和生活过来的,他们在势力、技术和经验等方面根本无能力耕种大垄地,并且在习惯与心理上

都舍不得弃牧务农;七、就种漫撒黍地而言,也只把它当做一项副业生产,而根本没把它当做主业对待,八、过去巴林草原人口很少,而大自然都非常富饶。巴林蒙古族多年以来一直享受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也是阻碍他们生产力的发展的又一原因。这些都是巴林牧民耕种漫撒籽地的自然的、社会的历史根源。

种漫撒籽地是个特殊的种植业。所以,耕种用的犁杖也跟种大垄地和稻田的工具完全不同。

今将巴林地区种漫撒籽用过的大犁杖当地农牧民叫弯弯犁杖简记于下:这种大犁杖由下列一系列大小部件组成——犁辕、犁把、扶手挂绳槓、犁底(座)、犁箭、犁铧、犁镜、犁镜座、托头、托头明槓、托头暗槓、犁镜 標绳(两根)、犁镜 標棍(两根)、黎槓(固定 標棍用)、抛绳、牵引绳、四牛杆、牛套绳、牛鞅、吊鞅、吊鞅绳、牛缰绳、牛笼咀、大鞭、柳罐(撒籽时盛籽用)等等。

耕种漫撒籽所以用套四牛的大犁杖,是因为它是开荒种地,带犁镜、犁铧宽而吃土深等原因所决定的。

四条牛的名称叫起(自内侧向外)。植被牛、夹当牛、垄牛、翻土牛。

犁杖转圈的方向总是向右转,因为犁镜斜向是内侧在前外侧在后,因此被它翻卷的软土终于是从内侧掀例外侧的。

撒籽者所转的方向是向左转。这是用右手撒籽者而言,左撒籽是与之相反。

撒籽的方法是将四条牛全部套上拉犁试验固定犁铧吃

土的深度,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选好开犁播种地段,播犁拉开一条中心垄,其长度因地势而定,一般最长的约一千米左右,最短不低于二百米。然后停犁作撒籽的标记。其用法撒籽人手抱一块茶壶大小的土坷垃,接着从中心垄向90度角赛迈二大步(约一米)放下土坷垃以作撒一回籽的标记。犁杖翻到标记时再作标记,再撒籽。撒籽是撒籽人将装种籽柳罐的带套在脖子上右手抱柳罐,沿着离中心垄沟1.5米线的用右手满把抓籽并使它从拇指和中指缝里均匀地撒流出来碰到食指指纹飞散出去。这就是漫撒籽名称的由来。左腿向前每迈一步,右手由外向里撒一回籽。手掌大者一把籽可撒三至四次,手掌小者一把籽可撒二至三次。撒一回籽的宽度约三米。撒籽是个手脚配合有节奏的动作,撒完一把籽的最后一甩结束时紧接着从柳罐中又抓满一大把籽继续向前撒去,如此反复,一直撒到作标记开始撒籽的地方为止。

为发展畜牧业,保护草牧场,防止草牧场退化和沙化,人民政府规定了在牧业地区禁止开荒种地的政策。自50年代末开始我旗停止耕种漫撒籽地,由国家向牧民供应牧业口粮。

镇敌金刚祭辞进善速成经 ——汗山祭辞经文

搜集:达木林巴斯尔

译文:布和朝鲁

请山神

福地灵区在此处
概天神将荟之宅
异树丽花奇峰磊
祥云层层光乘起
香馥馥野花环腰
响潺潺清泉下流
走兽飞禽满山舞
身安心悦极乐处
昂昂志气玉宝身
宝殿祇园胜景处
来去似箭如乘风
坐骑白马鞍辔辉
“镇敌金刚”威胜天
玉面玉容貌臻臻

五官英姿威烈烈
金盔金甲凝祥光
旌旗施展浩荡荡
左右手执方天戟
手掣如意宝
胯插壶箭
腹悬硬弩
威风凛凛
玉面后土红光面
执令箭持寿转宝
穿一领珠宝锦衣
跨彩鹿行众女间
慈悯善面天生喜
威武大臣赤青面
追风野马为坐骑
右手势轮宝刀
左手紧掣缚妖索
威仪弟将黑青脸
锦衣重甲有威风
势轮金刀又轮剑
跨猛虎坐雕鞍
硬弩强弓展施威
率精兵点阵将
右下众兵雷声起
左下多女妙音弦

战马奔驰似滚风
驾云纵风轻度天
八部诸天众揭谛
甲冑齐整众雄兵
兵器凝光
花雨缤纷
傲笑气悦震四方
脸有祥光龙凤舞
猛虎雄狮齐争斗
走石飞沙狂风怒
诸天多法戏神舞
进善为本兴善果
心深灵处神在天
凝空道道彩霞摇
世尊傲空悠神威
众姬众臣众亲朋
诸天诸龙诸山神
六丁六甲众土地
聚如丽日彩云
敬请来降如掣电

日伪时期巴林右旗喇嘛教片断

阿其图

喇嘛教是蒙古人民群众信仰的宗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建置后，侵入蒙族地区，首先利用宗教信仰麻痹蒙古民族，也是对蒙古民族施行的一种怀柔政策。

日本侵入巴林右翼旗后，对喇嘛教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反对又不提倡，但力图通过喇嘛教迷信摧毁蒙古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是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目的，他为了垄断民心，也允许喇嘛按旧习惯、旧规定日期举办各种类型法事活动，首先是多年来在内外地最著名的大板“六月庙会”，自雍正八年(1780年)始，全旗十三个庙的喇嘛一千余人集中到大板东大庙，历年举办一次“六月庙会”，喇嘛们念经，“跳鬼”，喜庆水草丰收，国泰民安。它不仅是信仰佛教而且是蒙古族群众参拜佛爷的机会，这时许多人和商号从北京、天津、张家口、通辽、赤峰、锡盟等地前来赶庙会，这都是以喇嘛为中心活动起来的历史传统，也是发展民族文化，开展全旗性的赛马、摔跤、射箭，各种娱乐等体育活动，也是物资交流的场所，日本人利用这个机会搞一些搜集情报，掌握民心思想

动态等活动。

其次，平时大的法事活动日有每年阴历正月15日，6月15日，10月25日在大板东大庙举办全旗性的喇嘛念大经“跳大鬼”、转经(背着经卷围绕庙院转一圈回到庙前正门磕一个头)，每年还有不少喇嘛为了朝拜活佛而千里迢迢去五台山、北京雍和宫，以最信佛的诚心，一步磕一个头，磕到五台山、青海塔尔寺等地，牧区一般家庭中遇有婚丧嫁娶、疾病、灾害等事请喇嘛诵“甘珠尔经”，对这些活动，日本人一概不管。

巴林右翼旗喇嘛教务机构：

全国设喇嘛教务总团，省设喇嘛教务所，旗设喇嘛教务分所。

巴林右翼旗于1940年建立喇嘛教务分所(在东葛根仓办公)阿贵庙的嘎拉僧担任所长，以后提升省喇嘛教务所长，另任东葛根喇嘛阿旺东力布扎木苏任分所长，设顾问两名，由旗长阿拉坦瓦其尔和庶务科长乌尔吐担任，下设书记员两名，由赛音朝格吐、高力布呢玛(日本京都留学)协助所长处理教务事项。

在教务分所主持下在旗公署文教股长(蒙和舞乐极)的倡导下，在东葛根仓院内成立了喇嘛学校，招收年龄25岁左右的青年喇嘛(包括在庙学徒的)，专职教员仁钦道尔吉，教普通社会科学知识、文化教育等，也起到了分化和削弱了喇嘛的特殊信仰力。自伪康德七年(1940年)至1945年培训了一百名左右青年喇嘛。这在对喇嘛的启蒙，开展知识上起到相当的作用。

1942年由兴安西省公署文教科派来一名日本人叫内岛,来大板以视察“六月庙会”为名,在东大庙后殿召集喇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旗公署日本参事官吉田保,协和会事务长滕畑定男,旗公署行政科文教股长蒙和舞乐极(蒙语翻译),省喇嘛教务所长嘎拉僧活佛,旗喇嘛教务分所长阿旺东力布扎木苏,有代表性的喇嘛20余名,日本人内岛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他说:

1、现在我们居住在国境地区的蒙古人都有责任参加扩军备战,你们当喇嘛的更不例外,在平时念经中要祷告必胜的信念。

2、满洲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友邦”日本出兵帮助的结果,才得到今天的“王道乐土”的幸福生活,喇嘛们应知道“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离的关系。

3、喇嘛教和日本同样都是信佛教的,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的,因而蒙古族也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今后你们这个地区除了修筑寺庙外应建立日本“神社”,喇嘛们都应该敬崇“天照大神”等等。

1948年“六月庙会”正在大板东大庙喇嘛们“跳鬼”期间,由锡林郭勒盟来了一名叫满恩大森的日本人,披着喇嘛外衣,与大喇嘛们混坐在正座上伪装念经,观察情况。

日本殖民者本身就是崇拜“天照大神”的信佛教民族,随之战时的紧迫,原则上他是希望蒙古族的迷信宗教便于统治,以后只顾扩军备战,经济掠夺,征兵,收税等对喇嘛逐渐削弱特殊待遇,随之人民觉悟提高,送子弟当喇嘛的较少了。自然在社会上降低了喇嘛特殊地位,又规定没受教育

的人不准当喇嘛,这样以来当喇嘛的人自然减少了。

解放当时(1945年),全旗二十一所寺庙共有喇嘛一千零四十二人,比到清末光绪三十年已有喇嘛四千零五十三人(指原右旗十四座庙)大大减少。

兴安西省境内的宗教:佛教、喇嘛教、道教、在理教、萨满教等其中蒙古人独特的喇嘛教最为兴盛。伪康德五年(1938年)省里设省喇嘛委员会各旗设喇嘛委员分会,当年省公属利用大板上六月庙会的机会,召集各旗七百名喇嘛召开第一次兴安西省全省喇嘛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脑有:

兴安西省长诺拉格尔扎布,参与官(日本人)都间观三,军方首脑巴达玛拉布坦中将,省喇嘛委员会委员长阿鲁科尔沁旗罕庙的查干活佛,其他没暴露身份的日本人数名,克旗喇嘛代表,东西扎鲁特旗代表莫林活佛,阿鲁科尔沁旗代表仁布其活佛,巴林右翼旗代表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三喇嘛葛万巴拉、阿旺东力布扎木苏,巴林左翼旗代表元旦活佛、松哈布活佛、丹毕扎拉森、二爷喇啼、扎胡大喇嘛其木德道尔吉,奈曼旗代表包日浩绍活佛、满楚根活佛。

会议地点东大庙前殿,参加人数七百余人,就餐地点,首脑人在行官院内。

这次大会主军研讨了下列几个问题:

- 1、提高喇嘛的素质
- 2、度牒制度
- 3、喇嘛态度调查
- 4、亩产

5、蒙文教典的普及

6、加喇嘛律戒等

这次会议规模最大,巴中将乘飞机降落到麻斯他拉飞机场,各界代表到机场欢迎。

赛罕汗山上的蘑菇

哈斯巴根

在草原上提起蘑菇,饮誉历史远远流长。巴林北部赛罕汗山脚下的蘑菇更是有独特的风格。

在巴林赛罕山脚下的草滩、峡谷里,有成片、成圈或散落状的蘑菇群,品种有珍珠蘑、大白蘑、小白蘑、紫蘑、青蘑、柞片蘑等数十品种。其中珍珠蘑菇最为名贵,即没有开扇的大白蘑菇丁。

蘑菇属于真菌,他生长的地方一般都有杂草,树根、粪蘑等发酵物,其中含有大量菌丝体。当有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菌丝就迅速地繁殖,萌发,钻出地面便成为蘑菇。

我国食用蘑菇的历史悠久,古代就有“味之美者,越骆之菌”的记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对蘑菇作过“甘平无毒”的论述。

蘑菇的营养价值很高。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脂肪,含有80%多的纤维,含有钾,磷、铁、钙等矿物质和氨基酸,含有维生素B和C。它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能降血压和胆固醇。长期食用,大有神益。

蘑菇的香味特别的浓烈。被誉为“素中之荤”。蘑菇含

有大量香酯和谷氨酸钠等挥发性物质,固气味新鲜醇香。

赛罕汗山的蘑菇属于巴林草原的上等山珍,是当地主要土特产之一,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巴林火锅

郭振有

逢年过节,人们经常用火锅来烹制菜肴,招待亲朋好友。巴林人也不例外。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系列饮食用具。火锅那时虽未出现,但做为火锅的前身“鼎”已不鲜见了。进入青铜器时代后,金属制炊具渐多。据考古发掘表明,呈圆形、三足两耳的鼎,在其三足下架薪烹煮肉食;为保持其热度不衰,又在鼎腹下加了一个圆盘,内置点燃的木炭,这就是最初所见的火锅雏形。

火锅,始创于公元五世纪,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据《北史》记载,我国古代有一个称为“獠”的少数民族“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鼎。且薄且轻,易于熟食。”这就是我国关于火锅的最早记载。

围坐火锅吃涮食,唐宋时期很盛行。在民间已广泛食用,但当时的火锅是多用陶瓷制的。唐朝诗人白居易爱吃涮食,他在《问刘十九》诗中吟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意是,当新酒酿热,酒香扑鼻时,可以相对而饮了,这时室内生着红泥做的小火炉,装上炭火,放上陶锅,边吃边喝,在严寒的雪天给人以吃火锅

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故唐朝时又将火锅称之为“暖锅”。北宋时期的汴京,火锅已成为冬季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佳肴了。元清两代,对火锅更刮目相待了,使这一民间风味在宫廷宴席中初露头角,值此火锅又有“御锅”之称。据记载,清朝嘉庆皇帝登基时,在宫中摆“千叟宴”,使用火锅竟达 1500 多个,其规模及靡费之大,是火锅涮食史上绝无仅有能。

千百年来,在祖国的烹调史上,火锅的内容不断更新。古老的涮羊肉成为京门一绝,涮、蘸、饮、吃同步进行,一碟碟切如薄纸般的羊肉,在锅里涮上几下,蘸上调料便可食,嫩鲜可口,妙不可言。白肉火锅是满族人最喜欢吃的,五花三层的熟肉,红里透明的里脊,加上细长洁白的粉丝,放进口里还颤颤微微。东北传统的火锅配料,一般以白肉、三鲜丸子,猪排骨、蘑菇,加上酸菜和海带等菜料。尤其是铜火锅里的酸菜、海带,煮熟后,夹一筷子青悠湛绿,吃进嘴里美味满口,嚼酸爽胃。我们居住在塞北的巴林人,最爱吃这种配料的火锅。还有一种是清洁鲜纯的菊花锅,以三鲜的海参、大虾、鸡肉为主料,再配上鲜蔬,开锅后香气四溢,闻闻皆醉。更胜一筹的是,它取鲜菊花两朵,撕碎撒入锅中,略焖片刻,得其清香渗入汤中后食用,堪称佳品。

火锅的食法又何止首都的涮羊肉,东北的白肉锅和菊花锅呢?在烹饪大师的手下,火锅的食法已是千姿百态,从江南的元鱼锅,到四川的毛肚锅;从广东的生鱼锅、狗肉锅到山东的什锦锅,都是各有千秋,别具风味。尤其值得一荐的是日本的鸡素烧锅等更是花样繁多,令人垂涎。

我们巴林人,当然更为喜欢巴林火锅。大家知道,历史

上虽然各民族人民都一般喜欢食用火锅,但居住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过去庆贺喜筵和招待宾朋,一般都上“羊乌查”(即全羊)或“手扒肉”。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定乾坤,大犒群臣之日,曾大摆宴筵,上全羊,称曰:“乌查之宴”。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今天。宴客、祭奠,蒙古族始终以全羊为上乘之品。当然,随着人们习俗的改变以及对生活多样化的要求,如今逢年节或招待客人,在一些蒙族家,除了上奶食。上“扒肉”,也炒些菜,七碟八碗,有时也上火锅。但上火锅,一般只有主人招待最敬重的贵宾才上的,如同上全羊一样。近年来,春节请客,几乎家家都上火锅这道菜。

春节,是蒙古族的最盛大节日。蒙族人把春节叫做“查干萨日”,意为“白日”或“白节”,因为对蒙古族来说白色是纯洁、吉祥之兆的上色,所以蒙古民族常以白为吉。因此,他们把春节称之为“白节”。蒙古民族十分讲究熬年,即春节的前夕——大年三十整个一夜在蒙古包或新居室内外灯火通明,优美的马头琴声和嘹亮的歌声不断。人们常常通宵达旦,欢歌曼舞。天一亮,男女老少都换上了新的服装,晚辈给双亲和老年人叩头,献哈达,进行拜年,然后敬奶酒,祝愿老人和长辈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老人和长辈们也祝愿子孙们象小马一样成长,驰骋草原。

正月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摆宴喝酒,划拳唱歌。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开始上“扒肉”和火锅。火锅端上后,火锅门面对谁,谁站起来喝一杯酒,然后提着耳子将火

锅门转向冲蒙古包门口或居室门口的方向。火锅转止,其门背面对着的人,一般是贵宾和长尊。对着谁,此人将站起来先饮两杯酒,然后将火锅盖揭开,递给上菜的人,并敬主人一杯酒,对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接着,此贵宾再拿起筷子,从火锅里夹出点肉或菜,扔进燃烧着的火锅烟囱里,表示祭“锅撑子”,即祭火神。再夹点菜,往上往下扔,祭典天地;或者擎起酒杯,用手指轻轻弹洒几滴美酒,同样表示祭天祭地祭火神。上述仪程完后,众人才可动筷共餐火锅里的美味佳肴。否则,急于动筷者,要处于罚酒的。

上述仅是巴林人食用火锅的一般程序,但还有多样吃法,讲究这些,为的是活跃宴席欢乐气氛,达到助兴的目的所采取的劝酒办法而已。

是的,围坐在一起,尽情品尝着火锅里的美味佳肴,痛饮着巴林的“套马杆酒”,高唱着庆贺丰收的祝酒歌,谁不为之振奋?谁不为之高兴?!

让我们的新生活,永远像马奶酒一样浓醇,像巴林火锅一样香美、甜蜜!

巴林人的传统食品

——呼日森巴达

布和朝克图

呼日森巴达,即炒米。炒米,是巴林蒙古族的传统主食之一。是用糜子加工成的一种风味独特的食品。古代叫做“稷”,是北方少数民族很早以前的主食。

炒米的做法是;把糜子倒入大铁锅内,加适当的水,然后加火煮。在煮糜子的过程中,用大铲不断得搅拌锅里的糜子,使糜子泡胀大半熟为止。然后被泡胀的糜子掏出锅把水滴净。水基本滴完之后倒入约小半锅,加火进行炒。炒米时用特制的专门搅拌工具“胡特古日”不断的搅拌,当炒的糜子迸出花时立即掏出锅。这样把一次泡胀的一锅糜子,要分四至五次才能炒完。

把炒完的糜子拿到碾盘上进行加工去皮即成炒米。这种炒米可用蒙古族传统的奶茶和牛奶泡着吃,也可用奶皮拌着吃或可以做成粥等吃法多种。

炒米食用方便,适合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出野外,放牧出场等很适合的旅途食品。

于寿山烧鸡

陈文增

1944年至1947年期间,每天在大板大街小巷里有人叫卖:“烧鸡,熏鸡杂,五香的烧鸡!”这吆喝叫卖声是出自一个五十多岁,大个儿有点驼背,长瓜脸黄白净子的人。他名叫于寿山。世面上有个小小的绰号,人称“于傻子”。于寿山,甬说大板就连赤峰的大饭庄饭馆没有不知道他是一名手艺高超的“上灶”,没有肉他也能做出“二八席”来。1944年前他开饭馆,自己是掌柜(经理),又当“上灶”,到1944年改开烧鸡房。谁知他对烧鸡也是有顶上的绝活。他熏鸡用“老汤”煮熟,材料色用红糖,刷香油,用香柏木末熏。熏出来的鸡色紫红,味浓香扑鼻,吃在嘴里嫩香可口。于寿山熏鸡用料非常认真讲究,从不将就,因香柏木缺,他认可不熏也不用别的料代替,他为寻找香柏木,曾亲自去桃山峰巅沟壑寻找过香柏树。

鸡杂碎除肠、苦胆不要外,如鸡心、鸡肝、鸡胗……甚至鸡血也不扔掉,与鸡一起煮出来,每个鸡的杂碎用竹签儿穿成一串儿,同熏鸡一样的材料熏出来,同样是香味扑鼻。有钱的买烧鸡,钱少的花两角钱买串熏鸡杂解解扑鼻之香的

诱惑。

于寿山熏的鸡,那时有人给他评价,说鲜、嫩、香赛过沟帮子烧鸡;可复德经常买他的烧鸡,可说他的烧鸡比卓资山的烧鸡只好而不逊色。

于寿山每天熏的鸡,他挎个椭圆形食盒,大街小巷一转悠一吆喝,就卖完了。回来沏上一壶“白豪”茶,在墙上摘下他心爱的三弦,定定音:|5-1|25421|12165|42465|……弹上一曲《苏武牧羊》,这是这个身怀绝技的老师傅二天里最惬意的时候。

康熙下马石

郭振有

公元一千七百年(康熙四十五年)七号,康熙皇帝曾巡幸诸蒙古营地,并于八、九月扮先后驾临巴林。据《东华录》记载:“八月,辛巳,驻蹕和硕荣完公主第,九月,癸酉,又驻蹕和硕荣宪公主第。”

康熙皇帝起驾之前,一日闲坐在弘德殿里,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亲赴塞北蒙古驻地,顺便看看二公主固伦荣宪,再查看一下民情……。

京都,虽然歌舞升平,一派繁华,但皇帝老子久居深宫,也自感烦闷。康熙六岁当皇帝,十二岁那年为了弄清摄政王鳌拜搞好的“圈地”的真实情景,他背着皇祖母,曾与御前侍卫索额图一道微服亲赴纷乱的京畿一带私访民情。至今与侍卫牵着两头驮经卷的黑毛驴,艰难地行走在蓟运河岸的情景,虽时隔三十九年,但仍历历在目。

这次,下去的欲望似乎比上一次还要强烈。次日,康熙摘下头上的红绒结顶常服冠,脱下身上穿的绣着九条团龙、八宝平水和五色祥云的明黄色龙袍,换上一套微服,第二天清晨,只带少数随从,悄然离开京城,往塞北进发。

康熙先到了他曾亲征、平息噶尔丹之乱的东北诸蒙古营地,安抚了那里的民群,又返到巴林。这些日子,虽然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确实有些疲劳,但远离闹市的康熙帝却感到别有一番兴致。

野外出奇的宁静。遥远的东方不声不响地放白了,将那一望无垠的气象万千的大草原展现在康熙眼前,这使他登时胸襟开阔,豪情顿生。他很想赋一首词,将此时此刻的心境记下来,可从草丛深处窜出来的几只小兔,一下打断了他的思路……。

眼前有了猎物,一贯喜好狩猎的康熙帝兴趣大发,吆呼着随从,乘马追去……。正巧,一只獐子斜刺里奔过来,康熙勒转马头,从随从手里接过弓箭,左手抓住弓身,右手拉开弓弦,一放手,“嗖!”地一声,羽箭射出,獐子应声倒下。众随从欢呼起来。

康熙驰马勒缰地又跑了一圈儿,盯着逃窜的兔子,弯弓搭箭,“嗖嗖”连出二矢,小兔均被射中了。

好箭法!是的,康熙自幼就勤习相扑、射箭,已练得身体强健,武功超人。年轻时能挽十五力之弓,发十三握之箭。现虽已年过半百,但箭法功力仍不减当年。你看,稳坐在金鞍上的康熙皇帝如同一个年轻的猎手,那样猎术娴熟。据民间传说,建荟福寺(又称“虎庙”)的前一年,康熙巡幸巴林看望女儿时,曾在大板南部的巴尔吐山松林中猎获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后来被内充白草、眼嵌玻璃球,栩栩如生地供在庙中,这就是巴尔斯庙(即“虎庙”)一说的由来。

一路狩猎,骏马飞驰。眨眼间,来到西拉沐沦河沿岸。

喘,好水!从岸上望过去,明晃晃的一条长带,看不清波翻滚滚,只有河水击岸的声音随着阵阵晨风传入康熙的耳鼓,激起康熙皇帝诗情大作。

黄金布地焚王家
白玉面林腊后花
对酒不妨还弄墨
一枝清影写横斜

康熙吟的唐寅的七绝诗句。这首诗题在唐寅的《墨梅图》上,挂在乾清宫西暖阁里。书和画都是颂扬河旁磷岫山石上的梅树的。康熙非常喜欢这轴画,更笃爱面上的诗,幼年时特命乾清宫的太监将此诗画挂在抬头就能看到的阁壁上,每天要看几遍,背诵几次。

今触景生情,康熙皇帝又骑在马背上高声吟咏此诗,伴着涛涛的水声,言出他艰辛治国,梅喜傲雪一样的志向。同时,心上也就涌动起一股股春潮。尤其当他触目到那座飞架南北的巴林石桥时,这种情感更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般。

穿过巴林桥时,稳坐金鞍的康熙皇帝想了很多很多……

巴林桥,此桥唐朝时期便已建,曰:潢水石桥。长姑固伦淑慧下嫁巴林右翼旗札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后,因见河水澎湃,有碍民行,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重建此桥,因而又称“公主桥”。尤使康熙难以忘怀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他率兵平叛噶尔丹之乱,曾扼守此桥指挥了有名的乌兰布通战役,也称“万驼之战”。

今故桥重游,康熙皇帝浮想联翩……。他信马游缰漫步走过桥去,到桥头下马,将马拴在桥头跟前的一棵小榆树上,一面探问此地民间风俗;一面观赏石桥四周风景,并命令将此桥载入《热河志》内。

康熙让随从叫来当年修筑巴林石桥的匠人子弟,详细询问此桥的传说,并顺手解下蒙古袍微服腰带下佩戴的一个黄缙丝绣龙荷包,伸手递过去,龙颜大悦,高兴地说:“拿着,你们匠人当年修桥有功,这是朕给你的赏赐!”

钦赏御佩荷包,这可非同小可!这是皇帝恩赐近臣的一种亲切方式。凡是有幸得到荷包的人,都会把这看作是皇上给自己的崇高荣誉。何况接受御佩荷包的是一名小小的草民匠人——之子。他受宠若惊,激动得泪花立时涌出眼眶,一下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毕恭毕敬地接过荷包,嘴唇翕动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连连叩首,当抬起头看时,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已与随从,牵着马缓缓而去。

走后好半天,王府的梅林才轻声唤他:“哎,康熙皇帝走了。”他,如梦惊醒,抱起康熙下马踏过的石头,愣在那里。

至今,当地群众还能为你指点出那块当年康熙路过巴林桥而下马踩过的石头。这说明,不管是君臣王侯,只要为人民做一点小事,人民也不会忘记的。

03015

巴林文史丛书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辑)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印刷装订 巴林右旗鑫源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数 220 千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000 册

1-8 册(全套)定价:280.00 元